

三联
耳关

生活

2016.5.23
2016年第21期
www.lifeweek.com.cn

“权威人士”看经济

周刊

推广竞价、医院出租与生命尊严 魏则西事件追问



887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展望》2016.5

欣克利角 C 的难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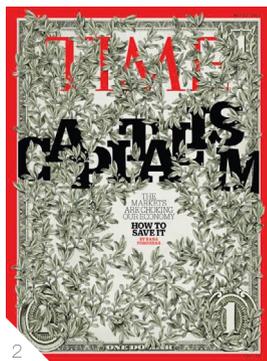
为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英国政府将建立核电工程视为减少国家碳排放的重要举措，欣克利角 C (Hinkley Point C.) 核电站项目正是其中的核心计划。欣克利角 C 采用的 EPR 反应堆主要由法国电力公司承建，然其持续飙升的成本已将法国电力公司的财务状况推入窘境。过高的成本和建设难度也使它在英国国内遭受质疑，反对声认为，该核电站会给电力消费者和纳税人增加负担，建议政府停止对这一“低性价比”项目的推进，寻求其他的核能发展路径。

1 / 《纽约客》2016.5.16 智能小球

Sphero 智能小球正在走进美国的一些小学校园，它不仅是玩具，也被视为有趣的教学工具，Sphero 同时支持 iOS 和 Android 设备，通过蓝牙与手机或平板连接，学生们可通过它在玩乐的同时学习到初级的编程技巧，同时培养想象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美国，一项教育领域内的 STEM 计划颇受欢迎，STEM 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据统计，仅有约 16% 的美国高中生在这些领域考虑自己的职业方向。将 STEM 整合进中小学课堂是应对这一现实、培养学生兴趣的尝试。

3 / 《经济学人》2016.5.14 阿拉伯世界的崩溃

阿拉伯世界的危机由来已久，但轻率地将原因归咎于西方强权、种族宗教、独裁政体等单方面都是很不妥的。解决阿拉伯世界的危机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需要打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赋予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逊尼派穆斯林政治权利，争取教派和解；需要伊朗与沙特取得谅解。这些都只是漫漫征程中的几个环节，而在冲突国家推行改革，更是统治者的责任。



2 / 《时代》2016.5.23 美国资本主义危机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美国 18 岁至 29 岁的年轻人中，只有 19% 的人认为自己是资本主义者，42% 的人表示他们支持资本主义。美国的经济体系正面临民众的信任危机。有观点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身已经受损，问题出在金融业的过度膨胀和实体经济的衰落，“经济金融化”是病因。现有的金融体系主要在服务于自身的发展，多数资本活跃在房产、股票和债券等领域，资本市场和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投资甚少。

4 / 《新闻周刊》2016.5.13 民主的选择

特朗普虽已成为可推定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却不得不对自己不受欢迎党内高层的现实。试图阻挠特朗普竞选之路的意图和行动还在进行，虽然他此阶段的胜利是因为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是民主选举的结果。选民的意愿不重要吗？由此牵出的对美国民主质量下滑的担忧开始发声。据经济学人智库 2015 年全球民主指数报告，美国的民主程度排在第 20 位。在美国的各类政治选举中，正常的输赢却常常伴随着政客对选民投票能力与资格的轻视和质疑。



P32

封面故事

推广竞价、医院出租与生命尊严

魏则西事件追问

- 36 魏则西，绝望处的生命尊严
- 42 漫长的原罪：医改市场化下的“专科”之路
- 52 搜索扭曲与竞价排名
- 60 人生最后一程，何时不再艰难？



P108 专题报道：黑暗入侵：走进阴影里的希区柯克

社会

- 时事：“石油大师”谢幕：沙特更换能源掌舵者 72
- 调查：辽西盗墓传奇，重寻红山遗址 82
- 乡土中国：“蒜你狠”与大理独头蒜 88
- 家园：12年后，重识侯登科 92
- 访古寻城：庞贝的密室 100

经济

- 市场分析：“权威人士”看经济 70
- 商业：自动驾驶是否引领汽车未来 104

专题报道

- 黑暗入侵：走进阴影里的希区柯克 108

文化

- 话题：《美国队长3：内战》：对于自我坚信我们可以付出多少 120
- 话题：《傲骨贤妻》：比女性主义更自由 124
- 音乐：“声音”与“未来” 126
- 旅游与地理：发现新波兰 130
- 时尚：一场商业，艺术和科技的混搭 138

- 科技：谁是药品的主人？ 144
- 科技：用DNA追寻欧洲的起源？ 148
- 思想：辉煌的古典 158
- 书评：凡·高之死，这很重要吗？ 160

专栏

- 邢海洋：逼虚就实的“堵与疏” 18
- 袁越：人为什么爱喝酒？ 153
- 苗千：从量子纠缠到量子计算 154
- 张斌：墙上的那个洞 156
- 宋晓军：普京会不计后果替别国“挡枪”吗？ 157
- 朱伟：刘心武：更自由扇动文学的翅膀（2） 164
-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66

（本期封面插图：张曦）

环球要刊速览	4	声音	23
读者来信	10	生活圆桌	24
天下	12	好东西	28
理财与消费	20	个人问题	168
好消息·坏消息	22		

2016年第21期，总第887期，2016年5月23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翔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晴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龚融 Gong Rong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图片总监 Photo Director

商园 Shang Yuan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非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内容编辑 Editor

薛凡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洽 Xu Ruihan

美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庄山 Zhuang Shan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阿润 A Run 邢宇 Xing Yu 孟佳 Meng Jia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尤帆 You Fan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不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 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934765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沧海书店 (0791) 8592810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017749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奔驰
2~3 · 凯迪拉克
5 · 科勒
19 · 中房
59 · 力度形象
69 · 智联招聘
87 · 周刊征订
99 · 野生救援
129 · 周刊 20 年
163 · 三联新知广告
167 · 书店广告
封三 · 中信银行
封底 · 太平鸟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鼠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五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我们为什么会变胖

我小时候生活的部队大院有一处奇观，就是礼堂前三排的座椅，一个座位至少有一个半的宽度。小伙伴一有机会就去争抢这些首长座，两两坐在一起看演出。那时候不光将胖视作正常、特有派儿，还能享有特殊待遇呢。记得一次拉练，出发时带队首长的肚子引发伙伴玩笑：人家背锅，他是锅背人。40天后返回，队伍中不见首长人影，后来听说他就在队伍里，肚子不见了，不好意思见人，低调了。原来，人们还是觉得有肚子才威风。现在观念变了，知识更新了，才知道肥胖不单事关现代审美，更是一种疾病，是需要控制或者治疗的。其中的种种，在这一期中了解很多，眼界大开。

武汉 赵洪崎

理想的城市

南方一卫视台，在讨论城市治理，有三位来自社区的代表“痛心疾首”，说整整10年了，我们所在社区的风貌就像农村，与省会城市、旅游城市的定位相去甚远。电视镜头恰好切到他们所在的社区，画面真的让我吃了一惊，这个吃惊不是因为“脏乱差”，而是我觉得他们所在的社区很美，我不明白他们为何要“痛心疾首”，要去改变。

首先是地处社区中央的一处丘陵，社区代表认为要“亮化”，要建游步道，要造凉亭……社区的临江地段，有一大块湿地，错错落落地长满了野花，还有鸟儿栖居。代表们认为要硬化，装上体育器材，作为市民的锻炼场地……我在心里说：“不可，不可！”可人家卫视台已经把规划建设部门的领导也请到了直播室，两个部门领导当场表态，马上做规划，争取今年改造完成，一锤定音。

什么才是真正理想中的城市？我想这既是一种理念的角力，也是一场实践出真知的角力。我生活在杭州的富阳区，富阳区往往会被认为是一个有点像农村的区，但从内心来讲，我喜欢这样的“像农村一样的行政区”。这里是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实景地，也是郁达夫的故乡。这里没有摩天大楼，也没有超大的博物馆，出门走几步，就可以看得见山、望得了水，居民的幸福指数很高。但非常奇怪，一对比大城市，身边的不少人就会有小小的自卑，觉得城市“家大业大”脸上才有光，最好城里造一幢全国第一高楼，如此才能扬眉吐气。

说起杭州，为什么人们马上会想起西湖、西溪湿地、钱塘江，

而不会想起武林商圈的商厦争高、滨江的CBD夜色以及萧山国际机场的航班像鸟儿群飞呢？自然永远是城市最为核心的资源，只有自然才能包容住人文历史，让人文厚重如初，并且栩栩如生。一个城市留住多少自然，她就具有多大的特质和气质。

自20世纪60年代始，一直有两种理论在争风，一种是以“大投入、大产出、大消费”为基本特征的“美国城市梦”，一种是“基于生活质量与可持续性发展的“欧洲城市梦”。“欧洲城市梦”的理念在于，他们理想中的城市不是纽约、东京、伦敦或巴黎，而更像中世纪的一些城市，譬如威尼斯，人口不过20万，城市“小而美”。把农业景观、生活方式渗透在城市中，工商业及市井生活水乳交融，欧洲中世纪城市在城市环境、城市管理与生活水平上取得的成就，是今天现代化城市难以达到的，几乎是所有现代化大城市的一个梦想。

杭州正在走向国际化城市，她的底气或者底牌，实际上是“自然”，也就是城市景观与自然景观的交融，这是杭州要打国际牌的特色，也是考题，杭州的将来肯定不是上海，不是北京和广州，更不是纽约、东京和巴黎，杭州应该是一个有山有水有乡愁的城市，有生活质量和持续发展，完全有别于教科书中所说的大城市的那种“大城市”。

杭州富阳 流沙

“中国式候机”升级

“五一”小长假期间，笔者陪家人去西南某省度假，返程途中却在机场遭遇空前的精神折磨，让我不禁生发疑惑：难道“中国式候机”出现了升级版？

飞机晚点在中国可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家常便饭。虽然在飞机跑道上苦等数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堪称许多民航旅客的噩梦，但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旅客而言，现实就是如此，你能奈它几何？民航方面认为，航空管制、天气原因和航空公司需要分别承担三分之一责任。美国航空数据网站公布2015年7月份全球航空公司《正点率表现报告》也显示，中国航企排名垫底。我所谓“中国式候机”升级版，是指航空公司随意取消航班的做法。

以我5月2日返程为例，其任性随意的表现起码有三：其一，事前通知太迟太突兀，让旅客措手不及。我预订的是当日S航18点10分起飞的飞机，当我们正赶往机场途中的14点49分时，突然收到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的通知，且无改签航班等预案信息下文。也就是说，离起飞前3小时21分才通知取消航班，此时旅客几乎都在赶往机场的路上，请问是选择去机场还是返回？其二，事中处置混乱，让旅客诡异惊愕。我们到达机场后，S航方面仅以“天气原因”解释事由，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在我们的要求下，为我们改签，一行14人只能12人改乘17点30分的航班，其中我妻子签成，我改签不成被留下。正当我气不打一处来时，已拿登机牌过安检排队登机的我妻子等4人被通知不能登机，只得将已办过托运的行李退出拉回。其三，事毕善后不力，让旅客无以

安慰。在我们的要求下，S航将我们改成20点25分起飞的另一航班，办妥手续候机时又遇晚点，被告知飞机预计要到将近次日1点才能起飞。估算这架经停飞机抵达最终目的地已近天明，与其今夜无眠折腾通宵，不如选择再改签次日航班。于是我们又改S航次日10点10分的飞机，将行李退出时已近次日零点。因被S航安排到宾馆休息错过机场大巴，打的又遇拒载，只得花80元打黑车到宾馆，一直折腾至凌晨2点多才入睡。虽然经过理论，S航方面给了最低限度的说法和安置，但本次经历仍然让我想来心有余悸难以释怀。

对于经常乘坐飞机的旅客而言，虽说航班延误和糟糕的沟通令他们不爽，但不少人已然神经麻木习以为常。那么我要提醒，对“中国式候机”升级版，理当引起高度重视。如若相关方面对晚点延误痼疾一时半会儿尚难找到治本办法，那么我要说，现时防止“中国式候机”并发症变异蔓延，可谓当务之急。

江苏扬州 陈庆贵

村主任的拳头

我的家乡在农村，虽然现在很少回家，但经常可以从父亲和大哥那里听说家乡的事。前几天，听父亲说我们家的邻居——一个姓李的老实巴交农民因为跟村委会主任讲话时抬杠，被村委会主任连扇了七八个耳光。父亲说，被打后的第二天，那

个姓李的农民带上两个儿子一起去村委会主任家里，不是去报仇，而是去道歉。这件事被村里人当成一个笑话。

这是一起再简单不过的事件，可是却有着不简单的背景。这个村委会主任，从我出来上大学起，已经在村里连续当了15年的主任了。此人文化水平不高，性格有点像梁山好汉李逵，开口就骂娘，一激动就动手，尤其喜欢打人耳光。那时我都不敢正视看他。这么多年过去了，相信他又积攒了更多的威势，让村民们因恐惧而躲得远远的。以前社会上有民谣说：某某级别的领导是打出来的，某某级别领导的是喝出来的，某某级别的领导是买出来的，某某级别的领导是生出来的。虽然失之偏颇，但也反映出一些现实存在的丑恶现象。就拿村委会主任这样的基层干部来说，似乎拳头不硬，就很难开展工作。

过去在村里，确实会有一些豪强势力，例如仗着家里兄弟多，目无法纪、横行乡里、欺软怕硬的。遇到软弱的村委会主任，连电费都收不上来。因此上级部门会推选一些做事泼辣果断、甚至有些流氓手段的人来以毒攻毒，维持村里正常的秩序。村委会主任要想镇住当地强人，讲文明、讲礼貌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好拳脚，再加上一些谋略，能镇住一部分人，再拉拢一部分人，这样才能

在村里说得上话，站得住脚。这在上级看来，是一种治乱的能力。没能力的干部被淘汰，有能力的干部被重用。另外村委会主任还得会捞钱，如果过于清贫，反而会被村民看不起。遇到选举时，像这样“南霸天”式的爱打人骂人的“强人”反而得票率高。村委会主任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有自身素质的问题，也正是这种筛选方式的负面结果。

正如吴思先生所说：“中国人从自己的悠久历史中发现了核心秘密，发现了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暴力强者说了算，或是拳头硬的说说了算。”任用这种干部管理基层，短期内能见到效果，豪强势力俯首，普通村民听话，但这种“元规则”的后遗症也很明显：有些基层干部可以只手遮天，称王称霸；有些群众在暴力管束中养成习惯，服打不服管，不利于将来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容易产生干群对立情绪，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如今基层乡村也在步入法治社会，打出来的村委会主任，即将成为一个历史产物。也许在不远的将来，管理分工进一步明确，维护治安的责任分解到职能部门，村委会主任不再需要喜欢动粗的李逵。群众也都习惯依法办事，也懂得维权，基层这种暴力型干部也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乌鲁木齐 陈湘涛





印度尼西亚 | 制作甘美兰

5月13日，印尼爪哇岛中南部城市日惹，一名工人在制作甘美兰乐器。甘美兰是印尼历史最悠久的一组民族乐器，又以峇里岛及爪哇岛的甘美兰合奏最为著名。主要的乐器有钢琴类、木琴类、拨弦和拉弦乐器，以及鼓、锣、竹笛，有些曲目亦可以加上演唱者。甘美兰是整队组合的名称，“甘美”（gameIs）在印尼语里意为敲击，而字尾“兰”（-an）用来标示名词，合起来即敲击乐的意思。甘美兰除了成为印尼的宫廷和宗教音乐，也对20世纪的西方音乐影响很大。



德国 | 莱比锡哥特音乐节

(右图)当地时间5月13日,一年一度的德国莱比锡哥特音乐节(Wave Gothic Festival)举行,预计将吸引近2万名哥特和黑暗文化爱好者参加。这场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和黑色文化节会持续至5月16日。图为哥特艺术爱好者身穿复古风格的衣服参加音乐节的“维多利亚式野餐”活动。



英国 | 反腐峰会

(左页上图)5月12日,英国政府在伦敦兰卡斯特宫召开首届国际反腐败峰会,旨在强化国际反腐合作,提升国际社会对于国际腐败的曝光、惩治和预防力度。抗议者头戴绅士帽,其中一位装扮成英国首相卡梅伦的形象在峰会会场外抗议,要求改革英国皇家属地和海外领土的离岸避税天堂。

美国 | 巢穴艺术

(左页下图)5月13日,美国与北欧五国(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领导人在华盛顿召开峰会,就北欧地区的安全防卫及国际合作等问题进行探讨。峰会期间,奥巴马总统夫人米歇尔参观伦威克美术馆时,在美国当代雕塑家帕特里克·多尔蒂(Patrick Dougherty)的艺术作品《Shindig》里留影。





英国 | 伦敦轰炸纪念

(左图) 5月8日消息, 为纪念伦敦轰炸结束75周年, 出现了一组电子合成照片, 这组照片将伦敦城现在的繁华和“二战”中伦敦大轰炸时期的样貌合成在一起进行对比。黑白照片拍摄于1940年10月15日, 一辆停在伦敦蓓尔美尔街上的亨伯汽车在空袭中被炸毁。“伦敦轰炸”是“二战”中纳粹德国对伦敦实施的战略轰炸, 发生在1940年9月7日至1941年5月10日间, 轰炸范围遍及英国的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 但以伦敦受创最为严重——被轰炸76昼夜, 4.3万名市民死亡, 约10万幢房屋被摧毁。

德国 | 环保

(下图) 5月13日, 德国施普伦贝格, 一批环保人士在韦尔措南镇(Welzow Sued)露天煤场抗议, 要求关闭煤场, 呼吁使用可再生能源。



逼虚就实的“堵与疏”

文 / 邢海洋

证监会对跨行并购与中概股回归放下闸门，将资本市场虚拟炒作资金逼入实体经济的用心可谓良苦。可所谓“马不吃草强按头”，前有高企的土地价格和人力资本，后有网上借贷动辄几百亿元血本无归的教训，民间数十万亿元的资金仍无处可流。资本市场治理的“堵与疏”，因缺失了疏导的环节，管理层只能陷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疲于应付。

梳理证监会痛下狠招的前因后果，“两会”后的壳资源炒作可谓是一个直接诱因。“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行了两年之久的注册制只字未提。而去年底全国人大给予国务院的注册制改革授权却是从3月1日开始，以两年为期。政策转向直接导致了市场预期生变，壳资源于是预热，“十三五”规划纲要删除“设立战略新兴产业板”更是火上浇油。自3月份以来壳资源股价普涨约四成，一些垃圾壳公司、僵尸企业则被炒上了天。二级市场炒预期，一级市场则是一壳难求，不少壳公司因此待价而沽、坐地起价，甚至疯狂到跟壳公司老板见面也要价千万。

供给侧改革在实体经济层面去产能，虚拟经济中当然也应该清除掉僵尸一般的空壳企业。5月13日，去年底因“中国好同学”名噪一时的*ST博元正式退市，这是自2014年《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实施后，A股市场首家因重大信披违法而遭退市的公司。但自该《意见》实施一年半以来，A股也只有这一家企业退市。而早在2012年，证监会就开启了退市制度改革，两年之后连续4年亏

损的*ST长油被强制退市。几乎每出台一次改革，作为政策实施的标志总会有一家企业“中枪”，这次若不是*ST博元董事长许佳明的高中同学“不愿意看到公司退市”，自向公司无偿捐赠8.59亿元的举动太过奇葩，也不会引起如此大的舆论反弹，直接导致*ST博元“中枪”。作为资本市场净化器的退市制度本来是保障市场优胜劣汰的重要机制，是抑制投机炒作的重要环节，在A股却纯粹是作秀。既然“中枪”概率低得可以忽略不计，壳资源的投机就永远不会停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ST博元最早的名字是浙江凤凰，上交所开市的“老八股”之一，随后数易其名以保壳。

资本进入实业，而非作为“中国最慷慨的同学”捐赠给壳公司，重要的驱动力量应该是有利可图。2008年巨人网络登陆纽交所，上市首日收盘创下接近50亿美元的市值，2014年私有化摘牌时，市值缩水近一半。今年4月，巨人网络成功回归A股，作价130.90亿元人民币入“壳”世纪游轮，目前总市值近600亿元人民币，利之所在，难怪中概股竞相回归。据清科报告，4月企业并购案刷新历史记录。围绕着中概股回归、公司并购等的资本运作，一条产业链早已形成并日渐壮大。据统计，2007~2014年，资本运作类定增平均收益率高达80%，项目融资类定增平均收益率为25%，上万家企业参与其中。而这一切都根源于A股市场的高估值、易炒作。正是因为产业界不能在A股实现自由的吐故纳新，这里成为全球最炙手可热的套利源。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监管层“堵”住资本市场的投机出口无疑是必要的。可就在市场盛传证监会动作频繁，对资本套利说“不”的时候，美国的高端制造业不断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无论是私营企业Space X回收了火箭推进器，还是靠众筹成立的美国初创公司Hyperloop One完成了超级高铁推进系统首次户外测试，都使我们见证了资本与实业互动的奇迹。此刻，我们难道不应该思考仅仅靠围堵是不能将资金顺畅导入到实体经济的，在资本市场的兴废改革中，建设远远比否定更为关键。而当前市场混乱局面的加剧，很大程度上难道不是来源于对注册制改革这个根本的拖延与躲避？

世纪游轮股价





造心由境

茶空间·专业手工定制者

都说“物随心转，境由心造”，
我们也希望努力，
在这样一个喧嚣时代，打造一块心灵栖息之地。

在中房，“老物新生”，
每一条木纹里，都镶嵌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可以感受得到它的存在。

欢迎自行提供承载着属于你自己记忆
或传承的老物料，
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小世界”。

老木茶盘的新生



中房微信号

杭州中房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转塘镇贤家路

电话：13456852656；13588014351（袁小姐）



栏目插图 | 范薇

进口肉

美国猪肉因含有瘦肉精一度被中国限制进口。2013年双汇收购了史密斯菲尔德，开始专门为中国市场生产不含瘦肉精的猪肉。今年，两国价差拉大，美国猪肉成本1.2万元/吨，在中国市场终端价格为3万元/吨，吸引贸易商蜂拥而入，一季度我国猪肉进口28.6万吨，同比增加90.3%。美国猪肉是否能够平抑中国猪肉价格？短期看似很难，中国去年猪肉产量5487万吨，进口100万吨仍不超过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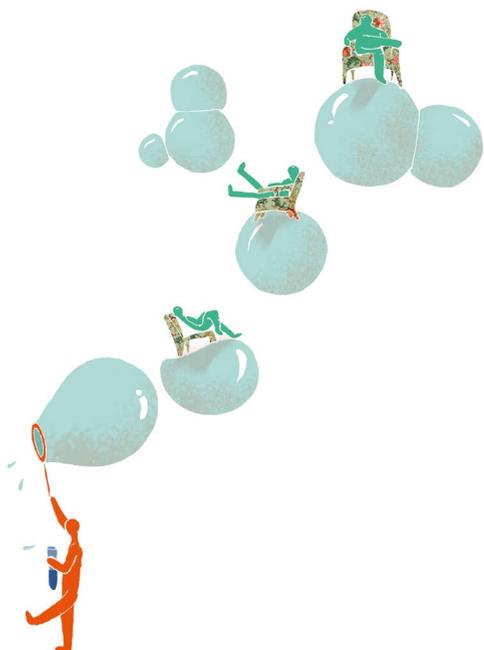
定增受限股

证监会叫停上市公司跨界定增，涉及互联网金融、游戏、影视、VR四个行业，且这四个行业的并购重组和再融资也被叫停。市场反应激烈，共达电声因定增收购影视资产、恒天海龙因定增收购游戏资产而遭抛售。不过，对于2015年至今千余个定增预案，跨界定增比例并不高。116家上市公司定增目的是跨界收购，整体占比并不大，即便在少数的定增跨界中，只有17家涉及上述四大限制性行业。

大豆爆发

5月10日，美国农业部下调全球大豆供应预期，国内农产品期货集体爆发。报告称，受南美洲大豆产出下滑的影响，今年全球大豆供应下调至7425万吨，较上个月的预期下调近300万吨。其中，洪灾将使阿根廷减产250万吨，旱灾则影响巴西100万吨产量。南美国家对全球大豆和玉米的供应举足轻重，阿根廷是世界第三大大豆出口国、第二大玉米生产和出口国。南美经济动荡、货币贬值打击农业生产，或成为扭转全球粮食过剩的先行力量。





企业债“高危”

国际金融协会发布报告，过去10年，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债务规模增长了5倍，达到25万亿美元；同时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发行的垃圾债券创新高。全球企业债已达到极端水平，从一些衡量指标来看已远超雷曼兄弟破产前金融泡沫时。目前企业债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一方面，不少大企业坐拥大量现金，例如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大企业持有的现金分别达到1.6万亿美元、2.2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很多小企业积累了巨额债务。

限制中概股回归

中概股大批集中回归，在美私有化金额巨大，增加人民币贬值压力。而大量国内借壳上市溢价较高，融资过多也将抽取股市资金。有鉴于此，证监会透出口风，将考虑对中概股回归估值按照一定的市盈率进行限制，并限制每年中概股借壳回归交易的数量。消息一出，正在私有化的企业股价应声下跌，5月5日到8日，世纪互联累计跌幅达29%，陌陌跌25%，欢聚时代跌22%，当当跌21%，奇虎360跌14%。

欧洲又沉沦

在廉价石油、欧元贬值、欧洲央行QE的刺激下，欧元区迎来曙光。可3月，德国工业产出下降1.3%，法国工业产出下降0.3%。制造业扩张停滞，欧元区一季度0.6%的GDP增长初值显得过于乐观，可能不得不下调。随着欧洲央行刺激措施效应的消退，隐藏在经济深层的问题重新浮出水面。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又陷入了公共财政问题，整个欧元区服务业通胀率过去6个月仅为0.2%，离通缩并不太远。



人机大战机器赢

金融杂志《Institutional Investor》发布的顶级对冲基金经理年度榜单中，前八位中的六位都是量化分析基金，即依赖计算机算法程序投资的基金。相比之下，2002年只有两只量化投资对冲基金上榜。15年时间，机器人投资改变了金融交易行业。量化基金更像技术公司，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聘用前苹果高管为CEO，Two Sigma在数据科学、机器人学习、云计算和软件工程方面都有涉猎。



污浊的城市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从2008到2013年，全球空气污染程度上升了8%，重灾区集中于城市。调查所覆盖的城市居民中，80%的人暴露于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污染空气之下，从而面临更高的呼吸系统疾病、脑卒中、心脏病和肺癌风险。研究者指出，低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空气污染问题最值得担忧，但在高收入国家，仍有56%的城市人难逃空气污染的威胁。不过，在过去的5年中，随着各国政府对空气质量问题的重视，半数以上的高收入国家城市和1/3的低到中等收入国家城市空气污染水平降低了5%。

好消息

听妈妈的话

挪威科技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小组日前指出，对于选择终身伴侣的问题，即便是一个自身爱情经历不靠谱的妈妈，给女儿的建议也往往是理性中肯的。女性选择自身伴侣时只关注外表，但当为亲人出谋划策时，则会更重视那些让家庭稳定的因素。



肥胖的转机

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的研究小组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至少在丹麦，肥胖导致高死亡率的问题在过去的40年中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1976到1978年，肥胖者的死亡率要比体重正常者高30%，但到2003年之后，两组数据已经持平。



坏消息

爱人难爱己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小组对280名家中有重症病人并肩负主要照顾责任的研究对象进行追踪调查后发现，43%的人出现了抑郁症状或被临床诊断为抑郁症。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与照料者是否抑郁并无显著关联，但低收入的年轻照料者最易抑郁。



小礼品与大处方

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上的一项调查显示，那些经常从医药公司代表那里接受小礼物和其他好处的医生，更容易有意无意地为病人开出品牌药大处方。数据显示，医生收到的好处每增加1000美元，开具品牌药处方的概率就会增加0.1%。

布罗茨基热爱废墟，因为它们同时证明了衰败和生长。只有在从顶点往下的道路上，我们才能意识到曾经到达过顶峰。只有那失去的天堂——诗人布罗茨基称之为“逝去的极乐世界”，对我们才是真实的。

——亚历山大·格尼斯，《布罗茨基在纽约》

我们这个时代的戏剧，是所有人的命运正日趋雷同……一切都陷入了对比。马克思把经济加以比较，想象了一个世界公社。达尔文把物种加以比较，想象了一个生物进化的世界家族，弗雷泽比较魔法、仪式和诸神，想象了一个崇拜的世界——到19世纪帝国主义者的扩张又迈向了一个更大的人类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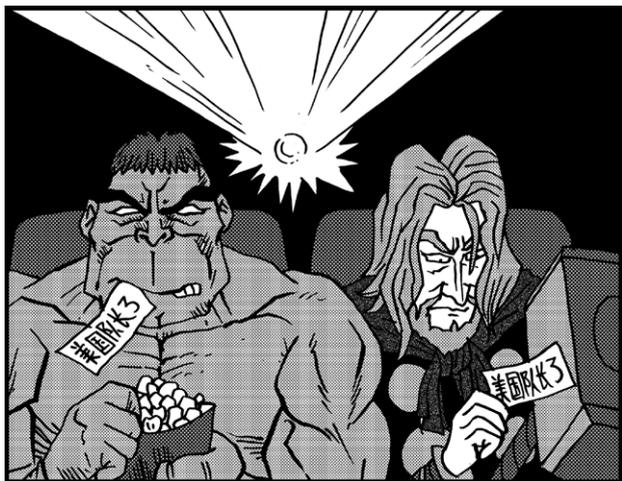
——美国诗人罗伯特·邓肯，《分享的仪式》

书名道出了一切：集体行动的逻辑（个人的理性选择往往会导致集体或非理性的结果）。

——一位老师评论《欢乐颂》女主角安迪的一句“最爱的作者是曼瑟尔·奥尔森”直接导致奥尔森的书《集体行动的逻辑》卖断货这一现象。

我想所谓孤独，就是你面对的那个人，他的情绪和你自己的情绪，不在同一个频率。

——理查德·耶茨



(插图 山羊胡)

一年又十三天前，我失去了我的丈夫戴夫。戴夫的死深刻地改变了我。我理解了悲伤的深度和失去的残酷。但我也明白了，当生活让你陷入悲伤之海，你可以奋力挣扎、让自己的头浮出海面，再次呼吸。我明白了，在面对空虚或任何挑战时，你都可以选择快乐和意义。

——谢丽尔·桑德伯格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

数字

+

57

公里

经过近20年的艰苦施工，瑞士圣哥达隧道于近日基本竣工。该隧道长约57公里，穿越瑞士阿尔卑斯山脉底部，已超过目前世界最长的隧道——日本的青函隧道（全长约23公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隧道。通车后列车可以在20分钟内穿越阿尔卑斯山。

4

名

4名中国警察要在意大利工作两周，负责保护中国游客。2014年中意两国签署了双边警务合作协议，是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首个这样的协议。在意大利，中国警官没有权力逮捕人，但他们和有逮捕权的意大利警官结伴行动。



2~4

英寸

妮拉·索普第一天去普华永道在伦敦的全球总部当前台接待员，结果还没领薪水就被请回家了，原因是她穿错了鞋子。为普华永道输送工作人员的人才中介机构Portico规定女性要穿高跟鞋：鞋跟要在2英寸到4英寸之间（约5到10厘米）。其着装要求还规定了可以接受的指甲油颜色：紫红色是允许的，但绿色不行。



定海神针

文 / 冯大夏

图 / 谢驭飞



楼上有个胡奶奶，上班时是某三甲医院神经外科专家，据说给很多大人物动过手术，曾经十分风光。特别是她的开刀技术很好，成功率极高，人称“胡一刀”。

她还有个瘦瘦小小的搞中医的丈夫，曾在一家小中医院工作。很多学西医的看不起学中医的，胡奶奶也是这样。我记得十几年前她刚退休，在楼下等着接她去做手术的小轿车，望着她丈夫骑着单车去坐诊的远去背影，狠狠地说：“要不是当年组织决定，我会跟了他？在这个家，我才是定海神针。”

胡奶奶由于年纪大了，眼神也不太济了，而且现在很多电子医疗器械她越来越陌生，请她去动手术的越来越少。胡爷爷倒是印证了“中医越老越吃香”，家里经常有慕名而来找他看病的人。据邻居说，胡奶奶当然接受不了这个落差，决定要在70岁学中医。她当然看不起赤脚医生起家的胡爷爷，所以就自学。她觉得自己曾经是做手术的，手下有准头，就专门研习针灸。凭借着深厚的医学功底，考取个针灸证自然不在话下。关键的问题是——谁来当病人？

一向清高的胡奶奶开始主动跟多少年都没说过话的邻居们搭讪，没说几句就开始说“您的气色有点儿问题，没事儿可以到我家免费号号脉”。有一个嗓子疼的大妈来到她家，她便摆出正在研习的金针、火罐、艾条、刮痧板和橡皮人让人家参观。最后还是选择了她最中意的针灸。怎奈得

她初次上手，认穴还不是很准。连扎两针，都给扎出了血。胡奶奶一边说“你血小板的凝固力差”，一边却不敢再扎了。大妈说：“你不是专家吗？”她说：“我是西医专家。”大妈说：“你得赔我。”胡奶奶见状连忙说：“你体内有淤气，放放血也是好的，你看你的血都发暗，敢不敢让我给你来一针？”大妈听罢，仿佛看到了绝望，也不管自己的嗓子了，赶紧从她家出来了，逢人就说她家是刑具陈列馆。

楼里的人已经把胡奶奶看成异类了。她只好把寻找患者的途径扩大到了附近小公园的人群中。同时她也加紧了研修针灸的力度。但是，公园跳集体舞的大妈传播消息的速度有时候比朋友圈还要快。胡奶奶有治病救人的胸怀，但苦于没有机会施展。据说她整天手里拿着根针到处转悠，嘴里老唠叨着要老有所为，见什么都要扎一下，连大小伙子见了都要躲她一躲。

有一天，我在街道社区报上看见一篇文章《某七旬奶奶协助警察捉住汽车扒手》，文中说到某老人在公交车上看到小偷行窃，在小偷手刚抓到钱包之际，突然一枚金针斜刺里飞出，正中小偷手指，针把钱包和小偷的手串成了串。正有一反扒民警在车上，小偷就地落网。老太不留姓名，只留下一句：“医者仁心，定海神针。”

我想，这定是胡奶奶干的，这是积攒了多长时间的愤懑啊。就是不用针，光用点穴估计小偷也受不了。不过，小偷也是活该。我更想知道，被扎的黑手流没流血。☑

牙疼

文 / 尖脚猫

图 / 谢驭飞



小小的过道里挤挤挨挨坐了二三十个人，坐在陈芬旁边的老太太已经开始冒汗，她穿得的确太多了，这会儿也只是把领口的扣子稍微解开一点儿。“这天气忽冷忽热的。”她对陈芬说。陈芬微笑附和：“是啊。”老太太又问：“你是头一次来吗？”陈芬说：“不是，之前来过几次，今天来杀神经。”老太太很明白的样子，说：“就算能一次治好也得让你跑两趟。国外这些牙医最挣钱了。”“国内还不是一样！”旁边有一个妇女搭腔。大家都表示同意，不久就有面无表情的护士出来叫大家安静一点儿。大家的声音低下去了，此刻能清晰地听见钻牙的机器声，陈芬的牙疼起来了。

陈芬是从上个星期开始牙疼的。那是在女儿青青跟她说了想和赵大维结婚之后。青青说赵大维想结婚后和她住在他父母家。陈芬尽量让自己面部表情平和地听完，青青见母亲不说话，小心地问：“您怎么看？”陈芬让青青先把自己的降压药拿来，又接过青青递过来的杯子，把药吃了，然后说：“是你们两口子过日子，你觉得怎么样？！”青青大为恐慌，一旦母亲让自己拿主意，那就是动了气了。于是她很坚决地说：“我当然不同意，我是家里的独女，我想还是离您近一点好……”大约是药效起了作用，陈芬觉得好些了，她说：“不用净想着我。当然你们愿意挨

着我，我不能拒绝。毕竟咱家房子大，人少，西屋我早准备给你们腾出来了。大维收入不多，在外面租房子太贵，又不稳定。你再和他商量商量。”青青说：“不用商量了。当然听妈的安排。”

隔天，赵大维和青青一起到家里来。喝茶的时候，赵大维说：“阿姨，我听青青说您想让我们跟您一起住？！”陈芬说：“是青青舍不得离开我！”大维还是坚持说想和青青在外面租房子住，理由很多，好像想要个人私密空间。陈芬决定明天一早爬起来去看牙，如果医生建议不拔，就先杀神经吧，有人说能不杀神经就不杀，因为一旦杀了神经，牙就变成了一颗死牙，没有了活力，可是那也不能任由它一直疼下去啊。长痛不如短痛。

老太太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小手绢来擦汗，如今用手绢的人不多了，都是用纸巾，那种一次性的，看上去很干净，还带着香味。老太太说：“现在什么都是一次性的了，不像我们那时候。”陈芬说：“是啊，从前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汽车，也过得挺好，现在到处是汽车，却四处堵车，堵得人心焦。”说起堵车，陈芬想起一件事来，给青青打了一个电话：“你还是让大维早点儿把他的东西搬过来，我好看看西屋怎么安排。”电话那边女儿的声音低而细，像潺潺的流水声，短而急促。☑

现实里的电影

文 / 张俊杰

图 / 谢驭飞



现在是凌晨1点42分，距离影片结束还有12分钟。我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屏幕上不停闪烁的帧数。我没有在电影院，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喜欢电影院的氛围，周围黑漆漆的一片，时不时地还会从某个不知名的角落里传来一声怪声、人声，这些在我的眼里看起来怪吓人的。可最令我感到恐惧的是那种突如其来的屁声，一声巨响，熏人的臭气从棉质的椅子里透出，弥漫在整个影院里，使得我不得不从电影的世界里硬生生跳回到现实里来，捂住鼻子，还要摆上一脸无辜的表情。

除了眼前的大屏幕外，我一无所爱。我不是一个爱电影的人，除了画面看起来很唯美，让人惊叹的特效外，吸引我的只剩下那些有料的剧情了。事实上并非任何一部电影都是有料的，该怎么辨认这部电影是否能够抓住人的眼光呢？现在的观念是抓出一大群明星，画上一脸浓妆，身上能多露则多露，然后在布景上摆弄多一些特效上去，让整部片子看起来很完美，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商业机密吧，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吸眼球的方法。可说来也怪，即便是商家这么做，看起来一点诚意都没有，网络上都是一片骂声，可到了影片一上映，人们还是会忍不住乖乖地为此买单。

现在影片还剩下5分钟，对于剧情的演绎，我早已没有了任何的兴趣，现在的我只是想单纯地看完这部电影，然后好好睡上一觉。我想这段浪费的时间虽然看起来浪费得很冤枉，但起码能让我睡上一顿好觉，也是能让人说得过去的。但有的电影甚至不值得去让我挥霍时间，说白了，连我想睡觉的兴趣都没有了。有时候电影的进度看得让我都想给整个剧组集资一个基金会，顺势给他们找上一群专业的演员和设备，教教他们什么叫作电影。不是说他们拍的不是电影，他们只是在浪费电和生命罢了。

影片还剩下1分钟，结尾的歌曲挺好听的，比起整部片子，我宁可坐在电脑桌前无限循环它个1小时30分钟。电脑该关了，影片结束了，现在是凌晨2点，指针仍在椭圆的钟表里无限旋转。秒针要完整转上一圈的话，需要用上60秒，可是在第61秒来到之前，我会想到，秒针得完整地转上一圈才得以完成需要60秒的工序，可下一秒却不同，因为下一秒永远都是新的一秒，即便是60秒后也是如此，今晚我失去了1个小时30分钟60秒，就意味着我还有下一个60秒可以珍惜，但在下一个一秒来到之前，就把自己只留给这个世界好了。☑

生活失效之疲劳点蚀

文 / 艾特子衿

图 / 谢驭飞



M小姐是标准的工科女。所谓标准，并不是指M小姐貌若无盐、面容乏善可陈，而是说M小姐所修的专业足以担当得起工科的名号：机械设计基础。M小姐是这个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既甩得起长裙又玩得转物理，厚厚一本机械设计在她看来，熟练度不亚于小姑娘的正红色唇彩。

M小姐的机械老师是一个年逾半百的谢顶憨厚男子。开课的第一天，他翻开书开始讲课，并不像其他老师一样来一段长长的独白。老师的特立独行让M小姐对这门课产生了兴趣。不讲废话长驱直入这一点，在M小姐看来特别有生活气。M小姐想象力丰富，她认为，所谓机器出故障跟人生病了是一个道理。那么机器的检修就如同给人挂号，把油加满继续上路。

最让M小姐感兴趣的是一节关于“疲劳点蚀”的课。为了机械能够运行正常，所加的负载不能超过机械的许用载荷。然而饶是毕恭毕敬地跟着说明书来，一段时间以后，机器也会报废。老师拿着细长的教鞭指PPT上的机械剖面图中一个小小的接触点：零件的受载接触点。虽然并没有超过许用载荷，但是两个零件长期以来点接触，接触面受到很大的局部应力，长期以来，造成疲劳点蚀而失效。动图循环了几次运转步骤，然后咔

嗒一声，报废了。

在大学一年级的時候，M小姐交了一个男朋友，工科学院的尖子生，篮球队里的翘楚。男生每天都能和M小姐巧遇，来回几次，她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了。一开始，男生每天早安晚安，送饭送水，鞍前马后。M小姐不懂得爱情是什么，有时候她觉得，或许爱情就是男生说给她的甜言蜜语吧，诸如永远永远，诸如我爱你。

那究竟是哪一天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呢？M小姐不记得了，她只记得QQ上的聊天信息，时间显示的已经不是几点几分、不是今天昨天，而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日期，久远到精通数学的M小姐要掰着手指头算一下才能理清。

M小姐爱收拾屋子，每过一段时间，她就会把一些用不到的东西丢掉。人生没有维修这回事，你必须靠不断的丢弃才能获得干净的屋子和干净的朋友圈，M小姐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既然疲劳点蚀避无可避，不如就正视这个现象，让该走的走，该回收的回收。M小姐伸了伸懒腰，顺便给男朋友发了一个分手短信。☑

本栏目投稿邮箱：mensula@sina.com

盗梦空间椅

来自罗德岛设计学院的学生 Vivian Chiu 利用大小镶嵌重叠的方式设计出椅子 Inception Chair。每把椅子的座椅骨架内边缘都有手工切割的凹槽，这些凹槽的尺寸都经过精细测量，使得不同大小的椅子能够紧密贴合。齐整的水平线带来了无限延伸感。



瞬间救援垫

来自台湾的设计团队设计了一款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变身逃生梯的救援气垫。当出现海难或者空难等危机时，装备会以高空二氧化碳为动力，使气囊充气膨胀弹出船身或机身。气垫面积可达 50 平方米，可供身体虚弱的逃生者充分休息。

密码钥匙锁

为了帮助人们解决钥匙丢了就必须换锁的烦恼，设计师 Liao Hung Lin 发明了这款配有数字密码环结构的钥匙锁。因为每个数字都有独一无二的凹槽或凸起方式，只有将钥匙端跟锁芯端的密码设置一致才可打开门锁。一旦某一端损坏或者丢失，更换一组密码即可让原来的开锁路径失效。



Hi-Fi 耳机

Edition S 是 HiFiMAN 推出的头戴式动圈耳机，频响范围 15 ~ 22000 赫兹，阻抗 32 欧姆。机身采用航空铝材质，可折叠设计，它的独特在于做到了集封闭式耳机和开放式耳机于一身。



多功能洗衣机

设计师 Chanhee Han 发明的这款 SOLO 单人壁挂式洗衣机，是一款集洗衣、熨烫、挂晾多功能于一体的概念洗衣机。外形设计简约、时尚、科幻，且小巧而节省空间，非常符合现代居家文化中对空间高效能利用的倡导。



魔幻折叠电动车

这款名为 eFOLDi 的百变助动车由英国一对华裔父女发明，并荣获了英国 2016 年度创意奖大赛冠军。折叠后的 eFOLDi 可当手提行李箱随身登机使用，落地后还可以当作电动助力车或购物车使用，250 瓦高效马达，最高时速可达 20 公里 / 小时，最高可载重高达 100 公斤。

凳子——“忧郁的眼睛”

设计师菲利普·格拉斯 (Philip Grass) 发明了一款造型有趣而怪诞的椅子，并起名为“companion”，意为“陪伴”。整个造型看上去像一个顶着一只忧郁的大眼睛、双手托腮席地而坐静静思考的小人。招牌式的“大眼睛”底座由质地上乘的实木制成，“身体四肢”则由钢管彩绘而成，风格俏皮，颇具神色。



鹦鹉耳环

Amsterdam Sauer 是巴西最知名的珠宝品牌之一，它的“花园派对”系列耳环以天然的黄色和蓝色蓝宝石，镶嵌出色泽美丽的金刚鹦鹉。



多彩登机箱

Tumi 多彩 Vapor 四轮登机箱属于轻盈的硬边旅行箱，箱体以一种特殊的多层聚碳酸酯合金为配方，比普通聚碳酸酯增加了强度和耐久性，多彩外壳如同一幅抽象画。

纽约沙发

Cassina 的“纽约沙发”表现了星空笼罩下的纽约城市天际线，摩天大楼元素充当座椅和扶手，靠背是巨大的满月，1.4 万针的经纬线织造工艺形成清晰的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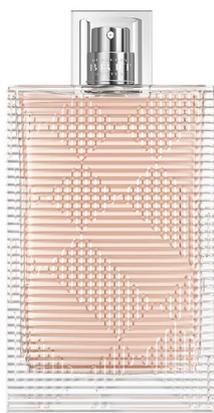
绣球花腕表

Chaumet“绣球花”秘密腕表，不同切割方式的钻石、蓝宝石和蛋白石构成华丽的绣球花束，搭配淡蓝色的缎面表带，花束下隐藏着32毫米白金表壳和母贝表盘。



六角形台灯

受超现实主义画家雷内·马格利特的画作《光之帝国》的启发，意大利设计师亚历山德罗·扎贝里为Seletti设计了Woodspot台灯，奇怪的六角形木制灯罩向下发散均匀的灯光。



节奏香水

“节奏”女士香水是Burberry第一款以英国薰衣草为主调的女士香水，其中加入橙花和粉红胡椒的香调，突出与音乐和年轻相关的热情感觉。

鹅形边桌

Zanotta“鹅形边桌”以一只三条腿的鹅为结构，自然色的喷砂铸铝支撑起耐热水晶玻璃桌面，黄色喷漆的鹅喙是有趣的细节。





推广竞价、医院出租与生命尊严
魏则西事件追问



5月4日，深陷魏则西死亡事件漩涡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贴出停诊通知，宣布暂时停止一切对外服务。现住院治疗患者及家属向所属科室领取探视证，凭证出入医院

文 / 吴琪

魏则西身高一米八出头，高高瘦瘦，见到人喜欢笑。他是同学眼中典型的“学霸”，总是背着书包往自习室、图书馆走，满脑子想着学习的事情。他说自己是为未来而活的人，期待着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成为计算机领域的“大牛”。

带着这样的印象，当我从西安市中心赶到20多公里外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新校区时，看到每一个高个的、背着双肩包往前急行的男生，就忍不住想：魏则西没有生病之前，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青春、充满活力，上下台阶都要几步合并成一步，也说不清是走路，还是在跑步。

魏则西2012年考上大学，如今他的同学们已是毕业班，各自为将来做着打算。我有些心虚地联系上他的两个大学同学，却发现一个正在北京实习，一个在老家做短暂休整。几天来，我首先找到了魏则西在咸阳的家，又到他治病的西安交大二附院寻访了一圈，但是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一直在反反复复地问自己：对于一个青春早逝的年轻人，一个给家人和朋友带来如此不舍的生命，我在他离去之后所做的追寻，到底有多大的正当性呢？我怎么确保，我的追寻与记录是在重述这个生命的价值，而不是让他的亲人感到更深的伤痛呢？

中国人的文化一直忌讳谈论死亡，更何况是重疾带来的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痛苦。魏则西在“知乎”上多次记录了他遭受的生理痛苦与精神上的惶惑苦闷。疾病绝没有任何浪漫化的伪善，他不得不接受身体正在逐步背叛他的人生事实。可那重病之下对生的渴望，犹如疾病尖刺中的一颗颗宝石，不安地闪耀着时而坚定时而怯生生的光芒。每一个被这种光芒打动的人，无论是否与魏则西相识，都容易成为他精神上的朋友。

魏则西的家，是咸阳一个建于2010年的新小区，十几栋高层建筑住着上千户人家。与任何城市一样，这些新建的高楼迷宫里，邻居们彼此并不熟识。我终于向一个保安打听到他家的具体楼栋，可让我惊讶的是，问了好几个与魏家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邻居，他们都完全不知道这家人的情况：“大家买的是商品房，又不是一个单位的。魏则西不是报纸上报道的年轻人吗？原来住在我们这里啊。”

我知道如果我一家一家问下去，终会找到魏则西的家。但是在楼下徘徊良久，我还是放弃了这种打算。记者没有任何理由，去打扰一对悲伤的、希望获得平静的父母。而魏则西家所在小区的崭新、热闹，人与人地理空间上的靠近与实

际生活中的疏离，给我留下了默默的震撼。半个多月前消逝的生命，一个拥着病痛之躯多次进进出出四处求医的家庭，在邻居们眼里，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当一个年轻人感受到命运巨大的不公时，当他不得不离去之时，新兴的现代化小区，并没有提供向这样一个家庭表达痛惜和安慰之情的渠道。

魏则西的妈妈曾是咸阳国棉一厂的职工，可是随着大型棉纺厂的不景气，曾经七八千人的大厂早已分崩离析。魏则西的妈妈2008年办理了病退，实际上办理病退的人，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真的生病，而是国企分流职工的一种方法。国棉一厂的老宿舍仍然在咸阳市区，老旧的外观掩饰不住人们居住其中的活力，但这里与拆迁后的土地没有多大区别的是，人们对他人的生活越来越陌生，大集体曾经带来的亲密关系早已瓦解。今天，一个患病的家庭，很难像过去那样获得群体性的安慰。

我来到位于西安市中心的西安交大二附院，魏则西的二姨是这里一个科室的主任，一位名声极佳的专家型医生。魏则西在两年的治病过程中，多数治疗在这里完成。曾经给他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拒绝了采访，魏则西二姨所在的科室，医生们分成小组忙于一个个手头的病人。医生们不愿意讲述魏则西的病情，一则是出于对病人隐私的保护，以及在医患关系紧张氛围之下，对于媒体的防备与慎重。但是同时，我能感觉到在这个高速旋转的空间，没有人有多少时间，为某一个个体的不幸，戚戚地哀悼。医院几乎是病痛之躯的集合地，每一个挣扎的生命都有他的故事和渴求。可是除了家人和朋友，又有多少人真的在意呢？如果魏则西之死没有引发舆论对于百度和莆田系的愤怒，这个年轻人又会有多少人关注呢？

位于郊区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新校区，体量极为庞大，魏则西所在的宿舍楼里，一整栋楼有着将近200个房间。与魏则西同一个专业的一个男孩隐约记得，“大一”时他们曾经一起上过一次体育课。“可那是三年前的事情了，三年了，谁还记得三年前的事情啊？”

如今大学的规模庞大，超出我的想象。我碰到的同学说，他们同一个专业的2012级学生，有500人左右。其中大约每100人一个大班，每个大班又分为两个小班。所以如果不是同一个寝室，或是关系紧密的朋友，很难讲述别人的故事。这些为各自前程奔忙着年轻人，略为疏离又很趋同，以各自的方式奔向未来。在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中，每个个体都变成了一个点，只有保持着同等速度的运转，才不会被抛离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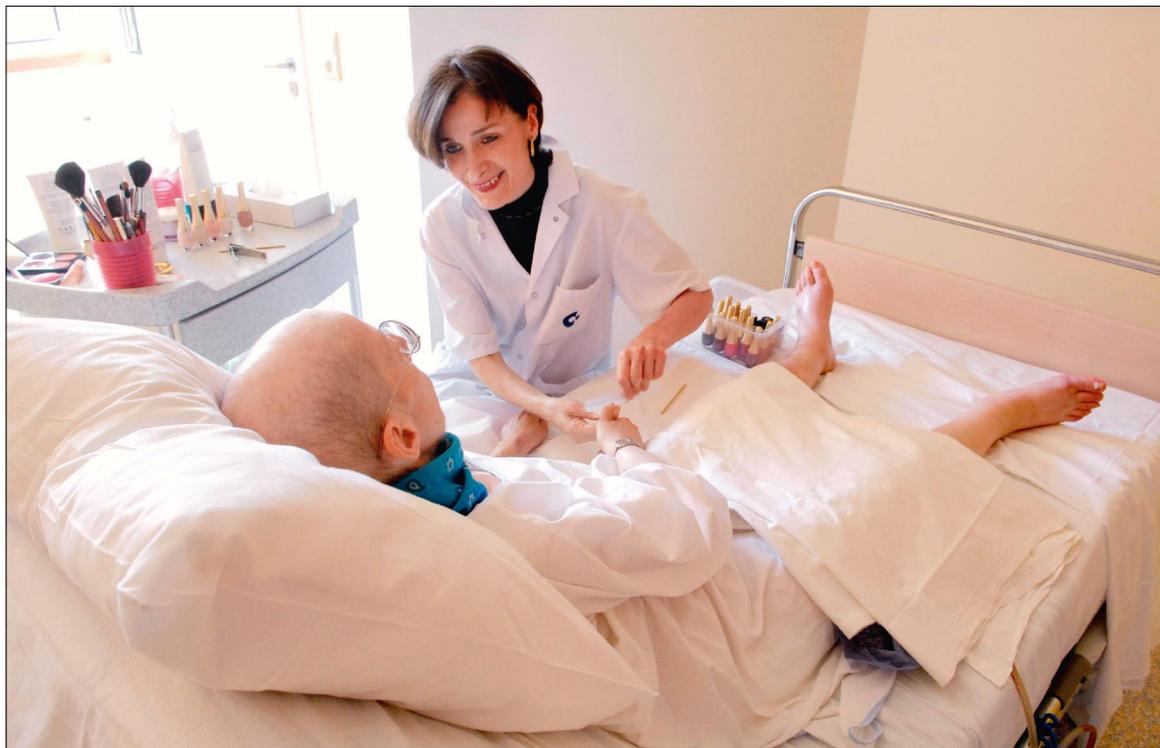
那因为疾病而不得不退出的魏则西呢？一个在集体中曾经领先的充满志向的年轻人，在这个高速运转、歌颂强者而无暇同情弱者的社会，不得不以个体去面对残酷的命运和一个个庞大的机构。这种深层的孤独感，一定让他有种“众人在侧，死者独行”的悲凉。当他最终知晓自己疾病的严重性时，在网络上开始向陌生人分享他的故事，由亲人朋友和网络上陌生人组成的“则西加油”的QQ群和微信群，成为他生命后期重要的精神领地。

在中国癌症病人的家庭中，魏则西不是求医者身边的底层。他受过高等教育，擅长利用网络收集和学习新知识，积极地为自己打听所有的救治办法；他的二姨是西安三甲医院的主任医师，亲人里有好医生，对于多数人来说是不可多得资源。在“知乎”上给魏则西提供过帮助的骨科肿瘤医生“微黏王子”告诉我，其实魏则西的主要求医道路算是顺利的，除去到武警二院做生物免疫治疗那一段经历，魏则西其他的手术、放疗化疗、靶向药物等治疗，都非常正规。

但是对于一个个患癌症的家庭来说，那种亲人被宣判死刑后的不甘与无助、那种每一次选择都战战兢兢患得患失的心情、那种时时刻刻都期盼能抓住救命稻草的渴望，实际上，永远与医学能提供的有差距。人们总是希望所有的疾病都能被治愈，对医学的期望越来越高，以致越来越远离真实。可是如何面对疾病与死亡，绝不仅仅是医学能解决的问题。

魏则西的大学辅导员和同学告诉我，虽然在治疗过程中走过这一段弯路，愤怒和埋怨并不是魏则西一家人的主要情感。在两年的治病过程中，他们对所有人的帮助都充满感恩之心。患病的头一年多，魏则西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绝症。一直到2015年夏天，当他家的经济能力被耗尽，不得不向社会发起募捐之时，父母才艰难地告诉了他真相。在经历过否定、绝望之后，魏则西开始面对现实。他曾经羞于向人们募捐，随着疾病的进展，他选择了在网络上一次次讲述自己的故事。他流露出来的在人群当中寻求亲密感和慰藉的主动性，让人似乎能直接触碰到这个鲜活生命的呼吸。

今年4月12日早上，魏则西带着对父母的牵挂，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魏则西的父亲在“则西加油”的群里，告知了大家消息，并且说他们尽力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他们克制着巨大的悲痛，尽力去感谢每一个给予过帮助的人，并且在自家经济上山穷水尽的时候，将募捐剩下的4万元，按照魏则西的遗愿，转交给了学校，希望能帮助其他患大病的学生。



2007年4月27日，法国巴黎居里研究所的美容医生玛丽·皮埃尔正在照顾患者。这些美容师通过给经受化疗的患者佩戴假发、进行化妆美容等方式，使患者看起来像正常人一样

他们跟学校商量，魏则西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孩子，希望能以学生的身份离开，魏则西仍然是群体中的一员。于是学校出面召开了追悼会，近百人的现场一度泣不成声。而感恩所得到的帮助，是这一家人一直惦念在心的情感。在两年的治病过程中，魏则西和他父母表现出来的善良和尊严，又让人在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中，看到了亘古不变的品德在他们身上的力量。

在我采访的后期，魏则西的一位大学同学刘易思，给我发来了他在魏则西去世当天写下的文字。在这种描述中，魏则西作为一个活泼的个体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也感受到这群不知道如何适当表达出悲伤之情的年轻人，隐藏在忙碌外表下的温暖的心。这也使我多一点信心来记录下魏则西的故事，希望我们对每一个个体的尊重，都有着属于他个人的独特的价值。

这位同学写道：

今天不凑巧，天气不太好。早晨八点十七分，你选择了离开，忍着那么大的痛苦坚持了这么久，我想你肯定渴望着什么。

说实话啊，刚认识你的时候，心里经常嘲笑你。每天手上拿着一个大水杯，书包插着把灰头土脸的雨

伞，大老远就看到你迈着大步往图书馆走。那时候“学霸”不是什么褒义词，我经常这样和别人说你，我觉得你满脑子都是学习，活得不够开心。但是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讨论习题，不过也不能说是讨论，大多数情况是我在问你。

记得你第一次出院回到学校，我们在路上遇到，你开心地笑个不停。我问你去哪儿，你说：“去上自习，现在就想上自习。”那时候看着你开心摇摆的背影，觉得你还是蛮酷的。可能因为我也想像你一样酷吧，从那以后每次背着书包不管出去干什么，别人问我，我都会说去上自习。以前总觉得自己偶尔的小努力如果被别人看见挺别扭的，其实就是虚伪吧，可时间久了，渐渐不太在意，别人看到我上自习，说我是学霸，就当是在夸我了。谢谢你，让我少了份烦恼。

第二次你住院后回到家里，我去看你，你费劲地皱着眉头问我，怎么想学习都这么难？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原谅我承受不了那么悲伤的气氛，再也没去看你。

早晨看到叔叔阿姨在群里和大家说，尽力了。我想他们会放下负担，轻轻地思念你的。

愿你在天堂，享受自由。☑



(万蒙摄)

4月11日，魏则西在陕西咸阳的家中。此时魏则西肺部功能严重衰竭，只能靠输氧维持生命

魏则西，绝望处的生命尊严

文 / 吴琪

虽然每个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终点，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速度，但疾病从来不让人觉得光彩。尤其是残忍的恶性肿瘤，逐步侵蚀着人的身体，以及他们对人世间所有的情感与留恋。

疾病本身让人觉得厌恶，可是沾染了疾病的身体，有着他们各自迥异的过往，有着他们独特的心愿和期盼。那些和他们组成了家庭的亲人，那些去过的地方，那些喜欢或讨厌过的人……而这些真切的经验，也正是疾病背后打动人的力量。

每个人都有他独一无二的人生，即便幸运，或是并没有那么幸运。这是疾病永远也涂抹不掉的痕迹。

病痛措手不及

魏则西，就是一个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学习的书呆子。背着大大的双肩包，总是在教室、自习室、图书馆、宿舍之间匆忙奔走。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新校区在长安区，离西安市中心有20多公里，交通不算方便。每到周末，从学校开往市区的公共汽车变得特别拥挤。同学们说，当年作为新生特别想去西安城里凑凑热闹的心态，最终会被漫长拥挤的周末交通给消磨掉。既然“外面的世界”离得远，也就只能安心在偏于一隅的宽敞校园里寄托大学时光。

但这对魏则西来说，完全不是一个困惑。他丝毫没有大学新生在终于熬过高考之后，至少要放纵一段时光的想法。刚一入学，他就找到比自己大4岁的辅

辅导员邓麟，询问应该在大学阶段如何学习，除了学校里开的课，还应该补充哪些专业书籍。邓麟因此对魏则西留下了“很有理想”的印象，“一般新生对大学生活感到新奇和迷茫，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会静下心来为未来做打算”。

天南海北来的8个男生，因为选择了同一大学的同一专业，机缘巧合地被分到了同一宿舍。陕西汉子魏则西见人从来不怕生，一见面就主动与人握手介绍自己，显得自然又自信，说起话来意气风发。虽然选的是理工科专业，但魏则西读过很多人文方面的书，喜欢畅谈自己对很多事情的见解。在上百个学生一起上课的政治课上，魏则西一旦站起来回答问题，一次能说上20分钟。老师也觉得少见这样积极的学生，同学们对他留下了“自信大胆，敢于表明独到的观点，说起话来特别有条理”的印象。

魏则西说自己是为未来而活的人，他希望大学毕业后能去美国留学，最终成为计算机领域的“大牛”。所以从“大一”开始，他早上7点不到就起床，晚上学习到22点半自习室关门，然后从C楼走回宿舍竹园。同宿舍的彭晨晖说，一般男孩子喜欢打电玩或是踢球，可魏则西除了学习，让人想不起其他喜好。于是魏则西也就成了大家眼中当仁不让的“学霸”。“学霸”和父母的关系也非常亲密，他在咸阳的家离学校只有34公里，每过两三周就会回家一次。

读到“大二”时，魏则西给自己的学习任务更重了。他觉得自己“大一”有些课程虽然接近满分，但也有些课程分数不高，拉低了平均分，不利于以后申请好的学校，接下来必须扭转这样的局面。由于给自己的压力不小，当他在“大二”下学期，因为查出腹部有个包块而要手术时，反而有一种暂时能从繁重学业中解脱出来的轻松感，“不就长了个东西吗，手术取出来后回去上课，刚好把期中考试给省了。”他对自己的身体也充满信心，平时经常跑上5公里，不觉得这次手术会是多大事儿。

疾病的凶险却逐步推翻他和身边所有人的认知。2014年4月24日，魏则西在西安交大二附院做了第一次肿瘤切除手术。免疫组化验结果很快出来了，是滑膜肉瘤三期。滑膜肉瘤属于软组织恶性肿瘤，是一种预后差的罕见病，五年生存率并不乐观。何况魏则西查出来时已经是癌症三期。对于一个前不久还在跑步、即使在病房里也在看书、随时计划着回校上课的大学生来说，没人忍心告诉他真相。医生和父母都说，他得的是一种交界性肿瘤，不致命，做放疗化疗就是为了预防。

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的父亲魏海全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当魏则西生病需要休学后，魏海全和妻子到寝室收拾孩子所有的东西。大家发现魏则西的举止做派像极了父亲，魏海全热情实在，完全不拘束，他说让大家好好学习，则西读不了的书，大家来替他读。而只知道部分真相的魏则西的母亲更为外向开朗，对孩子的病虽然非常着急，但是很乐观。父母俩抱着一定要给孩子治好病的决心，他们努力使这个一向亲密的三口之家重回生活正轨的期望，让魏则西的同学们印象深刻。

脱离学校生活的魏则西，短期内就经历了炼狱般的痛苦。他后来写道：“化疗的时候持续性地呕吐，胃吐空了就恶心、干呕，器官遭到化疗药的侵蚀，免疫力也几乎崩溃，感觉自己就不像个人！便秘、皮肤发紧，头发等所有的毛发也都掉光了。后来护士长害怕化疗药渗漏，把皮肤、肌肉和骨头烧坏，就给我插了PICC（静脉导管）。结果一插上就开始过敏，整个胳膊都肿了，后来一整个夏天就都没有洗澡。最后一次化疗和放疗的最后几次是一起做的，差一点死了。白细胞在‘1’以下，怎么都升不上去。放疗的地方皮肤放射性溃烂，出院了又跑回医院急诊科待了一晚上，后来又在重症监护室待了10天，简直生不如死，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过来的。”

但是这个如此受罪的年轻人一旦身体舒服点，还想着回去上学的事情。他本来就把学习看得重，这下子更是担心会落后。由于相信自己得的病能治好，魏则西认为所有治疗的痛苦都只是暂时的。在经历了4次化疗和25次放疗之后，他觉得病已经治好了，但是身体免疫力一直没有恢复，就去北京做了几次生物疗法。至于发现北京的生物疗法完全不正规，则是后话。

这段时期虽然经历了身体上的极度痛苦，但魏则西在思想上并不悲观。从生病开始，学校就希望为他发起捐款活动，魏则西一直坚决拒绝。他后来袒露自己的想法——要求别人给自己捐钱很丢人，他甚至还孩子气地说：“如果不喜欢的人也给自己捐款了，那可怎么办？回学校都没脸见人了。”

他后悔自己六七年来没有去医院做过体检，瘤子发现的时候，在体内已经长了一年多。“当你失去健康的时候，你会发现，能自由地呼吸，随意地走路奔跑，晚上睡觉身上不难受，不用被随时可能出现的急剧疼痛折磨，可以有胃口吃饭，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可是，在失去健康之前，你恐怕很难认识到这一点，我现在最大的奢求就是在不那么难受的时候，静静地握着爸爸妈妈的手，一家人好好地待在一起。”

在做手术、放疗、化疗这些成熟的癌症治疗方法

用完之后，魏则西的身体获得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平静。2015年3月，他又重新回到了学校。这时候距离他发病过去了近一年，魏则西转成了2013级的学生。他对未来仍旧充满着期望，想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赶上学业。但是仅仅在一个多月之后，他又一次摸到了身体上的肿块，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后魏则西又回到学校，希望把“大二”下学期的期末考试给考完，了一个心愿。

疾病再次让他措手不及。6月份，魏则西从胸部不适到呼吸困难只过了10天。“这一次，我的生命遇到了最大的危险：转移了。插到我胸部的管子流出的是血色的液体，瘤性的。这时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以为只是胸部感染，还在病房学《信号与系统》《计算机组成原理》……现在想想，不知道该说自己什么好，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爸我妈天天哭。大夫给我说别学了，想干什么干什么。当时我还跟大夫说：不学的话，明年会很麻烦。我还在期盼明年，真是无知无畏啊。其实，大夫当时的判断是，我也就还有一两个月。”

对生命的渴望

魏则西知晓自己的病情，是在2015年的6月份。眼看着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父母终于分三次，陆陆续续向他吐露了实情，一家人抱头痛哭。“当我知道一切的时候，死亡的阴影笼罩了我，无比的压抑充斥我的大脑，也许持续的绝对的乐观积极可以帮助我创造奇迹，可我做不到。我连静下心来坐着都做不到，回想之前发生的一切。现在的我，属于自己所看不上的废物，死了也活该，没有能力与勇气去开创自己未来的人，没想到我现在会这样。”

对他来说，如果死亡随时会降临，根本不存在一个可以去想象的未来，活着变成了痛苦。可是父母对自己投入的爱，成了魏则西最割舍不下的牵挂。再想想自己二十出头的人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了学习，本来再过几年可以施展抱负，命运却不愿给他这个机会。

癌症对年轻躯体的侵占速度快得惊人。一向好学的魏则西，把他获取知识的能力用在了研究病情上。“我的情况很特殊，根据大多数病例，滑膜肉瘤即使出现转移，也会长得非常慢。可是我今年（2015）4月末做手术的时候还没有发现转移，在6月初的时候，做CT就已经发现了非常严重的转移。也就是说，在现有治疗方法之后，我必须立刻采用下一种治疗方法，否则短期死亡率非常高。”



这时候魏则西已经去北京做过了三次生物治疗，每次六七万元的花费，再加上前期治疗的费用，耗尽了这个家庭为治病筹来的40多万元，他还计划着去北京做第四次生物治疗。魏则西对于募捐仍然比较排斥，却也不得不妥协。在大学辅导员又一次给家里打来电话后，魏则西感受到了父母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向老师提出了募捐的想法。2015年7月，《咸阳日报》记者



2月18日，第59届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获奖作品揭晓。美国摄影师南希·博罗维克拍摄的《死亡中的生命》获得了长期项目类组照二等奖。作为女儿，南希2013年1月30日拍下了父母一起进行四期癌症平行治疗时的照片，以此定格家人最后的陪伴

马沅聪在魏则西家里见到他时，由于他身体虚弱，家里大热天也关着窗，但是魏则西对自己病情侃侃而谈的样子，有一种似乎在讲述别人病情的冷静和豁达。学校和报社发起的募捐，一共为魏则西筹到了9万多元。

持续的经济压力和身体上的痛苦，使得魏则西的情绪很不稳定，时常陷入绝望。由于第一次手术后的放疗和化疗给他造成了痛苦的记忆，他明确表示不愿

意再接受放化疗。“不管是异环磷酰胺的化疗，还是那次惨不忍睹的放疗，都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极端痛苦。现在，实在没有勇气再去经历一遍了，所以我宁可选择效果未知的免疫方面的临床试验，也不愿意再去尝试化疗。”

对于晚期的癌症患者而言，当成熟的治疗方法已经不再起作用时，选择任何一种其他方法，都意味着

冒险。只是如果其他带有试验性的疗法尚在国家规范的管理之下，病人对于自己所做的冒险能够较为清晰地衡量风险和收益。在美国被认为已经过时的CD-CIK技术，是一种缺乏价值的临床试验疗法，却在中国堂而皇之地收着高额费用。对于四处借外债的魏则西一家人来说，不知不觉掉进了一个既被骗钱又耽误治病时机的陷阱。

当魏则西的癌细胞出现转移后，他的情绪也更加起伏不平。“之前看病已经花了40多万元，我爸的工资一个月也就3000多元，他还患有高血压；我妈好几年前就病退了，这些钱连还之前借的钱都不够；我现在光中药、靶向药还有别的药物，一个月就要2万多元。之前以为重离子可以治好，爸妈准备卖房子再和亲戚朋友借钱，凑个三五十万元去做。可是那边拒收，说已经转移了，没法再做了。我现在也不知道干什么好，我爸我妈也快崩溃了。我爸跟傻了一样，我妈一年多一直陪着我，也快到极限了。我现在不知道用我家手上最后的一点点借来的钱拖着我的命，又没有治愈的希望，到底值不值。我现在吃的靶向药副作用很大，手足皮肤反应严重到了手用不了筷子，脚走路如酷刑，天天拉肚子、恶心、不想吃饭。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到底值不值。我现在毛发全部变白了，我爸我妈看着就想哭。他们爱我胜过一切，一定会给我买药。可是不愿意他们再借钱下去，再卖房子。他们身体也不好，以后看病也要花钱，而我又独子，他们老了也没有别的依靠。我觉得我还不如去自杀，这样最起码他们也不用再被我拖累下去，也许还能再要个孩子；就是不行，以后也不至于老了没钱看病。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幅场景，而我也不用再受罪了。也许我的自杀会让他们很伤心，不过长痛不如短痛，我觉得也许这样对我们都好。”

这篇名为“二十一岁癌症晚期，自杀是否是更好的选择？”的帖子，在知乎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魏则西发现，网络上陌生人给予的鼓舞，使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孤独和苦闷，还能够交上朋友。在身体允许的时候，他积极在知乎上回答与癌症相关的问题，也讲述自己的情况。比如他回答知友提出的问题：“20岁得了绝症，还有几个月的生命，该怎么办呢？”“癌症晚期的父亲要求母亲买安眠药，我该怎么做？”“觉得自己最苦最骄傲的一次坚持是什么？”等等。

魏则西希望自己的经历给他人以力量，他也积极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希望获得帮助。“知友的捐款我很感动，虽然我依旧很不好意思募捐，不过我现在确实需要治疗资金。我会记录每一笔捐款，如果我可

以活下去，恢复健康，我应该可以在工作之后不长的时间全部归还。”对魏则西来说，他有着对治疗费用持续的需求，必须寻求帮助，可是这种帮助又让他感受到了压力。魏则西写道：“如果不是亲戚朋友的帮助，我估计已经撑不下去了，现在的费用全部来自募捐。可问题在于：一、募捐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治疗费用，肿瘤治疗的费用，尤其是后期的费用，是非常可怕的。二、募捐会给人带来非常可怕的心理压力，非常难受，估计其他接受募捐的人也差不多，所以我如果能好起来，第一件事是挣钱，第二件事是还钱，欠人情的感觉太糟糕了。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关键点只有一个，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魏则西和父母一直在寻求新的疗法。魏则西通过知友联系国内针对晚期癌症患者的试验组，却因为他在服用的靶向药物与试验药物作用机制接近，不符合入组条件。他也积极联系了日本和美国的癌症治疗机构，也因为条件不合适被拒绝。北京和上海的知名医院他们也跑到了，医生们给出的前景并不乐观。在父母和魏则西看来，只要有一线希望，还是要奔着这线希望去尽力。

他写道：“一家人去了上海和北京，见到了全国治疗软组织肿瘤最大的几个权威，得到的是令人相当失望的他们的看法。除了效果暂不清楚的以PD-1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我其实没有希望。但其实这些无所谓，我现在的情况，在去之前就已经很清楚了，去，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家待烦了，虽然没有效果明确的治疗手段，但依然有希望不是吗？而有希望就够了，至少我不至于陷入绝望，至少有努力的方向。知道自己病情之后，崩溃绝望压抑恐惧，不断地在我身上出现，但，只要能控制住生理上的痛苦，有可以努力的方向，我，依旧可以活下去。”

到了2016年春节前，魏则西的身体情况突然显得好了起来。大学辅导员邓麟去看望他，他说自己身上终于不疼了，也开始能吃了。魏则西的父亲特别高兴，说：好了，跟没事人一样。魏则西在微信上发了一张面带微笑的自拍照：“住了二十四天的医院，终于回家了，让我过个好年吧。”

绝望中的感恩

可是2016年的大年初一，这个渴望在家过年的年轻人，又因为病情恶化被送进了医院。在2月底，当魏则西身体稍微舒服一点时，他在知乎上回答了别人提出的“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的问题，

讲述了他在北京某家医院接受生物免疫疗法的经历。这时候他已经通过美国知友在谷歌上的搜索，明白了他所接受的生物免疫疗法根本不可靠。抱着希望不要有更多的人被骗的想法，他写下了这段经历：

“我是独子，父母对我的爱真的无以言表，拼了命也要给我治。可当时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的各大肿瘤医院都说没有希望，让我父母再要一个孩子吧。那种心情，为人父母的应该可以体会，所以我爸妈拼了命地找办法。百度，当时根本不知道有多么邪恶，医学信息的竞价排名，还有之前血友病吧的事情，应该明白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可是当时不知道啊，在上面第一条就是某武警医院的生物免疫疗法、DC-CIK 这些，说得特别好，我爸妈当时就和这家医院联系，没几天就去北京了。”但魏则西一家为这一疗法花费了 20 多万后，却发现与医院所承诺的保病人 20 年完全不符。

为魏则西提供帮助的骨肿瘤科医生、知友“微黏王子”说，从魏则西的诊治经过来看，软组织肿瘤治疗最关键的首诊化疗和首次手术，莆田医院都没有参与。魏则西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死亡是疾病的自然进程，无论什么治疗都很难改变结局。

武警医院的生物疗法谈不上害死了病人，但是却有明显的作恶。本来对晚期患者来说，本来应该在二线治疗方案（争取手术以及滑膜肉瘤靶向药）这两种方案都失效后，再考虑非肿瘤特异性的生物治疗等前沿治疗方法。“这类治疗异常昂贵，且效果不明。对晚期患者来说，就是个赌局，鲜有获胜者。莆田医院这次的作恶，就是引诱则西提早进入赌局，输精光后才发现还有滑膜肉瘤的靶向药物可用，但他已经没钱了。所以跟则西谈治疗方案时，他最关心的是费用，其次才是疗效。钱的压力甚至让他考虑到自杀。”

“微黏王子”作为医生的冷静，使他看到了病人的结局，却不忍心说破。“则西是个求生欲望非常强烈的人，他一直在追问我，如果有一天靶向药耐药了，肿瘤卷土重来，应该怎么继续治疗？其实当时我想说，如果一旦……哪还有什么继续？”

可是对于原本没有医学知识的人来说，从患癌开始，在焦急的心情之下四处求医，很难冷静地知晓每一步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像很多中国其他有癌症患者的家庭一样，他们总是对每一个决定战战兢兢，对每一次选择患得患失，在做一个决定时总是忍不住后悔之前的选择。

到了 2016 年 3 月底，在吃过一片吗啡止痛后，魏则西发文章说：“我的肺功能快衰竭了，没有两天了，请大家不要打钱了。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帮助，希望

来生没有痛苦……我写下了这些东西，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我和我父母的出路到底有没有，我能不能为他们养老送终，是不是拖死我父母，把我活活耗死是我们一家三口不得不走的路……”

进入 4 月份，魏则西感到自己的病情更加恶化，提出了希望回家。他在 QQ 上给辅导员邓麟留言，说自己快不行了。邓麟吓了一跳，联系了魏则西的父母，问则西是否愿意自己去看他。魏则西虽然忍受着疼痛，仍然希望感受到友情的温暖。邓麟这时候看到的魏则西，眼睛里的神采已经暗淡了，整个人都是浮肿的，插着氧气管，只能以一个姿势躺着。但他仍然撑着与邓麟聊了一会儿。

邓麟的父亲因为癌症而去世，魏则西问她：“你父亲从医院回家后几天离世的，是否痛苦？”邓麟问：“你怕不怕死？”魏则西说：“我不怕。我想活着，只是不想像现在这样痛苦地活着。我最放不下的，还是我的父母。”

魏则西也忍不住表达了对医学深深的失望，他曾经对治疗寄予了巨大的希望，认为医学在以神奇的速度往前突破，却被迫一次次放低希望，接受生命的终点。在经历癌症之前，他认为癌症是那些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或年纪大的人才有可能沾染的疾病，与自己隔着千万重山。患病之后，虽然多位医生的判断一直不乐观，可是如果不真的经历癌症的全过程，又有几个人能明白它的凶险和残忍呢。

4 月 12 日上午，这个渴望生命、热爱生活的年轻人永远闭上了双眼，不再疼痛。虽然在治病过程中受到过欺骗，但是魏则西生前向亲人朋友表达最多的情感，是感谢。他多次提到感谢所有帮助过他的人。魏则西生前交代父母，将募捐剩下的 4 万元留给学校，帮助其他患病的同学。

这天上午，悲痛的父亲魏海全还给 2015 年夏天有过一面之缘的记者马沅聪打了个电话，感谢她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则西。魏海全也给邓麟打电话说，则西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孩子，让他以学生的身份走吧，则西仍然是群体中的一员。接到通知的亲人们，能感知到魏海全夫妇克制的悲痛，以及在命运遭遇不公之际，仍旧对他人心怀感恩的善良。

一篇在网络上传播的文章，在魏则西去世大半个月后，将他的遭遇推向了舆论风口。但是魏则西的父母表示，他们并不希望以怨恨之心面对一切，他们只想在孩子离去之后，平静地继续生活。那个勤奋乐观的骨肉，那个为理想而奋斗过的孩子，在他们头脑中留下的温情与记忆，是疾病永远无法抹去的痕迹。■

漫长的原罪：医改市场化下的“专科”之路

主笔 / 陈晓 记者 / 付晓英



2008年7月，上海首家日间化疗病房在上海市胸科医院肺部肿瘤临床医学中心试运行。由此可减少病人因等待普通床位而延误肿瘤治疗的情况



(王路江摄)

在中国医疗市场化改革后的发展历程中，“莆田系”是一支在职业道德上遭遇唾骂，但在商业逻辑上又被仿效的资本。在医院“公益”还是“盈利”性质暧昧不清的改革年代，冲击医院职业道德底线而造就的漫长原罪，并不仅仅是“莆田系”。

被同时唾骂和仿效的资本

一位身患绝症的青年之死，让莆田系再一次成为众矢之的。曾在莆田系医院工作10年的从业者莫西(化名)告诉本刊记者他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同行那里得到的信息：一些与莆田系有关系的部队医院承包科室已经被清理、关停。一位在四川的朋友告诉我，他的老板这几天已经回老家莆田了，说是跟其莆田系老板商量对策。莆田系医院门诊初诊挂号量普遍呈断崖式下滑。一位在东北的朋友说以前一天门诊初诊挂号在三四十个，现在初诊挂号不到10个。一些以百度竞价为主要推广方式的莆田系公司的网络营销部门员工已经解散放假。一位在上海的朋友说，一家承包了很多部队医院的莆田系公司老板已经出国暂避风头了，作为网络推广人员的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接下来会不会失业……

这不是莆田系第一次遭遇危机。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起，这群掌控着大部分民间医疗资源的商人，就一直处在舆论的针砭口伐之下。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莆田东庄镇，这是一个山多地少的沿海城市。创业者们大多出身草根，操着一口“F”“H”不分的莆式普通话，佐以外地人连猜也猜不出意思的莆田话，并习惯用它来传递一些生意中不方便让外人知道的内容。虽然大多出身乡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常年在生意场上的闯荡周旋，他们大都衣着得体，接人待物谦恭有礼。他们创造的医疗产业被统称为莆田系。

据统计，全国1万多家注册的民营医院中，莆田系占了8000多家。它们的资本总量是中国民营资本办医的80%，年诊疗人次接近2亿。这么大的基业又

是相对封闭的，因为莆田系老板高度集中于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这一弹丸之地，所以相互间有天然的亲近感，既相互学习交流，又互相竞争，争夺资源。莆田系的各个医疗集团大多相互参股，因为这种小范围内的近亲繁殖，莆田系的医院经营、营销模式都有一种封闭式的雷同：走专科的道路，挑选出性价比最契合市场的技术，包装成高新的独门绝技，以制造出巨大的利润空间，并辅以大量营销，吸引众多对专业知识一无所知的病患。从妇科、男科、皮肤科、泌尿科开始，莆田系把在医疗技术领域并不起眼，甚至有些边缘的专科科室，打造成了能创造高额利润的赚钱机器。这让他们在舆论和现实中，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地位。

舆论从来就没有对他们客气过。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莆田系就一再遭到质疑和抨击，并成为专业人士说起来痛心疾首的一个医疗笑话。采访中，有好几位公立医院的医生提到，莆田系将所有的医疗行为都转为商业的逐利，它们和希波克拉底誓言没有任何关系。它们虚假营销的方式，彻底破坏了医道的高尚。以逐利的商业指标，消解了医生的尊严感。身在其中的人也感觉不到多少职业自豪感。莫西说自己在莆田系医院工作的10年，当亲友问起他在哪里工作时，他总是不愿多说：“在莆田系医院工作并不是一件多么值得夸耀的事，社会上大部分人包括我的家人对莆田系医院的印象并不怎么好。一般来说，我不怎么对外人谈起自己的工作。”

但现实中，莆田系却又是医疗市场化道路上的隐形“领跑者”。一位民营医院院长告诉本刊记者，据他所知，兴建专科中心成为各类医院的共有之路。而专科中心，无非就是莆田系这几十年承包专业科室、打造专科医院模式的翻版。甚至这位院长的医院也正在筹建肿瘤生物诊疗中心，如果没有魏则西这件事，他们的中心都快开张了。

一面在道德观上被唾弃、谴责着，一面却在实践中被观察、模仿着，要理解莆田系包含的矛盾性，要从上世纪80年代一次仿效农村经验的医改说起。

逐利的医院

上世纪80年代，医改实行。对自认整体拥有较高的智力、属于社会精英的医生群体来说。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开局。“1983年，因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医疗领域也开始推行承包制。强调对医院断奶断粮，让医生自己养活自己。”中国协和医

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对本刊记者说，“政府只提供医院经费的10%，剩下的则由医院自负盈亏。卫生部一位领导亲自带领工作组去一家医院，签订了一份500万元的承包合同。到1985年，承包制的试点医院已经达到4家，此后向全国推开。”

从经济角度看，这似乎是个市场经济下的多赢格局：政府摆脱公立医院投入的财政包袱，原来囿于地域的医疗服务作为一种开放的资源在市场上待价而沽。患者的自由流动和选择，还能促进医疗服务之间的竞争优化。但它却带来了医疗服务性质上的一个混乱：医院以公益服务的身份，却追求盈利的目的，医疗行业的特殊性被粗放的改革政策抹杀。袁钟将此称为医院“冲击道德底线的原始积累期”，不同层级的医院都被裹挟在其中，走上了一条逐利求生的道路。“医生这种职业是以道德和信任为基础的，但医院承包制之后，合同层层传递，从院方承包，再到科室承包，于是出现了一系列潜规则：高价药、大检查、送红包……”

虽然此后医改历经了多次细节上的变革，但医院的趋利性与医患之间的经济关系却并没有改变。每次对医改方案的修正，只是让经济利益的摄取在医院的部门间转换。2014年，同仁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徐文被患者追砍至重伤，事后在这起血案的一个研讨会上，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育处处长王仲说：“第一次改革的时候，推翻了新农合，提出以药养医，于是出现了药价疯长，导致了医生的腐败。第二步是提高大型医疗仪器的价格，于是临床医生拿不到钱了，而辅助检查科室医生工资大涨。在协和医院，我们非常努力把分配原则尽量向临床科室倾斜，才基本上保证各科室医生的收入相对合理。而这些都是政策造成的。医疗本身不应该是营利性的，应该是公益性的。”

医改市场化的方向，或许是包含着扩容医疗市场，并将其分出层次提供医疗服务的初衷，但产生的一个实际结果却是，医疗资源被简单分为“优质”和“劣质”的资源。对一些有着悠久西医传统，并且术有专攻的医院来说，它们获得了一个庞大的市场，成长为行业内的“托拉斯”。袁钟告诉本刊记者，医改中最早实行承包制的试点医院，现在资产已经达到十几个亿。在一些中西部的省会城市，一家大医院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吸附着区域内的所有医疗资源——邻近200多家地方医院都为它输送病源，资产总量达到几十个亿。但另一个现实是，没有了计划经济下的财政拨款，也没有特殊的能力吸引市场经济的病源，乡镇



（朱家民摄）

上世纪 80 年代，广东深圳的一条巷子墙上贴满治疗性病的小广告

医院一级基本垮掉，三、四线城市的医疗网络也是千疮百孔，难以为继。甚至就在同一家医院内部，也因为经济效益的差别，分出了强的科室和弱的科室。这些在医改中被逐利浪潮边缘化的公共医疗资源，就像股市中国有企业的外壳一样，成为医改市场化中为个人所用的逐利平台。

承包平台

“莆田系”进入医疗的故事已经被讲述过很多遍。第一代是治疗皮肤病、性病的民间游医。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学历大都在小学初中，而且绝大部分并没有受过任何正规的医学专业训练，依靠民间偏方或者书本上一些简单的药剂调制方法，就开始了行医生涯。如今已建立起巨大医疗产业的莆田系老板詹国团曾经回忆他在医疗行业的起步，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和家族亲戚们离开家乡，拿着在公立医院配

来的，或者从新华书店治疗皮肤病书上学会配制的药膏，走南闯北。每到一处，就包下车站附近的一间旅馆房间，依靠电线杆上贴小广告招揽来的客源，开始行医。“我们没有当地卫生机构允许的行医证，但不可能你不批我就不做。”第一代莆田系就在这样以谋利为归依的理直气壮的草莽气中开始了。

但对极度需要信任和知名度的医疗行业来说，民营资本独立发展极为艰难。莫西 2005 年就进入莆田系医院担任企划，给医院做广告。他总结自己的 10 年：“这是一段长长的四、五线城市之旅——我先后去了江苏淮安、湖南衡阳、福建南平、广东清远、山东济宁、安徽淮南、浙江温州。其中江苏南京是我去过最大的城市了。我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份工作，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那么多四、五线城市。”这些四、五线城市的医疗市场开拓并不容易。“作为一名营销企划人员，我在全国各地很多家莆田系医院待过，这些医院经常是门庭冷落。每当我在一些媒体、红头文件上看



（林琳 摄）



左图：“莆田系”发源地福建秀屿区东庄镇

右图：“世界再大，根在东庄。”开发商的广告语在东庄别有一番意味

到‘看病难、看病贵’这一说法时，我总会痴痴地想，‘看病贵’我们已经做到了，但什么时候也让我们医院‘看病难’一下啊？在莆田系医院，我们这些营销人员为了让病人上门就差直接上街拉人了！”

医改衍生出的科室承包给了莆田系从民间走到前台的机会，而在所有的科室承包中，军队医院是一块难得的优质“承包”资源。它原本是医疗系统中更具公信力的一块资源，名称就给人天然的信任感。进入程序相对简化，大多数时候只需要某位部队领导同意就可以。而且军队医院中有明显的弱势科室。军队医院原本是为士兵服务，它的强力科室是骨科、创伤、烧伤，妇科就是这个平台上的弱势部门。而且在医院逐利化背景下信任基础的坍塌，导致医患矛盾层出不穷，医闹也应运而生，但部队医院配备有士兵，对医闹是一个有力的震慑。在这次魏则西事件中涉事的上海康新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创立者陈新贤、陈新喜兄弟，事业版图的扩张就是立足于承包部队医院的妇产科。到事发前，他们已经和上百家部队医院合作，建立起了妇产科室，成为莆田系中一支以妇产专科闻名的商业力量。

在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上海康新与一家部队医院

签订的妇产科室合作协议中，我们可以窥见合作的利益分配：医院方负责提供医疗用房和办公场所，以及原来医院中相关的医疗、技术、辅诊、财务、安保、后勤和行政科室的管理服务，而承包方则负责购置中心所需要的医疗设备，装修扩建病房，聘请专家顾问。承包方不但要付出建设科室的资金，还要保证“每月床位使用率不低于90%”。承包的保底资金是每个月90万元，如果医院累积分配不足90万元，承包方要负责补齐不足部分。但承包方从中心收入中获得的分成也是非常可观的。整个合同是六年签，第一、第二年，医院与承包方按“中心”收入9%和91%分成，第三、第四年，分成比例变成10%和90%，最后两年，分成比率变为11%和89%。中心的账目实行月清月结，每月15日之前，由医院的账户汇入承包方的账户中。

这个承包合同中还隐含有一个利润分配的奥秘。其中一个条款是：“合作期满后，乙方所投的医疗设备归医院所有，按后期投入设备折旧后，由甲方购入。”实际上，这个条款隐含着一种利益输送的方式。一位民营医院院长告诉本刊记者：“在中国，公立医院都是非盈利机构，因此在医疗成本上会享受很多国家的好处。比如盈利医院的电费是按工厂电价收取，



（刘航摄）

但非盈利医院的电费则按居民用电收取。”但获得了这些成本上的好处后，非盈利医院不允许分红，每年的营收结余只能用于医院的再发展。对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来说，购置医疗设备就成为一个利润提取的方式——开设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将设备以高价出售给承包科室，套取出利润。

以资本换取公共医疗平台，既享受公立非盈利医院的成本优惠，又获得盈利的利润。一群没有接受过医疗专业教育，也不被医疗职业道德约束的商人，在这场仿效农村承包制的医改中，冲在了医疗市场化的最前线。将这些原本在公立医疗体系中不起眼的边缘科室，作为生意的平台，并打造出一条赢取暴利的专科经营之道。

专科医院的“独门绝技”

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医改市场化方向刚确定时，詹国团就开始跑到公立医院去做承包。“我们在莆田注册公司，以公司的名义跟医院里签科室承包合同。我们发现公立医院买不起设备，买不起CT、彩超。而我有钱，买了这台CT，就这样合作起来，跟

医院分红。大概1990年左右，就干脆投设备比较多了。我自己还跟中科院联合开发过激光器，治疗前列腺肥大，代替手术。我出钱中科院出技术，然后一部分卖到外面，一部分我拿到全国各地医院去投资。”“卖这个设备也很赚钱。本钱加上工钱，投资大概三五万元，在市场里可以卖到二十几万元。后来投资的设备种类就多了，有检查的，有治疗的，根据医院的需要。不同的设备，不同的合作分红方法。”

作为如今莆田系中拥有最大规模产业的领导者，詹国团很早就发现了设备和技术在医疗生意中的重要性。医学是建立在解剖、生理、药理基础上，专业性非常强的科学，但发展至今已经为相当多的常见病种积累下了成熟的临床操作路径。民营医院资深管理者张松伦告诉本刊记者，大约10年前，国外就对1300多种常见病规定了临床路径，包括用什么药，做几次检查都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卫计委也发布了临床路径诊疗规范，对近200种常见病的诊疗路径有了已成明文的规定。但医学的另一个特点是每个病人的个体差异，都可能导致诊疗过程千差万别。这是医学的不确定性和艺术性，也是医生这个职业的魅力所在。但当这个特点被用于商业时，最特别、最具专业魅力的部分就成为最能产生暴利的掘金方向。

“专科医院”是莆田系最拿手的发展方向。原本因为能力所限，民营资本没有资金和技术建设全科诊所，而承包公立平台时只有皮肤、泌尿、妇科等科室可做选择。这些专业大多没什么技术门槛，主要靠诊流量获得收入。但莆田商人从生意的角度，将这些原本简单确定的技术，披上精深的专业外衣，包装成收费昂贵的“独门绝技”。

莫西在莆田系医院做了10年企划，他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做过最典型最普遍也最成功的技术包装项目是“无痛人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无痛人流’这一项目营销推广，可能没有哪家医院比莆田系医院研究得更透彻更权威了。当然，莆田系医院对‘无痛人流’这一项目情有独钟也是有原因的——首先，人流是一种刚需，而且市场需求极为庞大。据我们对市场的了解，对计划外怀孕的中国女性来说，人流是首选；其次，人流项目技术含量并不高，风险不大，不需要特别资历的专家来做人流手术。但这样看似技术含量不高的人流项目对莆田系医院来说，其定价空间却很大，因而能为其带来丰厚利润。我曾听说，在业内一些外营销内经营做得好的莆田系医院，一天能做三四十台人流手术，而做一台人流手术最高消费

金额可达近万元。”

“对于‘人流’这一项目，莆田系医院最普遍的做法就是给‘人流’这一其实没多大技术含量的项目包装出无数个以外国女性命名的所谓国际尖端人流技术，如‘格蕾丝无痛人流’‘海伦无痛人流’‘薇薇无痛人流’等等，同时佐以‘微创’‘超导’‘微管’等专业技术名词，然后再根据价格高低不同，组合出温馨型、豪华型、尊享型等多种人流套餐。这些林林总总名目繁多的无痛人流项目，价格相差几百至数千元，但实际在手术实施过程中所采取技术和耗材几乎都是一样的。而对一台人流手术来说，最可靠最具保障性的不是所谓的各类技术和耗材，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为你做人流手术的那位医生手术水平的高低。”莫西对本刊记者说。

在本刊记者获得的西安一家部队医院与莆田系医院合作的妇产科室报表中可以看到，药品收入占比微乎其微，甚至在整体营收最高的两个月，药品收入都几乎为零。绝大部分收入产生在治疗收入一项。“这说明这个科室的运营主要倚靠某种技术或者某台设备。”张松伦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专科医院典型的‘一招鲜’。”

网络时代的“专科大发展”

“魏则西事件”后，本刊记者加入了几个“医疗推广”“医疗营销”为主题的QQ群，刚入群就仿佛置身于一个喧闹的市场，大量简单粗暴的广告扑面而来：批发销售药品、几百元包办医疗资质证书、代发网络医疗软文、招聘善沟通开发医生、删除负面信息、竞价排名优化……各类分工明确的医疗商贩们群内殷勤兜售着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而这些商品或服务勾连起来便是一个完整的医疗网络推广产业的链条。

大概2008年左右，网络成为“专科医院”推广的重要阵地。竞价培训师杨昭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注意到了百度上的医疗广告。彼时百度的竞价排名系统

刚推出不久，他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巨大的利益空间，索性入行从事竞价培训。“搜索引擎广告非常精准。打个比方，莆田系有很多妇科医院，人流手术是比较大的一个业务领域。患者怀孕之后，通常会利用搜索引擎去寻找信息，像‘怀孕怎么办、做人流哪家医院好、怎么判断自己是否怀孕’等都是常规问题，竞价人员会把可能覆盖问题的所有关键词都买下来，再实时跟踪关键词的流量变化和点击价格变化，以便随时更换词条或追加费用，确保自家医院的信息始终排在前列。”杨昭告诉本刊记者。

杨昭记得自己初入这个行业时，竞价市场还是个新兴的推广阵地，进入这个领域的医院不多，在百度上购买关键词也非常便宜。“点击一次才几毛钱的成本，但却有传统广告难以具备的精准度，并因此带来成倍的客流，这对靠走量来获得收入的‘小专科’来说，是性价比最高的推广渠道。”杨昭说。在莆田系医院内部，建立起了大量挖掘引导网络广告和客流资源的部门。“一些大型医疗集团组建了成百上千人的网络推广部门，部门分工非常细致，有专门的竞价团队、文案编辑团队、流量引入团队、外推团队等等，即使是最小级别的承包科室，也会配备专门的推广人员或者将推广任务外包给专门的网络运营公司。”莫西告诉本刊记者，在他曾经工作的苏州一家莆田系医院，在2010年前后，由250人的公司规模发展为500多人，增加的几乎全是负责网络服务的员工。

庞大的网络部门分工非常细致。员工们就像勤奋机械的工蚁，每天通过电脑与庞大的病源交流，将那些并不存在的“高新医疗技术”变为网络中的“现实”。“同一家莆田系医院通常会设计多个官网来增加宣传渠道，不同官网负责不同病种，患者通过百度等搜索引擎寻找相关病症或医院信息时，分散的多个官网被搜索到的概率远远大于单一官网，总会有一两个网站有比较好的排名。访客看到信息后，点击进入医院的营销页面，就会有专门的咨询人员进行服务，在交谈过程中预约好时间，引导患者到医院接受治疗。”黄刚（化名）对本刊记者说。他曾在莆田系医院担任网络推广经理，熟谙各种推广手法，“我们会在各个渠道都发布信息，像百度知道、搜搜问问、360问答等。同时注册10个账号，不断更换账号来发言，一方面以患者的身份特征讲述治疗经历；另一方面看到相关的医疗提问就去回答并推荐医院。如果网上有针对医院的负面评价，我们也会去处理，指出是病人抹黑造谣……”

庞大的网络部门分工非常细致。员工们就像勤奋机械的工蚁，每天通过电脑与庞大的病源交流，将那些并不存在的“高新医疗技术”变为网络中的“现实”。

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大陆，百度几乎垄断了网络搜索资源。医院的竞价推广在当年达到巅峰状态，购买一个关键词的成本从最初的几毛钱上涨到几十块钱，甚至出现了后来传闻的999元点击一次的高价。但也在這個時候，“小专科”获得了大发展，莆田系医院走入了一个营收的高峰。一位莆田系医院前高管告诉本刊记者，即便在网络推广上的费用总额看起来非常惊人，但相比在电视台、纸质媒体上的广告形式，网络推广仍然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方式。“以前我们做广告，上海一家都市报做一个整版就要32万元，广告费占整体收入的30%甚至一半，但网络推广后，广告费用占比大大下降，只占公司营收总额的百分之十几或者百分之几，但吸引来的客流却大大增加。投入产出比最高时可达1:10，平均数据也能达到1:5，转化率非常高。”

被控制的医生之手

包装并推广扑朔迷离的“高精技术”，不过是打造专科医院招牌的第一步。任何技术或设备，再庞大的病源，都必须通过医生的诊疗行为，才能转化为真正的收入。在逐利化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如果将一个专科科室比作一台赚钱机器，“经营部”就是这台机器的运转核心，它们通过几个指标，牢牢控制住医生的手。莫西告诉本刊记者，在他所待过的莆田系医院中，经营部是莆田系医院独有的部门，它是莆田系医院的灵魂所在，也是“经济效益至上”最忠实、最彻底的执行者。“经营部”负责诊疗过程的报表管理。在这些报表上，有四个考核医生的重要指标——“门诊初诊率”“门诊复诊率”“病人单体消费额”“病人单体消费比例”。研究这几个主要数据指标组成的经营报表是医院经营主任每天必做的功课，他们通过考核报表上的数据，来分析医生的职业行为。

“门诊初诊率”是诊疗流程的第一环，也就是消费病人数与挂号病人数的比例，它考核的是门诊医生的接诊能力。莫西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一位专科门诊医生接诊了10名挂号患者，其中一名患者在咨询医生后就离开医院，另外一名患者在初步检查之后没有下一步的治疗消费，这位医生的门诊出诊率就是80%，两名患者会被定义为没有产生任何消费的“一级流失”和仅做了前期检查的“二级流失”。莆田系医院对初诊率的变动情况异常敏感，“如果一位专科门诊医生的初诊率降低，特别是‘一级流失’的患者

增多，医院的经营主任随时会找医生谈话来查明原因；如果医生的初诊率长期低迷，就面临着下岗的风险”。

初诊之后的复诊率也是报表管理体系的重要指标，复诊率不仅体现医生的接诊能力，同时直接关系到“病人单体消费额”，即一名患者在医院内的消费总额。患者只有多次到医院消费，单体消费额才会提高。因此，“单体消费额”是莆田系医院衡量医生“开发”患者能力最重要的指标数据，而医生的这种“开发”能力又是医院衡量医生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按照莆田系医院的规则，如果医生不能为医院带来经济效益，就没有任何价值。

莫西告诉我们，莆田系医院的经营主任通常会结合医院所在地的居民消费水平，对所有单病种划定一个基准消费额，“比如‘妇科炎症’作为单病种，在一个四线城市的单体消费基准费用为2000元。如果患者在一家莆田系医院的消费总额没有达到该标准，就说明接诊患者的医生开发水平不够”。

除了基准消费额，“单体消费组成比例”也是量化管理者不可忽视的指标。患者到医院就诊，不同项目的成本不同，给医院带来的利润也不等。由于药品价格相对透明，可操作空间有限，利润就相对较低，因此，专科门诊医生在“药品费用”上只能得到2%的提成；而提成比例更高的检查化验以及手术治疗、人工成本和设备损耗成本虽然都是固定的，但市场行情并不透明，可操作空间更大，尤其是手术项目，借助“高新技术”的名义包装一番，便可收取高昂费用。在经营报表上，医生对患者的消费构成进行精细化的比例安排。“比如利润较小的药品消费额不能超过总体消费费用的15%，而利润较高的手术费用的占比可以高一些，通过消费项目的最优组合，实现医院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莫西对本刊记者说。

这些经营报表经过几十年来不断完善改进，已经非常完善高效，它们一环扣一环，驱使全院医疗业务人员共同为“经济效益最大化”这一目标高效运转着。对一个纯粹的企业管理者来说，这些指标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利润管理工具，但对受过专业技术和职业道德训练的医生来说，这些指标却是伤害他们职业尊严的工具。当一个医生考核指标的数字不好看时，他们就像一个成绩不好的差生，会受到经营主任的训勉。如果长期不达标，医生会面临解聘的风险。也有不少指标成绩不高的医生自动离开，“因为他们不适应这里”。

新的专科产品线

在网络的助力下，莆田系医院在2010年前后达到一个营收的高峰。但对于需要不断增长刺激的资本来说，它们也迎来了困局。莫西告诉本刊记者：“作为一位营销企划人员，我最近几年的真实感受是，现在无论莆田系医院做什么样的活动，哪怕优惠再诱人，主题再感人，口号再惊人，也越来越难出现人头攒动的火爆场面。”莫西认为这是靠网络营销和虚假包装打造“高精技术”的模式走到了尽头，但少有管理者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脱离这个模式。“不得不说一个行业的开创者种下的行业基因对后来者的影响是多么巨大。自从莆田系第一人陈德良以游医起家，与其几个徒弟奠定了后来莆田系发展经营模式之后，绝大多数后来者几乎全盘继承照搬这一最简单直接的发财捷径，除了在框架上进行细节和战术上的改进和完善外，没有在战略和思想上对其进行过真正的改革创新。”

当2010年左右，传统妇产、皮肤等“小专科”迎来了收入的高峰和增长困局后，肿瘤的生物治疗被作为一条新的专科产品线提了出来。此次魏则西事件中涉事的上海柯莱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就建成于2008年，并在之后几年与武警二院等几十家公立医院建立起了肿瘤免疫治疗的合作科室。

选择生物医学和肿瘤作为新的产品线，是走专科道路的一种冒险。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肿瘤致死率高，变异性强，是目前最高端复杂、最具试验性的医疗技术领域。但从商业角度来说，这又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完美产品。那些勇于尝试最新疗法的肿瘤病人，大多处于病症晚期，生存概率已经很低。从商人的逻辑来看，病人严重的病情可以成为解释治疗不成功最顺理成章的理由。复杂且颇具实验色彩的各类疗法，则是包装技术的巨大空间。“越是没有正规方法的病种，方法就越多，越可能产生‘独门绝技’。”张松伦对本刊记者说。

肿瘤免疫细胞治疗已有20年的历史了，前后技术发展已经大概可以分为四个代次。从第一代LAK细胞，第二代的CIK、NK，第三代的DC-CIK、CTL，到现在靶向性明确的CAR-T。张松伦告诉本刊记者：“在肿瘤免疫疗法的技术梯队上，CIK就相当于黑白电视，治疗费相对便宜，做一次大约3000元。DC疗法相当于彩电，后面再开发出的新技术PD1、PD2则相当于数字化电视，可能更有效果，但也更具试验性，并且成本要昂贵得多。”

魏则西接受的治疗技术就是DC-CIK。对商业逻辑来说，DC-CIK是一个非常适合中国市场的技术。某家以细胞技术为特色的生物公司曾给出这样的成本利润计算：一次CIK治疗收费为1.5万元，毛利润为40%。如果与10家三甲医院合作，每家首年治疗200人，每人接受三个疗程，一年毛利润1512万元。从实际效果看，DC-CIK在提高病人免疫力方面确实有一定效果，对某种肿瘤细胞有很大的杀伤性，但这种疗法的精确度还有待研究，大约只对20%的病人有效。魏则西显然不属于这20%的幸运者，但他却在就医时得到了想留住病人的医生典型的莆田系承诺。魏则西描述：“他说，这个技术不是他们的，是斯坦福研发出来的，他们是合作，有效率达到百分之八九十。看着我的报告单，给我爸妈说保我20年没问题。”

2009年，卫生部颁布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及《首批允许临床应用的第三类医疗技术目录》，将免疫细胞治疗技术纳入可以进入临床研究和临床应用的第三类医疗技术，并对第三类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规定了一系列审核门槛。但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卫计委委托的技术审核机构并未组织对医疗机构应用这项技术前的评审工作。而同时国家政策又在鼓励这类技术的临床应用。2014年3月18日国家卫计委在启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2015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将PD-1、PD-L1和CTLA-4列为肿瘤免疫重要新靶点，市场前景广阔。2012年国务院《关于印发〈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中也明确将抗肿瘤药物、治疗性疫苗、细胞治疗等列为重要发展和重点支持的产业。多地物价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已联合出台细胞免疫治疗收费标准，并将细胞免疫治疗纳入医保范畴。在监管缺席和利益的驱动下，谁拥有了医院渠道谁就能应用这项技术，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为魏则西施行DC-CIK技术治疗的武警二院，只是柯莱逊生物有限公司在全国几十个合作医院中的一个。而这些合作科室仅仅是中国将这项技术用于临床并收费的场所中小小的一部分。一位业内医生告诉本刊记者，据他所知，相当多的公立医院科室都在应用这项技术为肿瘤病人治疗，这是近年来众所周知的可以创造高利润的热点专科。如果不是“魏则西事件”爆出，他所在医院的生物肿瘤中心也即将开张，方法与莆田系医院打造的专科神话如出一辙：推出几位专家，包装一个“独家”的技术。DC-CIK应用已经太广泛，失去了神秘感，所以他们准备包装推出的是更高

级的免疫疗法 CAR-T。

风险

医疗本身是充满不确定风险的行业，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病毒的千变万化，病人个体的千差万别，即便一个最专业且高尚的医生的行医生涯都会处在层出不穷的诊疗风险中。但对打造出一条专科逐利之路的莆田系来说，他们面对的风险要复杂更多。莫西告诉本刊记者他所观察到的莆田医疗系老板：“没有比他们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了。一个跟我熟悉的莆田系老总曾经跟我说，每当半夜里电话响起，他都会心悸不已，心想，完了，医院又出什么事了。”

他们面临的风险大多是在专业技术之外的——比如绝大多数公立医院的科室承包是通过给好处费，打通关键人物而私下得来的，这块可以带来高额利润的“责任田”随时有被收回的政策风险，还有市场越来越饱和，可承包资源越来越少，同行来争抢“山头”的危险。

通过贿赂获得承包平台，通过虚假包装技术，过度医疗的方式从患者身上榨取不道德的利润，通过偷税漏税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留利润……这些资本之恶，一旦内部产生矛盾，将这些灰暗的事实公之于众，经营者就会面临法律甚至刑责的风险。

但在过去这些年，莆田系一直用资本的方式解决这些风险。有的时候是给更多的钱：2012年5月，军区纪检部联合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军区医疗卫生行业专项整治活动》的通知，大量民营资本与部队医院的承包科室就在被要求整顿之列。但最后的解决方法是重新签订合同，协商出一个给部队医院更丰厚回报的协议。

有的时候则是放弃自己的得利平台：此次魏则西事件中被曝光的武警二院生物诊疗中心网站的幕后管理公司——上海康新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早在2014年就已经注销了。它曾是此次涉事的陈新贤、陈新喜兄弟与部队医院签订承包科室时最重要的平台，但因为与公司股东陈元发的股权分红纠纷，遭到陈元发提起诉讼和举报，于是陈氏兄弟注销了这家公司，导致一些合作医院科室的合作账款结算无法收回。据陈元发告诉本刊记者：新疆某部队医院，至今还有700多万元的余款没有与上海康新结算，其理由是无法汇到上海康新账号。

这些都是莆田系医院要付出的代价。他们也随

时保持警惕，以断尾求生方式保护自己的产业，莫西告诉本刊记者：“早在入行之初，我就诧异于分布在不同地域的莆田系医院虽然是同属一家公司同属一个老板，医院名号却各不相同，为什么莆田系医院不像其他行业的连锁店一样，统一名称统一标志，这对医院品牌推广来说不是事半功倍吗？后来，有业内人士跟我说，这是为了规避风险。设想万一某地某家医院因为某事违规被查处关门了（这在莆田系医院当中并不少见），他们可以像断尾求生，放弃这一家医院来止损，并不会因此牵连到其他的医院，也不会因此损害公司旗下其他医院的品牌形象。”

以金钱为代价打通关节获得平台，再以金钱为代价放弃危险的平台。在过去的几十年，这个在灰暗阴影下壮大的医疗资本，一直在资本的庇护下，牢牢保护着自己和已经占领的医疗阵地。袁钟对本刊记者讲述了唐山市一家公立医院院长的故事：“有一次他接到一位农村老大爷的投诉，说自己60多岁已经没脸回老家了，因为在这家医院的皮肤科被诊断为性病，后来证明这不过是皮肤科为了获得治疗收入的故意误诊。这家皮肤科就是被莆田系承包的科室。这位院长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接到了不少来自上级的干预电话，用了三年时间才将科室从那个不道德的承包者手中拿回。”莫西说他眼中的莆田系老板：“善于以金钱打通关节，无论是对各级卫生监管部门、部队医院、公立医院、退休高官乃至处理医患之间医疗纠纷……这种点对点‘攻关’对他们来说可谓稳熟无比，无往不利。”

但“魏则西事件”却不一样。“对莆田系医院来说并不是一起特别典型的医疗纠纷。”莫西对本刊记者说，“近年来，发生在莆田系医院更重大、更恶劣的医疗丑闻不绝于耳，反倒没有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在我看来，‘魏则西事件’发展轨迹出乎常规之外——如果魏则西病逝后，魏则西父母直接找上承包北京武警二院科室的莆田系老板理论。那么，我想，这件事可能早就被莆田系摆平了。而可能正是魏则西父母的不依不饶和平理性，反而获得公众更大的同情，也让莆田系的资本解决方法没有施展的空间。”这个年轻人和他的家庭，在生命接近尾声时，在网络上平静悲凉，但不带任何利益驱使的陈述，跳出了资本的逻辑之外。对那些以资本作为唯一武器和盾牌的逐利商人来说，这是一个他们没有预料，也无法防护的“意外”。■（感谢实习记者唐瑶对报道的帮助）



搜索扭曲与竞价排名

记者 / 王丹阳

在缩小知识鸿沟、驱动社会信息流动方面，搜索引擎可谓时代利器。但任何一家搜索引擎公司都是商业机构，盈利才是它的本能。只是，我们需要经历一次次残酷的事实后，才可以清晰认识到这一点。它缩小了知识鸿沟，还是利用鸿沟牟利？界线并不明朗。

“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魏则西在生前回答知乎上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时道出了他的经历。“百度，当时不知道有多么邪恶，医学信息的竞价排名……可当时不知道啊。”魏则西在那条帖子里说。

即使今年1月，百度“血友病吧”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但仍然鲜有人知道，最普通的关键词搜索，都可能已落入商业竞价的泥淖。

魏则西逝世后，“百度之恶”几个字眼满屏滚动，人们将火力集中开向百度，却一时间让处于矛盾核心的“莆田系”躲在了盾后。事后，有人分析，那几天舆论的引爆一定程度上源于民意长久以来对百度藏污纳垢的积怨。毕竟，原本被视为“技术中立”的信息搜索引擎，在诞生之初人们对它的期待是一种公器，当它慢慢越过商业的灰色地带，在人们的生活世界里形成遮蔽和过滤，它就极易被上升到阻碍文明的伦理高度，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对信息技术的依赖已不可逆转。



左图：2010年8月5日晚，在北京百度大厦总部，百度举办纪念酒会庆祝登陆纳斯达克5周年纪念日。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通过远程卫星连线方式为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敲响开市钟

右图：2012年9月，谷歌员工庆祝柏林办公室成立，谷歌在德国已有95%市场份额

害怕被颠覆

今年2月，李彦宏在“贴吧门”事件后缓了一口气，上了一档央视的纪录片栏目。让人印象至深的是，他否认了百度的成功跟谷歌退出有必然联系。“谷歌在退出中国大陆之前，它在中国大陆运营了5年，这5年它的市场份额每年都在下跌，而百度每年的市场份额都在增加……”李彦宏这么解释。

这个鲜少出镜的5万人大船的掌舵者跟他的企业一样低调而平顺。今年48岁的李彦宏从山西酒泉的“三好学生”、到北大学霸、硅谷精英，2000年创办百度，每一步都踩点精准，是中国第一代互联网骄子，享尽政策红利和社会期许；百度也一样，成立5年即美国上市，首发翌日市盈率一度飙到2450倍，堪称中国公司海外上市航母、华尔街上的中国名片……纳斯达克上市的其他网络概念股的市盈率也就30倍到50倍之间，当天谷歌的市盈率是85倍。

确实，谷歌退出中国虽直接源于境内审查，但它在中国市场的水土不服也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艾瑞数

据显示，谷歌中国网页搜索请求量市场份额2005年的时候是26.9%，到2009年变成了18.9%。而百度的市场份额则从2005年的46.5%增长到了2009年的76.0%。中国人每次点下的“鼠标投票器”都能说明一种地域性的搜索习性、人口结构、文化心理等等。当年，任谷歌大中华区总裁的李开复解释道：谷歌的用户集中在上海这样的白领集中地，他们明显发现周末的搜索请求降低，谷歌落后的市场是在“三、四线城市和网吧”。

如何破新兴市场的先入为主格局，是谷歌在中国摸索的最大难题，以至于李开复说，即使他们将搜索质量、页面收录数量都做过了竞争对手，但“用户还是不认”。另外，在版权流通缺乏规范的那几年，中国用户最喜欢用搜索引擎下载MP3，谷歌在这方面显得很不利，也无法对味国人的娱乐习惯。

而百度恰是瞄准了从技术中来，到国民中去的“草根路线”。为了贴合用户，百度大力布局了贴吧、知道、百科等社区平台，这正是它的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如果不是今年1月，“血友病吧”东窗事发，吧主的



2014年11月28日，法国教育部长贝勒卡西姆在巴黎参观欧洲教育展时测试孩童专属的搜索引擎网站“Qwant junior”

民主地位被广告经营的势力端翻，网民也鲜有察觉这其中如此精妙和灰暗的腾挪换手功力。

但放眼全球，两家公司在2009年的市场份额正好倒了个序：6月份谷歌的占有率为68.9%，百度则为6.9%。谷歌在退出前曾在中国的媒体上发声，搜索是一门“可以发展几个世纪的科学”，互联网最伟大的进步还没到来，今后10年内，将看到搜索模式出现巨大变革，并提到了移动搜索、语音、手势、图片和歌曲搜索，这也正好应验了近几年来苹果、Facebook等巨头正在开发的领域。谷歌在美国用10年时间做到了60%的市场份额，它的技术派和高冷范儿与百度相比似乎是由上到下的“俯瞰”，由此为其赢得了“专注”的市场印象。

无论如何，谷歌的退出为百度让出一条捷径，更助燃了百度轻松稳据中国大陆搜索引擎的鳌头。李彦宏在上述央视的节目中曾这样说过，他不怕本来就比百度大的竞争对手，但害怕行业内突然杀出的黑马。

确实，IT行业就像一个野草坡，在超额利润的诱导下，各种技术一茬茬地疯长，几十年来常伴随着弯道超车式的超越。李彦宏说：“反而是那些你平时没有关注到的，你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的，但其实你的判断是错的。这个东西可能越做跟你的核心业务越接近，最后把你颠覆掉。”

最接近他的害怕的那一年，也许是2012年，奇虎CEO周鸿祎对“360搜索”孤注一掷，瞄准15%到20%的市场份额，企图颠覆掉百度的垄断地位。当年，擅长“发难”的周鸿祎屡屡触碰边界，公开宣称说：“中国有垄断八成的搜索巨头，让用户没有选择。”当2013年中，360搜索的份额已攀升到15.26%，随后搜狐的搜狗和腾讯的搜搜也占到8.83%和3.4%，位列第三和第四，百度的压力不言而喻。

中国资深网民不会忘记，2013年底在百度上搜索“360”时出现的戏谑一幕，百度在搜索框下贴出警示：“奇虎360违反工信部20号令，强制拦截网民

下载百度杀毒、百度卫士。”双方的屏蔽拦截把“二选一”的游戏抛给了网民，最后，网民的鼠标还是自动淘汰了以杀毒软件起家的奇虎。法庭上，百度胜诉。

从2010年开始，延续了4年的“奇虎、腾讯”、“奇虎、百度”之争，看似是行业搅局和赶超之争，却始终透露着对伦理边界的质疑和挑战。虽然搅局者奇虎屡屡败走麦城，但百度在中国未充分竞争的互联网生态下常被抛到“垄断”的审判桌前。谷歌退出后的4年，百度也在鏖战中找到隙缝，从混乱的互联网创新业态中突围，成为无可匹敌的“国民引擎”。

只是到了今年，矛盾积蓄到了连发两次危机。5月10日，李彦宏写给百度员工的一封内部信里或见缘由。“不同部门为了KPI分配而争吵不休，一些高级工程师在平衡商业利益和用户体验之间纠结甚至妥协。”他承认，“我们的价值观被挤压变形了。”

竞价排名的起源

回想2005年百度上市前，时任谷歌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Emerson Schmidt）曾意欲收购百度，劝李彦宏不要IPO，李彦宏坚持上市，为此被一家官媒称作“不随资本的魔棒起舞”。11年后，百度却因竞价排名机制被历史性地钉上了舆论的十字架，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意汹涌下，百度承受着出世16年来最严酷的考验。

其实，竞价排名非百度首创，作为竞价排名的鼻祖，overture的每点击付费（pay per click, PPC）模式曾于21世纪前就被谷歌运用到实际营收中去。在老牌互联网公司谷歌、雅虎、微软中都能找到PPC的影子，搜索引擎、广告网络以及网站或博客都广泛运用PPC布展广告。但对于盈利渠道单一的搜索引擎来说，PPC就代表着更显著的利润增长点。

PPC的原理是广告主只有当使用者实际上点击广告以拜访广告主的网站时，才需要支付费用。广告主可以竞标他们认定的目标市场对象在寻找某一类型的产品或者服务时，可能会在搜寻时输入的关键词。当使用者键入关键词查询与广告主的列表匹配，该广告主投放的广告就会显示。根据搜索引擎不同，最低价以美元1分到50分起标，越是热门的名词就越贵。

迄今为止，人类的搜索技术只能截取浩瀚的信息海洋中的千分之二片段，基于技术之不可及，和人为的操纵化结果、对于序列的扭曲，信息社会里的人似乎离社会真相更远。跟谷歌一样，“技术中立”的

搜索巨擘的宿命是始终与商业广告互生着，无论是雅虎、必应，还是韩国最大的搜索引擎Naver，优先呈现的都并非是自然生成的搜索结果，而是经客户付费购买后的推广链接。商业公司一方面背负着人类对技术进步的普遍期望，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利益面前对产品做出“调整”。

目前谷歌最大的收入占比仍然是搜索广告。今年2月初，谷歌母公司Alphabet发布了架构调整之后的首份财报，显示去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213亿美元。其中，广告收入占到了第四季度总收入的90.08%，跟百度相差无几。

2001年，李彦宏也开始借助PPC模式。客户通过购买关键词进行竞价，决定其在搜索过程中排名的先后，并在竞价中提成。百度的竞价排名分两种，一种是百度推广，就是关键词付费，相当于谷歌的ad words。

目前，网上仍流传着众多关于如何关键词付费的指导性帖子，广告商朝着这一网上的“麦加”，就像当年淘宝独霸网络购物时，各地也兴起了淘宝学校做起了下游产业，教成千上万的店家如何做大流量。百度上的广告商亦有本经，比如“每日预算设置要低一点，因为账户是自动计费的”，如果你每日账户设置上限100元，你的关键词点击价格是1元，那么被点击100次就用完了，广告也就自动停止。照业内经验，某些热门行业的关键词一天花个上千元也正常。

另一种竞价排名方式是百度联盟，相当于谷歌的ad sense，它是第三方客户在其自己的网页上提供广告位，谷歌将契合度最高的广告投放到客户提供的广告位上。这是一种广告的新打法，广告发布商在自己的网站上展示相关性较高的Google广告，谷歌根据网站上显示的广告被点击次数来分成佣金。美国的互联网创业公司wikipedia都几乎是基于ad sense模式而生的，退休者也可以整天坐在屋子里摆弄广告模块，享受着流量分成的乐趣。

百度联盟的座右铭是“让伙伴更强”，联盟旗下的学习社区更是精彩纷呈，有先锋论坛、联盟志、大联盟认证、常青藤成长计划、互联网创业者俱乐部等等，它的搭建初衷都是冲着帮助“伙伴”挖掘流量价值。截至2011年，百度联盟的累计注册网站超过了50万，号称与国内外500余款知名软件、几十家网吧应用服务提供商合作，将搜索服务推送到了上亿台终端上。

2002年，竞价排名逐渐成为百度主要收入来源，以至于在2004年时达到百度收入的40%。根据艾瑞

的数据，当年中国搜索引擎行业市场规模 12.5 亿元，其中搜索引擎运营商收入规模 6.3 亿，渠道代理商收入规模 6.2 亿元，两者间的平分秋色也足以说明后者的补给价值。

今年 4 月末，百度发布今年第一季度财报，总营收为 158.21 亿元人民币，其中网络营销收入占比 94%。为此百度 CFO 李昕哲曾公开透露，医疗是百度最挣钱的广告投放收入之一。摩根大通 2015 年有分析报告称，医疗相关广告占百度 2014 年总营收的 15% 到 25%，更有公募基金分析师预言，如果中国政府未来整体禁止医疗类广告投放，百度的股价将下跌 28% 到 47%。

百度财报预计第二季度营收在 200 亿元当口，按照莆田系占比百度广告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来计算，哪怕仅是对莆田系医疗广告的封杀，就将剝去十几亿元的肥肉。更何况，目前百度账面的资金又尤其紧张。2015 年三季度，百度净利润仅 28.41 亿元，同比下滑 26.7%，这跟公司去年 200 亿元投入到 O2O 有关系，百度也在思索其转型战略，做“人与服务”间的连接。

“谷歌之恶”

2009 年，时年 34 岁的职业骗子大卫·安东尼·惠特克 (David Anthony Whitaker) 出现在美国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 (Providence) 的一个邮务督察办公室。他的任务是协助政府展开一个秘密调查，对他来说，能否减刑完全依赖于他能否再次证明以“不作恶”为座右铭的谷歌确实做了恶。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在墨西哥西部城市瓜达拉哈拉的一个乡村俱乐部一边挥金如土，一边造着一种叫 Dutchminnie 的类固醇，其实就是在小药瓶里装上无菌水、蛋白粉、植物油等等，贴上 1000 万美元的价格标签，通过在线业务卖出去。当他发现谷歌 AdWords 如此乐此不疲地帮他推销自己的业务时，就愈加胆大地勾兑假药了。

当他闭门造药时，也支付着每月 2 万美元的广告费，并有资格与谷歌的一名专门代表进行单独联系，这种“上门服务”还包括了选择搜索关键词和地理目标上一些指导，谷歌代表帮他吧“类固醇”、“人类生长激素”和“睾丸素”等关键词添加了进去。为了规避谷歌自有的自动屏蔽政策，该职员还教他重新包装了自己的网站，取消“立即购买”选项，让它看起来“温

和”一点。

惠特克的归案在当时的互联网世界落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谷歌作为全球第一大搜索引擎，其职员竟用关键词策略帮骗子规避广告审查，那么“很有理由设想谷歌也在帮其他网络骗子非法出售药物”，连惠特克也这样说。事情的解决发时，谷歌向当局支付了 5 亿美元“和解金”，以免于刑事诉讼，这笔费用占到谷歌全财年运营利润的 4%。

早在 2004 年，美国国会就提出过两项针对网上药物出售的法案，但在听证的时候，被时任谷歌运营副总裁的谢丽尔·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 否决，她认为政府监管措施会为企业带来沉重的成本负担。确实在美国，政府及法庭都有种默识，基于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性特征，过分监管会带来成本负担，阻碍创新发展。就像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莉·科恩 (Julie Cohen) 在《塑造网络化的自我：法律、代码和日常实践的游戏》(Configure the Networked Self: Law, Code, and the Play of Everyday Practice) 一书中提出，法律体系的“留白”有利于保护人们的创造性行为，而对于网络平台的免责正是这种“留白”的体现。

谢丽尔表示，谷歌已经聘用了一家第三方认证服务机构，来对网上药店进行审查。另外，她还描述了谷歌自己的自动化监控系统，只是，5 年后的东窗事发，证明了一种内部自我审查的无效。但惠特克案后，谷歌确实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慑。

公司宣布拿出 2.5 亿美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打击“非法网络药店”。在非处方药部分，谷歌只认可获得美国互联网药房执业认证 (Verified Internet Pharmacy Practice Sites, VIPPS) 的机构的广告申请。处方药、化妆品的广告投放则必须经过美国药事理事会 (NABP) 的互联网广告审批程序，并被确认已列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数据库中，才能申请谷歌有偿推广服务。此外，FDA 在线下响应，全线封杀了保健品。

近些年来，谷歌负责广告审查的员工多达 1000 名，并在 2015 年从提交给公司的数十亿广告中禁止和清除了 7.8 亿条违法的广告。同年，拦截了 1250 万个药品广告，屏蔽了 1 万个销售虚假商品的网站、1.8 万个此类账号。而谷歌研发的智能机器人也来到了屏蔽虚假广告的队伍中。

2013 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向谷歌、雅虎等搜索引擎公司发出公开信，更新了将付费广

告和自然搜索结果区分的指南，用“标签用语、添加背景颜色、设置边框底纹”等规范性要求，将付费信息从自然搜索结果中集中地区分出来。所以，现在当你在谷歌里输入滑膜肉瘤的英文名称“Synovial Sarcoma”之后，会发现在一连串的学术论文之后，会跟有几条用黄色“ad”标签打头的广告，而不是像百度那样，头几条便是医院的广告网站，而中立的病理性常识却掺杂其中。

搜索引擎的诞生因缩小了知识鸿沟、驱动社会信息的流动，确实堪称万世功臣，但技术中立并不代表永远中立，因为有人地方就有价值，作为企业来说不可能做到价值中立。这点上，谷歌和百度并无二致。如果魏则西生前并不是通过百度搜索到武警二院，也许竞价排名的“原罪”仍被继续藏匿，并不会受到如此公开化的攻击。

跟百度以往因竞价而惹上官司不同，这次，是一个病人在用生命拷问这个商业模式的合法性基础。特别是当医疗这个关乎健康与生命的领域与商业推广“合谋”后，伦理上的碰撞更是发出撕裂般的声音。毕竟，癌症病人的医疗选择直接关系到生命的机会成本，这也许是百度未曾想到的。

不算广告

5月9日，国家联合调查组公布了对百度的调查结果，认为竞价排名机制存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表示不清等问题，必须整改。但是“商业推广”四字极大地撩拨了公众的神经，在推广和广告之间，舆论倾向为后者，并认为百度再次逃过了《广告法》的惩治。

付费推广到底算不算广告，成了百度是否要负法律责任的关键焦点。回顾10年来有关百度竞价排名的诉讼案，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以往关键词搜索所带来的不正当竞争，所导致当事人经济损失的，都以删除相关信息告终。根据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对既有惯例的统计，“90多起判例中，认定百度推广属于搜索技术服务的有13件；认定百度推广性质不是广告发布者的有77件；认定百度推广具有广告性质的有2件”。

朱巍分析道，认定付费推广不属广告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百度推广符合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它是美国最高法院在索尼案中确立的基本原则：“如果产品

的用途被广泛用于合法的、不侵权的目的，那么就不构成侵权。”从这个原则来看，百度推广的内容符合良性竞争，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第二，百度推广对信息不具有完全的控制力。它所有的内容均来自网站自身，百度本身不具有选择广告内容的主观意志。试想一项本身就存在问题的医疗技术，当广告主时不时更换其天花乱坠的描述时，百度是无法跟踪并监督的。由于无法核实信息的真实性，而只能做到形式审核。

第三，百度推广不符合广告活动主体资格，排除掉广告主、广告经营者、代言人这三个角色，百度最有可能是广告经营者。即使在欧美国家，谷歌也没有被视作广告发布者，因为它不能决定引流页面的内容、发布时间和方式，承担责任的只能是广告主本身。就2009年的惠特案来看，其实跟竞价排名没有直接关系，那是谷歌甚至没有尽到形式审核义务，协助涉案人售卖假药。

当搜索引擎变成信息泥沙俱下的闸道口，其技术本身是无法对每一信息的真实进行侦探和追踪的。所以在5月3日百度对公众的回应中，表示武警二院是符合资质审核的三甲医院，这是一种形式审核，意味着百度履行的义务也只能至此。百度也无法控制实质传播途径，何况形式审核后的页面修改权保留在广告主手上。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在《自有言论与敌对环境》（*Free Speech and Hostile Environments*）一文中论述过附属审查（Collateral Censorship）的问题，传统的报纸、出版社是存在附属审查的，但如果附属审查被运用到传播门槛本来就低的网络平台，就会有很多问题。也正因为这一点，各国法律体系都对网络平台提供了一定条件下的免责保护，使之没有动力对所传播的信息进行审查和控制。

在百度这次的危机中，舆论认为，付费推广即使不算广告，百度也不能免责，因为“广告发布者对明知、应知广告虚假而发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事实是，百度是否可归为“广告发布者”，目前在法律上都没有依据。再则，根据“红旗原则”，百度是否事先知道那是虚假广告，也很难定论。

但在去年7月，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起草的《互联网广告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各类网站不得采用任何形式链接处方药生产销售企业，烟草生产销售企业自有网站、网页，搜索引擎不得为此类网站、网页提供付费搜索广告服务”。

这是政府文件中第一次提到“付费搜索广告服务”，但这只是一份征求意见稿，离实质法律约束效应还很远。

虽然以上意见稿大多数条目只提到处方药、医疗器械和药草广告，并未对像莆田系医院的医疗技术广告有所涉及，但百度还是感受到了一丝危机。2013年，百度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报告中表示，百度推广不受中国广告法的监督，但在去年的年报里，百度担心如果付费搜索被法律认定为在线广告，有效税率将会因此上升。

互联网“法外之地”

1994年，那是一个还没有谷歌或者百度的年代，甚至雅虎也是一年后才创立的。英特尔CEO格鲁夫患上了前列腺癌，他阅读了大量医学论文和书籍后，比较了各种治疗方案，最后选择了荷尔蒙加高剂量植入辐射。格鲁夫在今年3月去世，他曾经写道：“不能过分相信你的全科医生。”

在20年后，当网络搜索充斥着人们的生活，甚至原本不以搜索起家的网络巨头都在尝试把语音搜索用在智能机器人身上，搜索实则成了多数人接近信息的最便捷渠道。但当这个大箱子在向人们打开的时候，接收什么、选择什么，就以一种极其不平衡和不对等的方式引导着用户的日常。大多数人不大可能再通过翻阅书籍来确定治疗方案，未必因为学养水平不如格鲁夫，而是技术进步把人带到一个新的信任平台。李彦宏曾经谈及百度的文化精髓是“简单可依赖”，确实，用户在网络这个新的信任平台上产生的倚赖很难逆转。

而这个信任平台只是信息的汇集地，它也可能受商业利益驱动而扭曲，就像竞价排名。在国外，对网络平台的偏袒和赋权甚至存在一种理论基础，从而引导着一种非平衡的法律设计。而中国互联网20年发展，也是借鉴了欧美的惯例才得以有一套自己的体系。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网络法的教授乔纳森·齐特恩(Jonathan L. Zittrain)在《生产性的互联网》(*The Generative Internet*)一书中认为，若让网络对发布内容进行实质审查，将极大地增加互联网企业的创新成本，再则，它们也没有能力进行实质审查。

而所谓“生产性的互联网”的定义是，一个系统接受大量多样化的、未经受众审核的贡献，能产生预期之外的改变性力量。开放、自由和公共性是它的特

征，并降低了颠覆性创新的门槛。这里看来，颠覆性创新的本源在于用户，是一种合作参与下的激变，这就把互联网本身的社会责任属性给降低了。

虽然美国的互联网法专家也鼓励法律的力量，以及借助法律所划定的宽广边界来保护互联网发展，但他们都认为前提是“自由和开放”，而这个特征也让法律不能像规范生活世界中的刑事责任人那样规范互联网。哈佛法学院另一位教授劳伦斯·莱斯格甚至认为，通过法律手段过多地保护版权和专利将有损互联网创新。这让人联想在2004年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当时在谷歌、现在Facebook任CFO的谢丽尔强烈反对对医疗广告进行审查的理由，也是高举“创新成本”的武器。

基于以上这些原则，这30年来美国的复印机、刻录机、光盘、打印机、互联网、搜索引擎、P2P技术等新技术应运而生，法律上的宽容极大降低了创新的风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巍在一篇技术分析性文章中解释说：“同‘录像机不单能盗版，也能录制自己的生活’一样，不能因可能的隐患而一概抹杀。”

同样是受到法律眷顾的搜索引擎，人们却对百度大加鞭挞，而对将“不作恶”作为广告词的谷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谷歌一直是在突破技术漏洞，并肯花重金增强对漏网之鱼的屏蔽和拦截。说到“百度之恶”，舆论很容易地将之与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平庸之恶”联系在一起，后者就是指自甘于体制化的认同，一些未必违法，却与昏聩的官僚体系共谋并同归于沉默的现象。

而百度近年来逐渐给外界造成的刻板、僵化和官僚化印象正与这种“平庸之恶”越来越有几分相似。再一方面，在谷歌退出中国后，百度一枝独秀地存在了7年。彼得·德鲁克曾说，即使是那些最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人，掌管公共服务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半年以后，“其行为也会变得像最糟糕的混日子的官僚和争权夺利的政客一样”。百度不是官僚机构，但它在非充分竞争市场中所得到的红利不言而喻。

“记得创业初期的百度，那时我们主要在跟谷歌等竞争对手抢用户。后来他们进来了，却几乎没有挖动我们什么人，细想起来，那个时候大家都憋着一股气。”国家联合调查组在公布调查结果翌日，李彦宏写了一个内部信周知员工，说了以上这段话。在今年2月央视的那档纪录片中，李彦宏在结尾还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对我来说，最好颠覆我的是我自己，而不是另外一个公司。”

永远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加入我们去追求未来
因为只有幸运的少数人可以
NEVER MISS THIS CHANCE
OF JOINING US TO PURSUE
A FUTURE AS ONLY THE
LUCKY FEW CAN

CCTV

优秀代理公司

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是集广告代理服务、影视制作、音乐版权销售、金融支付4家子公司为发展平台的文化集团公司；拥有丰富的媒体运营经验、专业的品牌服务能力以及雄厚的资本运营实力，是媒体及企业经营活动中的有力合作商。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在北京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病房里，除了为病人提供止痛、营养支持等基本治疗外，医护人员还帮病人清洁身体、通过聊天进行情绪安抚

人生最后一程，何时不再艰难？

文 / 吴琪 摄影 / 黄宇

“肿瘤不相信眼泪，不相信亲情，不相信决心，不相信实力。”

这是一位中国医生的感慨。很多亲人罹患癌症的中国家庭，基本都要经历一场身心俱痛的浩劫，甚至是在人财两空之后，才能明白这句话在残酷背后的真实。

现代社会，人们沉浸在生命的愉悦与计算当中，渐渐成为死亡的陌路人。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似乎就是为了逃避和淡忘死亡，哪怕是在讲给孩子们童话中。但是当癌症不期而至，一个个家庭在惶恐中悲痛应战。他们这才发现，死亡往往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段缓慢艰苦的过程。

让人吃惊的是，中国的很多癌症终末期患者，最终是在急诊室的抢救中匆忙离世。在任何文化里，这都不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死亡方式。“宁愿死在三级医院的走廊，不愿死在其他医院的病房。”这其中既有人们对于医疗资源差异的不放心，也有临终者面临的深深无奈。尤其是癌症的临终者，对于三级医院来说已经失去了治疗价值，可是他们在这个庞大的社会里，又几乎找不到一个愿意接纳自己的，既能提供所需医疗服务，又能具有情感关怀，并且价格还算公道的场所。

在多种文化的民间传统里，面对死亡都是一种微妙难言的情感。临终之人对自己生命、财富和所爱之人难以割舍。但是，他的抱憾之情始终不会超出一定分寸。留恋生命与坦然上路联系在一起，与对死亡的习以为常联系在一起，死亡犹如近身常客。现代社会发达的物质文明，逐渐隔绝了人们与自然之间的距离。被迫面临的病痛与死亡，突然将人的生物属性打回原形。

而我们这才发现，以一个个癌症患者家庭的悲痛为代价，我们从大众心理到社会机制，都还没有为人生的最后一程，做好准备。

“只要一天24小时，有一两分钟不痛，他就会觉得舒服极了”

詹涓知道爸爸患有癌症的时候，离她临盆只有

10天。

在打开家门的一瞬间，远道而来的消瘦病弱的爸爸，再也无法向怀孕的女儿隐瞒实情。之前父母只是告诉女儿，爸爸得的是肺结核，在南京一家部队医院接受治疗。难以接受噩耗的詹涓，四处打听如何在南京给爸爸挂上三甲医院的专家号。在临盆的前三天，快过春节了，看病的人稍微少了些，她终于通过一家网站求得了某个著名公立医院的专家号。“我至今还记得，我把爸爸的一张张看病资料，摊在大肚子上拍照的情形。”她对我说。

一直到父亲去世将近两年后，詹涓才终于有了勇气，写下了她父亲最后一段人生路：“我的爸爸，笑声爽朗，身体健壮，与人为善，从不吸烟。2009年9月2日，他在常规体检中发现肺部占位，随后确诊得的是肺癌，经过两次开胸手术、9次化疗、20次全脑放疗，他在2011年的2月10日去世。去世的第二天，是他喜欢的外孙女、我的女儿1岁生日。”

让詹涓难以释怀的是，自从知道爸爸得病后，她们一家就发现走在了一条充满歧路的小道上。每走一步都要面临艰难的选择：该不该手术？该不该化疗？该不该看中医？……而到了最后，则是该不该现在就放弃？该不该赶紧回老家？该不该送入临终关怀医院？“这条路越走越窄，直至无路可走，虽然深知自己已经尽了全力，但仍然满心愧疚。”

2016年4月29日，在美国短期派驻的詹涓刷微博时，发现记者同行孔璞正在关注一名叫魏则西的年轻人的死亡。詹涓作为记者的敏感，以及曾经身为癌症家属难以摆脱的心理感受，使她迅速展开了调查。“一个22岁的年轻人的死亡，本身就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尤其在知乎上，他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本来，临终的人会是平静的、与疾病握手言和的态度。我经历过父亲和朋友患癌离世的事，我知道肿瘤患者会在治疗期间遇到多少无奈和抉择。”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说。

在父亲患癌去世后，詹涓开始了对医疗行业的关注。她也一直关注民营医院，尤其是莆田系和百度竞价方面的内容。詹涓还经历了一位同龄朋友因癌症去世的事情，这个朋友去世前接受过和魏则西一样的生



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生命关怀病区

物免疫疗法。“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借钱做了两个疗程的生物免疫治疗，却在两个疗程做完后，高烧一周而去世。当时我就对这种治疗充满怀疑，我搜了不少文献，但是并没有得到生物免疫疗法任何可靠的证明。”

詹涓说：“武警二院的医生给出了魏则西活20年的承诺。魏则西的病情很不乐观，积极治疗之后病情进展还是很凶猛，后来他在各地正规医院得到的是保守治疗。他是一个求生欲望强烈的年轻人，20年，太戳中他们的心理了。”她开始查武警二院的网页，查各种各样的ICP备案，很快就查到了“莆田系”的身影。她联系到斯坦福大学，查明斯坦福并没有与中国内地医院开展任何生物免疫疗法方面的合作。关于癌症疗法，她也咨询了几位肿瘤医生。

2016年5月1日早上6点多钟，詹涓将《一个死在百度和部队医院之手的年轻人》文章放在自己的小众微信公众号上，没想到3个小时阅读量就过了10万+。

三天下来，这篇文章在她公众号上的阅读量有80多万，新浪微博上的阅读更是超过了千万。

在这篇文章获得极大的关注后，詹涓承认自己取的文章标题有些情绪化。从事实来说，年轻人魏则西死于癌症，但是百度的竞价排名和武警医院科室承包，利用癌症患者的求生欲望进行欺骗，明显逾越了规范。“这其中的法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戳中了大家的隐痛。”在微信的后台留言中，詹涓发现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共鸣，一方面与很多人受到百度推广的欺骗有关，一方面也与患病家庭遭受的医疗行骗相关。尤其是对于经历过癌症的家庭来说，不实信息与昂贵的不实治疗，更是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在这种反响背后，癌症家庭面临的重重困难，更是一个让人沉重的话题。

一旦有亲人患上癌症，除了情感上的伤痛，如何选择合适的治疗，几乎成了每个家庭的难题。詹涓爸爸在南京某部队医院得到的诊断是，病人已经没有手

术指症，只能做化疗。在北京挂上三甲医院的专家号后，医生发现之前医院给予的治疗方案非常落后，病人早就应该做手术，之前的化疗不仅效果不好，还打败了身体的免疫力。

詹涓父亲很快在这家医院做了手术，接着由于病情进展，他在2010年5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可是詹涓一家发现，在父亲手术之后，就找不到主治医师了。因为外科大夫只在乎手术做得好不好，病人手术后的抗癌治疗不在自己的工作职责中。当詹涓父亲出现骨转移时，又被要求去骨科重新看病。终末期的病人既需要止痛，又需要营养支持，可是止痛科不管营养支持的事。詹涓一家一次次在家与医院之间奔波，出现脑转移的父亲躺在车的后座上，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呕吐不已。

让家人痛心的是，父亲在生命后期常常说，只要一天24小时，有一两分钟不痛，他就会觉得舒服极了。他形容自己从臀部到双下肢，始终是像刀割、像火烧、像放进绞肉机那样的疼痛，也因为痛，他失去了食欲，急速消瘦下去。这种看着亲人忍受巨大的折磨却无能为力的感受，使得詹涓的妈妈在爱人去世后，用了三年时间才走出阴影。

癌症病人家属：怎么选都是错？

在深圳工作的中年女子梁川（化名），曾经写文章讲述她父亲患癌后的经历。她们姐妹三人在父亲查出癌症晚期后，想帮父亲完成去南方旅行的心愿。于是梁川回到东北老家，将父母姐妹一大家子接到自己生活的深圳，然后又去了一趟广西。等再回到东北治疗时，父亲体内的肿瘤明显增大。经过三个多月身心俱痛的治疗后，梁川的父亲去世。随后，梁川一家人陷入了摆脱不掉的内疚和怀疑中，她们一遍遍问自己：如果当初查出肿瘤后，不是带父亲去旅行，而是直接去医院治疗，他会不会多活一段时间呢？

特别是在听说父亲一个朋友的经历后，梁川更是感到悔恨。父亲这位年龄相当的朋友，在几乎同样的时间查出了癌症，癌症所处的时期也与父亲相同。这家人马上把老人送进医院，虽然最后老人也没有逃脱病魔，但是他比父亲多活了三个月。

这多活的三个月，成为压在梁川一家人心头的巨石。直到有一天，她碰见了这位老人的孩子们，他们说：自从把父亲送到医院开始一系列治疗后，父亲就再也没有独立地下过床。他人生最后的半年实在是太痛苦

了。他们后悔没有像梁川那样，先带父亲出去玩一圈，再面对不得不进行的治疗。

梁川说，这时候她才发现：对于癌症病人的家属来说，不管怎么选，都会后悔。因为他们必须面对疾病逐步吞噬亲人的痛苦，只要疾病的进程是不可逆的，患者最终在疾病摧残下离世，这种压在家属心里的痛楚，就久久无法消亡。

事实上，在一个忌讳谈论死亡的文化里，人们很容易将疾病、治疗与不得不面对死亡的痛苦混杂在一起。

北京军区肿瘤医院的专家刘端祺对我分析说，在这种痛苦中，既有医疗制度不完善引发的求医艰辛，也有人们对医学普遍过高的期望。今天生活在城市高楼中的人们，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死亡。死亡变成了在医院重症房间里孤独的隐匿的事情。人们距离死亡越远，就越是心怀恐惧。一些肿瘤医生看到了太多病人的离世，也深知医学的有限性，他们在获知自己患癌后，会非常理性地接受部分治疗，不会过度求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并不具备医学知识的中国家庭来说，癌症成了测试亲情的武器，人们因为对亲人的不舍或是迫于外在的舆论压力，往往治到人财两空才罢手。癌症，很可能成为彻底改变很多家庭的可怕力量。

北京协和医院肿瘤科医生赵林也向我谈到，她常常会遇到病人充满疑惑地问：“这个病居然救不了？”“这个问题，你作为大夫居然不知道？”赵林说，在中国的肿瘤治疗中，绝大多数情况，是家属与医生商量方案，家属往往不让医生告知病人实情。虽然肿瘤大夫会多次告知家属，中晚期的癌症病人，身体状况是逐步恶化的，很多家属也表示理解。但是当真的面对亲人在痛苦中逐渐失能、越来越衰弱时，没有多少人能真正接受这点。很多家属和病人到了最后阶段，都会表现出对医学深深的失望。

赵林说：“可是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医学的局限，如果每种疾病都能破译，每种疾病都能治好，那人类不就永生了吗？”但是她也提到，作为癌症病人的家属也非常不易。他们在疾病的每个阶段，都面临着收集信息、寻找医疗资源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

与癌症斗争的大部分中国家庭，一方面需要面对病魔和死亡带来的恐惧和无助，另一方面需要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求医选择中做出判断。中国各个地区、不同级别医院存在着明显的医疗水平差距，这使得不少家庭尽力到一、二线城市的大医院去求医。如果著名



1

1.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结直肠癌外科专家顾晋

2. 北京协和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赵林

3. 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韩铮铮。从2010年开始，她尝试利用服务中心的22张病床，为临终病人提供安宁服务

大医院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与地方医院一致，病人或许会安心回到地方医院治疗。但是如果不一致，或者是病人更信任大医院，他们就需要长期在两地之间来回奔波。就算是在同一级别的大型医院之间，不少家属会带着病人看好些家医院，寻求治疗癌症的各种说法，同时自己也迷失在各类信息中。另外，由于缺乏主管部门的有力监管，各种虚假信息和治疗手段抓住了癌症病人的求生心理，趁机作恶。

在美国的癌症病人和家庭，则会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不同的求医过程。首先，无论是美国大型癌症医院、政府网站还是民间协和的网站，网民都能非常方便地找到各种癌症的规范信息。从某种癌症的疾病情况，到各种治疗机构和治疗手段、最新的治疗方法，都一



2

3

清二楚，信息非常透明和规范。美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胸部肿瘤放疗主任张玉蛟告诉我说，如果有公司发布了虚假信息，一定会被罚得倾家荡产。“那么多律师在等着机构犯错呢，如果有病人因为虚假信息或虚假疗法受骗，这个机构最后会在重罚下破产。”正规而充分的信息，保证了病人和家属的利益。

在具体的就医程序上，美国也与中国明显不同。一般是美国的家庭医生首先发现病人可能患有癌症，他们会将病人转给某个癌症的专科医生，然后这个医生就会对病人接下来所有的治疗负责。这位主治医生会要求病人取活检、做手术、接受放疗化疗等等，但是病人每做完一步检查和治疗，都会回到主治医生手上。这样病人会有非常稳定的安全感，治疗也会沿着



规范一步步走。“受过多年医学训练的医生，给病人疾病做的判断，80%以上都是一致的。当然也有病人会寻求一下其他医生的看法，但是很快就会意识到癌症的规范治疗方法有哪些，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美国很少出现晚期癌症病人倾家荡产去治病的情况，张玉蛟说，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文化上的不同，“美国人认为创造奇迹是神的事情，不是靠人的努力能实现的。花开花落是自然界的常态，只是每个人接近人生终点的方式不同罢了。很多人在得知患癌之后，会有非常现实理性的打算，想想这辈子未完成的心愿是什么，然后利用剩下的时光去做一次旅行，去还一个人情。哪怕是小学生，从小接受的教育也让他们明白，

癌症晚期就是不治之症，是人类目前还无力解决的事情”。

美国大多数患者相信医生的判断，不会去寻求偏方。“对于晚期癌症病人来说，最忌讳的事情是让他们相信，某人因为吃了某种药，奇迹般地治好了，或者又活了多少年。”张玉蛟说，“先不论这种传言的真实性，如果一个人抱着买彩票的心理，拿生命最后的光和大量的金钱去尝试不规范的治疗，这种心理是不可取的。这就好比我们会教育孩子，你应该通过认真读书去找个好工作，而不会说，你天天去买彩票求发财吧。对于一个人来说，中彩票的概率太小了，小到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个道理对癌症病人也是一样的啊。”

临床试验的伦理学考量

除去面对癌症的心态，病人如何在疾病的不同时期，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也是一件有规范可循的事情。正规医院的医生会告知病人或家属：“当今恶性肿瘤的治疗是规范性治疗，并且每年进行更新，以便把最新最有效的治疗方法用于患者。全球的治疗标准都没有太多差异，只有被治疗规范认可的，才是让人放心的治疗。”

医学对于癌症的诊断，会将病情分为一期到四期，不同分期会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和治疗目的。凡是写进诊疗指南里的方案，都是在经过严密的科学研究和验证之后，用在临床治疗当中。对于医生来说，只有当某一线的方案对某位病人完全无效了，才会进入到下一线的治疗方案。不同阶段的治疗，都会有临床试验。对于大多数肿瘤病人来说，一般是疾病到了晚期，手术、放疗化疗这些成熟疗法都用过之后，才会考虑参与新药的临床试验。靶向药物则需要与病人所患癌症的基因检测相匹配，并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靶向药物，更不是每个病人都负担得起靶向药物。

北京协和医院肿瘤科医生赵林说，不同医生可能对同一个病人的治疗思路略有差别，但是大的判断应该是非常接近的。不少病人和家属跑好多家三甲医院，来验证医生的正确性。“有些病人会坦诚告诉我们，他去过多少家医院，医生各自的说法是什么；有些病人则跟医生‘躲猫猫’，但是不小心又会透露多处看病的信息。我会告诉病人说：医学是一门非常艰深的学科，而且永远处在探索中。我学了这么多年医，对很多问题还是摸不透，更何况本来就不了解医学的人呢？信任医生，是理性求医的一个前提。所以我会跟

病人说清楚，如果你同时在接受其他的治疗，一定要告诉我是什么。如果你去找中医，一定要告诉中医你正在接受的西医疗。”

而对于美国的求医程序来说，病人自己预约肿瘤医生的可能性非常小。预约专家更是一件耗时又昂贵的事情，绝大多数患者是在一个医生的主治下走完全程。

医学具有一直往前探索的精神，所以临床试验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对于所有临床试验来说，保护受试者的利益，是最为根本的前提。赵林说，所有正规的临床试验，会有不同层级的医学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核和监督。受试者拥有充分的知情权、完全自愿。临床试验的参加者，一般预期寿命需要超过三个月，身体的一般情况尚可，否则也无法参与试验性质的治疗。

美国杜克大学分子癌症生物学博士李治中向我介绍，病人在参加临床试验之前，会签署各种各样的协议，协议会明确告知病人，他将参与的是第几期临床试验，试验的方法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对于试验一种新药来说，药物的安全性和效果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安全性试验是第一期试验的重点。试验中会慢慢增加新药的剂量，来观察病人的耐受性，尽量不损害受试者的利益。临床二期的试验主要测试有效性，在经过临床一期找到安全又有效的药物剂量后，进行二期的双盲试验。

一般疾病的受试者，分到对照组可能只是吃玉米淀粉，而不是真正有药效的药物。但是由于癌症病人急迫地需要治疗，所以即使是被分到对照组的病人，也会在保证当前最好的成熟治疗的前提下，再试验新的疗法，不会只是给对照组病人吃玉米淀粉。李治中还提到，对于癌症病人的临床试验进行到一半时，通常会有一个委员会对试验结果进行监审，如果发现新药的效果明显好于主流疗法，且对照组一些病人病情出现进展，主流疗法明确失效，那么即使是这种药物还没有到临床使用的阶段，也会让对照组的病人用上这种新药物或新疗法，“这也正是体现了医学的伦理精神”。

美国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胸部肿瘤放疗主任张玉蛟说，作为全美最佳的癌症研究机构，MD 安德森癌症中心有超过一半的病人在参与各种研究。但是癌症晚期的病人一定要清楚认识到，再好的药也不可能把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来，而且参加试验是有风险的。所以对于参加试验的癌症四期病人来说，一般都抱着这样的认知：第一，目前成熟的方法已经治不了我的病

了，医生们正在寻求新的办法帮助我。第二，这种新方法或许会对我有益。第三，即使这种方法对我无益，也会对以后的人有帮助。如果证明这种方法是无效的，以后的人就不用再试了。所以病人在获知自己能够入某个试验组时，常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愿意参加试验。即使这种方法对我没有用，也会对以后的人有用。”试验中的药是免费的，但是其他所有服务都是收费的。“医护人员的服务、其他治疗的费用是照付不误的，哪怕喝水都是收费的。中国人现在有一个认识误区，以为只要进了试验组就完全免费，这是不正确的。如果试验是完全没有效益的，医疗机构或研究机构就失去了动力，最终对医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张玉蛟说，只有病人对自己的病情有理性的认知，对医生有一个合理的期望，再加上外部监管的正规化，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任，才能真正达成。

放手也是爱

当癌症病人的病情进展到没有治疗价值了，如何劝家属和病人放弃积极的治疗，对中国医生来说并非易事。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院长顾晋，是有名的结直肠癌外科专家。他说肿瘤医生看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也看过太多晚期病人度日如年的痛苦，所以往往认为不应该一味延长病人寿命，生命的质量比长度更重要。但有些家属会跟医生说：“我只要看到我妈躺在那儿，我心里就舒服一些。”这种从家属情感出发的选择，很多时候并没有顾及疾病的现实，以及患者承受的痛苦。顾晋说，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既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也不是想治不想治的问题，疾病的发展和死亡的结局，并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这时候家属和病人都应该明白：放手也是爱。

詹涓和她的妈妈属于开明的家属，她们从一开始就告诉父亲所有的实情。“等我爸爸第二次手术两周后，拿到脑部出现肿瘤多处转移的片子后，他整个人一下子就垮了，不想再为治疗而努力了。”詹涓查了很多资料，得知以父亲当时的情况，中位生存期只有6个月，便已经开始接受父亲即将离开的事实。父亲的整个治疗过程都是遵循规范一步步在走，詹涓说她后来唯一后悔的，就是漏掉了靶向治疗。因为父亲做手术的效果很好，肿瘤切除得很干净，只是没预计到手术后很快就转移。“但即使用了靶向，效果也是难以预知的，我算是理性的家属了，对这点遗憾谈不上特别纠结。”

詹涓说，她父亲在去世前一天，与家里人做了非常正式的告别，告别之后就进入了休克。这种全家人对死亡来临有所准备的态度，使得家人事后回想起来，获得了安慰。实际上在民间传统中，预感死亡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根深蒂固且非常积极的性质。有些乡下老人至今还坚持着为自己安排后事的习俗，当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后，事必躬亲、一如常人地为自己安排临终和故去之后的事宜，相当于主持了自己的死亡仪式。在很长的历史时段里，妄图拒绝和违背生老病死这一天道循环，会受到其他人的奚落和嘲笑。与疾病和死亡握手言和，何尝不是一种美德？

只是这个理性的、顺应疾病发展规律的家庭却发现，她们放弃积极治疗之后，接下来的道路仍然无比艰难。三甲医院在定位上是治疗重大疾病和疑难杂症的，像詹涓爸爸这样已经失去了治疗价值的病人，三甲医院不会再收治。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分级诊疗制度希望将医疗资源用在最合理的地方，三甲医院的资源应该给予更多急需治疗的病人。终末期病人本该去到二级医院或是接受社区医院的护理。

可是她们却发现，每走一步都是难关。“第一关，是为爸爸进行后续治疗时的护理关。接受了全部疗程的化疗和放疗出院后，主治医院给爸爸开了很多补益类的药物，需要在社区医院每天输液。我对社区医院原本充满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以为护士能上门进行输液服务，能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护理。结果发现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社区医院可以输液，但需要先在上级医院输一次，证明没有药物反应，同时需要有院方盖章为证。因为一个章盖错，我妈妈便跑了两次医院。搞定了手续后，我们得知只能自己上门去输液：这又是一个大问题，虽然社区医院离我们家只有不到500米距离，而且没有上下楼梯，不需要过马路，但爸爸此时因为脑部肿瘤压迫已经不良于行，正常人5分钟的路程，他要走走歇歇，走上半个小时，每去输一次液，就要元气大伤一次。后来我们改成用轮椅推爸爸去输液，路上颠簸，同样痛苦。我们也想过请旁边民办小诊所的护士上门输液，但对方一听爸爸得的是这么重的病，立刻就退避三舍，因为怕输液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差错。”

而第二关是止痛关，晚期癌症病人有锥心的癌痛，虽然很多正规医院现在能有效控制大多数疼痛，但是终末期的病人却住不进去。很多二级医院也不愿意护理晚期癌症病人，怕引起纠纷。后来詹涓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癌症病人的夺命疼痛》时，大哭不止，

父亲的疼痛对家属也是锥心的折磨。

回家休养后，詹涓的爸爸由于持续无法进餐，已表现出恶病质，严重贫血、衰竭、双下肢浮肿，只有医院能为他提供营养支持。再加上病人下肢渐渐失去感觉，无法正常排尿，需要用尿管，不去医院的话，在家里再精心护理，也难免会出现感染，而感染对病人会有致命危险。于是她想到要找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提供这方面的医疗帮助之余，或许还能带来些精神方面的慰藉。但很快她发现北京的临终关怀医院极少，有限的几家条件也很差。詹涓和妈妈联系到了一家，订好了病床，临去时才得知这家医院没有暖气，詹涓看到一名癌症晚期的老太太冻得直流鼻涕，只得作罢。

詹涓父亲的遭遇，正是多数中国癌症患者在人生最后阶段面临的无奈处境。詹涓说，也有朋友出主意，让她们把病人抬进三级医院的急诊室，就赖着不走了，医院总不能真的给赶走。詹涓去大医院的急诊室看过，确实有走投无路的病人这样做，“可是看着急诊室那种兵荒马乱的场面，既不忍心这样对待父亲，也实在厚不起脸皮”。

最终，她终于找到一家愿意接受父亲的正规医院。“爸爸在这家医院住了一个月零一周，这肯定影响了医院病房的轮转率，恐怕也会影响主治医生的考核，但医生们爽快地接收了爸爸，并且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尽可能给了爸爸一个温暖、安静的环境，尽可能满足了爸爸的止痛需要，与我们商定了不做创伤性抢救的临终方案。而在我与妈妈痛哭时，年轻的女大夫递过来的一包纸巾，更是让我们感动至今。”

詹涓遇到的问题，对今天有癌症患者的家庭来说，仍然非常普遍。一方面，病人和家属需要在理念上正确地看待疾病和死亡，该放手时就放手。可是另一方面，对终末期病人缺乏广泛支持系统的社会来说，有多少个家庭和个人，在放手时充满无助和痛苦。

500 多万个家庭的痛楚

70多岁的老人王原德（化名），因为肿瘤侵犯骨髓导致高位截瘫。当他被家人送进北京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病房时，充满了怨气。这时候王原德已是癌症晚期，大小便失禁，因为有了积极治疗的必要性，大医院不再收治。但是家里人一直瞒着老人实情，连哄带骗地把他送进了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临终病房。

王原德情绪很不好，他一方面觉得孩子不孝顺，

折腾了半天，把自己送到了小小的社区医院。另外，他也认为医护人员水平不高，很不满意：“我都住进来一周了，怎么还站不起来？”

韩铮铮是这个社区服务中心的主任，她同时也是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系的教授。从2010年开始，她尝试着利用服务中心的22张病床，为临终病人提供安宁服务。对于这位愤怒的老人，医生们建议家属告诉病人真相，否则对病人是一种伤害。

当家属把病情如实告诉了王原德后，意外地发现王原德渐渐平静了下来，不再对任何人发脾气。他知道家人四处碰壁之后才终于找到了愿意接收他的德胜社区，对家人充满感激，也谢谢医护人员帮他控制住了疼痛。德胜社区的临终关怀病房找来大学生志愿者，每周给他说相声、下棋、听音乐，志愿者做了很多家属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做的事情。很快王原德与大学生志愿者建立了感情，如果哪次志愿者有事情没过来，老人家一天都闷闷不乐。后来这位学生读到大学三年级，因为决定参军离开了北京，把照顾老人的任务转交给了一位师妹。王原德仿佛得了场大病，非常牵挂年轻人，年轻人也总是惦记着老人，在老人离世后特意赶回来告别。

原本当王原德住进德胜社区的病房时，大夫预计他的寿命只有两三个月。因为病人一旦卧床不起，很容易发生肺部感染、褥疮感染或是尿路感染。但是没想到王原德在社区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下，生活了三年才平静地离世。

76岁的肺癌脑转移的病人冯强（化名）是德胜社区临终病房的第一位病人。2010年他因为鼻咽癌肿瘤的压迫，眼球被挤出眼眶，脑脊液从耳朵里流出，身体的疼痛非常剧烈。老人唯一的儿子在国外，他强烈要求不能住在家里：万一我夜间死在了家里怎么办？我的老伴会多么害怕，多么无助？他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帮他止痛和送终的机构，在一家民营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因费用太高而被迫出院。当他知道德胜社区能够收他住院的时候，非常感激。“我眼睛里流的是血水啊。”

老人在临终病房住了10天之后，安详离去。他的老伴随即加入到了临终病房的志愿者行列。

韩铮铮说，在中国做临终关怀是件艰难的事情，告知病人处于临终阶段是很多中国人接受不了的观念。即使病人明天去世，家属也不愿意在今天谈论这件事情。所以直到今天，病房入口处写的是“生命关

怀病区”，而不是“临终关怀病区”。

韩铮铮带着同事们刚刚摸索的时候，查了十几个国家的资料，发现对于临终关怀的服务对象，各个国家从临终前20天到一年不等。最后她们决定以大医院的诊断证明为参照，只要有大医院对于病人癌症晚期广泛转移的诊断，她们就收。她们会提前向家属或知晓病情的病人说明，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给病人提供支持性的措施，不做有创伤性的积极治疗。“晚期广泛转移的病人，全身都是肿瘤转移灶，应该切哪儿呢？他们已经失去了治疗机会，为何还要忍受治疗的伤害？一个新生命来到人世时，前呼后拥，多么风光。生命的全过程也包括死亡，为何死亡一定要恐惧而悲感？我们鼓励病人把一生引以为自豪的事情写在本子上，把有意义的照片贴上去，这种对生命的回顾，难道不是更好迎接终点的方式吗？”

在病房里，除了止痛、营养支持等基本治疗外，医护人员帮着病人清洁身体、通过聊天的方式进行情绪安抚和死亡教育。韩铮铮说，她最初也担心过，护理临终病人会不会容易发生医疗纠纷。这些重病者就像纸糊的船，随时可能被小风浪给打翻。但是6年多下来，她发现一起纠纷都没有。

“来到这里的病人和家属，对临终关怀的要求一点也不苛刻。她们经历了之前四处碰壁的绝望，来到这里已经心怀感激。只要我们能最大化地减轻病人的痛苦，家属们就很满意。另外，病人在我们这里一天的花费，只有240多元；而癌症患者在二、三级医院的日均费用需要3000多元。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让社区卫生中心承担起临终关怀的任务，能节省相当可观的医疗费用。”韩铮铮说，病人去世的时候，医护人员有时候也跟着家属一起掉眼泪。“我们脑子里记着这些病人的故事，他们都是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人。”

德胜中心算了一笔账，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270万人因为癌症而去世。而每一个癌症患者，大约会牵扯到三个相关联的家庭，韩铮铮说：“就算最保守估计，我们有500多万家庭，在承受亲人患病的痛苦时，还要承受亲人临终时无处可去的处境，该是多么悲哀。这些病人多数都非常恐惧死亡，有些病人刚住进病房不让关灯，害怕一关灯，自己就永远陷入黑暗，再也醒不来。经过医护人员的安抚和关爱后，病人慢慢会平静下来。如果我们能把中国人的临终关怀做好，这也是很大的事业啊。”

INSPIRATIONAL
HER

她世界
她力量

智联招聘 2016

中国女性领导力高峰论坛

“权威人士”看经济

主笔 / 谢九

一年之内，“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三度现身，对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发出最权威的声音。“权威人士”的这种预期管理模式，预计在未来也将成为“新常态”。

去年5月，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五问中国经济”，今年1月，权威人士“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次则是“开局首季问大势”。与前两次相比，这一次权威人士的谈话更加全面，也更有针对性。

在权威人士的此次长篇访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经济做出的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形，更不可能是V形，而是L形的走势。”很长时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如何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大的话题，有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仍然有实现8%增长的潜力，也有悲观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可能只有4%。

权威人士对于中国经济的判断既没有盲目乐观，同时也充满信心，认为“这个L形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旦回升就会持续上行并接连实现几年高速增长”。同时又认为“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

这样的看法其实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式和尺度问题。“供给侧是主要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必须作为主攻方向。需求侧起着为解决主要矛盾营造环境的作用，投资扩张只能适度，不能过度，决不可越俎代庖、主次不分。”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思路都是以需求侧为主，重点解决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驾马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需求侧管理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流动性放水对于拉动投资增长的效应已经越来越弱。

面对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传统的需求侧管理已经成为配角，权威人士对需求侧管理的定调是：“适度扩大总需求，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注重把握重点、节奏、力度。”而对于财

政和货币政策应该如何执行，权威人士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要真正稳健，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要真正积极”，其中“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要真正稳健”的提法尤为引人关注。今年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61万亿元，同比多增9301亿元，已经超过2009年一季度的4.59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这样的信贷规模显然已经难言稳健，权威人士的表态，似乎也是对一季度货币政策的修正，预计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可能会逐渐回归真正的稳健。

在传统的需求侧退出中心舞台之际，权威人士强调要“坚定不移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眼于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

“三去一降一补”将成为中国经济短期内的焦点所在，权威人士对于这五大任务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去产能，各地要明确具体任务和具体目标，加大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门槛准入、制度建设和执法力度；处置“僵尸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去杠杆，要在宏观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观上有序打破刚性兑付，依法处置非法集资等乱象，切实规范市场秩序。去库存，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健全农民工进城的财税、土地等配套制度。降成本，就是要把整体税负降下来，把不合理的收费取消掉，把行政审批减下来。补短板，就是要注重脱贫攻坚的精准度，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钱从哪里来、投到哪里去”的体制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潜在的金融风险也不断上升。信用市场维系多年的刚性兑付已经崩塌，包括央企在内的企业债券频繁违约，大有风雨欲来之势。随着实体经济违约不断发生，金融系统的坏账风险也显著上升，银监会刚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继续保持“双升”态势，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3921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177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75%，较上季末上升0.07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上升0.36个百分点，距离2%的不良率已经为时不远。除此之外，

股市和汇市的剧烈波动也已经成为常态，地方债务压力有增无减，种种因素都使得外界不得不担忧，如果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中国经济是否可能会爆发一场金融危机？

权威人士认为，“要避免把市场的这种‘超调’行为简单理解成只是投机带来的短期波动，而要从整个金融市场的内在脆弱性上找原因。其中，高杠杆是‘原罪’，是金融高风险的源头，在高杠杆背景下，汇市、股市、债市、楼市、银行信贷风险等都会上升，处理不好，小事会变成大事”。在这一次《开局首季问大势》访谈中，权威人士不止一次表达了对于高杠杆的厌恶：“树不能长到天上，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负增长，甚至让老百姓储蓄泡汤，那就要命了。”

权威人士反复表达对高杠杆的厌恶，或许是和当前中国经济去杠杆不尽如人意有关。早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去杠杆就已经被列为今年的五大工作任务之一，但是今年一季度的社会融资总量和信贷投放都创下历史纪录，显示去杠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杠杆。权威人士明确反对通过货币刺激来降低杠杆，“在利用货币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边际效应持续递减的情况下，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

杠杆的幻想”。这也似乎是对一季度货币过于宽松的一种回应，如果货币政策继续维持这样的宽松力度，中国经济很难真正实现去杠杆。

或许正因为一季度货币政策不仅没有去杠杆，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杠杆，在这样的基础上一季度经济出现回暖，权威人士对此并没有表示出过多的乐观，认为一季度的回暖很难用“开门红”“小阳春”等简单的概念加以描述，反而认为“我们面临的固有矛盾还没根本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也有所暴露。‘稳’的基础仍然主要依靠‘老办法’”。权威人士认为应该“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去杠杆”，也就是在宏观上不放水漫灌，在微观上有序打破刚性兑付，依法处置非法集资等乱象，切实规范市场秩序。

总体来看，权威人士的第三次发声，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前经济政策纠偏，对宏观调控加强预期引导，进一步明确当前中国经济的重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能重回刺激老路。权威人士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摇来摆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导向越明确，落实越有力，市场预期就越好。反之，如果我们还走需求刺激的老路，市场就会担心迟疑、无所适从。”如果未来经济政策走向偏离方向，预计权威人士还会再度现身。■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6年第五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89

- 俄罗斯音乐树上的奇异果
- 曹利群、刘青、孙冰洁、袁利军对斯克里亚宾的《狂喜之诗》、《神诗》和《火之诗》等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门德尔松《第四交响曲》的首演

话题 电影配乐中的现代音乐
谈哈农库特风格之一隅

爱乐笔记 键盘好声音之齐默尔曼

精彩回放 巴赫圣乐演出史中的一环

唱片说明书 说不尽的富特文格勒：《“悲怆”交响曲》

歌唱家档案 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托马斯·汉普森访谈

作品 小议阿连斯基两首钢琴三重奏

听片购片与收藏 加德纳指挥柏辽兹作品的唱片

《爱乐》2016年订阅须知

2016年《爱乐》月刊，每期24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6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8折优惠，订阅年价：192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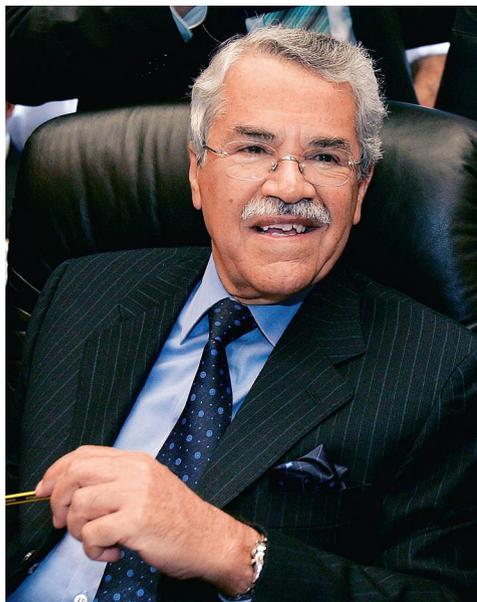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1976年，在摩纳哥的一家赌场，一名打扮成沙特阿拉伯人的游客在玩一款名为“石油冠军”的游戏。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的集体禁运给欧美国家造成了巨大冲击，认为沙特可能支配全球石油市场的恐慌弥漫在西方民众中



“石油大师”谢幕 沙特更换能源掌舵者

文 / 刘怡

纳伊米的退场，不仅是因为沙特政府需要一个重量级人物来为油价“熊市”中的损失负责，更因为他所坚持的传统能源政策，对穆罕默德副王储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构成了阻碍。老人黯然谢幕，改变即将发生。

80岁的阿里·阿尔-纳伊米 (Ali Al-Naimi) 被国际能源界尊称为“石油大师” (Oil Maestro)。这个绰号有两层含义：首先，自1983年出任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Aramco，以下简称沙特阿美) 总裁兼 CEO 以来，这位稳健派技术官僚延续了其导师亚马尼的务实路线，一面通过调节产量和配额，巩固了沙特在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内部的领袖地位；另一面领导 OPEC 尤其是海湾产油国与消费国展开集体博弈，以达成经济收益最大化。在他掌控沙特能源政策的30多年间，利雅得不仅得以挨过80年代中期的油价低谷，还在21世纪初的“牛市”中斩获颇丰。其次，作为一名非贵族官员，纳伊米与法赫德、阿卜杜拉两位国王保持着亲密的个人关系，他力促伊本·沙特王室将全国能源产业的主导权交给地位超然的技术人员，并从1995年起担任沙特石油、工业和矿产资源大臣至今。在《时代》周刊、《福布斯》

1. 沙特副王储兼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亲王

2. 自1995年起担任沙特石油大臣的“大师”阿里·阿尔-纳伊米



1986年6月26日，在亚德里亚海布里俄尼岛参加第78届OPEC部长会议的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前）和印尼石油部长苏布罗托乘坐小火车出行

杂志和《彭博商业周刊》评选的全球最具影响力商业人物排行榜上，纳伊米长期名列前40位，他的只言片语都可能直接影响到国际油价的起伏。

然而天下无不散的筵席。2016年5月7日，这位八旬老人被小他25岁的沙特阿美前总裁哈利德·阿尔-法利赫（Khalid A. Al-Falih）所取代，黯然离开了石油大臣的宝座。公开的换将理由是：纳伊米需要为沙特在2014年以来的油价“熊市”中蒙受的惨重损失负责。在全球油价一路走低的情况下，“大师”始终拒绝以限产换取价格稳定，他认定美国页岩油工业无法承受长期低价带来的压力，迟早会濒临破产；亚太地区的能源消费也将在低油价的刺激下再度回升。挨过48个月左右的下滑区间，利雅得的石油产业将重现曙光，届时以低价“护盘”所得的市场份额意义将尤为重大。但进入2016年春末，油价回暖依旧遥遥无期，美国页岩油工业承受低价的能力明显

比“大师”的预估来得强大，沙特原油在全球主要市场的占有率却出现了缓慢下滑。在此背景下，萨勒曼国王需要一个重量级人物来为去年流失的1201亿美元外汇储备和42%的岁入缩水负责。作为这个OPEC领袖国21年来的能源政策掌舵者，纳伊米难辞其咎，只得就此退休。

但从纳伊米的两位前任遭遇的类似命运看，与王室成员之间的微妙关系才是“大师”被贬的决定性原因。自2015年1月萨勒曼国王登基以来，关于纳伊米即将下台的传闻便在利雅得流传一时。今年4月多哈冻产谈判期间，“大师”更是与本国实权人物、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爆发了正面冲突。在纳伊米决定改弦更张、推动OPEC国家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共同限产之后，副王储坚持要求将态度桀骜的伊朗纳入协议之内，最终令谈判无果而终。鉴于穆罕默德身兼沙特第二副首相、国防大臣、宫内省秘书长和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等多项要职，极受国王信任（他是萨勒曼国王的第七个儿子），“大师”被解职的命运在4月份就已最终确定。

而对年纪还不满31岁的穆罕默德副王储来说，清洗尾大不掉的纳伊米只是他改造整个沙特阿拉伯的“2030年远景规划”（Vision 2030）的开端。根据这项计划，伊本·沙特王室将以目前的石油红利为支撑，创建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用14年时间实现财政收入来源由石油到资产投资的转型。在此过程中，沙特阿美不超过5%的股权将首次公开募股上市（IPO），这项资本和其他产业私有化所得收入的半数以上将被投放到海外，以为根本性的经济和就业改革创造条件。正因为“2030年远景规划”企图实现以石油收入为起点、但最终摆脱这项依赖的重大逆转，在改革启动之初，王室需要走上前台，撇开谨慎的“大师”直接实现对沙特阿美资产的管控。这不是利雅得当局第一次宣称要实施重大改革——之前所有的尝试都在浅尝辄止之后半途而废——更有观察家认定副王储在几年内就会被排挤出局。但无论如何，纳伊米的退场标志着那个萧规曹随、谨小慎微的时代已经过去，即将到来的是一场机遇与风险并存、最终可能影响到整个中东格局的大变革。

动荡年代的“大师”

若以1962年“随机应变先生”亚马尼出任沙特石油大臣为起点，最近54年利雅得的能源政策路线

可以说是由三位年龄相仿、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接近、观点高度重合的“大师”共同缔造的。1930年出生的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自1962年起出掌沙特石油部直至1986年。他在1973年石油禁运中作为OPEC的指挥官出场，不仅实现了产油国收入剧增的直接目标，还在事实上确立了沙特在OPEC内部的领袖地位。但到80年代中期油价滑落至谷底时，亚马尼主张为集体利益牺牲沙特一国的收入，遭到新即位的法赫德国王的质疑，被迫离任。继任者是小他两岁、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希沙姆·纳扎尔，后者放弃了亚马尼一贯坚持的严格配额制度，在有限浮动区间内实现了产油国的重新联合，从而走出了80年代中期的油价“熊市”。但在1995年法赫德国王首次中风后，实际摄政者、王储兼第二副首相阿卜杜拉（2005年正式登基）将纳扎尔解职，以1935年出生的沙特阿美总裁兼CEO纳伊米作为继任者。纳扎尔在阿卜杜拉的支持下担任石油大臣超过20年，最终在后者去世的第二年黯然出局。

亚马尼、纳扎尔和纳伊米都是平民家庭出身，都在美国获得过专业技术学位，属于海归派专家治国论者。在出任石油大臣之前或任内，三人都曾担任过沙特阿美总裁，对通过调节产能影响市场占有率和价格的策略运用极为娴熟。因为他们在不同时期曾经担任过其前辈的副手或下属，在总体政策上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同时也会针对市场行情的变化做出调整。而从三位“大师”离任的时间节点看，他们都在油价低迷趋于长期化、新的王室实权人物意图改弦更张之际被解职，则凸显出伊本·沙特家族在实际决策过程中一言九鼎的地位。

要理解能源产业之于整个沙特经济的意义，以及王室和技术官僚在油价问题上的观点异同，必须回溯到沙特阿拉伯建国之初。1932年伊本·沙特国王统一阿拉伯半岛之际，这个沙漠王国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麦加朝觐者支付的入境费用和额外消费，完全不敷开销。1933年5月，国王决定将半岛东部哈萨绿洲60年的石油开采权出售给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换取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现金。1938年，第一口油井开始出油，沙特的经济状况自此发生了根本性好转。1945年2月14日，伊本·沙特又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苏伊士运河大苦湖达成协议，沙特承诺在之后的60年里以合理的价格向美国提供充足的原油；作为回报，美国将在沙特境内的红海和波斯湾沿岸建立两处空军基地，保护其油田设施和国土安全免遭伊朗或苏联的破

坏。从那时起至今，确保沙特能源市场的稳定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柱之一，两国之间也形成了极为亲密的特殊关系。

在沙特石油工业创建之初，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掌握在私人公司手中。20世纪30年代，埃克森、壳牌、英国石油、美孚、雪佛龙、德士古、海湾石油这7家最大的原油生产和销售企业通过分配定额的方式结成了卡特尔，垄断了全球60%的油田开采权和85%的产量。创建于1933年的沙特阿美（其最初的全名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便是加州美孚和德士古的合资公司，两家各占50%的股份，沙特政府仅收取管理费，无权介入公司的经营。但随着战后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中东、拉美主要产油国获得完全独立，各国政府开始从私人企业手中收回控制权。1950年底，沙特阿美的美国股东被迫同意将每年净利润的50%交给利雅得当局。1960年OPEC成立之后，私人企业的博弈空间越发狭窄，能源产业的国有化开始成为普遍现象。1973年，沙特政府将阿美公司25%的资产国有化，1974年又收回15%；1980年，外国股东彻底退出阿美的经营，利雅得当局完全控制了本国石油工业的产能。到21世纪初，5家最大的跨国私营油企仅仅拥有全球原油开采量的14%和储量的5%，超过80%的储量由各国国有石油企业掌控，这显然意味着能源产业的政治性在不断强化。

阿里·阿尔—纳伊米就在这个“国家至上”的年代缓缓崛起。1935年他出生在东部省的一个石油技术人员之家，在抽油机的轰鸣声中长大，12岁时作为学徒工加入阿美公司。此时沙特政府已经在为收回能源业经营权做准备，类似纳伊米这样的平民子弟自幼就由官方资助参加一系列教育和培训课程，以掌握专业技能。纳伊米被送往黎巴嫩，首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AUB，中东地区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附属的国际学院修读预科，接着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地质学基础进修。1958年，他由政府公费资助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工程学名校理海大学修读地质学学位，1962年毕业。接着他又转往斯坦福大学，取得了水文学和矿床学的双硕士学位。这一轨迹与大多数沙特能源官僚并无不同：美国的学术背景不仅能确保纳伊米的专业技术水准，也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他的政治倾向，避免了出现另一个阿卜杜拉·塔里基（左倾的纳赛尔主义者，1960～1962年任沙特石油大臣）。这在利雅得一华盛顿特殊关系处于蜜月期的年代无疑相当重要。

结束学业后，纳伊米于1957年归国，旋即被

阿美公司派赴家乡东部省负责当地油田的开发和管理。1969年，他晋升为阿布盖格油田生产部总监。1972～1975年，纳伊米又被派往北部地区，担任阿拉伯中立区内归属沙特的那部分油田的生产总监。中立区是1922年伊拉克与内志王国(沙特阿拉伯的前身)划定的一块界限模糊的边界地带，在1981年之前并无固定国界，在该地区从事采油必须经历复杂的外事谈判和纵横捭阖。委派纳伊米主管这一地区，显然是阿美公司为培养未来高管而有意为之的。1975年，40岁的纳伊米升任阿美公司负责生产业务的副总裁，三年后转任总揽石油业务的副总裁。1980年，他进入公司董事会，一年后出任新设置的执行副总裁(主管油气业务)一职，最终于1984年成为阿美公司历史上第一位沙特籍总裁。

这一时期，作为石油大臣亚马尼和阿美公司CEO约翰·卡尔贝雷尔的主要助手，纳伊米亲身经历了1973年石油禁运的决策和实施流程。这次行动名义上是为了惩戒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支援以色列的欧美大国，实质则是产油国在谋求一次性抬高油价未果的情况下，对消费国实施的大规模报复。战争爆发前夕，OPEC方面曾在维也纳与美国、日本以及西欧6国政府的代表展开谈判，要求一次性将油价上浮100%，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OPEC代表随即单方面宣布提价70%，并开始以每月5%的速度减少产量。1973年10月20日，在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给予以色列22亿美元军事援助的第二天，OPEC中的阿拉伯国家全面切断了对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原油出口。这意味着全球石油贸易额的14%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西方世界的能源供给出现了9%的缺口。到当年12月禁运结束时，美国的GNP下滑了整整6%，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1973年12月阿拉伯国家与八国集团达成的新协议，将实时油价由当年6月的每桶2.9美元直接提升到了11.65美元，上涨300%，这对OPEC成员国是一场辉煌的胜利。1972年时海湾各国出口原油的总收入不过230亿美元，到5年后已经剧增至1400亿美元。这次禁运也是1945年阿美协议达成以来，利雅得与华盛顿之间影响最大的一次分裂。它显然暗示了纳伊米：在必要时，沙特可以在经济上成为美国的对手。

份额，还是利润？

禁运危机收场之后的几年里，欧美人士逐步从阿

美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中退出，由沙特本国专家接手。继1984年出任阿美总裁之后，纳伊米又在1988年接过了CEO大权，成为公司的实际决策者。但在他进入最高决策层之后不久，沙特能源产业即发生重大动荡：由于全球油价自1980年起即以疯狂的速度暴跌，在任25年的“随机应变先生”亚马尼被解职，由前经济规划大臣纳扎尔继任。1990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后，油价一度出现相当规模的反弹，但仅相当于1980年巅峰价格的40%，再未能恢复到黄金时代。

80年代能源市场低谷的出现，核心矛盾在于OPEC内部围绕定价策略产生的对立：当油价节节攀升、“牛市”已现端倪时，海湾国家是应当尽可能多地扩大生产，以赚取短期红利，还是维持相对稳健的定价策略，以实现收益长期化？利雅得给出的是后一种答案。作为OPEC创始成员国和1973年禁运行动的实际领导者，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产量长期维持在日均1000万桶的水平，一度占据OPEC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利雅得坐拥全球探明储量最大的加瓦尔油田，仅这一处的储量就超过700亿桶，平均开采成本为全球最低；1945年与美国的《大苦湖协议》则换来了华盛顿的长期军事保护和军火出售便利，使沙特完全不必担心遭受外部入侵。在这种情况下，亚马尼更倾向于控制OPEC国家的原油总产量，使价格上涨的幅度与欧美国家的平均通胀率大致相当。如此一来，大多数国家将继续维持现有的能源消费结构，不会迅速推进以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水力、核电)取代化石燃料的变革，产油国的长期收入增长自可获得妥善确保。沙特作为此际的头号原油出口国以及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支点，亦可维持对OPEC的实际控制。

但伊拉克、利比亚等较小的产油国不愿放弃看似诱人的机会。1979年伊朗革命政权宣布中止原油出口后，全球能源消费市场出现了9%的缺口；欧美买家出于恐慌心理和投机需求，在短期内不惜一切代价抢购原油，使得国家油价在不到两年里暴涨了100%。对深陷两伊战争泥潭的巴格达当局和正在与乍得进行边境战争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来说，错过伊朗危机带来的“牛市”机会乃是无法容忍的犯罪，他们执意要实施全面增产。按照亚马尼的既往策略，此时沙特应当启动减产，以维持原油供给总量的平衡。但减产意味着沙特本身的收益将大幅度缩水，已经上马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和国内福利将遭受严重冲击，1982年登基的新国王法赫德同样无法容忍这一切。四面楚歌声中，

亚马尼被迫放弃传统路线，责成纳伊米启动大规模增产。

从1980到1986年，原油市场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增产和抬价使沙特根本无法统一OPEC的政策方向，也无法稳定石油供应量；北海和苏联原油产量的增长则压缩了中东产油国的市场份额，使OPEC成员国在世界原油生产版图中的比重第一次滑落至50%以下。而在需求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在1973年禁运期间启动的能源结构调整效果逐步显现，伊朗危机期间因恐慌而过度囤积的库存亦开始流入市场。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油价在1985年重新崩盘：由于OPEC彻底分裂，产油国不得不自行压低价格以换取买家的订单，实时油价在1986年的前6个月暴跌了49.5%，最终稳定在了每桶18美元的位置，造成20世纪幅度最惊人的一次油价波动。亚马尼在当年10月遭到解职，由纳扎尔接手残局。

从1987到1995年，沙特能源产业大致呈现纳扎尔—纳伊米两巨头领导的格局。亚马尼的前车之鉴使他们越发确信：在与买家进行博弈时，OPEC内部必须保持立场一致，以沙特为领袖展开定价谈判；产量增幅方面，各国也须严格执行配额制度，以维持一个“完美”的油价区间。第一次海湾战争末期，科威特境内的油田遭到伊拉克占领军有组织的破坏，出口中断近三年之久；加上伊拉克本身的原油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进入国际市场，沙特迅速启动了增产措施，从而部分弥补了80年代后期的损失。但由于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缓慢、石油业长期投资不足，沙特阿拉伯在整个90年代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3%，国家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状态。1995年阿卜杜拉王储就任摄政后，最终解除了纳扎尔的职务，由纳伊米出任石油、工业和矿产资源大臣。

尽管纳伊米拥有极为丰富的经验，但在需求曲线增长平缓的90年代后期，这位“大师”同样缺乏改善经济状况的灵丹妙药。由于在80年代前期制订了过于宽松的税收政策（个人所得税为1%，关税为5%），沙特阿拉伯除去占GDP近四成的能源收入外几乎没有其他财源，电力、通讯、交通、农业等垄断行业则效率极为低下。而在城市化程度急速飙升（1970~2003年沙特的城市人口比例由25%激增到了85%）的背景下，阿卜杜拉王储被迫举借各种内外债务以应付公共开支，最多时竟占到GDP总量的60%。某种意义上，90年代后期大批沙特青年出走苏丹和阿富汗、投奔

本·拉登的“基地”组织，也是对经济低迷的一种变相反应。

1999年，受东南亚和俄罗斯经济危机拖累，全球油价再度跌入谷底，沙特阿拉伯经济增长率已滑落至零点。纳伊米被迫建议阿卜杜拉部分向美国资本开放电信业、航空业和金融领域，以换取华盛顿的经济和政治回报。鉴于《大苦湖协议》在2005年就将到期，沙特从90年代末开始将总额超过3500亿美元的公募和私募资金投放到美国市场，以换取华盛顿的两项承诺：在协议到期后，默认两国间的特殊关系继续存在；在伊朗和伊拉克遭受欧美长期封锁的背景下，继续以沙特作为美国本土原油消费的第一供应商。

所幸忍辱负重的举措只维持了两年。2001年，“9·11”事件爆发，国际油价止跌回升。尽管本·拉登的沙特国籍一度给利雅得—华盛顿关系造成了某些隔阂，但纳伊米明智地断定恐怖袭击的发生将加剧市场对中东能源安全稳定性的担忧，因之油价的回升将成为长期趋势，沙特阿美有必要启动大规模增产。2003年，这一判断同时被四个事件所验证：美国入侵伊拉克，伊拉克原油开采能力遭受重大破坏，在5~6年内都无法彻底恢复；委内瑞拉石油业爆发大罢工，查韦斯总统的地位再度遭遇挑战，南美原油输出总量出现波动；尼日利亚内战在大选后重新出现升级，这个OPEC第七大产油国的前景再度陷入黯淡；“卡特里娜”飓风席卷墨西哥湾沿岸，美国本土采油业遭受重大挫折。四项因素的累加，使得消费市场对沙特原油的依赖迅速上升。

纳伊米始终坚持的增产措施，在这个时候终于结出了硕果：从2003年初到2008年7月，全球油价经历了超过60个月的持续增长，一度飙升至每桶147美元的历史峰值，较1998年时疯涨了400%。随后经过一年多的金融危机冲击，自2009年起再度进入上升区间，并于2011年1月“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再度登顶历史新高。沙特国家财政不仅得以破天荒地实现零赤字，经济增长率更是一度达到了空前的7.2%。

从2003年初到2008年7月，全球油价经历了超过60个月的持续增长，一度飙升至每桶147美元的历史峰值，较1998年时疯涨了400%。



1973年7月海湾国家宣布减产，汽油价格开始上涨。柏林的司机加完油再多带两桶回去，担心到10月份彻底禁运之后就买不到汽油了

2008年，在全球油价第一次攀升至1980年以来的新高之后，美国《时代》周刊将纳伊米评选为年度最有影响力人物，阿卜杜拉国王甚至承诺由“大师”本人提名自己的继任者。这也是这位石油官僚个人事业的巅峰。

从“牛市”到“熊市”

一项并非纳伊米的责任、但需要由他来承担后果的政策是：在2003至2014年的油价“牛市”期间，沙特政府并未妥善利用好原油出口带来的收益，以完善经济结构、提升抗冲击能力。巨额的石油红利被漫不经心地分配到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部门，形形色色的基础建设项目皆以高油价作为预设前提，似乎从来没有人想到油价有一天会重回低谷。近期利雅得当局公布的报告披露：按照传统做法，所有

超过1亿沙特里亚尔（约合2670万美元）的投资项目都须由国王亲自批准；但在2010~2014年那些疯狂的日子里，这项限制被一路放宽到了2亿、3亿甚至5亿沙特里亚尔，最后干脆彻底取消了审批手续。本土劳动力人口的三分之二受雇于效率低下的国企，福利远远高于外籍劳工，创造的经济价值却少得可怜；耗资100亿美元的阿卜杜拉国王金融实验区在2006年投入运营，但在10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大量闲置单位尚未租出。除去石油产能外，沙特阿拉伯对海外资本没有任何吸引力——宗教警察权力巨大，妇女无法正常就业，行政部门腐败横行，缺乏完善的市场经济规则。

今年4月底，穆罕默德副王储罕见地对彭博社记者承认：2010~2014年，沙特平均每年的低效率财政开支高达800亿美元以上，占预算额的25%以上。这类开支使利雅得的财政状况比国际观察家的估计更

接近谷底。在2015年损失了120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度认为沙特政府的剩余资金还够维持5年；但副王储的首席经济顾问、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穆罕默德·阿尔-谢赫亲口承认，假如国际油价在2016年内无法回升至每桶50美元以上，且政府的开支继续维持在2015年4月时的水平（平均每个月300亿美元），沙特阿拉伯的国家财政在2017年2月以前就会彻底破产，这将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灭顶之灾。

不仅如此，政府开支的增加也没能降低青年人口急剧增长造成的压力。从1994到2002年，沙特全国人口由700万急剧增加到1700万，随后在12年里又翻了将近一番，达到3000万以上的规模，并以每年超过3%的速度继续增长。目前，有40%的沙特人口在15周岁以下，青年男子的失业率超过40%。就业已经饱和的国有企业无法吸纳如此之多的劳动力，私营企业则宁可雇用外籍劳工；后者不仅在工资和福利待遇上逊于本国人，而且比常年研习伊斯兰教法的沙特青年具备更强的专业技能。如果这种状况继续维持5到10年，沙特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将和内战爆发前的叙利亚、利比亚以及伊拉克别无二致。

更重要的是，作为能源产业的掌舵者，纳伊米突然发现他已经无法像40年前的亚马尼那样操纵整个市场行情。这首先是因为OPEC国家的石油产能在全球能源生产版图中的失势：2009年，沙特的原油开采总额首次为俄罗斯所超越，两国全年石油出口额的差距已不足2%。尽管加瓦尔油田的开采成本极低，但西伯利亚萨莫特洛尔油田的地质条件并不逊色，这使得俄罗斯同样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原油。而莫斯科在能源出口策略上有着更精明的战略地理算计，其在欧洲占据的传统市场份额几乎无法为沙特所撼动。尤为特殊的是，俄罗斯甚至也不惮于承受油价“雪崩”带来的冲击——俄罗斯央行在2014年放开卢布汇率的决定虽然给国内经济带来了巨大伤害，但生产成本以卢布计价、销售收入以美元计价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却因祸得福，未曾遭遇“跳水”。在中东原油与俄罗斯石油竞争最激烈的中国市场，莫斯科甚至已经开始蚕食沙特的份额：2015年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规模净增28%，沙特仅为2.1%，后劲明显不足。

另一个为沙特低估的新角色则是经历了“页岩革命”的美国。随着水力压裂技术广泛用于页岩油气生产，美国能源自给率迅速由2005年的30.1%上升至2012年的60%，并将在2021年突破80%。而在2015年，

美国日均原油产量已接近1000万桶，超越沙特成为全球第一大产油国。尽管北美页岩油的出口规模仍较有限，但丧失美国这个全球第二大单一能源消费市场将从根本上重塑利雅得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沙特传统的产量调节策略，也被证明对页岩油难收成效——从2014年底开始，利雅得即号召海湾国家稳步增产，试图使方兴未艾的美国页岩油工业因开发成本过高而破产。但美国页岩油生产商选择控制油井总数，将资金集中投入到储量最丰富、开采成本最低的区块，成功压低了成本，也使沙特代价重大的增产策略以事倍功半而告终。

同样出乎纳伊米估计的还有市场需求的急剧萎缩。2003年以后长达10余年的油价“牛市”，除去供给波动的刺激外，根本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经济崛起带来的需求增长。2004～2008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1.6%，印度则是8%；受其影响，2003～2006年全球日均原油需求增量高达490万桶。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能源市场的迅速复苏，与中国政府的刺激政策同样不无关联。但在2014年以后的“熊市”期间，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先后进入结构调整期，短期内难于产生巨大需求；而美元恰好在此际启动新一轮升值周期，推动了海外游资向美国本土回流，直接导致本币汇率紧盯美元的沙特元气大伤。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2016年全球原油市场的需求增幅将由2015年时的日均170万桶缩水至120万桶；与此同时，全球库存原油还将继续增加2.85亿桶。需求持续不振、供给严重溢出，纳伊米在此时依然固守增产策略，无疑是雪上加霜。

进入2016年春天，持续约一年半的增产策略已经使沙特政府42%的财政收入遭遇蒸发。纳伊米不得不愿赌服输，号召OPEC国家与同样处境艰难的俄罗斯携起手来。2月16日，沙特、俄罗斯、卡塔尔和委内瑞拉四国代表在多哈签署临时协议，呼吁将原油产量冻结在今年1月时的水平。此举回到了传统的限产路径，试图通过限制原油供给来拉动油价回升。问题在于，OPEC内部无法就限产达成一致：70年代末，伊拉克、沙特等国正是利用伊朗退出市场的机会，一举瓜分了后者的出口份额；而在今天，刚刚恢复原油出口的伊朗正迫不及待地增加产能，以图改善困顿的经济状况。穆罕默德副王储否定4月多哈谈判的预案，便是基于这一原因：正如2015年的增产行动未能有效打压美国页岩油的强势，倘若2016年的冻产行动不包括伊朗，同样无法迅速化解沙特的困境。在OPEC



2006年10月19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交易员正在公开喊价。当天沙特石油部宣布每日减产100万桶，国际原油价格因此上涨至每桶58美元

陷入内讧之后，纳伊米重演1973年奇迹的企图不过是一厢情愿。

穆罕默德的挑战

和白发苍苍的纳伊米相比，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亲王完全是个新人类。这位出生于1985年的年轻人推崇乔布斯、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曾经公开拒绝加入纳伊米的老上司阿卜杜拉国王的内阁：“我可以创造像苹果公司那样的传奇，而未必要去当别人的雇员。”从沙特国王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亲王一直在协助自己的父亲萨勒曼王储——也就是2015年1月正式继承王位的萨勒曼国王——修订全国公司法和商业监管条例。2011年10月，这位莽撞的年轻人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在利雅得省政府任职期间企图精简办公流程，并排除当地部落酋长的干扰，一批自觉受辱的王室亲贵在阿卜杜拉面前对穆罕默德进行了攻讦。国王随即下令：将萨勒曼提拔为国防大臣，但不允许穆罕默德再出入父亲的办公室，也不许他在

政府机关任职。

26岁的亲王重新恢复了自由身。接下来的6个月里，他在父亲创办的一家私人基金会工作，任务是为解决国内住房问题提供经济和法务建议，他还创办了一家基金会，培养沙特年轻人的创新和领导能力。私营经济的巨大潜力与效率低下的国企之间的巨大反差，令这个年轻人感到既惊讶又兴奋。2012年6月，阿卜杜拉国王与自己的侄子和解，萨勒曼亲王成为王位第一继承人，穆罕默德重新成为父亲的办公室主任。国王还责成他从速制订一项改革国防部办事流程和采购体制的方案，并在当年年底正式付诸实施。

改革国防部的行动见证了穆罕默德亲王的新思维和执行力：他重新强化了法务部门，对所有执行中的采购合同进行再审核和修改，并聘用了博思艾伦和波士顿咨询两家国际咨询巨头为他重建在军火采购、承包、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整个运作流程。借由这一系列工作，他也和军方建立起了密切关系，这对过去80多年间沙特的实权亲王都是一条必由之路。结束在国防部的业务后，穆罕默德还担任过不到一年的东部省省长。2015年1月萨勒曼正式即位后，立即委任这个儿子为国防大臣、宫内省秘书长兼国务大臣，同时下令组建由穆罕默德领导的经济发展委员会。这位亲王同时还是沙特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副王储）。

副王储以沙特王室的改造者自居：就任国防大臣之后不久，他发起了干预也门内战的“关键风暴行动”，并公开表态沙特应当在稳定叙利亚局势中发挥作用。和那些深居简出、保持神秘感的老王公们不同，副王储从不惮于通过《经济学人》《彭博商业周刊》等西方媒体展示沙特正在发生的变化。2015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戴维营会见了穆罕默德，称赞其“学识渊博，非常聪明，有着远超过其年龄的智慧”。另一位参议员林赛·格拉汉姆更是认为：“亲王显然懂得，在沙特这样一个国家里，让多数人得到更多的时候已经来临了。”

而这位亲王改造他的国家的终极方案，便是今年4月底公布的“2030年远景规划”；外界普遍认为，这份规划参考了麦肯锡公司去年为沙特政府起草的报告《石油之后》。因为规划中包含大量私有化内容，所以也被称为“沙特的撒切尔计划”。它的主要内容为：（1）未来两年之内，沙特阿美公司不超过5%的股权将被包装公开上市，这部分收入和对其他行业进行私有化的所得将组成一支总额2万亿美元以上的主权财富基金，在境外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以在能源收

入之外每年为利雅得多创造 1000 亿美元的收入；(2) 沙特将全面开放旅游业，并允许外国人在境内拥有不动产；(3) 政府鼓励国民创办中小型企业，目标是到 2030 年为止，将经济活动的 35% 交由私营企业来运行；(4) 逐步取消对成品油、水和电力的补贴，并在部分省份试行公共设施运营企业的私有化；(5) 允许女性单独外出和驾车旅行，强化国内职业教育，将失业率降低至 7%；(6) 允许外资进入石油化工、制造业和金融业，简化国外企业在沙特境内的投资审批程序；(7) 在政府机关尤其是军队内部发起大规模反腐，同时提升国内军工业的水平，最终使 50% 的现役装备可以在国内制造。

与此前那些带有浓厚中东风格的发展方案相比，“2030 年远景规划”更像是典型的欧美国家的全面改革纲要，它的第一阶段影响已经开始浮现：为了填补石油收入下降带来的 2000 亿美元预算缺口，副王储在 2016 年初宣布下调对汽油、电力和水的政府补贴，导致水价在两个月内上涨了 10 倍。成千上万的沙特人登录推特 (Twitter)，对这项政策表示不满。资深能源问题专家、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尼克·巴特勒更是公然讥讽称：“这项休克疗法不过是梦呓般的乌托邦，他们根本不知道完全实施所有措施要遭遇多大的阻力。”“这位副王储属于那种可以让莎士比亚写出一部伟大剧本的人物，但该剧本绝不会以圆满的结局收场。”

无论如何，在罢黜了“石油大师”纳伊米之后，穆罕默德副王储已经走向了规划的第二步：以石油收入为基础，尝试发展一种不依赖石油的新经济。没有多少人看好他的前景——除去经济改革本身需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外，目前最大的困境在于，包括俄罗斯、伊朗、沙特、伊拉克、美国五大产油国以及作为主要进口商的欧盟正深深陷入前途未卜的叙利亚冲突当中，并且已经像 17 世纪的“三十年战争”那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势倾轧关系。沙特在原油市场要劝阻伊朗的增产倾向，在军事上则要平息德黑兰支持下的也门胡塞武装的进攻，同时还在继续要求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更换领导人。伊朗则力图借助沙特焦头烂额的机会，将影响力渗透到整个黎凡特地区，形成横跨阿拉伯半岛的“什叶派新月”。而各国希图谋求最大利益的这个区块，却是过去 40 年间全球宗教、安全和经济对立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地理政治“黑洞”。

年轻的副王储看到的是沙特存在的变化机会，但

甚少回顾历史。他没有意识到：“9·11”事件后 10 余年中东乱局的渊源，来自 1979 ~ 1989 年阿富汗战争在中亚“阿富汗”地区形成的冲突反应炉；它借由阿拉伯世界过剩的青年人口、极端教派和管理松散的武器，重新进入了高潮。而 2011 年以降的大中东政争，则是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高潮期对中东调控失能的结果。叙利亚内战的持续和各方力量的卷入，已经孕育出今后 5 ~ 10 年一切大国领导人都无法回避的“全球巴尔干”。在人口、资金和物流流动极为频繁，本身又缺乏危机控制和调节能力的欧亚大陆交界地带，一地一国的动荡很容易沿自然地理方向朝周边国家扩散。而沙特企图关起门来、争取 15 年左右的时间平稳地完成经济转型，这根本就是缺乏现实感的奢望。

过去 70 年间三位“石油大师”领导沙特能源产业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收益，不仅因为阿拉伯半岛本身的自然禀赋，更是美国暗中支持和庇护的产物。而 21 世纪的全局格局将是某种“新维多利亚时代” (New Victorian era) ——和 19 世纪后半叶维多利亚女王统治英国时一样，昔日的霸权国家虽仍居于领导地位，但正在丧失绝对优势；多个次级经济和军事中心相继崛起，数种储备货币共存；保护全球军事和经济“公地”的职责正在由一国扩散到多国，竞争和动荡将成为新常态。在能源自给率大幅提升之后，美国无须再将波斯湾石油视为维持经济运转的“生命线”；即使不会对中东彻底撒手，承担安全责任的意愿和力度也会下降，这将对利雅得的命运构成根本性转折。美国无意再保护沙特，沙特无力继续领导 OPEC，OPEC 对油价的基础性控制能力彻底丧失，这都是“2030 年远景规划”必须面对的挑战。如同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所言，2016 年的全球经济和安全形势比 8 年前多了稍许稳定，但仍是一个大病初愈、虚弱而焦虑的病人。而穆罕默德亲王的这剂猛药会对这个虚弱的病人产生何种影响，或许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会显露出来。■

(参考资料：《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Daniel Yergin；《The 2-Trillion Dollar Project to Get Saudi Arabia's Economy Off Oil》，Peter Waldman；《The Color of Oil: The History, the Mone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s Biggest Business》，Micheal Economides and Ronald Oligney；《欧佩克配额制度和油价关系研究》，张照志、王安建等)

辽西盗墓传奇，重寻红山遗址

记者 邱杨

源头始于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遗址早在 30 多年前就被盗空了，近些年的盗掘轨迹显示，盗墓贼逐渐往辽西地区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推进，呈现包抄之势——这意味着辽西一带的盗墓高峰已经来临。一年年冬去春来，在看似宁静的辽西土地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桩盗墓案正在秘密收网。

村子里的陌生人

这年春夏之交，牛河梁周边村落里的陌生人突然多了起来。有人自称来收购农副产品，有人俨然一副收藏家做派，还有人则整日泡在村子里赌博厮混。这些表面看来身份各异的陌生人，却都在有意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打听谁家地里挖出了“片子”。所谓“片子”，来头可不小，这些当地农民在耕地或打井时无意挖出来的破碎陶片，却是有着 5000 年历史的红山陶片，零星地散落埋藏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周边。

陌生人的频繁出没，挑动起王红岩的军人直觉，他敏感地嗅到了其中不寻常的意味。彼时的他刚刚从工作 30 多年的消防战线上转业，分到新组建的朝阳市公安局牛河梁遗址治安分局。当时的治安分局只是一个既无属地又无实权的“光杆”单位，年逾五十的王红岩原本只想在这里过几年清闲日子。但面对牛河梁周边村落的异常情况，骨子里的军人本能告诉他：陌生人的出现绝非偶然。

在消防战线上与文保单位打过多年交道，王红岩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重要分量心知肚明。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在辽河流域出现的一个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被考古界誉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分布在内蒙古东南、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的红山文化遗迹最早发现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因内蒙古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而得名。80 年代初，在辽西朝阳市境内凌源、建平交界处发现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出土了距今约 5500 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是规模宏大的史前祭祀核心遗址，更证明了这里曾存

在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社会。

事实上，早在 2010 年牛河梁遗址博物馆开放之初，王红岩就注意到了这些混杂在潮涌而至的看展人群中，伺机观察蠢蠢欲动的陌生人。“和高谈阔论的学者专家和看热闹的游客不同，这些人看展时不怎么吱声，只专注地盯着某件器物或某张图片默默琢磨，时不时还密切关注着身边人的表情和反应，警惕性很高。”在王红岩看来，这些觊觎红山文物的“陌生人”在行为举止间不经意地透露出可疑的蛛丝马迹。

随着陌生人的悄然涌入，王红岩和牛河梁分局的同事们迅速对整个牛河梁遗址群进行全面摸查。在他看来，牛河梁遗址群保护区就像是一个层层包裹的鸡蛋：鸡蛋黄是占地 8 平方公里的牛河梁遗址公园，作为遗址群的中心地带，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的 16 个遗址点尽数落在这里；鸡蛋清则是面积为 58.95 平方公里的核心保护区；而最外围的鸡蛋壳是 23.56 平方公里的建设控制地带。

在摸查过程中，王红岩发现保护区的边界划定并不科学。“有些地标还是根据 1976 年的老军用地图确定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和实际地标不相符了。”而界桩的设置更是随意——“同一片庄稼地，桩内就是受法律保护的遗址区，桩外就是平民百姓地，可以随便挖。”他不禁诘问：“把界桩立在这里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加之牛河梁遗址群位于三省交界的复杂地域，王红岩和同事们便主动向保护区外围扩大巡查区域，向南远至河北承德，向西至内蒙古赤峰。

扩大巡查的结果却让王红岩大吃一惊：辽宁西部朝阳境内，几乎到处都遍布着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和遗迹，绝不仅仅局限在牛河梁那不过 90 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内。很多当地百姓甚至就生活在地下遗址之上，祖祖辈辈在这里耕作和祭祀，却从未察觉到一两米之深的地下就埋藏着珍贵的红山器物，即便偶尔挖出彩色陶片，也没有意识到它的真正价值。事实上当地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早些年由于辽西地下的铁矿石含量丰富，开矿挣了不少钱，但随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确立，开矿受到限制，在这片耕地稀少的干旱土地上，人们只能靠产出微薄的田地和外出打工为生。

以至于当有陌生人来这里偷摸挖掘时，文物保护意识薄弱的老百姓也仅限于担心：别把自家园子里的



辽西盗墓案嫌疑人在吴家山山顶指认盗墓坑

果树挖坏了。当王红岩巡查至此，问及“知道这些陌生人是盗墓的吗？”当地百姓的回答却颇具语言艺术：“也知道，也不知道。”逗得王红岩只得苦笑连连。当地人的文保意识薄弱至此，更何况大部分被盗挖的遗迹、遗址地处远离村庄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之中，更是无人察觉，遑论报警。

在对大量第一手盗掘盗挖痕迹的研判中，王红岩进一步厘清了隐藏其中的脉络和走向。“源头始于内蒙古赤峰，但当地的红山文化遗址早在30多年前就被盗空了，盗掘的年代轨迹便逐渐往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而来，最后推进到牛河梁遗址群外围，呈现包抄之势。”特别是2013年夏天以来，随着牛河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程的加快，牛河梁外围区域的盗挖痕迹悄然增加。“这意味着盗墓分子牢牢盯上了牛河梁。”据此，王红岩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辽西一带的盗墓高峰已经来临。

盗痕的秘密

从一开始，就有人质疑这个无人报案且线索难觅的盗墓案破不了，即使破了也抓不到人，即使抓到人也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批捕，即使批捕也追不回多少红

山文物。但王红岩偏偏不信邪，咬牙要将盗墓贼绳之以法。在他看来，破案的秘密尽在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盗掘痕迹之中。他就像是最苛刻的痕迹侦探，在反复研判中逐渐洞悉痕迹吐露的信息，让曾经消逝隐匿的盗掘现场重新变得清晰鲜活起来。

每年春夏之交，特别是夏季里植被繁茂的青纱帐一长起来，盗墓的时节就开始了。“盗墓贼通常选择在节假日或下雨天的前两天下手，从夜里11点到凌晨3点之前，是盗墓的黄金时间。”在王红岩看来，盗掘地点的选择则是盗墓成败的关键。“虽然有高科技工具的辅助，但真正的窍门还是根据星象、山脉和风水走向。”这种“看山”本领也为盗墓贼增添了某种神秘色彩。“地质情况会随时间变迁但星象不会，盗墓贼首先根据星象定位到辽西的某个乡镇，再仔细观察周边的山水地势，继续定位到背山面水又有隆起的某个土丘，然后反复验看土丘之上有没有散落的陶片标本。”经过这一番研判，有经验的“高手”通常能将盗挖范围精确到10平方米以内。

王红岩曾在一处盗掘现场发现了很多半锹半锄深的小坑，后来才知道这是盗墓贼在研究土层。“如果是10年以下动过的新土，盗墓贼就不会再来这里，如果是20年以上没动过的老土，就需要更进一步的



辽西盗墓案追缴收回的红山文化代表性器物，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细致挖掘了。”而这些验看土层的密集小坑更深层的意思，还有占地盘警告的意味。

盗墓贼通常会使用一种自制的名为“扎子”的工具，它的性能高于传统的洛阳铲，能带出地下土层，专门适合盗掘红山时期的文物。“红山墓葬的积石冢形制和其他年代的地下洞穴墓葬很不一样，加之5000年的风吹日晒地表风化，红山墓葬埋藏很浅，常常仅仅1米或半米深。”但在王红岩看来，埋藏虽浅的红

山墓葬却不是轻易盗得了的，如若没有多年的深度钻研，极难找到下手的地方。而对于“行家”来说，只要找准了下手点，用“扎子”扎下去，就如同做微创手术似的，用不了几锹就挖出来了，“基本上一盗一个准儿”。

这所有的一切都让王红岩警觉：他面对的是一群“专家型”的盗墓贼，而且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由于保护区里装有高清监控探头，且盗掘保护区内文物

量刑很重，这伙盗墓贼从不在保护区内作案，而是选择荒郊野岭人迹罕至的保护区外围下手。”每次盗掘完，他们还会把挖出来的石头全部回填，将盗坑恢复原状，甚至在上面覆盖草皮或撒上草籽，雨天过后草就噌噌地长起来了，不仔细勘察根本发现不了其中的端倪。除此之外，他们还会把留在盗掘现场的食品和垃圾统统带走，极少留下痕迹。

但百密总有一疏，警方仍然在盗掘现场提取出了大量的痕迹标本，并进而发现了其中的细微差异。“有的盗坑形式不一样，有的回填不够彻底，有的现场遗留的烟头牌子不一样，甚至咬的牙印痕迹也不一样。”通过对这些痕迹差异的细致研判，12个相对独立又互有交集的盗墓团伙逐渐浮出水面，各自的成员结构和行动轨迹也一天天清晰起来。

“关外第一高手”

姚玉忠被捕的那刻恰好是他的生辰，2014年11月26日凌晨3点。这个看了大半辈子“风水”的盗墓贼，此刻也不得不相信这一切是天意。在12个盗墓团伙中，被称为“关外第一高手”的他是编号101的头号主犯，也是其中资历最深的“盗墓祖师爷”。

可要逮住这个“祖师爷”并不容易。早在走访赤峰市古玩市场时，50多岁的中年男子“老姚”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穿得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的他，看文物的眼力简直成了古玩市场里的“传说”，尤其是红山时期的玉器，一看一个准儿。随后不久，当地赌场上也开始流传“老姚”的轶事，经常输个几十万、几百万元也不眨眼。“这个‘老姚’既不是开矿的，也不是什么大老板，他的钱从哪里来？”警方逐渐把目标锁定在“老姚”身上，他的身世谜团才就此慢慢打开。

姚玉忠1962年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新房村的一个篾匠家庭，七个孩子中唯有排行老三的他学会了父亲的祖传手艺。年轻时他常常带着编好的竹篾走村串户，还倒腾过羊绒、皮子生意，赚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在同村人眼里，这个寡言少语的年轻人是个头脑活络的聪明人，总爱读与历史相关的书籍，甚至会看星象和风水。事实上，早在读中学时姚玉忠就开始学着盗墓了，在他看来，这是发家致富最快的路子。他对红山文化研究颇深，加之近年来红山文物越来越值钱，盗10件青铜器还未必比得上一件红山玉器，渐渐地，他就专门只盗红山古墓遗址。

姚玉忠的人生转折始于赌博，从闲时打发时间

的娱乐，演变成嗜赌如命的“老败家”。过去小赌时，就常常有人来家里讨要赌债，老婆孩子晚上睡觉时不得不在枕边放把刀子傍身，而后来赌大了，姚玉忠更是不着家。事实上，生活中的他过得并不奢侈，对烟酒的兴趣也很淡，但赌场上的他却出手阔绰，有时输得急眼了，还会把随身携带的古董现场抵押换成赌资。赌博推着他更疯狂地卷入盗墓，在2013到2014短短两年间，外出作案多达200余次。常年浸淫其中的他，有着异常精亮的眼睛，甚至能在夜里看清200米开外的动静。

作为团伙的总指挥，姚玉忠的看山“秘诀”鲜少外传。每次踩点，他都是独自一人，从不许别人跟随，私下闲聊时也绝口不提看山“秘诀”。而在其他团伙成员看来，姚玉忠分赃时太不“地道”，每到快挖出东西的档口，他就自己一个人下去把文物都捡走。以至于其他人连到底挖出了多少东西都不知道，只能是姚玉忠赏赐多少就是多少。团伙里很多人一气之下另起炉灶，包括他的七弟姚玉飞也“单飞”了。尽管矛盾重重，这些新的盗墓团伙仍然与姚玉忠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

而姚玉忠策划的一起抢劫案，则牵出了本案的第二大盗墓团伙。今年38岁的冯杰是辽宁凌源人，经营着一家名为“宝之都”的文物店。2014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被人在家中楼下控制，被迫交出存放文物的保险柜钥匙，并被抢走8件红山玉器。事后，冯杰才得知这伙人是在姚玉忠的指示下“黑吃黑”。而警方也是在这起蹊跷的抢劫案后才注意到冯杰及其背后的盗墓团伙。“冯杰4人团伙的隐蔽性极强，从不聚在一起喝酒、打麻将，仿佛是4个毫无关联的陌生人。每到晚上，却能瞬间凑在一起踩点挖盗，分赃平均，组织严密。”甚至有其他盗墓团伙想让冯杰帮忙掌眼时，他还道貌岸然地劝诫：“这都法制社会了，还盗啥墓？有这时间还不如外出打打工。”

冯杰团伙里的骨干成员还包括姚玉忠的七弟姚玉飞。由于姚家80多岁的老母亲住在姚玉飞家，姚玉忠并不希望弟弟陷得太深，每次干活便只让弟弟开车和放哨。但姚玉飞心里却暗暗犯起了嘀咕：是不是三哥挣钱多，给自己的少？他便留了个心眼，每逢干活时便偷偷跟着三哥，偷学其“寻龙看山”的本领。结果却被姚玉忠发现了，大发雷霆之下兄弟俩闹掰了，而姚玉飞也搭上冯杰，就此另起炉灶。

王子朋团伙则是姚玉忠明面上的徒弟。王子朋与姚玉忠在赌场上偶然相识，臭味相投的二人一拍即合：姚玉忠教王子朋盗墓手法，王子朋则充当姚玉忠的保

鏢和金主。在追随姚玉忠的过程中，王子朋掌握了娴熟的盗掘技能，甚至自诩：“在寻找红山墓上，这世上除了姚玉忠就是我最强了。”落网后他积极举报姚玉忠的犯罪线索，内心盼着姚玉忠判重刑永无出头之日，这样自己便能占领红山文物的“霸主”地位。在押解他辨认案发现场时，走火入魔的王子朋一到山上就情不自禁地低头拣陶片，甚至说出来后还要接着干，妄图东山再起。

地下生态与保护区调整

几乎每个盗墓团伙背后都有固定的“掌眼把脉”销赃渠道，这些环节是将盗掘文物变现为真金白银的关键，串联起非法文物交易的地下生态链条。

王红岩告诉我们，有的销赃走的是上层路线。天津的张鹏开了一家民间博物馆，以收藏文物的名义暗地进行非法出土文物倒卖。姚玉忠便直接跟他联系，通过他再转手卖给各地的大老板、开发商甚至政府官员。而赤峰市红山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和副会长，则假借专家学者的身份从事非法文物交易，甚至常常第一时间赶到盗掘现场坐地收赃。“警方对盗掘团伙的抓捕消息一传来，他们就如同惊弓之鸟般四散逃跑了。”

除了上层路线，还有通过民间古玩市场销赃的。涉案的大多数文物贩子都在北京的潘家园、沈阳的鲁园和赤峰的古玩市场里设有店铺。事实上由于存在诸多法律漏洞，目前的民间古玩市场鱼龙混杂并不规范，一大批文物贩子藏污纳垢于其中，致使盗掘文物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多次转手。

经过一遍遍“过水”的文物身价暴增。以一件“牛首玉人”红山器物为例，盗墓贼以200万元出售，几经“掌眼过水”后到达文物贩子手中就变成了600万元，最后则以1200万元被天津的张鹏收走，而一位陈姓台湾商人则多次表示愿以2亿新台币的高价求购这尊“牛首玉人”。王红岩告诉我们，一旦红山玉器进入香港、台湾地区等海外市场，价格就是几十倍甚至数百倍的暴增。更为严重的是，一旦非法文物流出海外再回流时，便能被跨国“洗白”，堂而皇之变成合法渠道获取的文物。让王红岩感到欣慰的是，此次红山盗墓案的破获进一步推动了18条文物犯罪司法解释的全部修改，成为撬动规范文物市场多米诺效应的第一张牌。

与此同时，陆续追缴回来的文物数量是惊人的：共追回涉案文物2063件，其中一级文物248件，二级文物142件，三级文物262件，一般文物1411件，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追缴被盗文物最多的案件。其中多为红山文化典型器物——玉猪龙、勾云形玉佩、玉钺、马蹄形玉箍、双联璧以及兽面纹丫型器等，部分玉器和陶器更属于国宝级文物。

相关部门派出了研究红山文化的顶级专家组，但就在他们来到朝阳市对涉案文物进行第一次鉴定时，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按照既往的研究成果推断，尚未挖掘出来的红山文化玉器应该不超过200件，但这次却追缴回如此大量的红山文物，部分专家提出质疑：哪来那么多红山玉器？甚至认为这些涉案文物不是真的。”专家们在小小的财务中心办公室里争论得面红耳赤，这样的场景让王红岩印象深刻。但他并不着急，胸有成竹地通过案件分析、现场勘查、痕迹比对等一系列证据链条的严密呈现，最终让持否定意见的专家心服口服。专家普遍认为，此次案件的破获不啻为红山文化研究颠覆性的大发现，从器物组合到玉料选用，都填补了红山文化考古发掘的多项空白。“专家们有老大长进了。”说起这点，王红岩不无骄傲。

但盗墓盗的不仅仅是文物，更严重的是对遗址历史原貌的损毁，造成了历史文化信息的丢失。而这些信息对红山文化的研究推进，对5000年文明的进一步佐证，都有着重大价值。王红岩希望通过盗墓贼的现场指认，重新复盘遗址现场。第一次和专家们鉴定案发现场时，郭大顺先生跟王红岩说，准备去的两个地点他之前来过，是考古发现过的地点。王红岩也不急着解释，只说到现场看看吧。结果到了喀左的水泉，眼前看到的画面却让专家们傻眼了，大面积的积石冢群就裸露在大片农田周边。年近80的郭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反复感慨：“国家三次文物普查期间我走过了辽西这么多地方，却从来没来过这里。”由于我国推行抢救性发掘政策，过去是盗墓跟着考古走，但现在却是考古跟着盗墓走。专家曾判断，距牛河梁40公里内会有重大发现。而此次在喀左水泉因盗掘而发现的遗址群，从器物组合和考古现场判断，是红山先民居住地的可能性极大，恰好距离牛河梁保护区39公里。

这意味着红山文化遗址群在辽西地区不仅仅只有牛河梁一个核心区，其覆盖范围甚至可能辐射整个朝阳境内。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地下遗址的地表目前仍处在耕地状态，如若未来红山文化遗址群的范围将有大规模调整，这片土地之上的百姓民生问题如何解决才是遗址保护能否真正长久的关键。在王红岩看来：“如果处理不好，可能激化各方面的矛盾，但如果处理得当，也可能成为当地发展的契机。”



绘画·阿梗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蒜你狠”与大理独头蒜

记者 程磊 摄影 关海彤

9个月内上涨160%的大蒜价格，若情势扭转，种植者赔起本来，会比以往任何一次滞销的损失要巨大得多。蒜农们深知这一点，所以高兴之余，难免会对不确定性有些担忧。



种蒜、收蒜是大理西湖村村民主要的劳作内容，也是主要的生活来源

收割

5月8日，各地大货车挤满了大理西湖与214国道之间的一条不知名的马路。这条被当地人称为西湖线的不到两公里的路，因蒜而兴，经销商及仓库云集于此。

向西不远就是大理西湖，西湖村家家种蒜。我们去的时候，收获的时节已近尾声，蒜农们抓紧最后的几天时间，张罗着各自地里的蒜。这些蒜很快便归拢到西湖线经销商处，进行分级、打包、过磅、装车，一片热闹的收获景象。一车车的蒜，不消三天，便上了各地的餐桌。

西湖村隶属于大理州洱源县右所镇，这里的西湖，不像杭州的西湖，船只是一种点缀。洱源的西湖，船是生活的工具。家家户户门口几乎都停泊着小船，这些小船古朴而粗犷，仿佛就停在明清。西湖村有六个自然村：张家登、清水塘、东登、中登、南登、海塘。它们和像七巧板一般的湖中七座小岛构成汀港相连的景观，舟楫往来，湖中有岛，岛上有村，村落相连，汉港相通。岛上的土地基本都用来种蒜，勤劳的人家或是提起竹篙，或是带上两桨，驾着小船来到岛上劳作。驾着载满大蒜的小船回家的时候，吃水很深的小船悠悠而去，似从画中来。

进入南登村的路很窄，仅能容一辆车通过。杜国治的那三分蒜田就守在南登村口，紧邻路边，“漂浮”于西湖之上。杜、李是西湖村的大姓，他告诉我，白族人恋家，不愿意离开家乡，种蒜20多年来，经历了2008年每斤两毛钱的悲伤，也尝到了连续5年好年景的喜悦。但无论蒜价如何波动，村里的人大多始终居于祖辈生活的地方，不愿远行。所以西湖村，外出打工者极少，自然也就鲜有打拼者回乡务农继而发家致富的传奇故事。

大理州是南方紫皮大蒜的主要产区，其独头蒜是农产品地理标志。州辖区内有5个县市是主产区，其中洱源县出产的可能是全国最贵的蒜，年产值超过4亿元。洱源县种植大蒜有20余年的历史，作物的耕种随着市场的需求在水稻、玉米、烤烟中流变、摇摆，最近的这5年，大蒜种植已成为全县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性”产业。西湖村一带因特殊的种植地理条件，

产量高、质量优、个头大，大蒜素含量均比平原地区高出2~3倍，更能卖得上价。

“今年又是好光景。”杜国治说，经济作物不愁销路，坐在家中就能完成销售，在自己20多年的耕种生涯中，只有种烤烟统购统销时出现过。趁着这几年的蒜不愁卖，西湖村的蒜农多有包地种蒜，距离西湖30公里的喜洲镇通常是首选。毕竟本村土地有限且租金较贵，距离大理20多公里的喜洲以旅游业为主，本地人历来对耕种缺乏动力，镇上土地此前也未有规模化种蒜的传统。这为种蒜“好把式”的西湖村人扩大种蒜规模、增加收入提供了机会，租用耕地的价格也远比在本村租种田地要便宜得多。

问起杜国治村里的收入状况，他指着不远处的一排排民居，说这家不错，那家还行，说到谁家收入多时，他的声音会明显升高地强调：“他家在喜洲包地。”包地，少的十几亩，多的数百亩，对应的是西湖村人家庭收入增长的多寡，这在村民之间成了一个简单的“家产”判断标准。娶媳妇、孩子上学、房子翻新，或者直接对某个数字有追求，这些顺理成章的欲望驱动着村民。

2200米海拔地区的阳光，总要比中原地区炙热许多。这并不能成为蒜农或收蒜人停下脚步的理由，尤其对于后者来说，不过忙碌两个月，一年的生计便有了殷实的保障。收蒜人的利润依附于大的经销商，后者以每公斤两三毛钱的报酬支付于收蒜个体，报酬因收购蒜品的成色不同而定。独头蒜多、个头大，报酬较多，丫蒜（北方称为瓣蒜）则报酬较低。杜国治告诉我，在高峰期，收蒜人能保证每天收一车，利润600~800元，有的时候能收到两车。

收蒜的季节，村里基本上看不到人，劳动力要么在地里挖蒜，要么在家中分拣。村里能见到的多是开着四轮后驱动农用车的收蒜人，他们头戴草帽穿行于村里的街巷。农用车的噪音响起，有销售需求的蒜农便会打开自家大门。

虽然每天的收购价格是浮动的，上午和下午亦常不一致，但价格肯定是透明的。收蒜人多数是本地人，本乡声誉在熟人社会中更易如鱼得水，即便是异乡客，也断然是不敢在价格中捣鬼的。村子里的居民祖祖辈辈都世居于此，彼此间很熟悉，闲话家常中难免会聊起最近的蒜价。倘若哪家的蒜比别家低几毛钱，收蒜人的“声誉”定会大打折扣，接下来的买卖自然就难以继了。

谈起今年的收购价格，杜国治很乐意与我分享他

的喜悦：独头蒜每公斤12~14元、丫蒜每公斤8元左右，蒜薹每公斤稳定在12元左右。“我也不知道好卖的情况会持续多久，但我知道不会总是这样。”他一边挖蒜一边说。我告别的时候，他仍在收割着明天的希望。

包地

40岁出头的李树珍，家里劳动力不够，她索性把自己家的3亩多地包给了邻居种蒜，自己开办了南登村唯一的一家农家乐，提供住宿、餐饮和泛舟三个项目。大理西湖虽然名气很大，但因为距离大理古城60公里的路程以及公共交通的不便，游人如织的场面很少出现。对于每年9000块钱的场地成本，她虽然有些担心，但一年下来，总还是有说得过去的收入。

一些文学作品给了乡村很多想象的空间，人们对独门独院赋予了很多期许，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幻想成美妙的画面，投以羡慕的目光，但真正乡村的生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煎熬。

对于李树珍来说，牺牲持续好年景的蒜的溢价收入，一方面能旱涝保收，另一方面，也省去了耕种的辛苦。户外的劳作由田间转向了水上，有客人的时候撑撑船，每小时能赚100块，大多数时候还是在农家乐的餐厅操持客人的饭菜。白族的女人是出了名的任劳任怨，李树珍也不例外，加上她的厨艺在西湖村备受乡亲们推崇，所以她对自已经营的农家乐是希望大于担忧的。

杜丕明的老婆是李树珍老公的妹妹，他家的田在西湖东面的小岛上，李树珍撑着船带着我和摄影记者老关，因为她的介绍，杜丕明直接翻过了初次见面会局促的那一页，也省去了说辞上的习惯性的保守。

“每亩蒜能挣多少钱？”我问。

杜丕明答：“3000多块的纯利算不错啦。”

“小兄弟和你同年，都属马的，你跟他讲实话嘛。”李树珍催促道。

“岸上的田每亩一般有4000块以上的利润，湖田产量高些，收成好的时候能有六七千块，特别好的时候，上万块也有可能，不过很少见。”

“现在挣得多，也要承受赔得多的风险。”杜丕明补充说。

按照他的印象，蒜是从2010年开始涨价，农民增收的同时，成本也在连年上涨。蒜种、包田、人工、肥料是种蒜成本排序，蒜种买来要在冷库里冷冻一个多月，这样更易出独头蒜，冷库费用也是一项成本。

其中光蒜种，每袋就要800多块，每亩蒜需要7袋种。利润的高低取决于独头蒜的产出的比例，产量、个头的大小。独头蒜与丫蒜，每公斤价格差了三四块，没有一项是可以完美控制的，都要看天。人控制不了独头蒜，同一蒜种，种在不同地方，去年种和今年种，出独头蒜的量都不一样。“每个蒜种商都说自己的货种出来独头蒜产量高，种了以后不理想，找他埋怨几句，他就会说，是你没种好。”

“每亩蒜成本近9000块，以前蒜卖不掉的时候，成本2000多块，也没有包田，赔起来不心疼。现在一旦赔起来……”杜丕明摇了摇头，后面的话没说下去，表示不敢想象。

西湖村人均拥有耕地三四亩地的水平，奔小康的腾挪空间有限。只有包地，才有经济效益了。但常年的耕种经验告诉他们，包地确实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决策。李树珍的哥哥在邻近的喜洲镇包了16亩地，当地人认为这是包地种蒜面积的“黄金比例”。西湖分湖田岸田，杜丕明在镇上靠山的岸田包了15亩地，虽然比喜洲的地租贵，但产量要大。“地包多了遇到市场不好的时候，风险太大。另外，地太多自己也管不过来，人工用多了不划算。”要在稳妥的情况下去实现收益的最大化，15亩左右，是一个刚好能平衡并说服自己的数字。

看天

快到午饭的时候，李树珍去她的农家院准备中午几桌客人的饭菜，杜丕明则邀请我去他家小坐，我欣然答应。我们先上了船，杜丕明60岁的母亲撑着船，我们身披金光，满脸红光，穿梭于芦苇荡中。船上载的，除了装好袋后的500多斤新割的蒜，兴许还有唐朝的诗意，明朝的优游。

杜丕明的家在东登村，是典型的传统农耕家庭，房前屋后种点菜，院子里养鸡，平日取蛋，过年吃肉，一个小型的自给自足“闭环”。房子是2013年盖的，几乎是拆了重建的，上下两层，花了30万元。“不包地，哪里有钱？”新房子里里外外都尽量将白族人的审美元素用齐，门楼、照壁、石屏、斗拱、飞檐、串角、凸花砖，能用的装饰也尽量用上，绘画、雕刻、诗文等各种“软装”也招呼上。

修房、娶媳妇、教育，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开支。李树珍的哥哥因为包地每年也能赚超过13万元，前年把朝东的房子装修了，去年又把朝南的一栋也装修

了。追求美轮美奂的家，想必也是对人生最大的奖励。

摆设、家具、电器也在逐步更新，去年春节新买的54英寸的电视机就坐在客厅正中间。“半亩蒜没了。”杜丕明一边说着一边领我参观他的家。家里人口少，楼上全用作生产，地上摊着梁上挂着，全是蒜。晾一部分的好处是，农闲的时候去市场做零售，利润更高。白族房子二层正中间的墙壁上，必然是要供奉祖宗牌位的，按照老规矩，牌位下方不能住人，对应一楼的正好是客厅的电视。“祖上看到蒜收得好也会开心的。”

村里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农闲的时刻。蒜的收入占到了家庭收入的60%以上，9、10月种下去，第二年3、4月收割，半年的生长期。蒜收完了种水稻，每亩产1000多斤大米，卖2500多块，赚700多块，收成相对稳定。有的也种蔬菜，蔬菜种得好，利润能高一些。以前还能打鱼，贴补家用。“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来大理，提出要保护洱海，打不了鱼了。”

洱源西湖地处洱海源头，属澜沧江水系，为高原断陷湖泊，是大理及周边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必然要承担净化水质的任务。针对西湖6村7岛内群众种植污染问题，政府正在对岛内约500亩菜地和园地逐步进行一次性征用，用于恢复水面或湿地。

这个被史籍反复提及的“烟渚渔村”，渔的部分已成为历史。半年蒜、半年水稻或菜，将是西湖村完美的务农组合，但前提是风调雨顺。种蒜土要松软，土盖厚了，长出来个头小，土盖薄了，干脆就长不出来了。今年雨水多，水漫到湖田，土不够松软，影响了蒜的大小和产量。

“往年挖蒜的时候，土层是干的，是灰色的；今年土是黑色的，站着都有水。”杜丕明说起有一年夏天湖田全给淹了，“船在田上走”。所以他计划今年的湖田，收完蒜以后什么都不种了，后来又喃喃自语地说，还是种点萝卜好了。耕种的人，永远都在不种可惜和种什么之间犹豫不决，他们权衡风险，依靠经验盘算天气，往往又不能遂人意。

而对于土地的征收，是令人惆怅的，虽然每亩有4.8万元补偿，只是，“这是一次性的，土地在手上是一辈子的”。说这话的时候，杜丕明正望着9岁女儿上学出门的背影。关键时刻，还是媳妇的话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放心吧，我家在弥渡还有地呢。”

村里的人非常淳朴，一起挖挖蒜，剪剪蒜叶，休息的时候一起抽根烟，在一个碗里喝一口有劲的下关沱茶水，很快就有了因劳作而生的认同感。这个时候，村里的谈资、八卦，一股脑地都倒了出来：谁家修了



1



2



3

1. 大蒜收获后，独头蒜占比的高低对一年的利润起着决定性作用

2. 经销商的蒜厂正在分拣

3. 西湖村村民杜丕明的家在西湖东面的小岛上，穿过这片芦苇荡即是

新房子，谁家电鱼被罚款，谁家待字闺中的闺女被谁家小子惦记，谁家男人打老婆，谁家女人总打扮得妖里妖气……村里人的娱乐生活除了看电视就是八卦，人们对带有点“颜色”的八卦是喜闻乐见的，通常当天便能从村头传到村尾。

离开西湖村的时候，有的田地已经开始插秧放水。蒜季一结束，人们的心境一下子缓和得多了，插秧固然劳累，但却少了抢收的那份焦躁，隐隐的担忧已甩到了来年。一把绿油油的秧苗抓在手里，卷起裤脚踩

进泥里，几个村妇暗暗攀比，看谁手快眼尖，有些厉害的小媳妇儿，一路插下来，一条直线直得不行。

谁家小孩放了假，也嚷嚷着要插秧，奶奶便和藪地教她，插了两行低头一看，歪了，再低头一看，蚂蟥吸腿上了。“不插了，不插了。”拽了蚂蟥就摔，逃荒一样跑上田埂，赤脚走到田头，喝着奶奶用大水壶带来的水，美滋滋地倚在大青树旁，如童年的温床。若干年后细数内心最安宁的时刻，总有这天的一席之地。关于蒜的细节，都该忘了吧。☑

12年后 重识侯登科

记者 / 丘濂

侯登科回顾展正在深圳越众历史影像馆和关山月美术馆展出。由4.2万张底片精选放大的300余张照片，以及45万字文字手稿的精华呈现，都为我们重新认识侯登科的摄影生涯提供了一把钥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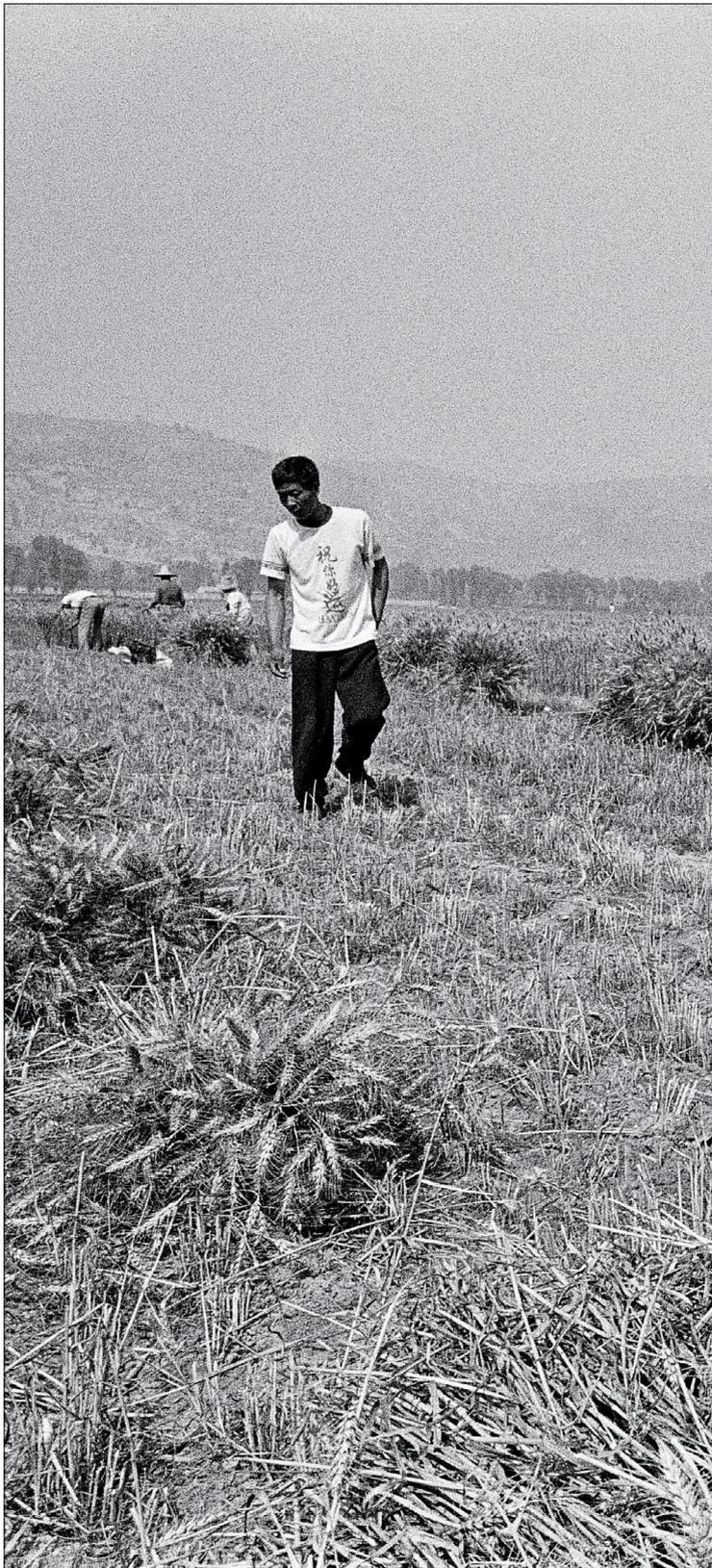
暗房显影

整整19周，付羽把自己关在暗房里。在这个安静世界中，他只和侯登科的照片相处。

在侯登科生前，付羽完全没和他打过交道。他看过他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张“三位农妇”。那是侯登科1990年在陕西凤翔的农村拍下的照片，三位妇女在灶台前为一场婚宴忙碌。侯登科一连按下了十几下快门，最后选了其中一张：左边的女人正在愣神，中间的女人欲言又止，右边的女人皱着双眉，好像马上就要抱怨。与同时代图片中人物具有的明确表情不同，她们的神态暧昧不清，和肃穆的构图有种反差。“拧巴着感觉，但是哪儿哪儿都对劲。”付羽说。这张照片上一切都是恰好而完美的。右边的女人被取景框截去一半肩膀，“这才是属于摄影的语言”。

策展人李媚找到付羽时，并没有把握他是否愿意帮忙。侯登科留有4.2万张底片，除了大概一小部分用于报刊投稿或者画册印刷被洗出来过，其他底片都不曾公之于世。侯登科去世之前，与李媚和于德水等好友定下了“12年之约”——12年后，如果找不到机构愿意接受并发挥作品的功用，就将照片移交给他女儿处理。12年中，李媚和友人一起完成了这些片子的整理和扫描，最终在约定期即将结束时，找到了深圳越众历史影像馆，对方非常

(侯登科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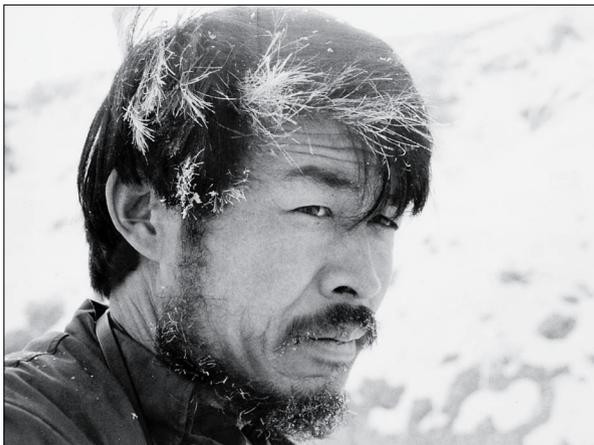
侯登科摄影作品“麦客”系列——《走镰的汉子》(1997年摄于陕西关中)



(侯登科摄)



1



2

认可来办一次侯登科摄影回顾展的价值。底片上的信息只是一种档案，还需要冲洗放大和装裱才能成为一件真正的作品。从中精选出 300 余张底片后，李媚想到了付羽，一位擅长制作明胶银盐照片的摄影师。

在黑暗中，冲洗照片是个充满神秘感的过程。付羽大多数时候是处理自己的拍摄底片，对于别人的东西，他有个原则，不想知道太多拍摄时的背景。他的朋友、侯登科的学生路泞告诉他，其中一张灞桥铁路大桥被洪水冲毁的照片是侯登科人生中拍摄的最后一张，“于是就怎么也冲不好了，做了几次，照片都是灰灰的”。侯登科很长时间以来在西安铁路工程公司的宣传部和办公室工作，有自己的暗房，属于陕西摄影群体中摄影物质基础不错的一个。即使如此，当时的冲洗条件也比较落后。付羽的工作就是让这批底片在相纸上呈现出最好的面貌。“他用的胶卷牌子有几十个，有什么就用什么，在选择相纸的时候就要考虑它的兼容性。”



(侯登科摄)

3



(侯登科摄)

4



(侯登科摄)

5

对“麦客”“四方城”这样侯登科著名的拍摄题材没有概念，这让付羽得以从更加纯粹的摄影角度来看侯登科的作品。“能够看到属于纪实摄影传统的东西。侯登科之前国外有人这么拍，可是国内摄影师还很少有这样的尝试，他的拍法就进入了中国纪实摄影的图库。”侯登科拍“麦客”时有一张是“走镰的汉子”，男子一手挥舞着镰刀，同时用腿抵住割下来的麦子。“大多数时候你都在拍你见过的照片。你可能会说‘是我觉得好才拍’，其实是之前有人拍过，那幅图印在你的脑海里。那种浑身绷着劲儿的劳作者，追根溯源，就在侯登科的片子里。”

侯登科的照片中，主角经常不止一个。如同继承了中国传统绘画中散点透视的技巧，他的照片是一幅不断进行发现的长卷：在西安的城门前，左面有“摩的”司机似乎在和乘客讨价还价，右面几位穆斯林妇女搀扶着老人；陕西关中农家的门口，妇人在给老汉改着衣服，年轻的女人摸着下巴朝镜头张望，男人一边抽

烟一边盯着面前的黑狗，还有一位中年女人掩面而笑。中国以往的纪实摄影中总是用近景和特写来表现人物事件，但侯登科却喜爱中大景构图，记录下群像中不同人物的“决定性瞬间”。这种方式虽然不是侯登科的首创，但也只有技法纯熟的摄影师才能对现场有准确快速的把控。

让付羽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侯登科独特的摄影语言。“一幅照片中，叙事中心和视觉中心并不是重合的。这在以往对侯登科作品的观看中并未发现，也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付羽曾经给路泞打过一通很长的电话，讨论一张照片应该怎样处理。那是一群头戴草帽的“麦客”，正在爬上一辆货车。“我觉得是一个个晒得明晃晃的草帽吸引了侯登科，而不仅仅是爬车的景象本身。于是纠结着到底要不要突出那些亮点。”后来付羽逐渐发现有四五十张照片都具有这样有趣的视觉中心：“麦客”们神态各异坐在货车顶上通过隧道，却同时有隧道尽头的亮光在分散着人的

1. 灞桥铁路大桥被洪水冲毁的照片是侯登科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2002年)

2. 侯登科

3. 三位正在忙于婚宴准备的妇女(1990年摄于陕西凤翔农村)

4. 《出征》是一组亲人送47军官兵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照片，因有军人妻子流泪的场景引起争议(1985年)

5. 阳光透过叶子形成了视觉中心(1999年摄于陕北农村)

注意力；孩子们雀跃着在帮母亲把玉米地里的收获装袋运走，阳光透着玉米种子闪烁着光芒让人同样着迷。

仿佛在暗房中付羽能和侯登科直接对话。“我知道是什么打动了。”一个“麦客”坐在那里凝视着镜头，“是他的神情动人吗？不完全是。他后面的墙沿儿正好穿过他的草帽形成了线条间的组合。我好像看到了纷乱嘈杂的车站里，周围的人都在上蹿下跳，但是侯登科发现了他，在照片里构筑了一个宁静的空间”。

精神历程

除了照片，在53年短暂的生命中，侯登科还留下了大量文字。侯登科并未将摄影当成唯一的表达手段，他也很早就意识到摄影的局限性。李媚主编的《侯登科的世界》中文献资料从他的文论、日记、书信和散文随笔中选择，共收入45万字。“日记一共有26本，仅收入五分之一不到，估计他所有日记至少有200万字。”侯登科有用文字来思考的习惯，90年代后随着电话的普及他还和朋友于德水抱怨过，电话中无法对一个问题深入展开讨论。他给朋友写信，最早是誊写一遍留存起来或者要求朋友阅读后寄回，后来有了复印机都要复印存稿。陕西摄影群体成员、好友潘科评价他“入史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文字配合着图片既是后人解读他精神世界的钥匙，同时也要注意他“在塑造自己形象时修正自我的努力”。

于是，一个完整的侯登科摄影探索过程在展览中呈现出来。侯登科最早是西安铁路局宝鸡工程处的一名工人，负责维护铁路旁的护坡。凭借绘画的特长，他很快就调到了宣传科工作，虽然最早是做一名电影放映员。1979年侯登科开始接触摄影，用一台海鸥4型相机。他早期拍自然风光，崇尚唯美，在户外拍摄时会拨弄树叶来做前景，也会用树枝搅动水面以泛起涟漪。与此同时，他凭着直觉尝试拍下一些光影和线条构成的具有视觉趣味的东西。“这是他初现天赋的地方，那是连美术学院都没有系统去教图像构成和色彩构成的年代。而这些习作小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倒和西方摄影中一些纯粹表现物象的作品相似，有一种‘当代感’。”李媚这样说。

侯登科没有走唯美摄影的道路，很快投入到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对于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方面，他日常工作的拍摄对象就在铁路工地，“现实中的产业工人与以前在宣传画中看到的印象有很大差

距”，仍然是陕西话中说的“下苦人”，这唤起了他成长过程中的情感；另一方面，经过80年代文化启蒙的人人都有一种对社会的担当。文学界、艺术节都陆续有作品批判极“左”，摄影界依然在延续“文革”后期概念化、口号式的作风，这让侯登科感到不满。他第一幅受到关注的作品是1982年发表在《中国摄影》上的《子弟》。画面的主体是两个儿童，而背景的人民子弟兵被取景框截掉了头和肩。这种不同于政治宣传画的拍法立刻引发争议。1985年，侯登科和潘科一起拍了一组亲人送47军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的照片，起名《出征》。因为表现了军人妻子流泪的照片，批判者说：“哭哭啼啼动摇军心，怎能打胜仗。”摄影界围绕着作品是否应该展现人性而持续了一年的讨论。

彼时在陕西具有相同想法的还有胡武功、潘科、石宝琇、焦景泉、李胜利、邱晓明等人，因为大家主张摄影应当关注和批判现实，这个崛起的陕西摄影群体，也被当时的摄影圈戏称为一支“摄影救国军”。“侯登科相当于是先锋的角色。”石宝琇说。1986年，群体推举侯登科执笔长文《现状与思考》，并署名“秦言”。这是一份群体宣言式的檄文。陕西摄影群发展的巅峰是举办名为《艰巨历程》的摄影公开赛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艰巨历程》的名字来自胡耀邦的讲话，“中国人民走过了艰难的奋斗历程”，侯登科觉得“艰难”显得低沉，容易授人以柄，遂改成“艰巨”。这也何尝不是摄影人走过的崎岖写照？影展推出的最重要的作品莫过于时盘棋的《起步》（1949～1959）、李振盛的《动乱》（1966～1976）和李晓斌的《转机》（1976～1986）三组，它们都成为记录国家历史的珍贵影像。而针对摄影一向被用作政治宣传的工具，陕西摄影群体还公开揭穿了一批假照片：比如1958年的照片中彭真还在，“文革”中被打倒后，彭真却从同样的照片中消失了；还有老山前线发回的新闻照片中，摄影师导演女民兵给化妆成伤员的战士喂奶，歌颂军民鱼水情。

80年代末期，侯登科沉浸在对摄影“真实性”的讨论中。他热爱读书，像当时许多青年一样，生吞活剥下不少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以此作为武器来写理论文章。潘科记得他发起言来满口都是哲学概念，有人质疑他，他就会说：“你应该去看看黑格尔的《大逻辑》《小逻辑》，比我说得晦涩得多呢！”学院派出身的杨小彦和“野路子”自学成才的侯登科有过数次争论，他那时正在写文章批判中国式的黑格尔主义，以及泛滥使用的黑格尔著作翻译腔调。“‘真实性’在理论上



(张松林摄)

上图：“乡村”系列之一（1998年摄于宁夏西海固）

下图：“四方城”系列之一，多角构图的典型



(张松林摄)

并无意义，只是对当时摄影圈有现实意义，侯登科需要向陈腐的摄影教条宣战。”杨小彦说。

90年代后，陕西摄影群体成员便各奔东西：潘科“下海”，邱晓明远赴美利坚，石宝琇去了香港为《中国旅游》杂志拍摄人文地理报道。侯登科依然坚持纪实摄影，只不过按他的话来说，1989年之前摄影是目的，之后就成为手段。既然是手段，他拍摄的题材就相对系统，比如已经成为他代表作的“麦客”“四方城”，他去世前未能完成的“民工”和“农村女性”系列。潘科曾经为了写《底片：探寻熟悉的陌生人》一书，几年前就看遍了侯登科留下的4.2万张底片。他给予高评价的除了侯登科经年累月拍摄的题材，还有一些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中晚期“散片”，像是《行走的女孩》（1997，陕北），《小卖部女孩》（1993，宝鸡），《西海固的男子和孩子》（1998，西海固）这类，如同早期零星出现的《三位农妇》那样的照片，这些中晚期的作品含义丰富，难以用一种方式解读。这些片子或许可以理解为侯登科对于“真实性”的跳脱。因为“摄影是对现象的记录，现象本质上是由一些或然状态的东西组成，是靠不住的”。侯登科就选择了那些“没有事件、没有意义指向、没有哲理的或然状态的东西”。他比喻那些刹那就像“撒了一把的黄土，落在那儿，自自然然地飘落”。潘科认为这样的视觉呈现才“超越了情节的尾随，消除了功利层面的干扰，从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发出一瞬间的光，投向了被摄者的灵魂”。

撤下标签

侯登科的“麦客”系列太出名了，在生前身后，他都被冠以“农民摄影家”的称号。“麦客”里有这样一张图，经常用作对“麦客”的介绍中：一位戴着草帽的农民嘴里叼着烟，手里割着麦子，同时也在凝视镜头。他的面孔长得极像侯登科。这也让人产生错觉，仿佛他不仅拍摄农民，自己也是农民中的一员。付羽在暗房里天天面对侯登科的照片，也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些照片中的农村中年男性，仿佛个个都有侯登科的影子。

“我就是个农民。”侯登科这样说过。现实可要比他的宣称复杂得多。他出生在陕西凤翔县的城关区，那是一个城乡接合部的地方，侯登科因此在孩提时代每到麦熟时节，就能看到一拨拨犹如候鸟一般出现的“麦客”。侯登科家里祖上经商，到他父亲这一代经过各种政治运动的洗礼便已经没落。父亲离家，母亲几

度改嫁。他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中，极少的有着童年去讨饭经历的人。他极力想摆脱饥饿留在心中的烙印，少年时代的最大愿望就是进城当一名工人。而等到他真正成为体力工人，他才发现境遇比农民好不了多少，更何况许多工人就是由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变而成的。

于是侯登科就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女儿侯小谨打趣他一直想进城，可是搬了几次家，依然住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李胜利回忆他到农村去拍摄会穿戴格外整齐，用“请您留步”这样文质彬彬的用语；进到城市里却是经常一身褪色黄军装，不修边幅，有件羽绒服被他贴满了黄胶布，让人以为上面破了许多洞。虽然侯登科从没有务过农，大部分时间都是办公室里的一位文职人员，但童年的悲苦经历还是让他离乡土经验并不遥远。李胜利利用“如鱼得水”形容侯登科与“麦客”的交往。“他和‘麦客’打招呼，顺手就抓起人家碗里的馍，与他们同吃同睡，很快人家就不介意他的存在。”与之相对，侯登科曾经和李胜利抱怨过城里人的警惕和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他在拍摄“四方城”的时候，有时需要出示介绍信对方才让他拍摄。而一个讽刺的结果是，“四方城”作为侯登科摄影生涯中唯一一部城市题材的作品，却被评论者嘲笑是为了赶“城市影像”的时髦，然而他将西安老城拍得像个农村一样，他也把镜头对准了一些进城不久的农村人。

正是因为侯登科对农民的认同，他总是对农民投以温情的目光。摄影评论家李楠说，他没有超越自己的情感与经验，留下对农民的批判性作品。侯登科自己写道：“照相机不是镰刀，麦客也不是麦秆，我下不了狠心死手。”最终，他选择了一种为这个先人视而不见的“下苦人”群体来“立此存照”的方式。

不过，侯登科对于拍摄“麦客”的伦理问题早有反思。他尽量以平视的目光打量他们，可是拥有相机依然意味着拥有权利。《麦客》的出版为侯登科带来了荣誉，可是他并不能为“麦客”做些什么，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演进，这个群体终于逐渐消失了。

无论是“农民摄影家”的头衔，或是“现实主义”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归类，潘科认为都对侯登科以及陕西摄影群体的理解狭隘了——那不过是他们在当时语境下表达主张的有限选择。说到根本，他们的拍摄是基于自身体验。“童年经历，让他渴望善良宽厚，也洞悉狡黠邪恶、自私愚昧。因此他在体验善恶两端时格外敏感。在农村的现实中他正是看到了这些。”



穿山甲最大的天敌是

人类

才能保护穿山甲

因为肉和鳞片的消费，
每年约有10万只穿山甲惨遭杀害，
中华穿山甲已极度濒危。
请拒绝消费穿山甲制品。



The Nature
Conservancy 
大自然保护协会

野生救援
WILDAID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
when the buying stops, the killing can too

杨颖 Angelaba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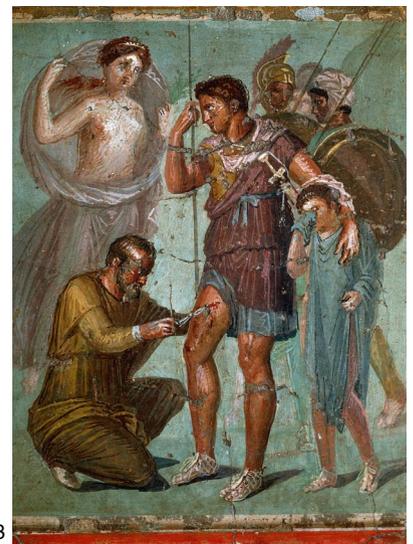
庞贝的密室

文 / 唐克扬

1. 庞贝古城 House of the Ceii 花园后墙上的壁画十分精美

2. 庞贝古城“密室”内的壁画人物

3. 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收藏的庞贝古城壁画。描绘了希腊医师伊皮西用镊子为埃涅阿斯拔出箭头，阿斯卡尼俄哭泣着依偎在父亲埃涅阿斯身旁



在庞贝看到的千百“小格子”其实是种错觉：古代的城市断没有那么“开放”。火山灰吞没了整个城市，全因为头顶的“封土”过于沉重，当废墟被重新发掘出来的时候，大多数屋顶和墙垣上端都崩塌了，门窗消失无踪。你现在面对的是被横竖“解剖”了的城市，就像台湾的李乾朗先生所画的建筑画，“穿墙透壁”。建筑的皮肤剥落的时候，筋肉也慢慢乱了次序，对于直接裸露而差别甚微的砖石—混凝土砌体，“内”和“外”的区分没了意义；假如不是经过考古学家刻意的恢复，就连建筑和建筑间的分界线也不再容易辨认——黑黝黝，暗红色，茫茫的断墙败壁，哪儿是开始，哪儿又是结束？

不管怎么说，能够看到这么完整的地面上的古代遗存已殊为不易了，庞贝是少数几个保存得如此完好的罗马遗址，要知道这毕竟是相当于我们东汉的时代——想想，就在庞贝毁灭的这年，也就是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前后，中国也曾发生多少大事。比如，这一年，洛阳白虎观召开了各地儒生参加的“白虎观会议”，它所确立的“三纲六纪”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可是见证它的所有物证早已湮没无闻了，更不用说像庞贝这样活生生伫立在面前的城市建筑——如此再打量两种历史，立刻有了不一样的含义：一种依稀“想见”，另一种却是明白地“看见”。

庞贝之所以可以看见，全是因为那一层厚厚的火山灰，不经意间“慢下来”的火山灰内部的时间，让城市依然保存着古代的格局。从16世纪开始，这些“时间胶囊”（time capsule）一点点暴露出来，顶多就是揭去了点“面子”，被遽然打通的却是相当于我们从明末到东汉初年的时光隧道，这个意义上的“看到”相当于一种历史穿越。虽然不免依然是座“遗址”，但一个人站在庞贝面前，就像是打开一座千年古墓，立刻感受到强烈的“古代”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去庞贝的那天有大雨，遗址上本没有太多的人，这空荡荡的迷宫愈发迷离。夜色降临的时候，未忍立即弃去，可又茫无头绪。转过街角，一盏灯忽然亮了，被微弱的灯光照亮的地方，仿佛显得有些不同，仿佛大都会的塑形灯光，把某些明星地标和它周遭的环境相区别。倏忽间，一抹亮色从灯影下闪过，那些看似雷同的废墟结构，忽然有了什么扎眼的东西。

从残垣断壁间穿过，也不知哪是路，直到近了，看清视线里吸引我的，原来是墙上小块残留的马赛克镶嵌画，它精致的肌理和邻近空间的关系，明白无

误地区分了“里”“外”，表明了我所站立地方的属性，不知何时，我竟走进了“展品”，忽略了展牌——“请勿靠近！”于是恍然大悟，原来有“情况”的，是曾经和人亲近的室内生活的气息。

两千年前罗马人的“里”“外”今天体会起来确不寻常。不错，有壁画的这面墙是“里面”，但是，与此同时它又是关于“外面”的——对那个时代的人而言，这种错置好像是一个人工渲染出来的室内“花园”，它放着外面真正的世界弃之不顾，却俘获了自然，把它囚禁在这本来应该敞亮的庭院中，然后幽暗地独自一笑。

最能说明这吊诡情形的不是露天的庞贝丘墟，而是罗马的国家博物馆（Palazzo Massimo）里重建的观画情境。这些壁画发现于另一个遗址：利维亚别墅（Villa Livia），它在闹市中的暗室里复原起来时，实际不是原封不动地仿制别墅的建筑，而是诉诸两种人工经验的相似——在画廊里看画一如庞贝暗室里的“卧游”，它验证了我们上述的那种“内”和“外”可能的混淆，是不同“看见”的歧路，带来了暧昧而不确定的“造境”。乍一看，你是在室内的，密不透风的暗室让人有些气闷，但是看久了，你就会慢慢坠入更大的幻觉中，好像回到了普林尼和奥古斯都的时代而不是一幢建筑的室内。这幻觉中并没有“窗”，也没有当代画廊里习见的“画框”，四面墙壁里的“花园”反而是芳草萋萋，桂树婆婆的，密室独有的清凉气息迎面袭来，似乎比真实的那个室外还要让人惬意。

别墅近旁未必没有迷人的风景，但是墙上的画面而非真实的风景才构成了他们“外”求的世界。在炎热的夏季，环绕着在此用餐者的却是壁画上永恒的春天——鸢尾花和甘菊芬芳的时节，松鸡、鸽子和金翅雀在棕榈树、松树和橡树间飞耍……与此同时，石榴和榲桲又结果了，现实中不可能的时序，提示着这种想象世界和真实的差别。

室内不仅比室外更发达，它的起源也更古老。

此前最著名的概括室内经验的概念，应是柏拉图的“洞穴”了。借助他和苏格拉底的虚拟对话，柏拉图的隐喻构造了人类困境的知觉模型。“洞穴”中墙壁的囚徒所能看到的是火堆或外光投射在墙壁上的龙蛇鱼虫，在没有其他参照物的前提下，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给这些变幻的光影赋予了形式和意义，认为它们都是“现实”得以呈现的方式（乃至有时把它们等同于现实）。在这群囚徒中，只有哲学家是那个有幸逃出洞穴的人，他会发现洞里的一切——所有“看见”

的东西——都是幻觉，墙上的图像没准来自被扭曲现实的折光，但更可能只是全然错觉。柏拉图因此认为感知是不可靠的，真正的知识存在于洞穴之外，哲学家的任务，是以他在洞穴外的所见去启蒙困守的洞中人。

《理想国》的室内室外差别富于启蒙的寓意：它是“我们天性的教育和它对教育的期求”的一幅图解。可是室内和室外的关系又远非“低级—高级世界”那么简单，在俗世生活已经如此发达的罗马帝国，他们希腊远亲理念里的二元论已经需要进一步澄清了。谁说每个“室内”一定就联系着另一个缺失了的室外？只要有了某种恒定的人造“光源”，这样的启蒙未必不能是自内而外的，也就是说，室内也可以没有室外——至少，现代社会里充满着错觉的各种“看见”的空间就是如此，在电影上演的90分钟内，闪烁着栩栩如生的梦境的电影院也是如此：我们到底在室内还是在室外？

庞贝暗室里某些画面的意义本身就是“光源”——它自己照亮了自己，这种不便向人言的启蒙来自寻常人更基本的需要，未见得有多么冠冕堂皇，但它的心理情境是真实的。共和国晚期的罗马已经有了初露症候的“城市病”，感受得到汗臭味的“稠度”应和着足以赶走“隐士”的喧嚣，就像住在一间公共浴场旁的哲学家塞内加所说的那样：“……请想象一下那里让我们憎恨自己长了耳朵的各色人声！”贺拉斯在他的诗歌中沿用了“城市老鼠”渴望作“乡村老鼠”的比喻，来说明时人对于这种方兴未艾的都市生活的态度：常见的居于公寓（insula）缭乱租屋的底层感受并不美妙，亟需一种魔法予以平衡——如今，这种盒子状的人类生活的渊藪我们并不陌生，它启发或者便利了一种囚徒式的自我省察，利维亚别业的密室貌似境遇，但心理起源类似——罗马还没有来得及征服全世界，它同时也正面临着征服自己的挑战。不像希腊人毫无顾忌地裸露自己的身体，罗马的壁画转向幽晦处讲述身体的隐秘，就是今天还常常出现在公共厕所

在那时，文明尚置身于“天然”渐变到“人工”的一片朦胧之中，奢华绮丽的室内出于母腹子宫的意象，它并非一切功业的终结而是愿念繁茂之地，是一片有无之间的“混沌”。

里的那些东西。今天，在庞贝废墟里的发现中，它们是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

事实上罗马最非凡的绘画艺术之一就存在于类似的房间中，有时即使不懂画的人也能一眼看出它们的特别来，比如，拥有一间四面都是些真人大小的壁画人物的庞贝“密墅”（Villa of Mysteries），还有位于博斯科特雷卡塞（Boscotrecase）的黑房间（Black Room），漆黑的背景之中仅有玩具屋式的人物和建筑。杰作和“低俗”绘画仅有一墙之隔。艺术史家们必须承认，他们并不是百分之百确认这些图像的真实含义，它们与“悲剧”、“喜剧”的正统定义都不太谋合——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驱使，才在罗马人住居的最深处留下了这些诡谲的画面？艺术史上的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绘画这扇窗最早并没有让我们看到远方的风景，庞贝壁画里的海港和群山也只有朦胧的远景，并没有费力凿穿柏拉图的山洞，罗马人似乎是从“自己”才发现了世界——对他们而言那些绘画更像是“镜子”而不是“窗户”。不管我们叫它“色情”，还是“情色”，这些隐秘而个人化的图像，应该换一种视角才讲得通。在那时，文明尚置身于“天然”渐变到“人工”的一片朦胧之中，奢华绮丽的室内出于母腹子宫的意象，它并非一切功业的终结而是愿念繁茂之地，是一片有无之间的“混沌”。

室内意味着更多撩人的细节，未必有表征着堂堂“中心思想”的“正面”，和“少就是多”的现代建筑格言也正好相反；但同时，它也证实着一种更能让当代人心会的“具体”人性的存在，而书面的历史往往缺乏这种具体。罗马建筑史的教科书上，我们几乎就没有找到太多个人创造者的名字，但我们现在依然可以叫得出好些庞贝画像主人的姓名，甚至还有那只著名的用马赛克拼出来以吓退冒犯者的狗，有告示专门与它配合：“小心！”——也许还是应该多谢火山灰，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确认：“他们曾经在那里，他们和我们一样。”否则世界上就只有大写却渺茫的历史了，就像我们在那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在汉帝国的麒麟阁、云台……上也许存在过的音容，可以“想见”却无法听闻。

有意思的还不仅是“看见”，而是重新“看见”的过程：庞贝人的心思已很难猜透，现代人对他们心思的猜度却又隔着好几层时间的火山灰。庞贝的室内终究是隐秘的，是不容易一览全貌的“里面”，但人们后来重睹庞贝，反倒是因为残墙上惊现的壁画，或许吸引了牧羊人的目光。在反宗教改革的时代，指



意大利庞贝古城遗址

导系统发掘庞贝的碰巧是建筑师丰塔纳（Domenico Fontana），他看到壁画的神情“内容”后备感踌躇，直到19世纪时，各色赞助人还企图将“不正确”的私密画面巧妙地覆盖或是封存起来，甄别完毕后，只留下那些盛大的公共建筑供人缅怀——于是“里面”决定了“外面”。

然后……如同我们都知道的那样，一切终无禁忌，“里面”又大放异彩了，甚至变成了“外面”。当罗马人的室内花园被移到现代的展厅里时，它又恢复成了一道外在于观者的墙壁，怀着虔诚的心情瞻仰（或者是偷窥）一律大写的罗马“艺术”，博物馆参观者现在真的说不清，到底是在古代世界的“外面”还是“里面”？人们现在至少明白了，理解庞贝的室内原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从这里出发去怀想整个人性，这样的世界首先是感性的、局部的体认，涓涓细滴才汇成了大海；还有一种，则是将它明白无误地看成室外的“反面”，是宏大秩序缝隙间的注解，就算意义不够清楚，也要清清楚楚地不清楚——室内和室外从此正式走上了不同的思考路径。随着对“正确”的不同理解，

这种两分法往往又决定了我们的“立场”——也就是我们参观时选择站立的地方。

变化的可能来自废墟。如上，半截的建筑往往难辨里外，“意义”只有闪现在断壁残垣之间。犹如18世纪的浪漫主义者所爱好的那样，废墟赋予了对原初态重新解释的可能，它打破了新古典主义对于“主从”、“轴线”这些宏大概念的耽溺，这种迷宫般的结构现在可以重新组合，互为表里，无穷无尽地衍生出新的秩序——或者混乱了。某种意义上，这反而更接近古代城市的实况。美国建筑师路易·康看到类似废墟的时候，居然喜不自禁，在他看来，有没有明确的“划分”——不管是功能还是形象——并不重要，他要的就是这种无始无终的、不羁的空间。

更绝的是，一度死寂的城市又感受到了欢快的气息，尤其春天的时候，芳草和野花直接长进了原来的室内，整个遗址都变成了一座真正的花园，园庭之中。这重新生长的一切和原有的意义不尽相符，但却有更多的片段的“意义”——它们重叠、映照，引诱着你去反复地猜想。☑

自动驾驶是否引领汽车未来

主笔 / 李三



沃尔沃汽车集团总裁汉肯·塞缪尔森

在沃尔沃汽车集团总裁汉肯·塞缪尔森看来，自动驾驶是多年来所遇见的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它将为人类的汽车驾驶行为以及整个汽车工业领域带来一场革命。

本人即是自动驾驶技术推动者的汉肯·塞缪尔森，去年在华盛顿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大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底气。“当汽车处于无人驾驶模式时，发生交通事故，沃尔沃将承担全部责任。”他表示，自动驾驶汽车除了助力沃尔沃实现2020年零伤亡的安全愿景外，还将大大减缓交通阻塞。

在5月初北京举办的国际车展期间，汉肯·塞缪尔森宣布，沃尔沃汽车将在中国设立面向汽车行业和普通公众的自动驾驶测试基地。

三联生活周刊：沃尔沃是中国本土企业里最早提出自动化驾驶概念的厂商，有这样的考量是基于哪些现实需要？

汉肯·塞缪尔森：在自动驾驶这方面，首先是基于沃尔沃非常注重安全性的企业传统，不管做什么样的汽车，最终都要回到安全的本质上来。沃尔沃积累了30多年的真实交通事故大数据表明：90%的交通事故是因为人的疏忽所造成的。由此，我们设想以更智能的机器驾驶代替人，自动驾驶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发生碰撞，所以自动驾驶对沃尔沃公司来说是非常自然的延伸考虑。再就是我们看到在全世界许多大城市，人们越来越多的时间要浪费在通行过程中，如果能够用于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而不是单纯地坐在驾驶座上等待堵车的时间，这对人和社会来说都大有好处。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想法将来是否能够真正实施？

汉肯·塞缪尔森：我们也一直在做测试，而这一点仅靠沃尔沃汽车公司是做不到的，我们要和客户共

同进行测试，要请国家的主管部门进行配合，因此在不久前我们发出邀请并宣布——我们正在和中国的有关部门、有关方面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在开展这样的测试，并确定在哪里可以进行测试。而目前我想比较现实的一点，就是先在瑞典测试一年之后，再将测试导入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在未来汽车的智能模式上，你有什么考虑？

汉肯·塞缪尔森：实际上正是互联网为自动驾驶提供大量的支持，因为自动驾驶需要大量信息支持，比如最新的地图、最新的交通状况、天气情况等，所有这些信息都要通过车辆的互联互通来提供。另一方面，互联互通也使车内的人能够获得各种各样的体验，不受传统条件限制。从这个角度讲，沃尔沃汽车并不想限制有关方面的技术或系统，所以我们并没有开发一个完全自己专属的系统，而是保留了开放的平台，对所有不同的服务和应用都保持开放态度。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会有哪些服务和应用会被开发出来，但对于采用自动驾驶功能的人来说就会拥有自由的时间，并且可以和成百上千万的人联系起来，我想这是最好的，而我们将会成为一个最好的集成平台。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互联网企业和传统汽车企业，在自动驾驶方面各自有哪些优势？

汉肯·塞缪尔森：简单地讲，互联网企业更擅长信息的获取、感知和决策，这是他们的强项。但对车本身，包括车载人机工程系统，他们不太熟悉。所以，我们各有所长，完整的智能汽车，应该是整个结合起来，必须结合起来。

互联网企业认为他所开发的是装着轮子的终端，用软件和处理终端的办法看待这个问题。汽车企业，则是利用信息技术改进汽车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所以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不是非黑即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辆互联网公司出产、真正可以说得过去并且在路上开得很好的车。

三联生活周刊：互联网和传统车企如何实现融合？

汉肯·塞缪尔森：互联网公司有自己的文化，在人工智方面他们有优势。我们在人机工程、技术集成等方面有更加强大的技术，相比之下，我们更懂汽车本身。所以，我认为应该加强合作，互联网最终目的不是以后要成立一家汽车公司，大规模量产汽车，这个不是他们的目的。有了自动驾驶以后，人可以空出时间，享受互联网服务，这个是他们最终的服务。所以，生产系统的形成需要各个行业之间去进行更多的合作，没有一家说有100%的优势，谁也不会说以后汽车就是谷歌的天下。两个行业怎样合作恰恰是最重要的。简单说，就是汽车+互联网，那个是互联网+汽车，是从两个方向往一个目标走。

三联生活周刊：从整体来看，自动驾驶技术目前处于哪个阶段？

汉肯·塞缪尔森：如果把它的智商和人类相比，我们仍然还处于婴儿阶段，整个自动驾驶的行业还处于婴儿阶段。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携手合作，尽早能够站起来大步往前走。目前汽车驾驶中仅仅是做到了接近于计算智能，不是人工智能。这在智能领域里是分级别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有没有自学习的功能，即便一个3岁的小孩，也是会学习的。但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汽车还不具备这个功能，所以，还是一个计算智能。

三联生活周刊：沃尔沃如何通过自动驾驶技术进一步提升产品的安全可靠？

汉肯·塞缪尔森：沃尔沃是一家以安全为主要诉求的企业，在这方面，我们更懂安全，更有公信力。1959年，沃尔沃发明了三点式安全带，并放弃专利权，以便其他汽车制造商能够免费使用和推广这项安全发明。据估计，沃尔沃发明三点式安全带以来已经挽救了超过100万人的生命。从那时起，沃尔沃发明和创造了全球几乎所有领先的汽车安全技术，包括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技术。

沃尔沃汽车集团有一个愿景，就是到2020年，没有人会因为驾驶或乘坐新的沃尔沃汽车出现伤亡事故。鉴于90%左右的交通事故都是由于驾驶员和人为因素造成的这样一个事实，我认为，自动驾驶技术将使汽车变得更加安全，从而助力沃尔沃实现2020零伤亡愿景。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现阶段自动驾驶亟待构建的法律框架包括哪些？

汉肯·塞缪尔森：首先，跟测试相关的法律框架肯定是最重要的。然后，才是上路。但不管这两者哪一个，相关的法律框架都很重要。目前，欧洲、美国、日本和瑞典都在进行自动驾驶技术相关的立法，从而使得自动驾驶汽车能合法合规地进行测试和运行。

尽管全球各国自动驾驶方面的法律框架一夜之间完善绝无可能，但我们希望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尽量规避出现有冲突的立法。比如与安全相关的法律，甚至就有5到50种不同的框架，汽车制造商应对起来相当复杂。

三联生活周刊：对比竞争对手，你认为沃尔沃在自动驾驶领域处于什么位置？

汉肯·塞缪尔森：不能说我们是最早的，但沃尔沃的技术是最成熟的。我们有信心，在现有基础之上，通过各方合作，让自动驾驶技术日趋成熟。沃尔沃也明确承诺，只要是我们的量产投入市场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旦出现与自动驾驶相关的事故，我们负全责。

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我们有自己的传承，相比IT公司，我们在技术创新方面一点也不输给他们。在自动驾驶技术应用的过程中，我们会把客户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不希望顾客在驾车过程中有任何麻烦，这是我们做事情的一个指导原则。

三联生活周刊：沃尔沃如何通过丰富产品线，来实现更高的目标？

汉肯·塞缪尔森：新推出的S90车型准备于大庆投产，车型内饰专门在中国研发和制造，加上双引擎发动机、自动驾驶技术等，应该说是中国市场上生产的最为豪华尊贵的车型。

丰富产品线是必然的，尽管我们迄今还没有揭示未来将会生产什么样的新车型，但显而易见，我们肯定需要一辆SUV。在丰富产品线方面我们有发展计划，那就是希望能够提供更多的高档车和更多的被广泛接受的车型。■

中药的洋崇拜

由神农尝百草开始，中药凝结着中华先人几千年的智慧和实践精髓，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药却出现了信任危机。优秀企业生产的良心药在市场上遭受挤压，甚至形成了劣药驱逐良药的不良局面。

尴尬

春节期间，日本的汉方药货架被一扫而空，韩国的韩药紧俏，走出国门的国人强劲的购买力逐渐从奢侈品、电子产品、日用品领域扩展到了医药、保健药，并且这种消费显现出越演越烈的趋势。

这一现象引起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秀林的关注，全国“两会”期间，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的国人到日本、韩国去，买洋中药，实际上，他们的产品就是将我们的药材进口之后，通过加工，再卖给中国人，这并不是我们中国生产不出这些中药，核心是我们的品牌和影响力还是不够的。”

所谓中药，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传承积累的精华，它深植于中华大地的土壤和文化，与传统中医理论相生相合，而日本的“汉方药”、韩国的“韩药”，这些所谓的“洋中药”，仅仅是中药流传过去之后的一个名称的变化而已。

统计显示，中草药国际贸易额占比中，中国大陆只占到4.5%左右，而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份额占到90%以上，日本更是有一支独大的傲人成绩。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饮片企业是日本的，但让中药界人士感到尴尬的是，日本中药原材料的90%是来源于中国大陆。这些数字看起来确实触目惊心，日本企业为什么占据了市场成就了世界最大的中药原料药饮片企业并且返销到我们国内？难道这仅仅是国人的崇洋心理在作怪吗？

中国中药材协会信息中心副主任贾海滨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没有做好，并不简单是洋崇拜的问题。”他认为，这种现象实际揭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日本企业按照传统中药标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质量把控体系，然后在中国大陆各个药材主产区广泛地设分厂，进行主产区收购。各个环节秉承了日本人做事认真、严谨的风格，所以做出的饮片符合了中医传统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要求。但我们国内反倒以西药体系作为质量把控标准，一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够个及格线就可以了，但即便是这样，中国大陆中药饮片大概六成以上达不到标准。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内饮片质量相比而言就远远低于国际竞争对手。

“对于老百姓来说，他看重的是药的疗效，并不关注你指标的合格与否，一来二去，老百姓在意识当中便形成了对于国产中药的质疑。”贾海滨说。

中药是良心药

现实情况下，在很多人的认识中，“中医是慢郎中”，即便是信任中医的患者也普遍觉得中医重在调理而不会有立竿见影的疗效，“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古训成了这种理念最可信的注脚，广泛记载于古代各种典籍中的药到病除也成了古人臆想的“故事”，几千年来解决中国人病痛之苦的中华医药竟会如此不堪吗？中医专家们也是苦笑不已，他们普遍的说法是——“医准方对药不灵”，甚至有专家痛心疾首地说“中医将亡于中药”。

“中药是良心药！”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少毅一再强调这样的概念，“先进的设备用钱都能够买到，现代工艺跟世界先进水平也并没有什么差距，核心问题就出在道地药材的选取和对规范炮制的手段的严格把控。”

中药流传几千年下来，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判别标准，气候环境、水源、土壤、空气等生长环境决定了中药材成分的变化，所以，中药材历来讲究原产地，是为“道地”。在医学典籍中都有明确的记载，这些都是先人们在千年实践中实证出的精髓。大量验证表明，一旦改变了环境，药效往往差别很大。按照历史经验，中药如果需要异地种植，必须经过三代，考察是不是有疗效。用第一代的种子种第二代，第二代的种子再种第三代，直到三代药材的疗效和原产地药材一致，才允许移植。而现在，现代种植技术的进入让这样的移植变得随心所欲了。

一些企业对于传统规范的选择性舍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行业“诚信”的动摇，其实，中国的企业并不乏传统和诚信的坚守者，遗憾的是，它们的坚持往往并不被国人所了解。

吉林敖东药业坚守着做“良心药”的价值观，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投料标准进行生产。

敖东药业出品的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具有30多年的生产历史，产品旺盛的生命力和良好的市场认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对道地药材的坚持。鹿茸是安神补脑液最重要的君药成分，梅花鹿、马鹿是我国主要的茸用鹿。梅花鹿主产于吉林、辽宁；马鹿主产于黑龙江、吉林、青海、新疆、四川等省区。吉林敖东梅花鹿养殖场，纯种梅花鹿存栏6000头，是亚洲最大的梅花鹿养殖基地，也是国家药学会东北鹿茸养殖示范基地。鹿茸切片最顶级的是“腊片”，市场零售价1公斤达到10万元，长白山下最道地的梅花鹿茸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但敖东并不为市场利益所惑，吉林敖东自创业之初，便秉承着中国中药“济世救人”的传统，提出了“制药酿德”

的企业价值观，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善待生命，关注健康”为制药原则，以“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为企业理念，他们把整只鹿茸全部拿来做成安神补脑液。

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中医药现代化的政策引导下，我们药检控制检测方法越来越西化，强调的就是中药的核心指标，比如人参就是强调人参皂苷，只要有了就达标可以流通了，但是，一项指标或两项指标合格就意味着这个东西合格吗？贾海滨认为，以西药体系化学成分为指标建立的质量标准，对于中药生产来说门槛过低。随着个别企业造假问题的出现，国家进一步出台了中药的投料标准，但现代科技的化学分析方法还是无法对道地药材给予应有的严格区分。

比如，何首乌的道地药材生长周期五六年的每公斤要40元，而家种的一两年的每公斤只需要15元，只是简单地以安神含量单项指标作为判别标准的话，企业投料只要接近标准线就可以了，就没有了选择道地药材的动力。更何况，生首乌中含有一种蒽醌衍生物，能滑肠致泻，必须经过炮制，让蒽醌衍生物水解成无泻下作用，降低毒性。按照传统需要九蒸九制才能入药，如此简单的指标标准，一般的企业就不愿意费那么大气。

追溯体系的闭环

人参生长6年才有药效，按传统经验，6年生的人参，它的芦头长度和须根上的珍珠粒（根须上的疣状突起）就可以作为判别标准。杜仲等皮类药材，过去选择的标准是皮必须有0.3厘米厚，树龄一般10~15年，折断后杜仲丝拉都拉不动，那才有药效。但现实的情况是，大量的药效不足的“萝卜参”进入市场，当年种的杜仲都拿来用，都是薄皮和枝皮的，也根本没有丝，疗效当然可想而知。

贾海滨说这种乱象就是市场劣药驱逐良药的恶性循环，他认为中医药现代化的步伐是一定要迈的，但步子不能太大，一定要适应现实的发展阶段。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实际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复杂，最重要的是要将原料药流通的追溯体系建立起来。

“追溯体系一定要能防止造假。”贾海滨强调说，“旧社会的商帮对于造假的处置是非常严厉的，谁有问题就会被踢出这个圈子，到计划经济时代，统购统销，药材流通同样是闭环可追溯的。眼下，我们必须在现有体系上完善追溯体系实现闭环流通，只有这样，我们中药的前景才会更加广阔。”

敖东 OTC

健忘 睡不 容颜差 操心多 睡不好 压力大

敖东 OTC

安神补脑液 ANSHENBUNAOYE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2022453

吉林敖东 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JILIN AODONG YANBIAN PHARMACEUTICAL CO., LTD.

【功能主治】 生精补髓、益气养血、强脑安神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2022453 吉药广审（文）第2006120221号
【不良反应】 【禁忌症】：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60年1月29日，希区柯克在电影《精神病患者》(又译《惊魂记》)拍摄现场

黑暗入侵：走进阴影里的希区柯克

文 / 张衍

50年前，法国“新浪潮”导演特吕弗在1966年出版了他对希区柯克的那场著名访谈，这是世界电影史上最著名的一场访谈，也是世界电影史上第一本“电影书”（Cine-book）。特吕弗对心中大师的激情捍卫不但结束了一场长达18年的“希区柯克争论”，也创造了“作者论”这样一种新的电影话语。

36年前，1980年的4月29日，希区柯克在家中平静地离去。不同于其他大导演国葬般的葬礼，希区柯克的葬礼只允许受到邀请的人入场，更加与众不同的是，现场连灵柩都没有。

充满悬念的希区柯克，去世至今仍是人们谈论最多的导演。

2012年的电影《希区柯克》讲述了这位导演惊世骇俗的名作《惊魂记》的拍摄过程，在片中重现的浴室谋杀拍摄现场，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的希区柯克穿着整齐的西服疯狂刺杀浴室中赤身裸体的斯嘉丽·约翰逊，这一刻，这位导演向我们揭开了他的另一面。

在他同时代的所有电影大师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是最为今天影迷熟知的一位，他一生共导演了53部电影，监制了数百集电视剧，冠有他名字的惊悚故事集直到今天依然畅销（虽然对这些小说，他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什么都没有贡献）。同时，希区柯克把他自己也打造成了时代的偶像，我们今天依然会想起那个穿着西装在他自己的电影里一闪而过的胖子，或者被印在快消品上的漫画肖像。可是当你稍稍走进他（很多人这么做了，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弗朗索瓦·特吕弗），就会发现在他一成不变的庄严又风趣的外表下，藏着的是一个自卑、严苛、傲慢甚至残忍的灵魂，他一生都在内心的痛苦之中挣扎着，同时又要保持表面的风平浪静，这样的矛盾给了他无穷动力拍摄出一部又一部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影片，也让他在晚年无力拍片后坐拥着巨额财产痛苦地离去。希区柯克一生都被认为是精于计算的商业片高手，但他却又是好莱坞甚至全世界最具变态人格的艺术家。其

实，他永远把自己隐藏在阴影里，然后让黑暗笼罩每一个胆敢走近他的观众。

希区柯克诞生

希区柯克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人回忆一个他童年时的故事，有一次父亲为了惩罚他，让警察把他在监狱里关了五分钟。这个奇怪的体罚事件是否真的存在并不可考，但希区柯克认为它可以为他的创作生涯提供一个合适的开端，他把自己对恐怖的敏感与好奇心归结到幼小的他在牢房中的五分钟所受到的惊吓，但是偶像的诞生不可能只来自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希区柯克出生在英国伦敦东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劳工阶层家庭，就读于严格的教会学校，学校的教育不断向学生灌输要时刻保持对罪恶的警惕，因为任何人都可能受到世俗的诱惑走向犯罪，一旦堕落，必将受到惩罚，并辅以严苛体罚来让学生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古典的道德观念成为希区柯克日后所有电影的伦理基础。但希区柯克并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表面上他不爱凑热闹，但是一旦有机会，他就会跳出来大搞破坏或者欺负年幼的同学。同时，他又对犯罪充满兴趣，他常去法院旁听刑事案件的审判，还去参观陈列着各种谋杀工具的罪案博物馆。渴望破坏的欲望和严苛的生活环境之间的矛盾塑造了希区柯克一生的形象，外表上他是位礼貌的英国绅士，内心则充满了难以压抑的对罪恶的迷恋，这逼迫他只能在影像中一次又一次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希区柯克15岁那年，父亲去世了，然后一直到26岁结婚，他都和母亲住在一起，每天晚上他都要去母亲床头进行汇报。26岁之后，他的妻子艾玛很大程度上接过了母亲的责任，接管了他的全部生活，希区柯克曾亲口承认他和妻子没有床第之欢，并且终其一生都称呼艾玛为“夫人”，他对与他合作的编剧的最大赞赏就是“艾玛喜欢你写的这段”。和母亲的关系是希区柯克电影中不断出现的话题，变态犯罪者总是深陷对母亲的迷恋，同时又把暴力的双手伸向对母亲地位构成威胁的年轻美貌的女性。



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

1. 《后窗》剧照
2. 《美人计》剧照
3. 《房客》剧照

希区柯克 1926 年的电影《房客》讲述了一个类似“开膛手”杰克的故事，被他自己称为“第一部希区柯克电影”。影片敏锐地捕捉到了当时英国传统秩序瓦解、阶层矛盾激化和社会人心惶惶的心态，这使它大获成功。同时，影片还透露出一些在希区柯克日后电影中不断重访的情结。片中女主角当警察的男朋友说，他有一天要把绞索挂上凶手的脖子，同时把戒指戴到女主角的手上，这句话在雄心勃勃的表面之下，潜意识中把绞索和戒指并置到了一起。扼死是希区柯克电影中最喜欢的谋杀女性的方法，双手紧紧锁住对方的方式体现了变态的控制欲，这样的控制欲恰恰又是希区柯克对他的女主角的态度，他热衷于塑造

自己电影中女主角的形象，亲自为她们挑选戏中的每一件衣服，想把她们打扮成自己心中最完美的样子。在拍摄《房客》时，女主角就被命令把头发染成金色，她是第一个被希区柯克这么要求的，但不是最后一个。

在拍摄了一系列成功的电影之后，1939 年，希区柯克到了美国，这个挚爱电影的国家让他有了充分的条件施展拳脚。

事业巅峰

希区柯克在美国的第一部影片《蝴蝶梦》描绘了



2



3

一个通过婚姻从底层进入贵族阶层，为了让自己配得上丈夫的地位，违背心愿把自己打扮成上流阶层女主人，又由于失败而痛苦万分的女主角。这一时期的希区柯克电影中，女性总是会为了男主角深受折磨，而这一点在《美人计》中达到了高峰。

《美人计》是他第一次尝试拍摄爱情片，面对惊为天人的英格丽·褒曼，46岁的希区柯克第一次向观众完整展露出了他的整个内心世界，通过剧中人，我们看到了母亲和情人两个身份在导演心中的纠缠。片中身为美国间谍的褒曼借着自己纳粹间谍之女的身份，潜入巴西的一个纳粹秘密基地，帮助她的搭档兼情人加里·格兰特窃取情报，为此，她被迫嫁

给深爱着她，同时又被母亲管教着的纳粹分子。片中的两个男人呈现了希区柯克的两个面目：一个是加里·格兰特，他爱着褒曼，但又出于间谍的身份和冷漠的性格不愿表露；另一个是克劳德·瑞恩斯饰演的纳粹党徒，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褒曼的深爱，但又被他住在一起的母亲掣肘，他想脱离母亲对他的情感控制，但当他得知褒曼的间谍身份后又只能求助于母亲的智慧来解决困境。而作为欲望对象的褒曼毅然身犯险境，只是为了满足所爱之人的要求，直到自己命悬一线时，才促使自己的爱人挺身而出，得到圆满的结局。这些元素在后来都成为《后窗》《精神病患者》《群鸟》等一系列经典之作的源头。《美人计》是希区柯克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一向喜欢致敬希区柯克的《碟中谍》系列在第二部里相当大程度地重演了这个故事，新世纪的偶像汤姆·克鲁斯在片中重访了他半个多世纪前的前辈加里·格兰特的心路历程。

很快，希区柯克拍摄了他的第一部彩色片《夺魂索》，这个在同一空间内以连续的时间讲述的故事仅以四个连续的镜头完成。但与令人咋舌的拍摄手法相比，更加震撼的是它讲述的内容，两个同性恋大学生共同勒死了他们的同学，然后把尸体藏在箱子里，以箱子为桌台宴请了包括死者父亲和女友在内的多位宾朋，他们如此费尽周折只是为了体验尼采式超人般的快感。这个人物让人想起导演在几年前拍摄的另一部封闭空间电影《救生艇》，那部电影刻画了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派纳粹军官，他面对孤身一人陷入敌手的险境，临危不乱，以强悍的体魄和超人的智慧控制了所有人，他成为后来希区柯克电影中一系列优雅的天才罪犯的雏形。而《夺魂索》中的杀人凶手让这一形象更加完善了。表面上看，《夺魂索》似乎充满了对同性恋者的恶意，一方面嫉妒他们超人的智商，另一方面又把他们贬斥为杀人的罪犯；并且，在两年后的《火车怪客》中，希区柯克又塑造了另一个迷恋着男主角的变态杀手，只是这一次，罪犯的同性恋倾向表达得十分含蓄，隐藏在了他对犯罪手法的执著和对母亲的依恋之下。但其实，希区柯克私下里从没有表达过对同性恋者的反感，他像一个好奇孩子一样对一切方式的性行为抱有同等的（被严格控制在知识层面的）求知欲，也许在同性恋的烟幕弹之下，他实际迷恋着的是这些与众不同的犯罪人格，他们成为这位导演少年时代访问犯罪博物馆时在心中摆上神位的偶像。

两年后的《电话谋杀案》中，导演又一次为观众奉献了这样一位优雅的高智商罪犯，他不但拥有过人的智商能够一手策划一起完美的谋杀，同时还有过人的情商，在罪行败露、大势已去时还能优雅地坐下来品尝最后一口佳酿。

在《电话谋杀案》的同一年，《后窗》问世，片中由于腿伤不能移动的詹姆斯·斯图尔特与希区柯克另一位重要的女神格蕾丝·凯莉再度重演了格兰特和褒曼在《美人计》中的故事。当凯莉站在斯图尔特身边时，男主角总是无法向她展露爱意，只有当凯莉在斯图尔特偷窥到一起谋杀案后，勇敢地身犯险境，去与杀人凶手面对面，才激发出她恋人对她的爱。困在轮椅上无能的斯图尔特，正是自卑到面对女神永远只敢躲在优雅风趣的假面之下单相思的希区柯克的真实写照。

这种无能在斯图尔特主演的另一部经典之作《迷魂记》中化身为主人公的恐高症，由于自身的病症，主人公在自己迷恋的女主角掉下钟楼的一刻无法拯救她，而当遇到另一个和女主角长相相似的女孩时，他不顾当事人的反对，不遗余力地要把她的外表打造成和前者一模一样，在这里，无能造成的自卑逐渐转化成了一种施虐，为希区柯克后来电影的转型埋下了伏笔。

1960年，希区柯克筹划请奥黛丽·赫本出演一部电影，但赫本由于片中有她被强奸的情节而拒绝了他，这让希区柯克暴跳如雷。多年来，他总是感到自己被一个又一个女主角背叛，其中包括嫁给了同是导演的罗伯托·罗西里尼的英格丽·褒曼，还有成了摩纳哥王妃的格蕾丝·凯莉，赫本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更深层的角度讲，步入老年的希区柯克越来越难以压抑住自己渴望暴力的灵魂，他需要更猛烈的药剂来纾解，因此，他的作品进入到了另一个阶段，而这一阶段是以他一生中最令人震惊的电影开始的。

攻击显现

作为影史上的经典之作，1960年的《精神病患者》充满了可被解读的信息，它完美地塑造了一个变态杀手的心理世界。片中先把母亲杀掉再把尸体偷出来放在家中和自己共度二人世界的行为是对恋母情结最震撼的呈现，女主角在出场40分钟后忽然在观众眼前被残忍杀害，完全颠覆了好莱坞用几十年建

立起的观影习惯。而影片最受关注的莫过于浴室谋杀这一场戏，导演在40多秒的时间里用70多个镜头，辅以刺刀刺入身体的音效与小提琴奏出的高频配乐，极富节奏地呈现了刺杀的全过程，让观众感觉好像每一刀都刺进了自己的心里。从希区柯克整个电影生涯来看，如此直白残忍地展现凶杀场面在他从前的电影中是完全没有的。导演从前那双躲在角落痴迷地看着心上人的弱小的眼睛不见了，只留下影片结尾凶手母亲木乃伊的空洞眼眶，发着残暴而凶狠的呐喊。

1963年的《群鸟》在一个铺天盖地的鸟群袭击小镇的灾难片背景下，讲述了一个母亲逐渐被儿子的情人取代，从而被遗弃的故事，而片中被遗弃的不止她一个人。其实电影里每一个人都在试图与他人建立情感上的联系，但是又不可避免地走向孤立，而群鸟的攻击是对这一悲剧的外化表现。费德里科·费里尼把这部电影形容为诗，每一次攻击都是为这一情绪注入一个强音。

影片最引人注目的是片尾女主角被群鸟攻击，在这个两分多钟的段落里，导演用各个角度仔细表现了她被无数只鸟啄伤的场面。为了拍摄这场戏，希区柯克让女主角蒂比·海德莉站在镜头前，两边的工作人员不断把一只只活鸟扔向她，就这样从早到晚，连续拍摄了五天，终于导致她在第五天精神崩溃继而晕倒。这一刻，《精神病患者》的浴室谋杀场景在戏里戏外同时重演了。

在导演晚年最后一部经典之作《狂凶记》里，摆脱了电影审查束缚的希区柯克毫不掩饰地完整呈现了一起强奸杀人罪行的全过程，《后窗》中无力移动的男主角在这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只有在用领带勒死对方时才能恢复性能力的杀人狂，希区柯克内心隐藏的黑暗被完全释放出来，而与此同时，他的生命能量正在一步步耗尽，在完成了又一部电影之后，80岁的希区柯克走到了人生终点。

在电影《希区柯克》的结尾，《精神病患者》首映了，当浴室谋杀就要到来时，希区柯克悄悄走到放映厅门外，一边听着里面观众们的尖叫声，一边饶有趣味地像乐队指挥一样挥舞着双手。他一生都热衷于躲在幕后指挥观众的情感，1980年5月2日的那场葬礼是他指挥的最后一场演出，当现场600多位宾客以悲痛的感情共同怀念这位电影大师时，他早已重新躲回了阴影里。✍



1948年，英格丽·褒曼和希区柯克在伦敦合影

《精神病患者》里的“门”

文 / 杨鹏

比服装更抽象、效果更强烈的建筑元素，是希区柯克钟爱的“暗器”。他不需要《乱世佳人》《玛戈王后》那样华丽的建筑布景，他只需要普通的门、窗、楼梯与街道。

一扇非常普通的木门，就在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尽头。门的后面，阴暗潮湿的地窖里，隐藏着世界电影史上一个著名的谜。

为了不提前泄露骇人的谜底，导演希区柯克费尽心机。在影片的开机仪式上，所有剧组成员必须承诺严守机密。希区柯克还刻意散布谣言，佯装为并不存

在的“母亲”物色演员。而在开拍之前，他已经让助手们买光了一年前出版的同名小说。在复印机还极其罕见的1960年，这种措施的确相当有效。影片制作完成后，没有对记者和影评人举行任何点映，他们不得和普通观众一起，挤进影院去看这部历史上票房最高的有声黑白影片：《精神病患者》（*Psycho*，又名《惊魂记》）。

一部杰作的诞生，必然是许多不同行业的精英们合作的结果。在这一方面，电影与绘画、写作等个人的艺术大不相同，倒是和建筑设计非常相似。为了《精神病患者》的诞生，作家罗伯特·布拉克创造了一个既惊悚又足够深刻的故事，编剧约瑟夫·斯蒂法诺的剧本为拍摄铺平了道路。貌似柔弱的男演员安东尼·帕金斯贡献了绝妙的表演。以至于1960年之后，所有姓“贝



电影《精神病患者》剧照

茨”(Bates)的人,恐怕都不会给自己的儿子取名“诺曼”(Norman)了。这两个原本很常见的名与姓,结合在一起,已经是西方世界里变态杀人狂的代名词。影片中的配乐,令人心悸,过耳不忘,甚至掩盖了作曲家伯纳德·赫尔曼为其他经典影片的配乐,如《公民凯恩》和《出租车司机》。

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盖“总建筑师”希区柯克的光辉。尽管剧本的每一行都是斯蒂法诺写下的,这位编剧仍不得不承认:“当我看到剪辑完成、带配乐的样片,连我都感到浑身战栗。”扮演被害者的女演员珍妮特·李,第一次看到样片时,也不由自主地连声尖叫。

如果没有这部低成本的黑白片,希区柯克在电影史上的地位,无疑会大打折扣。即便有《后窗》《晕眩》这样的名作,即便他曾与英格丽·褒曼、格蕾丝·凯莉和加里·格兰特等大明星合作,花甲之年的希区柯克很清楚,自己与“大师”的地位之间还有些距离。如此难得的剧本,是他猛踩油门提速的好机会。

希区柯克决定最后一次采用黑白片。尽管50年代末的美国,黑白片已经几乎被彩色片替代,他本人此前也已经拍摄了多部彩色片。一部分原因,是派拉蒙

电影公司并不看好这个“变态”的题材,给出的预算额度非常苛刻。更重要的原因,是希区柯克认为黑白片更适合这次重要的试验。除了珍妮特·李扮演在影片不到一半就死掉的女主角,其他演员都不是当时的名角。没有艳丽的色彩,没有明星的皮囊,他可以像做手术的外科大夫那样免受干扰,让他所掌控的镜头变成犀利的手术刀。

《精神病患者》的大多数镜头,都是在正常人的视点位置,以50毫米焦距的镜头拍摄。牺牲壮观的广角鸟瞰、诗意的特写镜头,换来观众真切的身临其境。然而,希区柯克的魅力还远远不止于此。

比服装更抽象、效果更强烈的建筑元素,希区柯克只需要普通的门、窗、楼梯与街道。在这方面,希区柯克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类似,后者擅长用建筑元素表达中产阶级莫名的惆怅,在希区柯克的镜头里,它们则很可能是凶手和被害者命运的暗示。

除了少量的室外场景和汽车内部,《精神病患者》的绝大多数场景都是建筑的室内。在加利福尼亚州中部,某个虚拟的偏僻小镇,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老房子孤零零地立在荒坡上。它的原型是美国画家爱德华·霍珀作于1925年的油画《铁路旁的房子》。老房子唯一的邻居,就是著名的“贝茨旅馆”,只有12个房间的汽车旅馆。这种简陋的单层建筑,遍布于美国西部辽阔的大平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独自驾车远行的女子,在这种汽车旅馆投宿,是再普通不过的经历了。正因如此,当你最熟悉的门、窗和楼梯都面带阴冷的表情,就会有更多的观众感到毛骨悚然。

许多建筑没有楼梯,某些建筑甚至没有窗,比如仓库或者蚁族们的家。然而,根本没有门的空间,就很难称得上是建筑了。对于建筑师而言,在图纸上勾画出几道门,不过是例行公事,必不可少,但与作品的魅力无关。对于电影界的“建筑师”而言,门可以变成极富表现力的道具。同样是墙上的洞口,窗只是让人观察到另一个世界,而门则意味着进入那个世界的机会。

影片中频繁地强调一扇又一扇“门”。门,总是吸引着好奇的人,无论是影片中的人物,还是影院里的观众。敞开着门,象征着命运的诱惑。紧闭的门,背后隐藏着阴暗的秘密。当一扇门被推开,就会释放大一桩恐怖的罪行。

年轻漂亮的女出纳员玛丽安,带着本应存进公司账户的4万美元,驾车潜逃。她计划和负债累累的男友相会,幼稚地以为这样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出发之前,她在家里面对镜子整理衣服。镜子里映出她身

后衣橱的门，敞开着。在片刻的犹豫之后，玛丽安决定出发。她拿起箱子，从衣橱里取出大衣。尽管她永远也不会再回到这个房间，她仍然没有忘记关上衣橱的门，然后拉开房门离去。一关一开，两个不露声色的细节，暗示着她关闭了自己的未来，选择了黑暗的泥塘。至此，冗长的情节铺垫结束，扣人心弦的大戏即将开幕。

连夜驾车的途中，滂沱大雨让玛丽安不得不停车，投宿在“贝茨旅馆”。店主人诺曼殷勤地接待了这个唯一的顾客。他站在客房的床边，面带淳朴的微笑，夸耀自家的床铺和用具。他的身后，正是灯光明亮的浴室——门敞开着。此刻，观众还想象不到，那间狭小的浴室日后会频频出现在电影教科书里。

接下来，诺曼准备好了牛奶和三明治，邀请玛丽安去隔壁他的房间吃晚饭。客房的门敞开着，玛丽安的身子斜倚在门框上，略显疑惑地看着有几分帅气的小伙子。几分钟前，她已经听到诺曼和母亲为了自己而争吵。如果她接过托盘，坚持在自己的客房里吃掉了事，可能就不会彻底激怒母亲，也可能会躲过杀身之祸。然而，玛丽安终于接受了邀请。去隔壁诺曼的“主场”之前，她用力关上了自己客房的门，也非常确凿地关上了自己的生命之门。

当玛丽安吃完饭回到房间，诺曼快步走向山坡上的大房子。他没有上楼，而是走进厨房，在桌子前坐下。穿过敞开着厨房门，我们看到他一面紧张地搅着咖啡杯里的小勺，一面望着门外——他正在虚幻的世界里与某个人搏斗。他曾经犯下不为人知的罪行，但是只要停止新的罪恶，他仍有一线机会，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与此同时，玛丽安已经打定主意，今晚睡个好觉，明天就开车回去，返还那笔巨款。她走进浴室，在脱下浴袍前，有一个很认真地关上浴室门的动作。玛丽安背朝着门，开始淋浴。隔着半透明的浴帘，观众看到刚才被关好的门被猛地推开了，凶手第一次登场。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在急促地切换了50多个镜头之后，被尖刀刺死的玛丽安，无助地跌倒在地。浴缸的圆形下水口，慢慢叠映成她仍然圆睁的眼睛。

接下来，观众们可以喘息片刻，直到受雇寻找玛丽安的私家侦探，走进鬼气森森的大房子。侦探蹑手蹑脚，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在几米之外，他看不到楼梯平台上，原本紧闭的房门，正在慢慢地打开。随着门缝悄无声息地越开越大，一束强光从门里射出来，照在地毯上。猛然间，从门里冲出凶手，用尖刀疯狂地刺向侦探。

当两个受害者都在汽车后备厢里沉入泥塘，影片

逐步趋近高潮。诺曼接到警长询问的电话之后，上楼走进母亲的房间。镜头也顺着楼梯爬了上去，注视着房间的门——几小时前冲出凶手的那扇门。房门半开着，镜头在空中旋转，却始终没有进屋，只是在偷听母亲与儿子争吵的画外音。伴随着母亲的咒骂，儿子抱着母亲，夺门而出，慌忙地跑下楼去。

接近影片的结尾，玛丽安的姐姐莱拉冒险走上山坡。她希望大房子里的“贝茨夫人”，能帮助她找到失踪的妹妹。随着莱拉靠近大门，镜头反复地刻画大门和门把手。所有人都很清楚，杀死玛丽安和侦探的凶手，无论他（她）是谁，就藏在门后面的房子里。

在二层的房间和顶层阁楼，莱拉都没有见到“贝茨夫人”。她看到诺曼向这里跑来，立刻在楼梯下面躲了起来。趁着诺曼跑上楼，她原本可以逃出去，就在这时，莱拉看到了通向地下室的门。她推开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扇门，走进幽暗的地窖。又推开另一扇小门，看到了背朝她端坐着的贝茨夫人——10年前死去的“母亲”。

1960年的奥斯卡奖评选中，《精神病患者》获得了包括“最佳导演”在内的四项提名，却无一斩获。事实上，希区柯克毕生从未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正如马克·吐温和茨威格没有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哪一方的损失，显而易见。如今，1960年兼得“最佳导演”与“最佳影片”的《公寓》，不知还有多少人看过？而《精神病患者》依然是欧美世界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它像山谷里的巨响，回声持久不散。专门分析这部影片拍摄过程的专著，已有四五种之多。“浴室”场景的音乐主题，被后来许多影片所借用。在动画片《海底总动员》里，“小鱼杀手”女孩达拉一进门，就响起了“浴室”主题——像刀刮玻璃一样的小提琴齐奏。

希区柯克去世之后，1983和1986年，观众分别迎来了《精神病患者》的第二部与第三部，仍由安东尼·帕金斯主演。1998年，美国导演加斯·范桑特重拍了1960版，换上全新的演员，绝大多数镜头都是原片的同角度复制。那些门的刻画，也都忠实地照搬。很可惜，经典在前，它们都难逃狗尾续貂的厄运。2013年面世的美国电视剧《贝茨旅馆》，号称《精神病患者》的所谓“前传”，实在是连狗尾都算不上了。

值得一提的是，苏格兰艺术家道格拉斯·戈登在1993年把《精神病患者》改造成了“当代艺术”。在博物馆里，以不到正常速度十分之一的慢速放映这部100分钟的电影。既然人人都是艺术家，有兴趣的影迷不妨在自家的大屏幕上试一试，用整整24小时来重温经典，想必能发现更多希区柯克式的细节。☑



时尚只是情节的附属品

文 / 杨聃

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正是这种衣服和角色之间的连接，激发了时尚的想象力。

经典的金发女郎

“希区柯克的女主角在不断重复着相似的特性：她们都是金发美女，她们都冰冷且遥不可及。她们都被禁锢在戏服里，和时尚与拜物主义产生了微妙的关系。她们迷惑男人，而那些男人通常在身体上或心理上有所障碍。”《时代》周刊的电影评论人罗杰·埃伯特（Roger Ebert）曾这样写道。

要说希区柯克的女主角，格蕾丝·凯莉总是第一个被提及的，不仅因为她后来成了摩纳哥王妃，还有她在《后窗》中那个独立、勇敢的形象——丽莎·弗

莱蒙特。影片中最经典的特写镜头之一就用在了丽莎的出场上。给昏睡中醒来的男朋友一吻之后，丽莎呈现在男主角和观众的视线里。

由于衣服的领口设计极其简单，整个画面的焦点都在她精致的妆容上：红唇，珍珠耳钉和项链，白纱披肩的一角与漆黑的背景相互呼应着。

“这不是从不把一条裙子穿两遍的丽莎·弗莱蒙特吗？”

“只有专门为她定做的除外。这件刚从法国空运过来，你觉得会畅销吗？”

那是一件深V领口、黑色上衣搭配白色伞裙、具有“新风貌”（New Look）风格的洋装。事实上，这种在1947年被迪奥推出的风格一点也不新，而是对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风格的夸大：20码（约18米）长布料加工而成的过膝裙装，帽檐向上翻翘的礼帽和手套。



左图：格蕾丝·凯莉在《后窗》中的经典形象

右图：希区柯克执导的电影《捉贼记》剧照

如果说束腰紧身衣、低领口、优质衬裙和褶边让性感衣服重新流行起来的话，很显然，这种给女性吸引力加上漂亮包装的做法，导致了更为普及的潮流。美国人对纤腰的迷恋反映出时装与性之间的象征关系。作家柯莱特这样描述道：“新风貌带来了一个时髦而昂贵的臀部，美国被征服了。”

即便丽莎为证明男朋友的推理有胆识冒险求证，在当代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看来，她仍然只是男性视角里“视觉完美的被动形象”。然而，凯莉在电影中的每一套戏服都为她“说出”丽莎所代表的另一个身份——50年代战后美国的职业女性。

50年代的女性希望展现出成熟优雅的一面。所以白天都穿着量身订制的西装裙套装，夜幕降临则换上晚礼服。尽管电影中只有6场戏，丽莎的每一次出镜都完全展现了这些潮流。不仅仅是她，玛琳·黛德丽也曾穿着迪奥风格的服装出现在《欲海惊魂》（*Stage Fright*）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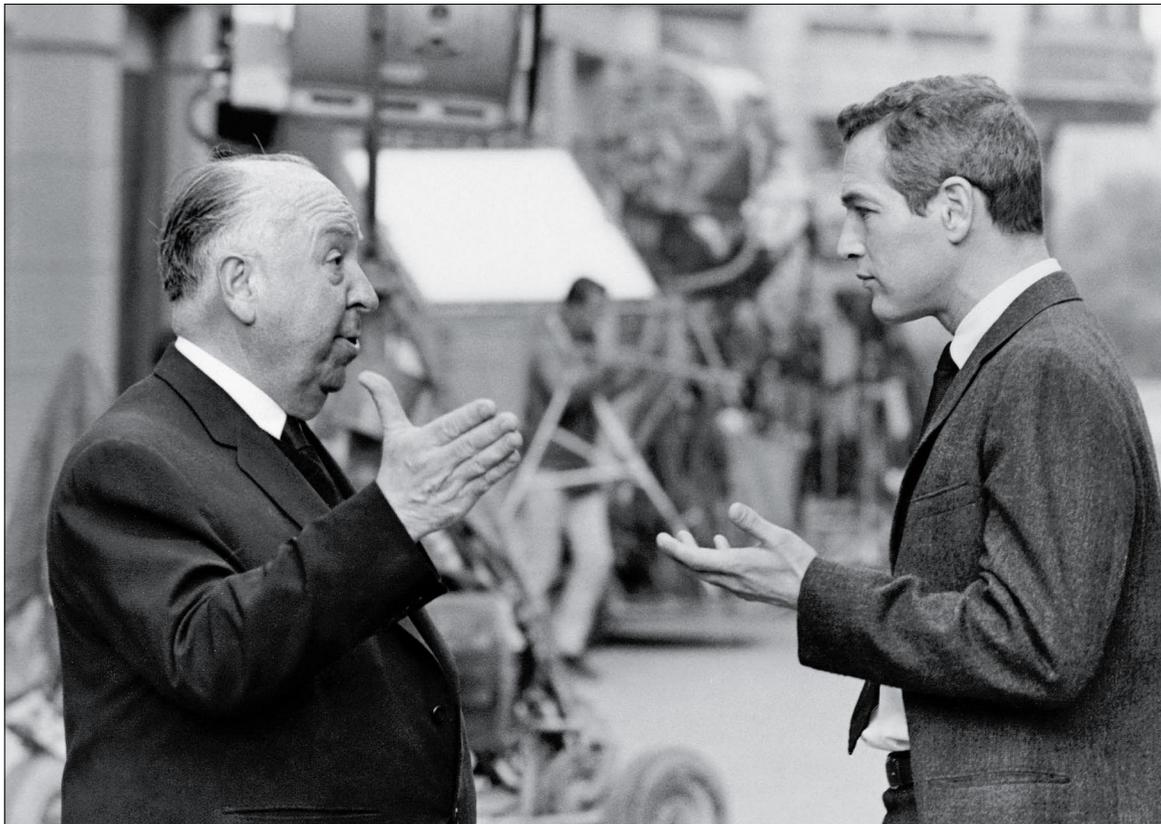
为什么都是金发女郎？希区柯克曾经断言：“金发女郎是受害者的最佳形象。”除了《后窗》，《迷魂记》

（*Vertigo*）、《群鸟》（*The Birds*）等电影都让人觉得希区柯克在表达对女性的厌恶，毕竟，每一部都少不了因为不同原因丧命的女人。然而，他并非只选择漂亮的女演员来扮演那些被动的角色，每一个人物都是经得起反复推敲的个体。

这些微妙的心理变化正是通过戏服的反差来体现的。在《后窗》的最后一个场景，两条腿都骨折了的男主角没办法践行他对旅行与摄影的热爱，只能继续安静地瘫坐在窗前的躺椅上，昏昏欲睡。丽莎则倚在床上阅读，与之相伴。

凯莉这次一身体闲装与之前形成鲜明的对比：卷起袖口的粉色男装衬衫，靛蓝色牛仔裤，和暗棕色便鞋，活脱脱一副男主角向往的自由装扮。最“狡猾”的是，当他一睡着，丽莎顺手把手上那本《Beyond the High Himalayas》换成了《Harper's Bazaar》。即便丽莎外表伪装成了男朋友喜欢的样子，内心仍然是那个自己。

格蕾丝·凯莉出演过三部希区柯克的电影，他对她的评价是“外表冷若冰山，内心热情如火”。事实上，希区柯克多少要为凯莉离开好莱坞负上一点责任。1955年拍完《捉贼记》（*To Catch A Thief*），就在夏



1966年，希区柯克和美国男演员保罗·纽曼在电影《冲破铁幕》拍摄现场

纳电影节上，凯莉与摩纳哥王子雷尼尔相遇了。

设计服务于情节

电影中的经典女性形象让“希区柯克式”成了T台上的专属名词，亚历山大·麦奎因（Alexander McQueen）曾在2005年秋冬季推出了希区柯克系列，其中模特穿着安哥拉山羊毛衫搭配笔挺的裙装，头发挽起，成为他最受欢迎的造型之一。缪西娅·普拉达（Miuccia Prada）也曾根据电影《艳贼》（*Marnie*）为Miu Miu的2013年秋冬，设计了过膝铅笔裙、A型短大衣、手套和淑女手袋。

设计师施瓦博（Marios Schwab）的灵感缪斯是《迷魂记》的金·诺瓦克和《欲海惊魂》的玛琳·黛德丽。每每涉及秋冬的服装，他都会回味希区柯克女主角的风格。“自从我开始欣赏蛇蝎美人，希区柯克就在那里。”他说，“你会和她们相识、相恋，却不知道真正的她们是怎样的。”

尽管时尚界对希区柯克的电影是如此长情，V&A博物馆好莱坞戏服策展人黛博拉·兰迪斯（Deborah Landis）认为时尚并不是他和他的造型师伊迪丝·海德的第一要义。这位直言不讳的美国戏服设计师并不觉得希区柯克的女主角是时尚偶像。“就像海德经常说的那样，希区柯克并不想让他的女主角太招摇。他只是把戏服当作电影场景中的一个重要工具。”

在托尼（Tony Lee Moral）所著《Hitchcock and the Making of Marnie》一书中详细记录了海德与希区柯克如何利用戏服丰满角色。合作之前，希区柯克曾对海德明确表示：“一旦你签了合约，就会收到剧本。无论喜欢与否，你都需要按照剧本上的要求做。”

当海德拿着素描本问希区柯克是否满意时，他就会回答：“亲爱的海德，看剧本就好。”问他的意见丝毫没有意义。

海德研读过剧本之后，会把它落实到非常具体的服装细节上，如此一来，每一位演员都能被区分开来。然后她会拿草图给制作设计师，“除非这些衣服会

出现在某一个冷色调或者暖色调的房间，或者关系到墙上是否有花纹的时候，才会有联合设计这回事”。

希区柯克不希望人物在画面里太突出，就像穿着亮紫色裙子的女性或者橘色衬衫的男性，除非是剧情使然。通常情况下都会选择哑色，他认为这样才不会让观众在重要的场景中分心。“他用色就像艺术家那样，一种颜色表达一种心情。”海德评价道。

电影《迷魂记》里，一些诺瓦克与詹姆斯·斯图尔特的交流，会出现画面上红色与绿色的冲撞：例如詹姆斯第一次与诺瓦克在餐厅相遇，以及她在他家密谈等等。事实上，红色与男主角的浪漫幻想和痴迷有关，但同时也预示着他的危险处境。当诺瓦克以朱迪的身份与男主角重逢，决心以本来的身份让男主角再次爱上自己的时候，她选择了一条藕荷色的裙子赴宴。

除了色彩的暗示，希区柯克也善用服装在屏幕上的力量：诺瓦克在《迷魂记》中的灰色西装，是詹姆斯所饰角色痴迷的证据；蒂比·海德莉在《艳贼》中的黄色医生包，在电影开场的头5分钟内，出现在镜头前的时间比她都长；当《惊魂记》中的诺尔曼·贝茨表现为他母亲的第二种人格时，也会穿上女性的衣服。正是这种衣服和角色之间的连接，激发了时尚的想象力。

设计师戴安娜·西利亚斯接下了为《The Girl》设计戏服的重任，它是BBC和HBO根据《希区柯克和他的女主角们》一书联合制作的TV电影。“我们确实复制了一些细节，比如《群鸟》里的服装和《艳贼》里的包包，除此之外，我们追求的是利落的剪裁，简洁的色彩，没有过分装饰的东西。”西利亚斯认为那是这些经典的形象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主要原因，“所有戏服都旨在体现女性的美感，这是亘古不变的标准。”

虽然像《后窗》、《惊魂记》等一些经典被陆续翻拍，但都没能在表现手法上超越原作。希区柯克爱金发美女，却觉得玛丽莲·梦露太过“张扬”。所以，当得知斯嘉丽·约翰逊——现代版梦露，出演电影《希区柯克》里的珍妮特·利时会觉得有点吃惊。兰迪斯认为：“成功的电影才能影响时尚。观众只能被权威性的人物所诱惑。”

女主角眼中的希区柯克

一边有穆尔维声称的“视觉快感”，一边有塔妮亚·莫德斯基（Tania Modleski）在《知情太多的女人》（*The Women Who Knew Too Much*）一书中阐述

的“自我意识”。希区柯克对女性的态度一直是电影评论人和社会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

而与之共事的女演员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答案。“至少，他愿意也能够和他的女演员交流。”《家庭阴谋》（*Family Plot*）的主演克伦·布莱克（Karen Black）分享过一次她和希区柯克私下的小插曲。

那次面对表情阴沉的希区柯克，布莱克以为自己惹到他了，就跑到帐篷里主动认错。他回复说脸色差只是身体原因，并没有生她的气。

可布莱克还是不太放心，不知怎么的，聊天聊到了“肚脐”。希区柯克说自己没有肚脐。“怎么可能，有母亲的人就有肚脐。我当时脱口而出。”布莱克回忆说。于是，希区柯克掀起了衬衫，结果——他真的没有！

原来，经过之前的一场手术让他的肚脐经过缝针看不出来了。布莱克说：“这就是希区柯克安慰一位以为在生她气的女演员的方式，他踏出了更加亲密的一步。”

希区柯克的传记作者唐纳德·思博多（Donald Spoto）也说过：“想了解希区柯克与他的女主角的关系，看看《迷魂记》那场化妆的戏就知道了，詹姆斯对玛德琳的痴迷程度已经到了要控制她每一个妆容的细节。”

曾出演《西北偏北》的爱娃·玛丽·森特回忆道：“我记得有一场戏每个人都穿着没有腰身和腰带的连衣裙，所有的演员都是，然后他让大家都回家了。为什么？因为那种裙子当时特别流行，拍下来就等于给电影标注了日期。”

如今再看《西北偏北》，里面的戏服在当下也不觉得过时。希区柯克就是这么细致，对衣服有自己的见解。“那次，他对我的衣橱不满意，索性带我到纽约 Bergdorf Goodman 商场现买。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这样一个甜心老爹。”她在“Literature Film Quarterly”节目上笑着说。

当然，他也有严厉的时候。拍《迷魂记》时，诺瓦克拒绝穿灰色的衣服，认为那对金发女郎来说太没有魅力了，但希区柯克坚持让她穿。“确实，那套灰色套装也帮我更好地把握住了玛德琳这个角色。”诺瓦克感慨道。

正如希区柯克曾说的那样：“电影必须要看起来有趣，毕竟对它来说，画面才是最重要的。我试图通过一帧一帧的画面来讲故事，但万一电影院里的音响设备出问题了，观众们也不会焦急和不安，因为运作的画面仍然能吸引他们！”他就是这样，以视觉的方式为女主角们创造了更多空间。■

◀ CAPTAIN AMERICA: CIVIL WAR ▶



电影《美国队长3：内战》剧照

《美国队长3：内战》 对于自我坚信我们可以付出多少

文 / 张月寒

深夜降临。现实不满。一些人披起战袍，变成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成为之强大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别人来拯救你，那么似乎，只能自己拯救自己。

所有超级英雄电影也许都深植着人们的一种英雄迷恋情结，这也导致这类电影看上去特别容易模式化：类型雷同、情节类似，无非是一些穿着制服披风的人利用各种高科技和超能力打来打去。对于那些缺少美国本土文化、历史背景烘托的人来说一切确实很容易理解成这种扁平。但这也并不妨碍人们一次又一次，打开腰包，走入电影院观赏一场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5月6日刚刚上映的《美国队长3：内战》，中国票房已经超过9580万美元，全球票房也已将近7.9亿美元。

从故事情节和叙述方式来看，《美国队长3：内战》是一部还算不错的电影。对于刚经受过《复仇者联盟》(1、2)、《美国队长2：冬兵》、《蚁人》熏陶的观众来说，这部影片或许有一些新意。之前此类电影一贯正邪分明、强强联盟的热血模式开始发生某种改变，超级英雄内部出现矛盾。今年3月刚上映的《超人大战蝙蝠侠：正义黎明》似乎也是这样一种把原来同属正义阵营的两个超级英雄选出来对决的电影。那么，面对这种“粉丝”数众多的超级英雄，导演是如何让他们在大战之余又不破坏彼此在“粉丝”中的形象呢？《美国队长3：内战》的导演罗素兄弟(Russo Brothers)告诉本刊，在这部电影中，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把角色塑造得非常矛盾。“我们认为，在漫威平行宇宙这一大框架下，一切已经到了一个把所有事物拆分、重组的时刻，要让‘复仇者联盟’面临某种威胁，而不是始终作为一种整体、联盟而行动。随着目前上映的几部电影的脉络发展，‘复联’内部其实已经到了超级英雄开始拥有各自想法的时期。而且，充满矛盾感的塑造，也会使故事的讲述更有张力、更具戏剧感。”罗素兄弟说。

影片中，因为强烈的个人原因，之前联盟的美国队长和钢铁侠开始分化成对立两方，别的联盟成员也各自选择阵营，并有令人惊喜的外援蚁人、蜘蛛侠加入。

值得一提的是，“个人原因”(personal reason)似乎是这部电影的导演罗素兄弟一直强调的主题。在电影上映前接受本刊的采访中，他们说：“我们之所以为美国队长和钢铁侠设置参战的‘个人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两个英雄就政治角度在大屏幕上辩论两小时。那样对于观众来说会很无聊。”

于是，每个人都因为各自的个人原因发动一场战争、坚持某一阵营。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付出代价。

当在影片中看见钢铁侠重新创造自己最后一次和父母相聚的那个场景时——随后他的父母就被双双谋杀——我也终于明白了这种“个人原因”的真正含义。对于超级英雄电影来说，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任何人物，正派或反派，都会为其赋予“人性化”，这也是超级英雄文化之所以在美国拥有如此稳定受众的重要原因。越是积极向上充满光明面的角色，越要弱化其说教性。

罗素兄弟说，对于这场“内战”，他们试图拍得不偏不倚、没有站在任何一方，这样电影的“戏剧感和张力”也更强，他们是“要让观众自己选择，究竟是站在美国队长一方还是钢铁侠一方”。

本片导演罗素兄弟——乔·罗素和安东尼·罗素，是一对配合默契的兄弟搭档。《美国队长3：内战》是他们执导的第二部超级英雄电影，第一部《美国队长2：冬兵》也反响不俗。他们的作品还包括美剧《废柴联盟》《发展受阻》，其中《发展受阻》还获得了艾美奖。

值得一提的是，在漫画原著中，这场“内战”从根本上是一个坚持“遵守规则”和“反对约束”的矛盾，而不像电影中的“个人原因”非常强而引发的战争。然而，无论电影还是漫画，其中最让我好奇的一点是，美国队长，一个罗斯福时代军人出身的人物，会选择“对抗政府”、“不相信权力机构”。甚至在《美国队长3：内战》这本漫画原著中，他曾这样说服钢铁侠：这个

国家（指美国）是建立在推翻现有规则的基础上。而相反的是，钢铁侠托尼·史塔克（Tony Stark），一个勇敢、爱冒险的高科技产业大亨，却选择臣服于政府约束。

罗素兄弟是这样解释的：“在《美国队长2：冬兵》中，当邪恶组织‘九头蛇’（Hydra）潜入神盾局总部，美国队长开始觉得一切权力机构都不可信。所以在这部电影中，他对将一切主动权交给政府、国家、权力机构，会非常谨慎。钢铁侠对于自己在《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故事中触发了和奥创（Ultron）的战争而感到充满愧疚感，因为奥创本身，其实就是钢铁侠自己创造出的一种产物。所以，他感到复仇者联盟应该为自己行为所造成的伤害负责。而在漫画原著中，美国队长之所以说服钢铁侠‘这个国家是建立在推翻规则的基础上’，他想表达的意思或许是，用一种个人的正直去引导人自己的选择，去站在人所认为的正确的事情之后，不管谁在挑战你或阻挠你。”

这部影片，是一种观众在观看了前几部超级英雄电影后，觉得超级英雄很酷的“后果时代”，即建筑被毁、平民伤亡，他们虽然拯救了世界，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间接伤害。

神盾局被颠覆的情节也出现在美剧《神盾局特工》第一季。“九头蛇”一瞬间颠覆了神盾局，局长费锐（Fury）也传说已死。对于漫威的超级英雄世界来说，这一事件的发生是一个著名节点。

仔细剖析，美国队长这个角色其实是漫威超级英雄历史上一个中流砥柱般的角色，在美国人民心中也一直具有一种强大的情结。这个“二战”期间首次出现的漫画人物，陪美国人民度过了很多艰难时期，在各个时代的读者中，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而近年来通过电影崛起而人气日高的钢铁侠，代表了一种超级英雄新的时代需求。钢铁侠的魅力除了和他那一身标志性、多功能的盔甲相关，更和他多金、帅气、高智商、出身不俗、浪子回头的花花公子形象脱不了干系。如果说纸上的漫画人物还是一种代入了读者太多想象力的二维意象，电影无疑将这些纸上人物一口气吹“活”了。

虽然说是基于原著漫画所创造出来的人物，但经过电影的重新创造，一切就变成一种截然不同的全新作品。导演罗素兄弟也说：“电影的情节确实和原著非常不同。我们是根据漫威电影中的超级英雄故事进行改编、发展，而不是根据原著。所以，对于我们来

说，使用已经出现在漫威电影中的一些角色，诸如《复仇者联盟》《蜘蛛侠》《蚁人》，是非常重要的。也即，它是一个基于电影而构建出的全新的故事。”

这一切非常明显地体现在钢铁侠这个角色上。在原著漫画里，钢铁侠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拉风的领袖式主角，只是复仇者联盟中一个普通的成员。然而经过几部电影的奠定，他已经成为漫威在全球范围内受欢迎度最高的超级英雄之一，这当然也和小罗伯特·唐尼的成熟以及张弛有度的演技有很大关系。

我第一次看超级英雄电影是在2012年，《复仇者联盟》刚上映的时候。当时被朋友几乎是硬拖去电影院，因为我原以为会看到一部充满打斗以及特技的电影，而我对这类电影是零兴趣。然而后来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却看了一场“好看”的电影。让我这种资深文艺片路线的人能看进去《复仇者联盟》，原因就是其间的“人性化”，而“人性化”也是斯坦·李当年拍摄《钢铁侠》第一部电影时所遵循的原则。当时的导演乔恩·费儒也说，他不想拍那种“两帮人穿着盔甲互殴”的常规英雄片。事实上，目前的西方影评界也普遍认为《复仇者联盟》是推动漫威顶点的一部电影。“复联”可以说为从上世纪开始在纸质漫画界纵横的漫威，赢得了现代更多、更年轻的受众。“复联”电影过后，几个主角的受欢迎度更是呈几何级数增长。

《美国队长3：内战》中，我觉得颇值一提的其实是蚁人这个角色，戏份虽然不多但是却可圈可点。《蚁人》电影去年10月在中国甫一上映，就因为其主打搞笑的风格获得了中国观众“亲切”的第一印象。《美国队长3：内战》过后，蚁人的扮演者保罗·路德（Paul Rudd）也因为这一角色在美国炙手可热，很多上脱口秀的明星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他或他扮演的这个角色。《神盾局特工》的主演汪可盈就在脱口秀中说过一个她的华裔父亲曾在路上偶遇保罗·路德的搞笑段子。

影片中蚁人受猎鹰的邀请加入美国队长一方。作为一个新人超级英雄，在刚和美国队长等这些老牌超级英雄第一次见面时他所表露出的追星族式的紧张和激动就已经让全场观众忍俊不禁。后来机场大战后，他和猎鹰、红女巫、鹰眼被困禁于海上监狱，钢铁侠进内探视，蚁人冲着他说了一些义正词严的话后钢铁侠反问：“你是谁啊？”保罗·路德说“come on”时简直让人笑死。

我最早对保罗·路德有印象是来自于《老友记》，他在剧中扮演菲比的男朋友并最终成为她的丈夫。那时这个角色就是有喜感的，直至后来看《蚁人》，我觉得才是把保罗·路德个人喜剧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部作品。而在这部《美国队长3：内战》中，这个47岁的演员的喜剧风格，更加圆润、自然、成熟了。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不知道这些超级英雄前世今生的历史和渊源，或许观看《美国队长3：内战》时就不会这么有纵深感。在原著漫画中，绯红女巫一直和幻视有牵连，最后他们结成了夫妇。鹰眼追求过黑寡妇，而美国队长也曾对黑寡妇有恩。冬兵曾是美国队长在“二战”期间的助手巴基，所以美国队长在片中才一定要救他。而据漫画原著，冬兵和黑寡妇也曾发生过恋情。电影中美国队长的新女友13号特工，由美剧《复仇》的女主角艾米丽·万凯普(Emily VanCamp)扮演。电影中艾米丽·万凯普和美国队长共同出席特工卡特的葬礼。特工卡特是13号特工的姑姑、神盾局创始人，也是美国队长的初恋女友。美国队长由于冰冻了很多年，所以面貌上一点没有改变，而实际上他已经100多岁了。

超级英雄题材在电影领域的成功也使其延伸到美剧领域，比如《神盾局特工》《特工卡特》《超人前传》《绿箭侠》《闪电侠》……如果说漫威至今推出的超级英雄电影还是一种比较正面的英雄角色的塑造，《神盾局特工》则探讨了英雄并不总是完美的这种更深刻、现实的问题。有了超能力以后，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成为英雄。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美国队长3：内战》结束得稍微有点仓促和突然。虽然这是明显要拍续集的征兆，但是，就这部电影单独来说，由于前面的铺垫太长导致观众会期待一种很大的爆发。然而这种“爆发”，却似乎一直并未出现。如果这是所谓“内战”的话，那么有些观众会怀疑这场内战究竟有没有真的开始。

还有一点，不知是不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持这些早已树立的超级英雄的某种光辉形象，这部电影的另一美中不足是主创太过“仁慈”。在原著漫画中，内战开始前夕超级英雄阵营就已经有人真正死去，而电影中却不是。电影前半段当“战争机器”詹姆斯·罗迪从高空坠落的那一刻我以为他必定是死了，这样的处理我觉得其实反而更好，张力和深刻感都会更强。

“‘粉丝’之所以喜欢这些超级英雄，因为他们在超能力的外表下仍充满着‘人性化’。他们可靠，又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在一起配合默契、充满友爱。”

但可惜的是并没有，罗迪从高空坠落后的结果是下肢瘫痪，后利用高科技辅助手段进行复健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漫画原著中内战的导火索《超级英雄注册法案》(Superhuman Registration Act)在电影中被改成了《索科维亚协议》(Sokovia Accords)。这两者都是一项政府强制出台的、旨在增强对超级英雄控制、管理的法案。而我或许可以理解电影的这种改编，是后者的事件指向性或许更强，索科维亚是在《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中被摧毁的那座城市。

然而，无论如何，当我们看着美国队长和钢铁侠这两个IP如此大的超级英雄在屏幕上大打出手的时候，心中还是不免有点“伤”。罗素兄弟告诉本刊，他们力图把打斗场面拍摄得非常本能和真实，以“在观众群体中唤起非常强大的情感上的召唤力”。

“‘粉丝’之所以喜欢这些超级英雄，因为他们在超能力的外表下仍充满着‘人性化’。他们可靠，又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在一起配合默契、充满友爱。但是，正如所有大家庭一样，凡事都有争吵（于是这一点就让这些角色更加真实）。在电影中，钢铁侠和美国队长都各有判断正确或错误的东西。于是，这一切其实就是让观众自己决定，究竟谁对谁错、孰是孰非。就像电影中的美国队长和钢铁侠可以各执一词一样，观众也可以各执一词。”罗素兄弟最后总结。执导了两部超级英雄电影并即将执导《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的罗素兄弟，将来想在他们的家乡——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执导一部该地区背景下的犯罪题材电影。

我们做任何事都很艰难，做任何事也都有自己所坚信的东西。然而，不能因为事情艰难就不做，也不能因为别人怀疑就不相信自己。这世界终究是一个自己为自己所坚信的东西而努力的过程。正如美国队长和钢铁侠一样，他们发起战争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私欲或泄愤，而是每个人都必须坚定地站在自己所坚信的东西之后。■

《傲骨贤妻》：比女性主义更自由

文 / 驳静



美剧《傲骨贤妻》剧照

如果说艾丽西娅逐渐接受了男权社会的行事标准，那么戴安坚定的原则性正好与她形成对比，前者恐怕正是现代社会里女性主义的异化。

2009年，《傲骨贤妻》(The Good Wife)第一集试演，它的故事背景和人物设置，很容易让人想到多年前的希拉里——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期间的莱温斯基丑闻曝光后，希拉里选择了原谅丈夫。

不过女主角艾丽西娅(Alicia Florrick)，更直接的人物原型应当是当时的西尔达·斯皮策(Silda Spitzer)，她曾是纽约州的第一夫人。就在2008年，当时身为纽约州长的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因为同样的嫖妓事件被曝光，他不得不向公众道歉，并辞去担任才一年多的州长一职。

第一集中道歉记者会的许多场景似曾相识，更多的相似之处是，与西尔达一样，艾丽西娅在成为全职主妇前，也曾当过律师。不过，与西尔达同病相怜的“姐妹”其实还有更多，比如，也曾是律师的伊丽莎白·爱德华(Elizabeth Edwards)，2008年，她身为美国参议员的丈

夫约翰·爱德华(John Edwards)承认婚外情并育有一子。

上述例子在美国政坛不少见，这些总能成为头条新闻的人物，共同构成了艾丽西娅代表的“贤妻良母现象”：作为政客的丈夫出轨或嫖娼被曝光后，需要召开记者会向公众解释，而此时妻子往往站在身边，其间的细节还可以设计到夫妇二人何时牵手、何时拥抱，竞选团队往往有研究透彻的套路。

对政治家庭中的妻子角色而言(当然，也有少数男性站在背后的情况)，每当她的丈夫面临这种道德困境，她们的角色既弱势，又有其特有的强大力量。比如如果缺席记者会，显然会被不断解读，伤害竞选人的形象，因为“人们总是更喜欢一个家庭和睦的竞选人”；在特殊且复杂的竞选文化中，利益攸关的因素多如牛毛，但仍然有许多人会抛却这些，去关心站在无异于被当众侮辱的场合的这个女人，“她当时在想什么，她接下来要怎么办”。

《傲骨贤妻》的开场，对准的正是这个视角。艾丽西娅在想什么？记者会结束后发生在走廊里的一个巴掌似乎给出了答案，而对后半问题，就是整部电视剧希望呈现的故事。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概括，可能是：“丈夫嫖娼曝光，10多年的家庭主妇生活后，艾丽西娅重

拾本行，开始在芝加哥本地的一家律所重新开始职业生涯，逐渐取得瞩目的成绩，最终，她离开丈夫，寻找爱情，掌控自己的生活。”你或许可以用更花哨的词语，但故事的本质不外乎如此。

因此，没有看过《傲骨贤妻》的人，很容易误以为这是一部肥皂剧，它的律政剧属性也很容易被拿去和NBC上世纪90年代经典剧目《法律与秩序》(Law & Order)做比较。事实上，这的确是一部传统的律政剧，应用美剧常用经典结构，即《X档案》(X Files)以来盛行的“一集一个案子”的叙事逻辑，同时，《傲骨贤妻》也有每一季的剧情发展，而更大的剧情弧度，则是女主角的转变和成长。

这当然不是一部完美的电视剧，比如每当遇到障碍，律所万能的调查员K姐(Kalinda)一出手，总能解决问题(她因此还有别名“神探Kalinda”)，再如法庭上律师们常常喊出戏剧感十足的“objection”(反对)，但该剧的过人之处在于案例的选择。

按剧迷们的不完全统计，“Chumhum”这个以谷歌为原型的网站，以案例讨论主体的身份出现多次，有了这个平台，谷歌科技创新讨论的话题包括私人信息泄露等，除此之外，还讨论过无人机涉及的公共与私人领域之争，利用推特击败来自英国的诽谤案，由交友APP引发的强奸案件，在比特币还没有盛行一时的2011年，第三季就有案例与此相关。

曾获得普利策评论奖的《纽约客》电视剧评论人艾米丽·努斯鲍姆(Emily Nussbaum)在该剧第四季时写剧评，称“如果将该剧涉及科技的问题整合起来，可以明显地看到，编剧对互联网科技发展带来的危险和它生产的自由，两者之间的关系有过深入思考”，而“数字化”这一问题在现实中仍然充满争议，这部律政剧外衣、女性主义内核的电视剧之于数字化问题，好比HBO黑帮经典《火线》(The Wire)之于毒品问题的探讨。这一颇具游戏色彩的类比，由于该剧法律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双重解读，而显得奇异地贴切。

不过，“男人应该对它不感兴趣”，这不只是我和周围观剧同好的感受，努斯鲍姆在剧终评论里也这样认为。

的确，《傲骨贤妻》另一特色是令人大开眼界的女性角色设置。首先是律所的创办人之一戴安(Diane)，是典型的成功女性形象，“粉丝”们常常津津乐道她的不走寻常路的职业装和形状各异的项链，相比之下，艾丽西娅的打扮更为“政治正确”；K姐也是剧迷们的心头好，她是律所雇用的调查员，总是一身皮衣皮裙过膝靴的准哥特式风格，以她为中心(总是被她吸引)的若干制服女同性恋角色，配角当中，隔三岔五出现一回的

红发女律师，夸张却有趣的注意力缺失症，却往往用出人意表的脑洞解决问题。诸多女律师群像，显然是该剧女性主义内核的另一佐证，如果还嫌不够，其实还有诸如FBI女探员、艾丽西娅的“女保镖”等女性角色，倘若作为样本，其职业的多样性算得丰富。

但艾丽西娅其实又不是编剧实现女性主义投射的重点，真正的代表人物是戴安，作为律所的创始人，她专业、独立、有原则。看上去，艾丽西娅也在一步一步走向成为第二个戴安的路上，不同的是，艾丽西娅最后成长为另一个皮特，这意味着，她一面妥协，一面变得更强大，而这又意味着更多更深刻的妥协。如果说她接受了男权社会的行事标准，那么戴安坚定的原则性正好与她形成了对比，这恐怕也是现代社会里，更向男性行为标准接近的女性主义。

从这个角度，艾丽西娅作为主角，其实是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人物，因为显然，她不是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式主角。

美国前参议员夫人康妮·舒尔茨(Connie Schultztz)对此也颇有感触。曾出版了《一个贤内助的回忆录》(A Memoir from the Woman Beside the Man)的康妮曾就职于俄亥俄州最大的日报《The Cleveland Plain Dealer》，并于2005年获得普利策评论奖，她显然是一位事业上非常成功的女性。而获奖后的第二年，她决定辞职以协助丈夫竞选参议员，这一举动招惹了许多女性主义者的非议，他们同样认为这是一种退步。“如今人们对政治配偶的要求发生了变化，他们一方面希望女性以妻子的角色展现候选人真实的一面，一方面又希望她们独立、有自己的事业。”她在NPR(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一次节目里这样说道。

所以，当站在嫖妓丈夫身边并且努力维持婚姻被视作虚假，甚至“女性主义的倒退”时，剧中的艾丽西娅或者现实中的希拉里的前进路线，却在宣示，女性主义并不是简单地以“离婚”反击，甚至也不是某种可以独立生活的能力，今天的女性主义，恐怕还有更深长的意味。她们在以一种男性觉察不到的方式更自由地行事，在艾丽西娅身上，则是哪怕表演一个你们想要的“圣人艾丽西娅”呢。反正她自由行事，如果在舆论压力下离婚，那才反而陷入反击的圈套。对此，艾丽西娅的扮演者朱丽安娜·玛格丽丝(Julianna Margulies)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女人其实更聪明更善于伪装，“如果她想要借机行事，就不会让你识破”。

在女性主义持续发展的20世纪，独立自主反而成了一种公众刻板印象。而《傲骨贤妻》中，艾丽西娅的反英雄主义形象，正是对此观念的一种反击。☑

“声音”与“未来”

记者 / 黑麦



德国 Faust 乐队创始人 JHP 在演唱

明天音乐节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它似乎可以从中国的多数音乐节独立出来，构成一种特有的“深圳”生态。

今天深圳的文艺青年大多会汇集在一个名叫华侨城的创意园区，这里是设计工作室和创意工坊的聚集地，也是深圳小型演出和创意市集的主要场所。在这之前，位于福田区华强北的旧天堂书店曾经是一个据点，那里除了贩售书刊和唱片，偶尔还举办一些小型沙龙。阿飞是书店的老板之一，2000年时，他来到深圳，组了一支乐队，他想去北京，可后来乐队散了，有人做了生意，有人出国，阿飞开始摆地摊，和朋友慢慢

地做起了这家书店。再后来，书店搬到了华侨城创意园，华强北那儿的旧址随即被拆掉了，随后，创意园区内旧天堂和它所处的那个地带便成为今天深圳文艺青年最常出没的地方。

后来，阿飞开始不满足于“这里只是一个书店”，那会儿，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方都陆续出现了小型演出场所，独立乐队和自由音乐人的演出也多了起来。2010年，滕斐和阿飞做起了“B10现场”，成立了一个名叫OCT-LOFT的国际爵士音乐节。他们将那个音乐节称作“收获了一次缓慢而有力的爬行”，“无中生有，土法炼钢”，让深圳的一群音乐好事者可以抱团取暖，事实上，这个音乐节包含了传统与现代、爵士与民族，他们试图用一种多元的文化相互包容，

尝试音乐前沿的先锋和特性。

3年后，B10开始策划了另一个音乐项目，给它起名为“明天”。一个音乐节和它所处的城市气质有关。在第二届明天音乐节的策划人前言中，策划人提出了娱乐与美学的悖论：正如取悦与冒犯，往往是下落在半空中的一枚硬币的两面。平庸的乐手热衷于追逐外在的形式，而睿智的音乐家则努力向内拓宽他们的美学思想。对他们来说，任何稳定性的美学都是不稳定的。B10宣称明天音乐节的风格涵盖实验、先锋、摇滚、自由爵士、民族等等，它们有一种相似的特质，即未来的指向性，它是一种精神方向，一种可能性，或许还是一种声音的趋势。这个音乐节的现场也会营造出不同于北上广音乐节的氛围，深圳的观众有着自成一套的偏好和文艺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尚未被彻底商业化，也没有像“连锁音乐节”那般形成某种套路，或许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边缘化的存在，这与张铁志的《声音与愤怒》中的部分阐述相似，它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也是虚无的享乐主义；既是逃逸的窗口，也是封闭的暗巷；既提供了反抗的新能量，也是政治意识的麻醉药。这个表象“边缘”的音乐节也在孕育出一种独特的演出方式——以即兴的方式交流、对话。阿飞觉得它并不边缘，“这里的票房会高出北京一些”。

2016年的明天音乐节刚刚结束，参演的乐队0v0来自意大利，这是乐队成员布鲁诺（Bruno Giuseppe Dorella）第二次参加这个音乐节。0v0来的成员是一男一女，他们在2000年离婚前夕组建，16年来，他们遵循着一种小众生态的演出方式而存在。多年前，他们与意大利的唱片公司解除唱片合约，开始自我经营，乐队的生存及生产方式如同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技术元素》一书中的举例，0v0将专辑上传到Bandcamp售卖，也在社交网站上公布乐队作品及信息。他们以各种合作的方式创作、录音、制作声音和影像，也会与时尚、艺术跨界合作。16年来，0v0的演出已经超过千场，他们走遍了欧洲的各个城市，却也等到很多年后才在欧洲以外地区尝试演出，随即他们发现意大利或许并不是自己的“真正主场”，他们的乐迷似乎遍及各个城市的角落。

布鲁诺和斯特凡尼亚（Stefania Pedretti）在大学时分别学习心理学和哲学，他们偏好暗黑，异端（Cult）以及用一种罕见的声音审美阐述精神哲学。“我们的音乐也并非北欧式的，”布鲁诺认为，“这是一种很难界定风格的创作方式，即便是在一张专辑中，你也可以听到不同的素材和采样，这些声音可能包括了意大利的民乐、工业音乐，它可以是宗教式的，也可

能是在亚洲的某个小镇听到的小调，抑或是在美国听到的城市噪声。这些分散的声音仍可以自成一派。”斯特凡尼亚认为乐队对这些声音的选择像是一种“相互作用”，随即产生某种听觉观念。

他们认同互联网对音乐的改变，即便是实验与噪音音乐也没能逃脱技术和信息带来的变革，二人很早就意识到这个现象。布鲁诺认为，多年前音乐的固定形态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相对艺术化、装置化、现代化的发声方式，它不具有代表性，例如Bandcamp上发表的无声唱片、音乐制作人发起的宇宙音乐像，以及阿尔法脑电波音乐，都有自己的受众。他们也认为网络改变了分众，自上而下地使音乐拆分，变成小众，而风格的边界和技术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手段与媒介似乎都不再是问题，而真正遇到的问题则是，解读、题材与再解读。当然，音乐生态也随即改变，0v0乐队在演出时看到了各种年纪，不同情绪、喜好，以及不同性取向人群，“这些人在现场总会给乐队带来新鲜的反馈”。为此，布鲁诺成立了另外一支“乐队”项目，他觉得意大利音乐家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是一个命题，他认为这种机制化的创作与0v0可以生产出完全不同效果的声音情境。

当马木尔、张东再、李剑鸿等人上台时，营造了从氛围太空到迷幻噪音再到工业摇滚的不同气氛；木推瓜乐队也在阔别舞台十余年后再次复出，以荒诞直白的叙事风格，加上原始自然、粗糙有力的唱腔得到现场的欢迎。这次音乐节，很多观众都是冲着Faust乐队和音乐家灰野敬二来的，灰野敬二是这个音乐节上的标签式人物。现年64岁的灰野是日本实验音乐创作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吉他手的身份进入日本的地下音乐圈，他的音乐被形容为过于孤独，过分自我。

Faust是明天音乐节上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在表演的开场时加入一段循环中文念白：“这是一条正确的路。”在演出中，乐队还使用了水泥搅拌机，试图用一种强迫的声音追击听觉的进化。这支乐队诞生于60年代末，彼时的唱片公司都默默地注视着披头士的成长与衰败，也注意到了“地下丝绒”和Frank Zappa等音乐人的“艺术形态”和逆商业而行的强大潜力，于是，“宝丽多”唱片的高管思索着西德如何能培养这样一支真正拥有世界影响力的音乐组合。当时的科隆和慕尼黑已经有了两支叫Can和Amon Düül II的地下乐队，Can对于“地下丝绒”的理解和复制有一种废弃而严肃的美感，而Amon Düül II似乎在实践一种德国式的嬉皮和社群态度。1969年，Can和Amon Düül II相继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彼时，29岁的音乐记者乌韦（Uwe Nettelbeck）谋得了一个在西德著名新左派刊物《Konkret》的编辑职位，那会儿《Konkret》大力组织和支撑着西德左派学生运动，这与Amon Düül II等地下乐队的姿态不谋而合，此时，乌韦也以左派评论家和作家的身份开始头角峥嵘，试图打开德国地下乐界的“宝丽多”找到了他，希望他以星探的身份给“宝丽多”带去一支德国本土的未来超级乐队，他们给乌韦的方向非常笼统，听起来甚至有点荒谬——“找一支德国的披头士。”

1969年，在奥伯豪森电影节上，乌韦看到了一支带有爵士的味道的先锋乐队，成员Jean-Hervé Péron制作的配乐有种独特的吸引力。很快他又发现了另一拨做乐队的人——绰号“Zappi”的鼓手沃纳（Werner Diermaier）和键盘手汉斯（Hans Joachim Irmeler），他们更像摇滚乐队，噪音色彩浓厚，而且喜欢搞乐器上的实验。乌韦认为，这两支乐队各自的特色强烈但却单一，缺少一种惊异感，前者乐队的即兴爵士风格自由拥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如果搭配上后来的这支乐队充满攻击性和实验色彩的音色，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于是，他撮合这两支乐队合并。这六个人的第一次集体排练是在维梅河边一个潮湿阴暗的防空洞里，狭长的空间给他们制造出来的声音提供了一个甬道来回响动。在还没有任何乐队理念和章法的情况下，这支尚未命名为“Faust”的惊异感凌乱地喷放了出来。

Faust原意为德语的“拳头”（fist），并非最初英语国家认为的“浮士德”，这支乐队误打误撞地沾上了与哲学、艺术相关的构成，他们用一种“自由”的方式描写未来，在潮湿、闭塞、烟气缭绕、昏暗而瘙痒的环境里，潜意识反复地觉醒，然而迸碎，进而被重新拼贴起来。Faust的第一张专辑在田园里遥望废都，笼罩着一股现实的酸涩感。他们的第一首歌在挤压的电流嘶声里憋出两句“...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all you need is love...”，是对The Rolling Stones和The Beatles的回应。不过，《Faust》这张专辑销量惨淡，唱片公司很快对Faust失去了信心。1972年，他们被迫减少成本和时间完成第二张专辑《Faust So Far》的创作录制。这张纯黑专辑凝重妖异的氛围在《Mamie Is Blue》一曲中显山露水，这种黑色的锤击质感后来会在Blixa Bargeld和他的“倒塌新建筑”中再次孕育出来。除了评论界，德国人对Faust似乎完全没有兴趣。另一边，杜塞尔多夫出现了一支叫Kraftwerk的乐队；而Can在日本主唱铃木健二加入后，变得越发地下，越发具有黑暗领袖的气质。

英国《NME》杂志的记者伊恩（Ian MacDonald）是少有的几个在Faust发行第一张专辑之后的专场演出中看过他们表演的外国人。回国后他保持着对Faust的关注，并且在《NME》上撰文推荐这支德国前卫乐队。那会儿，年仅22岁的理查德（Richard Branson）刚刚在伦敦创办了自己的唱片公司“维京”（Virgin Records），作为小唱片公司，它有足够的空间和胆量运营一支未做足姿态的乐队。在“维京”发行的两张唱片里，《Faust IV》的第一首歌或许最为知名——《Krautrock》。一触即发的一声鸣响和后面十几分钟的长篇迷音，在包括Faust、Can、Amon Düül II等乐队的作品中并不少见，但没人知道该怎么概括这种声音。在之前的迷幻和前卫摇滚里并没有这种至极的黑色和电流气息。《Krautrock》听痴了会像很多迷幻摇滚一样让人飘然不能自己，但总有股下沉的感觉拽着耳朵，周身发麻，似乎只有当时德国人做的那些音乐符合这种设定。于是“德国摇滚”这个词成为乐队的归类。不过Faust再次被唱片公司放弃，到这里为止，Faust的70年代告一段落，不仅是音乐，他们像很多那个年代的德国人一样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需要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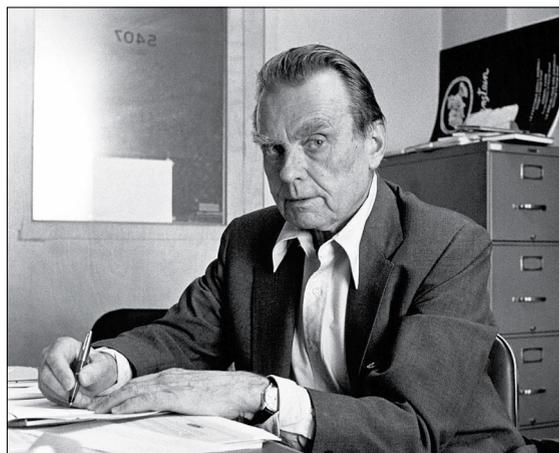
法国导演朱利安（Julien Perrin）曾经跟随乐队两位始创成员的足迹回到乐队出身之地，探寻他们从无到有再到缔造传奇的轨迹。影片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呈现了乐队在舞台上荒诞不经、令人着迷的姿态。很多年以后，Faust在1994年宣布重组，那时，“Table of the Klements”唱片公司的亨特（Jeff Hunt）为Faust安排了美国的巡回演出，在加州的Death Valley的表演是那次巡演中的一个亮点，几位伟大的先锋艺术家加入了他们的演出行列，其中包括音速青年乐队的吉他手瑟斯顿·摩尔（Thurston Moore）、托尼·康纳德（Tony Conrad）、吉姆·鲁尔克（Jim O'Rourke）和灰野敬二。同年，先锋吉他手鲁尔克与Faust合作录制了杰出的专辑《Rein》。

乐评人张晓舟在一篇描写明天音乐节的文章中引述了法国批评家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在1990年发表的《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中提出的“超先锋主义”概念，用以跳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对峙和漩涡。他认为超先锋主义肯定两种价值：一是灾难，作为非人为规划的差异存在；二是流浪，在所有疆界、所有方向，包括向过去的毫无拘束的行走，无需更多的未来感。如同实验或者当代音乐一般，不再有现在与过去的时间与等级之分，而这种时间与等级之分是昨日先锋派的典型特征。■





左图：华沙老城重建始于1945年。70年过去了，华沙人依然认可这座城市的重建，不是按照执政者的情感，而是经过了充分讨论的



波兰诗人、作家和散文家切斯瓦夫·米沃什于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发现新波兰

主笔 / 葛维樱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切斯瓦夫·米沃什

玻璃塔以外，现代城市的另一种可能

沿着“保罗二世大道”略倾斜的路线，向上可以直达“古城”，向下可以通往“肖邦公园”。以1978年当选的第一位波兰人教皇命名，将复杂的历史因果串联起来。在欧洲的大城市里，华沙是一个执拗的特例。除了维也纳、伦敦、巴黎那样一直保有大量古建的重要城市，大量中东欧城市都是在近20年才开始拆除火柴盒式的建筑，尽力追求徒具其型的“古代化”的。华沙是在1945年战后立刻开始重建的。在如今欧洲大同小异的城堡、广场、喷泉、教堂的模式当中，70年前的华沙，就一面是对自己精确到毫米的“仿制”，



上图：波兹南旧啤酒厂购物中心，集购物、休闲、艺术为一体

下图：罗兹市带动了波兰壁画的风潮。图为克拉科夫市卡齐米日犹太区的街头壁画



一面是符合人生活居住的城市“发展”逻辑，二者并行本身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活建构方式。

新世纪以来，华沙成了全欧洲最受欢迎外来建筑师的地方。“华沙的土地曾经被国有化，在欧洲国家里算是一个特例。华沙不是一天、一代人可以完成的。”一幢500米高的虚拟黑色“巨塔”竖立在华沙市中心，艺术家把“二战”结束后所有华沙市区残存的碎片，精确地一块块用电脑堆砌成一座巨塔，比现有的最高建筑科学文化宫还要高一倍多。即使是最负盛名的盛放肖邦心脏的圣十字大教堂，至今只用信徒的钱默默做零碎缓慢的修复，我看到的天使还不对称。

战后对于华沙的重建，是一个城市组织和空间秩序的规划。70年过去了，波兰人仍然认可这个城建是通过充分讨论的，而不是执政当局出于表达情绪的需要。街道宽阔，公园自然清新，建筑上因为执拗保持了一些历史风貌地区，与德国的东柏林、德累斯顿那种“社会主义生产型城市”大异其趣。“我们不想从18、19世纪的拥挤建筑里‘拯救’出一个新城市。”华沙至今看到的城市面貌，包括历史街区界限、公园和原始生态区的保留，为居民提供新鲜空气的廊道以及高等教育、轨道交通，尤其是改善住房，都是从废墟中一点点重新做的。“这才是华沙故事的起点。”

故事的矛盾依然集中在人上。展览搭建在一所即将拆除的废弃学校里，利用学校剩下的材料，搜集大量有时代烙印的家具器皿，已经远去的生活被再次“重建”。电视机里，正在播放一个男人情绪激动地讲述自己和警察打架过程的真实录像。20世纪90年代激进的保护生活原生态的人，类似今天的“钉子户”，波兰语里有一个指代词——“斯沃特”，指那些认为住宅本来就应该免费的人。他们有一定组织规模，采取暴力与警察打架，与政府对抗。一个年轻“斯沃特”女孩被人用残忍手法杀害，公众普遍把她作为私有化进程里的牺牲品代表。另一边，90年代的波兰私营企业大量兴起，一个角落被布置得有如一个新的投资者办公室，椅背上搭着灰色的化纤西服，小玻璃板组成的窗户透出黄灰色的天空。

这些艺术元素观照人的内向性，是因为制度变化在人的心里制造了危机。托马斯·富达拉（Tomasz Fudala）是华沙当代艺术馆的馆长，他说，“重建”这个主题，让波兰人对私有制里的人性和非人性有了非常大的争论。当今社会法则以所有权为上，人们习惯于对统一规划诸多挑剔。消费主义的咒语在波兰失灵了。贫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数低，全国只有一个LV

店。华沙独此一栋俯瞰全城的豪华公寓，带精装修的房价大概合2万元人民币一平方米。

伏尔泰曾把欧洲国家分为“等着被了解”和“主动去了解”两类。区别至今仍在，权力、繁荣、机构都在欧洲大陆的最西端，心理版图上的欧洲大国还是德国。“欧洲对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意味着什么？他们的国家1000年来属于起源于罗马基督教的欧洲部分。他们参与欧洲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对他们而言，‘欧洲’一词并不代表地理现象，而是代表等同于‘西方’一词的精神理念。”米兰·昆德拉尽力诠释的“中欧”，为这些地处东欧、却文化认同西欧的小国家带来一个绝非地理，而是价值的观念。

在20世纪80年代，波兰乃至整个东欧，在这个交界上焦虑丛生。托尼·朱特曾说，成为塔林或布拉格那样“被审美”的地方，对于东欧国家来说并不是个好名声。昆德拉说历史是征服者的历史。波兰不能离开欧洲历史之外，却只能做牺牲品和局外人。不管多么不情愿，也必须承认真正影响甚至定义了华沙现当代地标的，还是来自苏联的礼物——“科学文化宫”。3年前我第一次来华沙时走马观花，一进门那种水磨石地板，冷调大白光，很多年里一直被要求拆除。20年过去了，波兰人接受了科学文化宫作为城市景观、标志建筑 and 实际用途，作为历史的遗存也能审美。因为彻底进入欧盟、“申根”，波兰的身份认同感的焦虑不再急迫了。

波兰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还没有被脸谱化。或者说旧的脸谱早已经模糊暗淡，新的样貌还没来得及定义。

马厩里的“瓦特”主义

到波兰最特别的招待，是去别林斯基贵族的郊外宫殿的马厩。该国100多年内的现代历史和创造，波兰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波兰生活尽在其中。有趣的是，尽管主管安娜·马加（Anna Maga）反复向波兰外交部声明，这里的情况并不适合向外宾展示，但依然挡不住特殊的参观。车子行驶过华沙郊外非常原生态的森林，才到达了这片不对外开放的宝库。天鹅从远处的河边静静迎向桥上的客人。11年前，国家博物馆的库房被迫搬到了这里，展品中生活杂项类最不被重视。宫殿本身地处偏远，政府意在打造另一个旅游目的地。可是私有化以后，别林斯基家族近年来与政府协商成功，将在两年后要回这举国知名的宫殿和巨大的森林，

原本政府装修好的宫殿，也只能“内部参观”了。

还来不及为美景感叹，就被一尘不染但层叠堆放的“杂物”震惊了。第一次接触波兰的艺术设计领域往往觉得元素太杂，既能发现模仿西欧的语汇，也推崇本国六七十年代的独特风格。但只要在这个以2.5万件家具、布料、瓷、玻璃组成的仓库里，侧着身子以最小幅度的动作和最轻声的语言，看一上午，一个世纪以来的波兰人的真实生活就如同彩色默片一样生动起来。很多设计元素来自于波兰20世纪初，特别是“二战”前的思想和意识。最早的藏品制作于1917年，我看到30年代很多色彩丰富的家具产品，让人联想到宜家。有一把不锈钢的方方正正的椅子，用整张小鹿皮裹得漂亮极了，来自“一战”后波兰总理的夏季别墅，是特别为他订制，可惜别墅尚未投入使用战争已经开始，只有这把椅子被人抢出，其他的均遭战火荼毒。这个当时最时髦的设计品，今天看起来也独一无二。

博物馆收藏的沧海遗珠极多，目前最有知名度的，是一把叫“RM58”的椅子。这把原本像一个黑色蚕豆瓣的圆胖胖的椅子，贯穿了我在波兰的好几处探访。椅子极轻，优雅时髦，在波兰是炙手可热的经典设计代表作。这是波兰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完全使用工业

材料做出的第一件家具。今天这椅子受到世界范围的赞美，不仅是国家博物馆，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也已收藏。华沙美术大学的副校长帕维尔·诺瓦克（Pawel Nowak）接受我采访时自豪地介绍，正是该校学生2012年在学校奖学金的支持下，才把这个1958年的经典设计重新复刻了出来，目的就在于让设计进入每个人的生活，让人人都买得起经典。学生找到了最贴合、最经济的材料，颜色也变换多样，一推向市场就引起了抢购热潮。

罗兹设计节的主办人也很自豪，因为椅子的设计者罗曼·莫泽莱斯基（Roman Modzelewski）是罗兹设计学校毕业，并留校任教30多年，做教师期间设计了这把椅子。当时他的初衷只是希望学生们能因陋就简，因为1958年的波兰，物质匮乏，设计专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波兰面对的是市场封闭、材料紧缺，本着“有啥用啥”的原则，老师只是把椅子做了出来，没有条件做工业化生产的尝试。我后来在波兹南一家设计酒店大堂巧遇这把椅子，立刻试坐，曲线触感简直好像有吸力。

“一个完美守住的秘密”是西方带有惊喜地发现波兰的评价。不管是鹰经济，还是“欧洲的中国”，波兰在政治体制改革后明显得到了最快速的发展，而且他们还幸运地少走了弯路。取代曾经的煤矿、木材和纺织产业的，是今日最蓬勃的家具设计制造和服装设计制造，从大而重，走到小而美的波兰。2009年金融危机降临，欧洲经济出现负增长（-4.1%），欧盟各国只有波兰是正增长，这与欧洲对波兰“秘密”的接纳密不可分。

波兰的设计家具年出口额，2014年官方数据是80亿欧元，去年的数字估计已超过100亿欧元。其中欧洲市场尤其是德国占出口额一半，法国和意大利排在第二、三位。有意思的是，2009年以前，对于整个欧洲来说，波兰是一个没有设计行业的国家。当年申请加入欧盟时，波兰打出的一张王牌就是时装业。“为了让他们相信，我们也是欧洲家庭的一分子。”我遇到了波兰设计界最有名的广告人亚切克·克拉克（Jacek Klak），他既不代表政府也不代表商业，而是纯粹因为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了25年，我们共进了一顿早餐。他告诉我：“结果遭到了嘲笑。西欧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要是穿得像波兰人，意思就是这衣服陈旧僵化得简直可以穿进棺材，是上个时代的老古董。”“二战”后波兰时装厂只有一个，几十年里只生产三个式样的西服。

左图：RM58椅子。1958年波兰经典设计，近年被复刻

右图：罗兹时装周已经举办了7年。这个曾经的欧洲棉纺织中心，转型成新的欧洲小精品设计店聚集地





可是现在波兰设计为什么能满足西欧的口味？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当中，消费主义在波兰没掀起什么价值观的暴风雨。老牌奢侈品在波兰传播的时间不长，波兰人对这些商业神话完全没有认同感。借助低成本的优势，反倒是波兰推陈出新，不断吸引着“西方”，设计的源头之一就在罗兹。

“好莱罗”复兴

波兰斯基在回忆录里描写罗兹——“这里的化工厂和纺织厂昼夜冒出烟雾，使整个城市上空漂浮着一层炭黑色的物质。汽车污染、外层剥落的墙壁和破碎的玻璃窗也构成罗兹特有的风貌。”19世纪的罗兹是波兰的淘金地，从伊拉克、乌兹别克斯坦进口棉花，制作成棉纺产品出口到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土豪遍地，工厂林立，使这里成为仅次于芝加哥发展速度的城市，人口数量达到欧洲第二。那些德国制造的

老机器依然能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好莱罗”是电影爱好者的口头语。1947年，波兰政府决定在华沙以外最有条件的城市重建电影工业。罗兹至今最漂亮的建筑之一——纺织大王、犹太人波兹南斯基的私人宫殿，就被用来做了罗兹电影学校的教学楼。学校门口有一块列宁的语录牌：“对我们来说，电影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重要。”根据波兰斯基的回忆，在战后资金全面短缺的情况下，学校设备精良、人员充足，教师们个个出类拔萃，而且学生和教师的比例，简直好像客人在豪华大旅馆里接受服务员的服务一样。这使得罗兹电影学院成为欧洲最好的电影学院之一。“红白蓝”三部曲的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也毕业于此。

90年代，罗兹的人口从80多万下降到70多万，这让罗兹政府非常紧张。罗兹政府官员对我说：“前些年说自己来自罗兹是不好意思的。”在近20年的时间里，罗兹城市的样貌被工业定型。灰色的罗兹在



犹太纺织大王波兹南斯基的棉纺厂建筑群近年改造成“Manufaktura”，包括购物中心、酒店、博物馆和开放的公共空间。罗兹人第一次有了欧洲城市习以为常的广场

“二战”后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到了1989年以后又逐渐停产。尽管罗兹在战争中也死亡了42万人，但工厂设备硬件和建筑却破坏不大。“二战”后波兰曾有人建议迁都罗兹。在波兰全国都逐渐恢复了生机活力的大背景下，罗兹的完好导致它的建设总排在波兰最后一位。

我上了两处罗兹厂房的楼顶，一次是在波兹南斯基巨大工厂区改造的“Manufaktura”，另一次则是比邻火车站的一个工厂改造项目。因为使用一种环保清洗剂，眼前的棕红色砖结构厂房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最时髦的城市广场。原来棉纺织厂的消防蓄水池被设计成酒店的游泳池，复杂完好的水系管道则做成了欧洲最长的室外小喷泉，间杂着色彩明丽的公共自行车锁车带，和与之统一的彩色视觉标志。曾经因为没有广场而自卑的罗兹人，终于有了一块前所未有的公共空间。“Manufaktura”除了制造，也包含“手工”的意思，这个“实体口号”被推崇的背后，是对大量技术工人专业能力的赞美。“身份认同是近年来政府最重要的一个导向，在于加强人的自豪感。”

轻工业的氛围，制造业的美感，是近几年来罗兹逐渐从衰败里苏醒的关键。在罗兹，无论是一个裁缝，还是一个设计师，“面对材料时毫无畏惧，并且自信于把概念付诸实践”，是我在棉纺织厂改建的旧资料馆里看到的一句话。罗兹人不是抛弃工业时代，而是重新认识和改造生活本身。罗兹是一个像纽约一样分成条块街区的城市，并且只有一条拿得出手的像样街道，报业大亨、银行家、奢华旅馆的旧楼仍在。可是

这条市中心很古老的步行街，尽管花了5000万兹罗提修缮，却依然不如“Manu”那样醒目、轻松和气派，连店面租金都非常便宜。我有半个小时漫步在这条古老的街道上，可以看到鲁宾斯坦的出生地，和他弹钢琴的雕塑，还有许多让人怀想19世纪繁华的人物塑像。可是这里的财富和活力真的与制造业矛盾吗？

我发现在老步行街两边，不同的区域有一些不太起眼却很独特的小精品时装店，大多一店一个自由小品牌，服饰设计款式都颇有意思，面料质量也不错，价格中等。“二战”以后，罗兹保留了波兰最重要的轻工业中心地位，乃至整个中东欧，罗兹都是轻工业大本营。1989年以后，大工厂开始衰落亏本，但是从事服装业的人却一直数量巨大。

从意大利和法国来的设计，从设计稿到产品生产完毕再到欧洲上架销售，罗兹可做到两个半星期完成。这正是欧洲时装产业无法舍弃波兰的原因。单就服装制造成本，波兰是德国的三分之一。Robert Cavalli 90%的外套，都是在波兰罗兹的同一个工厂做的。Hogoboss也在波兰制造了20多年，其高端产品的生产线也在罗兹。“罗兹成了欧洲时髦人来买衣服的地方。欧洲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影响，现在的人越来越不崇尚品牌。这里的设计很个性，价格不是特别贵。”“罗兹生产”成了一个服装设计界的暗号。外地人和新企业，被“Manufaktura”这种气氛吸引而来。罗兹近几年是波兰工程项目最多最集中的城市，而且政府投资总能带动一些周边新的私人投资进入，同时在申办2022年的世界博览会。

迷哈尔的梦想

波兰斯基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用电影为波兰注入了艺术与精神的新语汇。至今人们仍在关注《钢琴师》与《辛德勒的名单》在人性上的不同底色，斯皮尔伯格还是一个美国人的乐观，而波兰斯基更绝望。在融入欧洲的过程中，东欧曾经被认为是失语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两生花》里，波兰的维罗妮卡嗓音动听喜爱唱歌，然而却一唱高音就会死去，结果她出场不到三分之一处，就在正式舞台的高音挥洒中死了。朱特认为波兰创造了最重要的哲学和艺术，但波兰语这种奇怪的文字却把其包围了起来。从字母上看波兰语用的是拉丁字母，拼写完全是斯拉夫语系。如果不通过这层语言屏障，就无法进入波兰语的世界。坚持用波兰语写作的米沃什说，波兰语不像俄语，波兰诗歌

无法像普希金的诗歌那样力量强大、形式夺人，永远镌刻在人的记忆里。一比较英语、法语作家，他就更沮丧，而且觉得波兰文学是小圈子文学，而不是严肃文学，波兰还没有一部可以与它的悲剧历史相对称的文学作品。

不到30岁的米哈尔·皮尔尼科维奇（Michał Piernikowski）对我说他有一个梦想的时候，我正看着他选出的去年最流行的波兰设计节上年轻人最钟爱的英语口语：“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那也就不算问题了。”波兰人骨子里有贵族文化的浪漫主义，因此崇法。公费去法国留学后，渐渐地米沃什才相信：“我这一部分欧洲在法国人的脑海里是一片空白。波兰人从小被灌输着拿破仑的传说，法兰西眼中的波兰却是农业的不幸和孤绝。”1951年他从波兰驻法大使馆一等秘书职位上出走，逃亡巴黎，却一直坚持使用波兰语写作。“我想我是害怕失去自己的身份，因为当我们变换语言，我们就会变成另一个人。”米沃什说。

年轻波兰人并不想“变成另一个人”。他们无不在寻找波兰式的表达。波兰设计也带有一种天然的叙事感，有论文甚至证明了肖邦叙事曲是受到了密茨凯维奇叙事长诗的影响。米哈尔作为罗兹设计节的发起人上了顶级设计杂志的封面。“我只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觉得，闭门造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波兰最大的建筑设计杂志《Architektura-Murator》的主编埃瓦·珀乐布斯卡（Ewa P. Porebska）告诉我，2010年开工建设的住宅有69万栋，在欧洲简直是了不得的数字。“设计，不是为了政府和商家，而是为了‘人’本身。”设计节每一年都找一个波兰人关心的话题，今年是“安全和舒服”，去年则围绕食品。10年前波兰餐厅还不多，人们也不习惯外出就餐。现在城市氛围改变，餐馆林立、口味多样。一顿普通西餐，包括红、白葡萄酒，前菜、主菜和甜品，价格大多在数十元人民币，贵不过100元，其中包括米其林一星和米其林候选餐厅。餐厅消费成了波兰人生活里新的领域，因此催生了与食品相关的设计节。“不太贵而人人都用得起”是一个主要理念，全国甄选有意思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产品。培养发现年轻设计师是一个动因，另外带动了波兰人“向自我”审美，恢复文化自信的感受。

另一个现象是7年前就有了罗兹时装周，到现在举办了13次。和设计节一样，在繁花似锦的产品之后，成为名家大师并不是这些比赛者的目标，也不评比名次，所有的设计者和企业能迅速找到彼此，并在

市场上立足。“我们希望波兰人发现，波兰本地也能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说华丽极简也好，或者说，好看、便宜、有趣的想法可以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书籍到沙发、暖气、台灯、护肤品等等，不一定非要去买批量生产的宜家，设计应该被购买和应用在生活里。好的设计也不应该分三六九等。”波兰年轻设计师们曾经反复讨论过波兰设计的共性，结果发现共同点是：“大家都希望自己设计的东西更实惠，‘务实’。”无论生活消费品还是服装。米哈尔说：“接下来谁获得了中国的注意，谁就是王。”

“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来讨论和评估我们周围的世界。”我在波兰一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看到这样的宗旨，“新的语言”，是一种“共同的语言”，为了帮助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波兰”。密茨凯维奇曾经说，拜伦对东欧文化最大的启迪是：“他是第一个向我们表明，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离他的时代100多年过去了，现在波兰又一次得到了“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的机会。

“曾经是伟大的，现在显得渺小。/王国衰败如覆雪的古铜。/曾经是能够猛击的，现在不再猛击。/天上的星球流转，照耀。/伸趴在河岸上的草地上，/如很久很久以前，我放走我的树皮船。”米沃什的诗在我坐火车到波兹南的路上特别清晰地变成了眼前的画面。我正赶上波兰建国1050年的节日，总统、总理全都到了波兹南来共襄盛会。大教堂里挤满了祈祷的人群。当年波兰王子受洗，在波兹南建立了波兰这个天主教国家，波兰就取消了贵族头衔。“二战”后波兰政府第一个重建的就是华沙久负盛名的大教堂。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经度上最接近西欧，到柏林不过300公里距离。

重新确认身份、寻找语言、建立生活的波兰人，都对我讲了一个重要事实：“感觉越来越好。”朱特认为，是交通让一个真正完整的欧洲正在形成。“不是东欧去了解西欧，而是相反。”欧洲大陆比较拥挤，城市间距离短，地面交通更受欢迎，铁路成为无可争议的、持续的公共投资目标。波兰城市无一不在强调自己在欧洲的交通地位。从中国成都开出的火车只要12天就能到达波兰罗兹。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已经加入了美国籍，他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国的居民，与其说存在于空间，不如说存在于时间里。”波兰所处的这个“中欧”空间里，历史上最坏的恐惧，一直以来最好的思想，如今最大胆的雄心，将逐渐展现。☑

一场商业， 艺术和科技的混搭

文 / 杨聃



它是一种活的艺术形式，
我们所有人都置身其中。

大都会博物馆“手工 x 机器：科技时代下的时尚潮流”展品：



1
2
3

1. 香奈儿 2014 秋冬高级定制礼服
2. 迪奥高级定制“Vilmiron”礼服
3. 艾里斯·范·荷本作品



上图：“手工 x 机器”策展人安德鲁·博尔顿
 下图：压轴的碧昂丝身穿纪梵希鱼尾服



当地时间5月2日晚，被认为是时尚界的“超级碗”或奥斯卡的Met Gala(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在纽约举行。这场在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的隆重项目是为了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服装馆(又称时尚馆)募集资金，难怪时事评论员保罗·威尔莫特称其为“时尚馆提款机”。

从1999年开始，由联合主席和博物馆长期伙伴安娜·温图尔操办，她在2015年成功帮博物馆筹得了超过1250万美元。据《纽约时报》消息，今年的慈善舞会的门票售价为3万美元，而品牌想要承包一桌则要付27.5万美元。

即便付得起门票，Met Gala的门也不是那么好进的。和纽约市芭蕾舞晚会或富力克美术收藏馆青年舞会等其他文化募捐不同，参会者必须手持邀请函。据说候选名单也不短，有资格接受邀请的人不仅要有相当的经济基础、声望和成就，作为时尚盛典，美貌也是被评估的一个方面。对所有邀请和参与者，温图尔有最终决定权。



1



2



3



4

2016 年大都会博物馆慈善晚宴上的嘉宾礼服

1. 卡莉·克劳斯身穿 Brandon Maxwell 礼服

2. 肯达尔·詹纳身穿范思哲礼服

3. 克莱尔·丹尼斯最切题的 Zac Posen 礼服

4. Zac Posen 采用的光学纤维织面料一旦进入黑暗空间就自成光源

5. 嘉露莲娜·库高娃的变色 Marchesa 礼服裙



5

所以在社交日程上，当晚占据了显要位置，通常着装谨慎的明星名人们会乐意在红毯上试一试有主题的时装冒险，帮她们制作战袍的设计师们也将陪伴在侧。即便有主题，明星们也只是鼓励遵守，因为大家都明白美不美才是最终标准。

就像 2013 年，莎拉·杰西卡·帕克和麦当娜都“严格”遵守了当年的主题“朋克，混乱到高级定制”，可飞利浦·崔西的鸡冠帽、涂鸦长袍和渔网短裤都遭到了大规模的非议。事实上，今年两人的境遇也出奇地相似，穿着 Monse 的杰西卡·帕克和穿着纪梵希的麦当娜又纷纷被吐槽了。

差点忘了，此次的着装要求是“tech white tie”（科技白领结），然而，大部分出席开幕晚宴的人穿得更像星球大战或者硅谷毕业舞会。以主持人之一的泰勒·斯威夫特为代表的“盔甲灰”色系被理解为机器人的颜色而频频出镜，金·卡戴珊把自己穿成了弗里茨·朗在 1927 年的黑白经典电影《大都会》中的机器人玛丽亚。

当然，真正切题的着装也有。比如女演员克莱尔·丹尼斯，她身穿的 Zac Posen 礼服裙真正“点亮”了她自己。Zac Posen 采用一种光学纤维织出了欧根纱面料，在灯光和阳光下看似是一条普通的蓝色礼服，经典的抹胸收腰设计，一旦进入黑暗空间，这条裙子就自成光源，变成了一条夜光裙。

模特嘉露莲娜·库高娃的变色 Marchesa 礼服裙是与 IBM Watson 超级计算机进行合作设计的，礼服上每朵花都是一个 LED 灯，有 5 种灯色，根据推特用户对 Met Ball 的评论改变灯的颜色。同具匠心的还有业界营销达人伴侣安得烈·萨菲尔和丹尼尔·本尼迪克的 LED 燕尾服。

虽然艾玛·沃特森的复古 Calvin Klein 礼服看起来没那么特别，甚至有评论人认为她裤子外面的裙摆显得多余。然而，这正是它的用意。文森特的造型师沙拉·斯勒茨基在 Instagram 上写道：“在 Eco Age 的帮助下，这件由三种织物编织而成的 Calvin Klein 五件套作品完全是用回收塑料制成的。”不仅如此，礼服的拉链也是用回收金属制成，内衬是有机棉。

可循环的概念不仅在于材质上，也体现在设计上。“服装的设计也出于未来的搭配考虑，裤子可以单穿，裙摆也适用于其他红毯。”文森特表示，“真正美的设计应该被反复展示。”

今年晚宴和展览的赞助商是苹果公司，其首席设计官乔纳森·保罗·伊夫成了这间科技巨头公司和活动之间的联络大使。虽然在红毯环节，有科技感的着装要求被名人们的光环模糊了，但科技的影响力已经从嘉宾名单中的大多数名字上体现了出来，其中包括 Instagram 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凯文·斯特罗姆、Yahoo 首席执行官玛丽莎·梅耶尔、Tesla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当然除了伊夫，少不了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苹果公司创

始人史蒂夫·乔布斯的遗孀劳伦娜·鲍威尔·乔布斯等贯穿晚宴流程始终的苹果公司代表。《时装商业评论》还饶有兴致地数了数当日佩戴 Apple Watch 的客人数量：女士中至少有 10 人佩戴，而男士因为将手表隐藏在袖子里难以观察。

如此热闹的红毯让人差点忘了，一切都是为了大都会博物馆“手工 x 机器：科技时代下的时尚潮流”（Manus x Machina: Fashio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的开幕。这场展览由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装学院主办的展览从 5 月 5 日起对公众开放。

“时尚科技”（fashion-tech）这个词诞生可能还不到 10 年，但在“手工 x 机器：科技时代下的时尚潮流”展览上，许多展示服装的诞生时间都早在 20 世纪之初。策展人安德鲁·博尔顿坚信：“从开始到现在，时尚一直是一个率先拥抱技术的行业。”

像巴黎高级时装业的创始人查尔斯·夫莱戴里克·沃斯、埃米尔·平艾特和雅克·杜塞等早期工坊都是依靠当时新推出的缝纫机才制作出了服装。这场展览的一个主要灵感来源就是伊夫·圣·罗兰在 1965 年创作的蒙德里安裙（Mondrian Dress），除了手工锁边之外，裙子几乎全部由机器制成。

尽管在时尚界对手工和机器一直以来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手工制作比机器制作更有价值，但在某些方面，展览体现了手工和机器的此消彼长。在人们



6

6. Lady Gaga 又把自己穿成了最差着装之一
7. 艾玛·沃特森穿着由回收塑料制成的复古 Calvin Klein 礼服



7

急于把现下时尚和科技的协同效应推上新闻头条时，博尔顿强调的是时尚与技术的长期关系。

他挑选的这 170 件展品颇具挑衅意味。“我将重点放在那些沉迷于手工、沉迷于机器以及沉迷于将两者结合的著名设计师的身上。”博尔顿说，“传统意义上，高定和成衣的区别就在于手工或机器制作。但最近这种区别越来越模糊，因为这两者都接受了彼此的方法和技术。”

最能够体现博尔顿意图的展品是一件香奈儿 2014 秋冬高级定制礼服。它由潜水针织面料打造，后摆上则装点着刺绣。其巴洛克风格的设计首先是由手工勾勒，再用电脑制作出像素化的图案，然后用手绘上金色金属颜料，再与莱茵石一道转印。最后，珍珠和宝石经手工刺绣至面料之上，历时 450 小时完成。成品的数字化版本被投影在屋顶上，周围回荡着布莱恩·伊诺的《An Ending (Ascent)》。

刺绣、羽饰、花卉贴花、褶皱、蕾丝、皮革制品……博尔顿通过不同的制衣工艺将这些高级定制和高级成衣分门别类，往往展示的是其演变的过程。譬如，在刺绣展区，陈列着三件黑色的吊带礼服。第一件来自 1935 年香奈儿的高级定制版本，装点着手工刺绣的黑色胶状亮片，一面呈磨砂亚光状，一面则为闪亮光泽。第二件，是马丁·马吉拉在 1996 年的合成针织成衣，其上印着数码印花的错视亮片图案。最后，他用设计师盖斯奇埃尔（Ghesquière）为路易威登 2015 秋冬系列制作的一件成衣来总结前两件展品，因为它结合了两种技术。

除此之外，有一间展厅着重展示了服装原型的坯布和纸样，而另一间展厅则还原了传统高级定制时装屋的模样。整个展览的结构有些像狄德罗和让·勒朗·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这试图赋予制衣工艺，艺术、科学等量齐观的视角。

观展者能看到创作时装的过程，无论是由手工、机器还是两者结合，都十分有序。“时尚的步伐太快了，”他对《时装商业评论》说，“如今对艺术家、设计师以及背后复杂的过程都没有什么欣赏，因此展览的一部分目的是希望将其变慢下来，让人们聚焦于时尚的制作过程。”

然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视角和理解。伊夫看到的是马瑞阿诺·佛坦尼和马克·雅可布等展品之间的联系。他表示，科技产品总是试图让人们察觉不到他们对解决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这就是设计师的工作：解决问题、向前探索，但绝不会把用户拖到问题中去。

说到“科技”往往令人联想到基于软件、设备的数字化，但同时它也是根植于迭代进行创新的思维模式。这或许是很多时尚品牌在谈论要像科技公司那样思考的原因，就像温图尔所说的，“他们有多迅速，就有多创新”。

即便可穿戴设备的呼声更高，博尔顿并没有迫于压力把重点放在这里，在他看来“那些东西没什么审美吸引力”，相比于一件外套穿上后能告诉你会有多热的这种科技概念，他更感兴趣的是激光切割或超声波焊接之类的技术本身。

博尔顿总结了 20 世纪以来，融合了手工与机器制造的最佳案例莫过于侯赛因·卡拉扬的遥控时装、三宅一生的蒸汽拉伸褶皱、艾里斯·范·荷本的硅制羽毛裙以及其 3D 打印的高级定制。“作为缝纫机来说，3D 打印很具革命性。如果有了合适的材料，你就能在家里用 3D 打印出自己的夹克和裙子了，这是最终极的定制服，所谓定制就是要关乎合身。”

在大部分工作可以被机器代劳的前提下，人的价值是否还存在？对此，博尔顿认为，即便机器承担了制作的角，但在背后设计和编程的仍然是人。“如同任何艺术实践，有那么多出于错误导致的美丽和意外发展。我对一台机器是否有将错误转变成创新语言或者词汇的能力表示怀疑。”就像弗里茨·朗的电影《大都会》在开头和结尾的警句：“头与手之间的调停者必须是人心。”博尔顿同样认为：“手工和机器之间的调停者必须是人心。”

刚刚上映的纪录片《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一》试图撇去浮华表面，追问时装为何又如何占据了我们的文化和经济中如此被高估的位置。时尚是艺术，还是商业？若两者皆有，是否能和平共存？博尔顿对后一个问题表示肯定。他承认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不只是星光熠熠的 Met Gala，依靠明星宣传设计师的时尚界本身也是如此。

“某些时候，时尚和明星挂钩并不一定是好事。明星的光芒反而盖过了她们身上的服装。”博尔顿对《华盛顿邮报》说，“无论是外界的批评家，还是内部的部分策展人，在那些对时尚有偏见的人看来时尚深扎根于商业，而非艺术。”但事实上，从大都会博物馆的其他主题馆的油画和雕塑中都能找到与之相关的元素，艺术史研究人员用他们的服饰来辨别其身份阶层和社会活动。“时尚馆总能吸引更多的人，因为它是一种活的艺术形式，我们所有人都置身其中。”
(本文参考了《时装商业评论》对大都会展览的相关报道)

全新高尔夫·嘉旅重新定义生活

全新高尔夫·嘉旅正式上市

2016年5月6日，一汽-大众通过线上形式宣布：全新高尔夫·嘉旅正式上市。此次全新高尔夫·嘉旅共推出1.6L、1.2T、1.4T三个排量8款车型。

随着中国汽车消费文化和消费观念的成熟，兼具大空间、实用性、运动性、多功能于一体的车型愈发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城市年轻家庭更是需要在上下班、自驾游、私人聚会、家庭用车、商务出行等情景下的转换，一汽-大众敏锐洞察市场需求，带来了一款“都市多功能两厢车”——全新高尔夫·嘉旅。它集高尔夫优质基因和更多实用功能于一身，既拥有运动基因和纯粹性能，又具备宜家、宜商、宜旅的全能品质，完美契合了城市年轻家庭多生活方式的需求，开辟出一个全新的细分市场，引领一种全新的用车潮流。

全新高尔夫·嘉旅基于大众最新的MQB平台打造，它传承了世界级传奇车型高尔夫42年的品牌积淀和纯正的血统，集更大空间、更多功能、更高性能、更优秀的舒适性及操控性等多重优势于一身，将为那些追求高品质生活，希望在家庭、个人生活以及工作之间自由切换的年轻家庭开启人生“最嘉旅程”。

Better 设计 颜值与实用完美平衡

一辆既可以出席高端商务酒会，又可以载三五好友出去旅行的座驾，必须同时具备“动感颜值”与“实用空间”这两大条件，SUV往往在运动中失去了高雅，轿车端庄有余而动感不足，MPV空间够大却不上档次，而全新高尔夫·嘉旅都做到了！

作为第七代高尔夫的衍生车型，全新高尔夫·嘉旅在传承大众汽车经典品质和高尔夫运动精髓的基础上，以高车身、直后背、短前悬等元素大大增加了车身尺寸，不仅使整车外观看上去更加大气、动感，同时也全面提升车厢内部空间的实用性，实现了颜值与实用的完美平衡。

Bigger 空间 承载多样精彩生活

全新高尔夫·嘉旅最显著的亮点在于车厢内部的优越大空间，乘坐空间更宽敞，坐姿更高、视野更好。灵活多元的空间布局，实现了乘坐和储物空间的最大化、最优的乘坐舒适度、最大的储物空间以及丰富的空间组合，充分满足家庭日常、外出旅行、商务出行等多种用车需求，让用户尽享多面掌控、多样精彩的惬意生活。

Stronger 动力 高尔夫优良血脉流淌

高尔夫家族一向以运动著称，由于采用了和第七代高尔夫一样的MQB平台，全新高尔夫·嘉旅完美地传承了高尔夫家族动感设计、德系品质、强劲动力等所有的优质基因。新车搭载了大众最新一代EA211发动机，以更小排量创享更低能耗，以更大扭矩带来澎湃动力。EA211系列全铝发动机在降低车身重量的同时，大幅提高了燃油经济性和环保性，既减轻了年轻家庭用车的成本，又为绿色出行做出了贡献。

新车在研发、生产过程中严格遵循大众集团的苛刻质量管理体系，在高密度抽检与严格检测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全新高尔夫·嘉旅获得了欧洲E-NCAP五星安全评分。

More 科技 雕琢惬意科技生活

在当今追求高品质生活方式、尽享驾驶乐趣的用车趋势下，全新高尔夫·嘉旅集众多领先科技、人性化舒适配置，全面优化了驾乘体验，让驾乘者在忙碌的事业中暂且放慢脚步，安心享受智能科技带来的惬意时光。

时间成就经典，创新铸就传奇。如果说高尔夫品牌开创了一段传奇，那传奇因创新而更加伟大，而全新高尔夫·嘉旅的出现便是这种伟大的再次开始。作为集合多重优势于一身的创新之作，全新高尔夫·嘉旅完美胜任当今消费者在家庭、商务、自驾游乃至更多情景的多重用车需求。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借其宜家、宜商、宜旅的全能品质，高尔夫的运动基因和纯粹性能，全新高尔夫·嘉旅定将续写高尔夫品牌新的传奇。



谁是药品的主人？

主笔 / 袁越



德国制药公司勃林格殷格翰是全球主要的生物制药 CMO 企业。图为勃林格建在德国南部小城比伯拉赫的生物药生产基地

今年初开始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药品的属性，中国制药业即将迎来一场大变革。

迟来的救命药

魏则西之死引发了公众对肿瘤免疫治疗的关注，但一部分人关注的重点出现了偏差，癌症免疫疗法替某些医院背了黑锅。

从治疗方法上看，肿瘤免疫疗法大致可以分成细胞疗法和药物疗法这两大类，魏则西采用的是细胞疗法当中的一种比较旧的方法，此法临床试验效果不佳，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被正式批准在付费的病人身上使用，任何有偿提供这一疗法的医院都是违法的。但是，肿瘤免疫治疗的药物疗法近几年取得了重大突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已经批准了三种基于“免疫检查点阻断”的抗肿瘤药物在美国

上市，用于治疗某些特定类型的癌症。其中有两种是针对 PD-1 的单克隆抗体药物，从目前的情况看疗效相当不错，前景广阔。可惜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迄今为止尚未批准任何一种免疫治疗药物在国内上市，中国大陆的癌症患者只能耐心等待。

好消息是，国内有好几家药企都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恒瑞医药和泰州君实生物的 PD-1 单抗临床试验申请已经获批，其余若干家药企的申请至今尚未获得批复，百济神州（BeiGene）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家成立于 2011 年初的生物技术公司，创始人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晓东博士。这家公司致力于探索和开发新型抗肿瘤药物，早在 5 年前就已着手研究肿瘤免疫治疗药物。他们研制出来的 PD-1 单抗比后来在美国上市的同类产品在结构上有了一个重要改进，起码从理论上讲疗效会更好。

“已上市的 PD-1 单抗能够和巨噬细胞表面的 Fc 伽马受体（Fc Gamma Receptor）相结合，导致后者被激活。巨噬细胞是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被激活

的巨噬细胞会把那些原本应该去和癌细胞作战的免疫T细胞吞噬掉，抗癌效果很可能会受到影响。”百济神州政府事务部总监、美国杜克大学生物医药工程博士黄鑫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我们公司的科学家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早在2011年就开始研究如何去掉PD-1单抗分子上的Fc伽马受体结合位点，避免巨噬细胞对于T细胞抗癌作用的干扰。这个设计方案在去年9月份出版的《癌细胞》(Cancer Cell)杂志上首次发表，迅速获得了被公认为PD-1祖师爷的戈登·弗里曼(Gordon Freeman)教授的认可。”

但是，一种全新的药物，无论看上去多么完美，都必须通过临床试验的检验才能被允许上市。百济神州研发的这个代号为BGB-A317的PD-1单抗连在国内开展临床试验的许可证都还没有拿到，更别说上市了。

全世界绝大部分发达国家对于新药的临床试验申请采取的都是备案制，药企只需要在相关管理部门备案，如果在一段很短的时间(美国是30天)内没有异议，就可以开展临床试验了。中国采取的是申报制，没有药监局的批准，药企连开始试验的资格都没有。药监局受理这类申请所需要的时间往往又很长，导致中国药企在和国外同行的竞争中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事情还没有完。即使百济神州拿到了临床试验的批件，试验的结果也很满意，中国患者仍然还要等很长时间才能用上这种新药，原因就在于现行的《药品管理法》规定，新药申请人如果不是生产企业的话，只能取得新药证书而无法取得批准文号。换句话说，百济神州如果想让BGB-A317在国内上市，就必须先建一个制药厂才行。这家公司在创立初期既没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经验，又没有建工厂所需要的大笔资金，没有条件成为自己研发的新药的主人。

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国外却是有这个条件的，原因就在于国际上普遍实行的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rketing Authorization Holder,简称MAH)制度，这个制度将上市许可和生产许可分离了，上市许可持有人可以将药品委托给生产企业进行生产，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均由上市许可持有人对公众负责。

这个制度虽然听上去有些拗口，似乎只是关于药品生产的细节问题，但对于百济神州这样的小型生物技术公司来说却是天大的喜讯，这就意味着他们只需要找到一家生产企业，能够按照他们的要求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就可以以上市许可持有人的身份进行最终的上市注册了。

2013年，百济神州和德国制药公司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 Ingelheim,以下简称“勃林格”)签订了合作协议，由勃林格担任百济神州的合同生产提供商(Contract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简称CMO)，全面负责PD-1单抗的生产。勃林格是全球排名前20的制药业巨头，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生物制药CMO是其主业之一，全球排名前20的制药企业当中有15家都和勃林格有类似的合作关系。

“我们之所以选择勃林格作为合作伙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丰富的单抗药物生产经验，是全球主要的生物制药CMO企业。”黄鑫对本刊记者说，“我们的PD-1单抗最终是想卖到国外去的，国际上一直对中国制药企业的产品质量存疑，和勃林格这样的国际大公司合作可以增加新药获批的概率。”

在勃林格的帮助下，百济神州很快就在澳大利亚开始了I期临床试验，截至目前已经在100多位癌症病人身上试用了。相比之下，中国的临床试验许可直到现在还没批下来，不知还要等到何时。

一种有可能救命的新药，就这样被耽搁了下来。

谁是药品的主人？

出了问题就要改。2015年1月，CFDA改组，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毕井泉出任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正式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同年底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和有关问题的决定》，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北京、上海和广东等10个省(直辖市)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几天之后，CFDA便公布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方案(征求意见稿)》，业内一片欢腾。

“原来的那个注册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只适用于当时的仿制药审批，没有考虑创新药的问题。”沈阳药科大学的杨悦教授对本刊记者说，“新的《试点方案》的核心就是鼓励创新，这就首先要求我们在制度上必须和国际接轨。”

中国医科大学邵蓉教授也向本刊记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员学成回国，纷纷在‘北上广’等地的科学园区成立生物技术公司，从事新药的研发工作。这些人擅长搞科研，不太擅长搞生产，资金往往也比较缺乏，要求他们投资建厂不但不现实，也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

两位教授都是国内研究MAH制度首屈一指的专

家，对这个制度的来龙去脉和优缺点都有很深的体会。据她们介绍，旧的制度大大提高了制药领域的准入门槛，一名科学家很难从自己研发的新药当中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于是绝大多数科学家要么早早就将自己的专利卖掉，业内俗称“买青苗”，要么只能和大药厂合作，变成对方的雇员，从而失去对药品的控制权。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药品经营者私下与生产企业达成秘密协议，由后者出面去申请药品的批准文号，但实际的控制权掌握在前者手中。调查显示，中国药品行业存在很多这样的批准文号隐形持有人，并因此而屡屡出现产权纠纷等情况，给管理部门造成了很大麻烦。

旧制度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强迫所有试图进入制药行业的投资者都必须自建工厂，于是全中国各个省市纷纷上马建造药品生产线，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2011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中国医药企业的总体设备利用率不足一半，大量生产设备处于闲置状态。

上述两条缺点都属于药品经营的范畴，对于消费者，也就是对病人来说影响没那么直接。在杨悦教授看来，MAH改革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建立了主体责任制度，明确了“药品的主人到底是谁”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这条才是最重要的。

“《试点方案》明确规定，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就是药品的主人，必须对药品的全生命周期，包括研发、生产、临床应用和不良反应监测等所有阶段承担全部责任。”杨悦教授对本刊记者说，“过去中国政府不相信企业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因此把责任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政府成了所有药品的实际主人。新药的临床试验许可要政府批，上市许可要政府批，药品生产过程所需的原料药和辅料要政府批，包装材料要政府批，上市后可能出现的技术转让和委托生产等等问题也全都要政府批。从某种角度讲，政府这么做相当于为企业做了个担保，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处于很被动的地位，缺乏主动性。”

在新的MAH制度下，政府只需要负责一个审批，那就是上市许可，之后这个药的主人就是上市许可持有人了，出了问题他必须负全责。就拿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疫苗事件来说，问题疫苗出事的原因是冷链失效，毛病出在了运输环节上，生产者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干系，但如果把责任全都推给工厂也是不公平的。现在好了，这个疫苗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就是疫苗的主人，他必须负责一切，冷链自然也包括在内，出了问题找他就行了。

邵蓉教授举了一个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假设你买了双耐克鞋，刚穿一天就坏了。你根本不用管到底是生产厂家质量不过关，还是商场保管不当，或者是运输过程出了问题。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你根本不必知道这些细节，直接找耐克公司总部索赔就行了。”

药品比球鞋复杂得多，很多环节都可能出问题，有些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和生产企业的质量管理无关。比如某些药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当初临床试验时没有出现过的新情况，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药物警戒计划来加以管理，该赔偿的赔偿，该撤市的撤市。即使真的撤市了也不等于这个药就完蛋了，可以进行适当地修改，减少不良反应之后再恢复上市，这就是国外药企所面临的生存环境。

但是，所有这些政策都需要首先明确药品的主人是谁，否则很难实行。

因为药品的特殊性，药的主人可不是那么好当的。MAH制度允许任何机构甚至个人成为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因此有人担心科学家只懂科研，没有能力和财力对药品的全生命周期负责，当不好药品的主人。黄鑫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百济神州已经做好了升级的准备，如果有新药被批准上市，他们会立即招募合适的人才把这个药全方位管起来，做好新药的主人。

“国外很多大的制药公司也都是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一点一点做起来的。”黄鑫说，“只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合理的制度作为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

作为药品的消费者，不少病人担心国家放松管制之后，制药厂为了赚钱，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视药品质量。杨悦教授认为事实很可能正相反，因为国外的经验已经证明，只要惩罚机制到位了，一旦被查出问题就重罚，企业承担的风险甚至比过去更高了，因此也就会比过去更加重视产品质量。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制药界越来越认可‘质量源于设计’这个理念了。”杨悦教授补充道，“新的政策鼓励上市许可持有人从药品生产线的设计开始抓起，通盘考量，事实证明这么做将会大大提高药品的质量，最终造福消费者。”

生物药的特殊性

前文说的都是创新药的情况，但不可否认，中国目前仍然只是一个仿制药大国，MAH制度改革对于仿制药行业会有哪些影响呢？

“MAH改革对于仿制药行业更有利，因为目前中

国有很多仿制药企业不具备研发实力，只懂生产，这样的企业要想进入仿制药行业，原来只能自己申请批准文号，这就导致中国仿制药上市申请积压严重，药企怨声载道。”杨悦教授对本刊记者说，“改革后像这样的药企可以转行做贴牌工厂，专心替别人生产。”

邵蓉教授同意这个看法。“从国外的情况看，创新药的委托加工有可能会担心泄露技术秘密，而对于仿制药来说这个问题就没那么严重了，所以MAH改革其实更适合仿制药。那些具备仿制药研发实力的机构或者企业在申报的时候可以借助别人已有的生产线，不必另行建设，所以这个制度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好事。”

仿制药大致可以分为小分子化学药和大分子生物药这两大类，中国目前主要仿的是前者，虽然质量仍然存在问题，但毕竟已经仿了很多年，积累了一些经验，问题还不大。但是生物药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游戏规则和化学药完全不同。

“简单地说，生物药指的是蛋白质类的药物，其分子量比化学小分子大几百上千倍，结构也更复杂，几乎不可能用化学合成的方法进行生产，只能借助于生物体自身的蛋白质合成能力，用活细胞来生产。”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提奥多·丁格曼（Theodor Dingermann）教授对本刊记者解释道，“因为用的是活细胞，每次生产出来的终产品都不会完全一样，所以生物仿制药通常不叫仿制药，而是被称为生物类似药（Biosimilar），其监管程序也和小分子化学仿制药完全不同。”

丁格曼教授是研究生物类似药的专家，他向本刊记者详细解释了生物类似药的特殊性。就拿百济神州的PD-1单抗来说，这是一种蛋白抗体，分子量约为15万道尔顿左右，相比之下，小分子化学药的分子量通常不到1000道尔顿，两者的差别从这两个数字就可以想象得出来。

不但如此，单克隆抗体在从细胞器中合成出来后还要进行再加工，比如糖基化、磷酸化和硫酸化修饰等等，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这种再加工的科学术语叫作“翻译后修饰”，只能在活的哺乳动物细胞中进行，百济神州的PD-1单抗就是如此。最终的产物也不是某个单一的蛋白质分子，而是一系列结构和修饰方式略有不同的蛋白质混合物。更复杂的是，无论生产条件控制得多么严格，每一批次的产品都会有差别，无法做到完全一样，再好的工厂也只能保证不同批次之间的差别维持在某个事先界定的范围内。

因为上述这些原因，像PD-1单抗这样的生物类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提奥多·丁格曼

似药的生产过程极其复杂，技术含量非常高，一般的小工厂玩不起。

本刊记者日前专程前往德国南部小城比伯拉赫（Biberach），参观了勃林格建在那里的生物药生产基地。整个生产车间都是全封闭的，我们只能隔着玻璃参观。车间的主体部分是几个足足有三层楼那么高的不锈钢发酵罐，其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管道，让人眼花缭乱。哺乳动物细胞就是在这种发酵罐里生长繁殖的，终产物（比如抗体）会分泌到培养液当中，再经过进一步的纯化和浓缩，成为最终的药品。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提纯出来的蛋白质还要经过一系列检测，保证其生物活性达到一定的标准，同时其毒性和免疫原性也被控制在某个范围之内，这才可以注射到病人体内。

中国目前还没有这种规模的生物药工厂，百济神州虽然能在自己的实验室里生产出少量的样品，但要想生产出足够多的样品供临床试验使用，就必须投资建厂，或者和勃林格这样的CMO企业合作才行。事实上，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大分子原研药和生物类似药研发领域的广阔前景，勃林格才决定在上海张江建造一个生物药生产基地，其服务对象就是类似百济神州这样的生物技术公司。双方的合作为中国众多的科研人员，以及有志于进入高科技制药行业的小公司树立了榜样。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作为保障，这就是为什么CFDA的这次MAH改革试点方案在中国医药界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的原因。

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中国市场上的药品即将从原来的全部国有变成部分私有，一部分中国药品的主人即将从国家转为个人，就像市面上大多数商品一样。

大家准备好了吗？

用 DNA 追寻欧洲的起源？

——一位历史学家的生物学之旅

主笔 / 陈赛



(刘学红 摄)



人类总是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的自己与世界。这无可避免。因为人类是一种历史存在 (historical being)，我们的认同、我们认为自己是谁，都与过去有很深的关系。关于过去有很多迷思，有些有用，有些危险，我的目的是尽可能准确地呈现历史。也许我的研究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但人生就是复杂的，人类的存在也是复杂的。任何形式的简化都可能是一种危险的扭曲，被丑陋的政治所利用。

——帕特里克·格里

左图：美国著名中世纪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格里教授，任职于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计划邀请来华讲学

右图：从古墓中提取的古人骨样本被送到位于佛罗伦萨和图宾根的实验室里，进行严格规范的基因提取与测序

墓地、人骨与欧洲的起源

见到帕特里克·格里教授之前，我对他的研究抱着一种颇为浪漫的想法。

作为一位中世纪历史学家，他的研究主要涉及 5~9 世纪西欧人口、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从 2013 年开始，他领导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地发掘“伦巴第人”墓地，从这些 6 世纪的古人遗骨中提取 DNA，以研究早期中世纪史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即伦巴第人越过阿尔卑斯山自北向南迁徙的问题。

根据古典后期的史料，伦巴第人是 1 世纪生活在易北河口附近的一个人群。在这个名字出现在 1

世纪的史料中之后，他们就从文献记录中消失了整整 300 年，直到 6 世纪初，一个有着同样名字的人群出现在今捷克和匈牙利境内。他们征服了如今属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大块土地，之后又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半岛北部，于 568 年到 774 年间统治意大利的一片广袤地区。

是否真的存在从德意志北部到意大利的大规模迁徙？如果是，规模有多大？意义有多重要？移民对当地居民和文化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取代了当地居民，还是对其进行统治并快速地与之融合？

在与中国学者的一次座谈中，格里教授谈到“伦巴第”项目只是开始，他们真正的目标是一幅 5~6 世纪的欧洲基因地图，以寻找欧洲内部以及欧亚之间人口迁移的证据。“现代欧洲的基因地图没有显示明显的人口迁徙，但我很想看看 1500 年前的‘大迁徙’时代，情况是否有所不同？”

格里教授是受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计划之邀来中国访学的。在史学界，以基因治史还是一种非常新鲜、饱受争议的方法，所以他的中国之行吸引了不少中国的同行前来切磋。也正因如此，我才知道，原来国内已经有不少类似的研究，比如吉林大学考古系从 1998 年开始就与分子生物学系合作展开古 DNA 的研究，他们有中国最大的古人骨标本库，收藏了 2

万个古人骨样本，横跨 20 多个省、自治区，100 多个古代墓地、遗址，年代从 8000 年前一直到明清时期。

那些阴森森的人骨和墓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印第安纳·琼斯和《犯罪现场调查》的调查员。格里教授虽然颇受恭维，但还是摇摇头，说自己的工作更像是“管理一个小型的跨国企业”。

“我们有考古学家在匈牙利和意大利发掘，清洗和处理两处古墓地发掘出来的东西。但这些都是很平常的墓地，不像中国古代帝王的墓地，没有宝藏，只有 50 个到几百个坟墓，深埋地下，有一些武器，几乎没有珠宝。”

然后，这些提取的古人骨样本会送到位于佛罗伦萨和图宾根的实验室里，进行严格规范的基因提取与测序。提取古人 DNA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机生物死亡后，核苷酸的长链条断裂，其 DNA 会碎裂为数百万个越来越小的片段，同时还会受到其他物种 DNA 的污染，比如土壤中的细菌。

所以，当科学家从一块人骨中提取 DNA 时，会将样本里的 DNA 全部提取出来，但其中绝大部分 DNA 不属于人类，而属于死后附着在这块人骨之上的细菌和其他微生物。所以，过滤并拼合这些 DNA 的过程有点像是在玩虐待狂制作的拼图游戏。格里的同事曾经在伦巴第墓地里发现了亚洲基因，大吃一惊，后来才发现因为装人骨的塑料袋是中国制造的。但是，有时候这些 DNA 里也可能包含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比如一批科学家从 5000 多年前的亚姆纳亚人的遗骨里发现了鼠疫杆菌的 DNA，从而揭示了几千年以来鼠疫杆菌的起源、进化和传播。

格里教授告诉我，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和人口基因学家一起，盯着电脑屏幕做计算——人类基因组 30 多亿个位点，原则上每个位点都有各自的祖先，这意味着极为巨大的运算量。

“以前，历史学家的主要工作是面对历史文献上的几行字，但现在，我们要面对极其庞杂的数据。”这种转变绝不容易，但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多学这些方法，不是为了成为科学家，而是为了成为这些技术“聪明的消费者”，知道如何识别好的科学与坏的科学，并如何将这些技术正确地置入自己的研究。

美丽与陷阱：当历史学遇上生物学

半个多世纪前，当格里还在读高中的时候，他以为自己会成为一名生物学家。当时的美国还笼罩在太

空竞赛的狂热之下，科学被认为是唯一重要的研究项目，生物学虽然不像物理学那么了不起，但也是值得学习的。但是，当他上了大学，却迷上了历史、哲学与文学，尤其是中世纪抓住了他，因为其中陌生又熟悉的气质——“中世纪与我们这个时代如此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欧美的文化与社会传统都源自于它。即使在当代社会，二者之间的张力仍然充满了创造力。”

50 年后，当他重新回到生物学，不再是带着对宏大生态系统的兴趣，而是希望利用基因技术解答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一个传统历史材料（文献和考古证据）无法解答的问题——欧洲中世纪所谓的“蛮族入侵”真相。

在欧洲历史上，很少有比罗马帝国的衰亡更迷人的问题，或者用更时髦的现代术语，罗马帝国是如何“转变”成各个独立的、被视为西方现代各国之先驱的蛮族王国的？

无论是德国学者所说的“民族大迁徙”（Völkerwanderung），还是法国学者坚称的“蛮族入侵”，数百年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争论这段时期从帝国边界向腹地迁移的人口的规模、性质和影响。但中世纪史的问题在于，历史学家极少能发现新的文献；考古学家虽然发现了丰富的材料，传递的信息却模糊不明（人们对物质文化的解读往往会大相径庭，特别是在何种程度上墓葬遗物和下葬习惯这类文化标记能反映出民族与社会身份），所以，格里说：“我想找到一种新的方法，超越简单的文本与考古证据的争论，而基因技术刚好提供了一种新的资源。”

提取古 DNA 技术的创始者是一位叫斯万特·帕珀（Svante Paabo）的瑞典科学家。他的治学之路与格里教授恰恰形成有趣的对比——他最初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埃及考古学家。他对于这种职业抱着一种浪漫的幻想：发现木乃伊、金字塔之类。他甚至在大学选修了埃及学。但梦想很快撞上了现实。70 年代德国的埃及学有着强烈的“语言学”倾向，研究的是古代象形文字。他无法想象这样度过一生，于是改学生物学。但对于考古与埃及的迷恋之心不死，他一边做着病毒的研究，一边想着有没有可能从千年干尸身上提取基因。如果可以，这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研究历史的方式。

1997 年，他带领一群科学家从 4 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骨中提取了数百个 DNA，震惊了全世界。

此后，惊人的消息接连不断。2010 年，他们先是破译了尼安德特人的全部基因组。在与现代人类的

DNA做了全面比对之后，发现除非洲人之外的几乎所有现代人身上都有1%~3%的尼安德特人DNA。

几个月后，他们又从西伯利亚洞穴里一个7岁小女孩的指骨(3万多年前)中提取到完整的基因组序列，发现属于一个全新的人类种群——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一样，丹尼索瓦人很可能也在与智人的竞争中灭绝，但他们一小部分的基因仍然流传了下来，大洋洲的美拉尼西亚人是现代人类中唯一还带有显著丹尼索瓦人血统的人群。

斯万特·帕珀的兴趣在于进化——关于现代人如何离开非洲，散布到世界不同大陆的各个角落，怎样一步步产生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样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基因变异如何影响人们思考、表达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比如消化牛奶(乳糖)的能力——这是一种典型的变异，成年人类本来不能吸收乳糖。

格里教授的兴趣则在于“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某一中世纪墓地里的死者之间是如何关联的？墓葬是如何组织的，按照血缘、性别、身份或者其他形式？具有某种特定文化传统(包括衣物、墓葬等)的社群与另外一种不同文化传统的相邻社群之间是否有广泛的通婚现象？”

事实上，将基因技术应用于2000年以内的人群，这在之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2000年尚不足以构成进化意义上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现在，整个欧洲人口的基因结构看起来几乎没有不同。

但是，最近几年古基因提取技术的进步神速，科学家已经能得到越来越多的数据，进行越来越精细的分析与比较。他们还在尝试将基因分析应用于更短的时间段内——几十年或者几代人的时间。“可以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很接近法政基因学了，就像你在《犯罪现场调查》里看到的。”格里教授说。

当第一批检测结果出来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同一个墓地里，有两个人的基因与其他所有人的基因构成都很不一样，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这美吗？”他问，“这不像打开墓门，发现美丽的东西。但这是新的证据、新的知识。如果我们不做这个研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而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基因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

格里教授的第一本书《中世纪偷盗圣人遗骨的人》

(*Furta Sacra: Thefts of Relics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是关于中世纪偷盗圣人遗骨的窃贼，其中有盗墓的僧侣、洗劫教堂的商人、到处搜寻罗马古墓的文物贩子等等。

我问他，如今他是不是也像当年中世纪的小偷一样，很想得到那些圣人的遗骨？

他笑着说：“是的，也许我们会发现那些遗骨根本不是人骨。或者看看散落在不同教堂里的同一个圣人的遗骨是否真的来自同一个人，大概也会很有意思。但我不确定它有多大的历史价值。我一向更感兴趣人们如何看待这些遗骨，这些盗窃行为背后的社会与文化背景，而不是这些遗骨到底是什么？”

同样，在今天这个对身份政治多少有点偏执的时代，人类血统不仅仅是生物学的问题，而是高度跨学科的问题——事关人们如何思考自己与祖先、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思考“我是谁”，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其中必然涉及不同族群、身份的认同，以及社会制度、权力关系和文化背景。

是的，基因能告诉我们文献无法提供的许多信息——比如这些人的外貌、社会结构、亲属关系、健康状况等等。

但是，也有很多信息是基因无法告诉我们的，比如动机、思想……

文献记载，伦巴第国王阿博文离开潘诺尼亚地区(Pannonia，范围包括今天的匈牙利西部、捷克和奥地利东部)，南迁意大利。

“我们有一个名字、一个国王、一个起源神话。也许不正确，但这些文献告诉我们为什么和他们是这么想的。据说一个对皇帝不满的罗马将军邀请阿博文一起进攻意大利。打败了之前的统治者——Gepid国王之后，他娶了国王的女儿，割下国王的首级，做成了一个酒杯。在一次酒席中，他喝醉了，对他的王后说，‘为你父亲的记忆干杯’。于是，她谋杀了他。”

“这是一个好故事。它真的发生了吗？我们不知道。但这个故事一定对伦巴第人很重要。因为他们在讲述和传递这个故事。这些故事里有他们对于自己最根本的理解。”他说，“你不可能在基因里找到这些故事，你也不会找到那个头颅做成的酒杯。”

在给北大学生的一场讲座里，格里教授花了更多的时间来解释以基因治史的陷阱，而不是机会。

他认为，基因技术的确产生了大量的新数据，但这些数据并非解决历史问题的终极方案，也不是就比文献或考古证据更准确可靠。“所有的证据都需要人



瑞典进化遗传学家斯万特·帕珀。任职德国莱比锡马克斯·普朗克协会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是提取古 DNA 技术的先驱人物

的阐释。对任何一种数据而言，这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而基因数据尤其如此。”

比如遗传学家倾向于以自然单元来对待他们的研究对象，往往对其背后复杂的语言、政治、文化元素视而不见。正如英国遗传学教授马克·乔布林（Mark Jobling）在《皇家学会哲学交流》（*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的一篇文章里中所写的：

基因学家在数据里观察到一种模式，并寻求解释时，一般会跑去图书馆，找出一本历史书，找到一段关于过去的历史，似乎这样就可以解释他们看到的这些模式。

比如，2010年，一群韩国科学家宣称在蒙古东北2000年前的匈奴贵族墓地发现一名“西部欧亚人”，并由此推论“匈奴人的种族宽容”。而他们的依据只是在该男性DNA中找到Y染色体R1a1和线粒体U2e1。基因分析真的能证明一个人来自欧亚大陆的某个特定区域吗？能证明他说印欧语吗？能证明匈奴人的种族宽容吗？

事实上，不只遗传学家如此，文学、神学、哲学、历史，太多的著述和研究都是简单地从往昔选取材料以确认当前的偏见。所以，就他自己的研究而言，最大的陷阱可能就在于，认为他们正在研究的这些人骨就是“伦巴第人”。

“你很难不谈论‘伦巴第墓地’，但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给我们的样本赋予历史的、政治的或民族的标签。”

历史文献上说，伦巴第国王统治这个区域，这是否意味着他统治下的所有人都是伦巴第人？考古学家在他们的墓穴里发现符合伦巴第风格的武器、珠宝、墓葬仪式，但这能说明这些遗骨的主人认为自己是伦巴第人吗？或别人认为他们是伦巴第人吗？也许伦巴第只意味着精英武士，而社会其他阶层有别的身份？万一“伦巴第人”是一种政治派别呢？就像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你能从基因上判断谁是民主党，谁是共和党吗？

即使尼安德特人、纳图芬人、雪维洞穴、哥贝克力石阵，都不过是现代人为他们取的名字。我们也许

在他们的墓穴里发现了某些典型造型的生活用具，但我们对于他们的信仰、梦想一无所知。他们使用同一种陶器，就意味着他们认同自己都属于同样的社会吗？

按照这样的逻辑，如果现在一场灾难突然将北京埋于地下，1000年后才重见天日，未来的人们以北京地下出土的汽车残骸来推断过去发生了什么，他们会以为21世纪早期的北京是被日本人占领了。为什么？因为你找到了无数的丰田汽车残骸。然后，他们还会推断，日本人口扩散到全世界，因为日本汽车无处不在。

当然，听到这里，人们也许已经开始打呵欠了，冲着“解密历史”而来的媒体也已经失去了兴趣：你们到底是不是研究伦巴第人？

“我们只能说，我们研究的是6世纪生活在罗马帝国边境的军事人口，我们在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使用这种墓葬风俗的人口与同样区域里不同墓葬风俗的人之间的关系。至于这些人是谁、哪些是真正的伦巴第人、今日意大利人中哪些人是伦巴第人的后裔、蛮族入侵是否摧毁了罗马帝国、欧洲是否应该改变当前的移民政策，这些都不是基因研究能够回答，或者应该回答的问题。”

对他来说，这项研究的魅力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也许会推翻他们之前所有的想法，或者实验根本无法导向任何有意义的结果。但这是一场赌博。

“很有可能，我们找到的不是什么纯粹的族群，而是非常非常混合的族群。在考古学家所谓的‘伦巴第人墓地’和传统罗马墓地的人之间也许根本没有什么明显的基因差异。这意味着什么？伦巴第侵略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吗？还是说，罗马与伦巴第的区别不在他们的身体里，而在他们的大脑里？”

“我们必须意识到，将基因/生物学带入认同的讨论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他告诉我，“尤其是当欧洲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的时候。”

2010年匈牙利国会议员秋季选举之前，极右翼政党（匈牙利国会的第三大政党）的一个候选人请一家名为NagyGen的医学诊疗公司为他做DNA测试，以证明他没有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血统，而是一个纯种的马扎尔人。这份测试报告宣称，在该候选人基因组的18个点上的检测表明，他的祖先中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吉卜赛人。

两年后，法国总统竞选，又有候选人在陈述中提到：法国人都曾在496年接受国王克洛维斯一世的洗礼，1500年过去了，这一群人薪火相传，其熟悉的身份成为一个民族的灵魂。言下之意就是，那些祖先没有受过克洛维斯洗礼的人（如犹太人和穆斯林），便不是真正的法国人。

是的，人以群分，但分群的标准各不相同，比如家族、阶级、宗教。

耶稣的早期追随者说：“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所有人都是基督奥体的一员。”也就是说，在宗教身份面前，这些古代社会最根本性的差异都不算什么。

因为某种历史原因，从19世纪开始，在欧洲，寻求与过去的祖先的认同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对中世纪有一些很浪漫化的想象。他们阅读关于这些古人的文献，在帝国内部寻找自己的身份。他们自认为属于一个遥远过去的纯粹族群，有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可以将民族的源头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法兰克、伦巴第等英雄祖先。这些祖先在蛮族入侵罗马的时候来到欧洲，在这里占领了神圣的领地，从此也拥有了对这片领土永恒的权力。

于是，对于欧洲人口起源的理解变成了一个非常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出于对这段历史以及由这段历史继承下来的权力的信仰——关于他们与祖居土地的关系、与邻国的关系，人们不惜兵戎相见。他们会说：“我们没有选择，我们继承了历史，也继承了朋友和敌人。”

“这种信仰一直被政治家、演说家、宗教领袖们反复利用，在其中寻找某种政策、理念、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从某种角度而言，欧洲三场可怕的战争都与它有关。”

比如1870年的普法战争，争端始于拥有丰富铁矿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人认为那应该是德国领土，因为那里的人民是德国人，说德语；而法国人则说，身份不是由血缘或语言决定，而是由人民的意愿，由政治和文化身份决定。

“一战”始于欧洲南部和中部的民族解放运动。奥匈帝国的崩塌伴随着民族身份意识的觉醒，他们认为自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族群，拥有独特的语言、历史、文化，因而应该享有独立的政权。

“二战”的爆发原因有很多，但种族主义是其中之一。“日耳曼民族是优越、高级的人种，犹太人、吉卜赛人则属于劣等人种，应该被消灭或奴役。”这时候他们强调的是身份的纯粹性。■

人为什么爱喝酒？

文 / 袁越

头晕、恶心、呕吐、失忆……这是大部分人喝醉后的常见症状，想想就难受。微醺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但会影响人的运动和平衡能力，还会让人丧失警惕性和判断力，对于一个猎手来说属于致命缺陷。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的猎人祖先们喜欢上了喝酒呢？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酒精可以助性。电影里男女主角都喜欢在酒吧里堕入情网，鸡尾酒往往也会取个性感的名字，比如“石榴裙下”之类的。报纸杂志上经常可以读到关于喝酒有助于提升性能力的文章，曾经有位著名的西方性学专家在专栏中列出了喝酒助性的四大理由，包括提高性欲、增加勃起的硬度，以及延迟射精时间等等，都是男人们最希望获得的能力。

且慢端起酒杯！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的话，会发现绝大多数这类文章都没有相应的科学论文作为支持，即使有的话也是发表在三流期刊上的质量很低的论文，而且相当一部分都是由酒厂赞助的项目。

即使论文本身抓不住把柄，这类研究也很不可靠，因为凡是涉及性的研究都非常难做。人类的性行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绝不仅仅是生理反应而已。酒精在性生活中的作用和喝酒的方式很有关系，实验室是重复不出来的。性反应的强度也很难测量，只能依靠受试者自己的回忆来打分，其准确性可想而知。

既然饮酒既不能提高生存率，又不能增加繁殖力，人类为什么仍然爱喝酒呢？答案要从酒精（乙醇）分子在人脑中的作用机理去寻找。研究显示，酒精可以作用于大脑中的四种分子，通过它们改变人类的精神状态。

第一，酒精可以提高大脑中 γ -氨基丁酸（GABA）

的水平，这是一种常见的中枢神经抑制剂，水平越高人就会越放松，其作用类似于神经科医生常开的安定（Valium）和安诺（Xanax）等镇静剂。服用这类镇静剂的患者常常出现头痛、嗜睡、乏力、行走困难和言语含糊不清等副作用，和醉酒很像。

第二，酒精可以降低大脑中谷氨酸（Glutamate）的水平，这是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和GABA的作用正相反。酒精正是通过对这两个分子的调节，抑制了中枢神经的活动。其中，主要负责理性思维的前额叶皮质被抑制后反而会让人失去理智，做出冲动的决定，这是因为被抑制的前额叶皮质失去了来自其他部位的约束，只会专注于自身，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喝酒的人反而会觉得自己的头脑很清晰，虽然在外人看来事实正相反。

第三，酒精可以增加多巴胺（Dopamine）的含量，这是调节大脑中“奖赏回路”的主要分子。毒品之所以让人上瘾，和多巴胺很有关系。一些人之所以会喝酒上瘾，也是因为酒精提升了多巴胺水平的缘故。

第四，酒精会促进大脑释放脑啡肽（Endorphin），脑啡肽又名内啡肽，是一种属于阿片类（Opioids）的小分子。懂英文的朋友从这个词的词根就可以猜出，它和鸦片有点关系。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酒精会让很多人感觉舒服的主要原因。

广义上说，这四种小分子都属于介导性的神经递质，来自外部的、与生存和繁殖有关的信号（比如食物、水和性伴等等）必须通过这些小分子的介导才能作用于大脑，让大脑产生兴奋、抑制和喜悦等各种不同的感觉，并以此来指导身体，做出相应的反应。经过多年的优胜劣汰，这套反应系统已经进化得十分完善，身体所做的反应都是对自己的生存有利的。酒精直接作用于介导分子，这就相当于劫持了这套反应系统，让人可以在没有看到食物的时候就产生和吃到美食同样的喜悦，这就是为什么酒虽然对提高生存率没有帮助，人却喜欢上了喝酒的原因。

远古时期的人类并不掌握酿酒的技术，只能在腐烂的水果里尝到一点点酒的味道，问题还不小。随着农业的诞生，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具备了大规模酿酒的条件和能力，酒精的威力才显现出来。从实际效果来看，真正喝酒上瘾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人还是能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喜悦，什么是被劫持的喜悦。但对于那些分不清两者区别的人来说，喝酒的后果往往很严重，必须引起重视。■



从量子纠缠到量子计算

文 / 苗千

人类从认识量子现象到建立起量子理论，距今已经过去了 100 多年的时间，如今，人们正试图利用这种大自然的运算方式建造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将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但量子现象究竟是什么？如今人类是否理解了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般的远距离作用”的量子纠缠现象？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说清楚。从本期开始，将尝试以一系列专栏文章来对此予以解答。

“这一刻代表了量子云计算的诞生。”2016 年 5 月 4 日，IBM 研究主管阿文德·克里希纳 (Arvind Krishna) 这样评价 IBM 刚刚推出的量子计算平台——IBM 量子体验 (IBM Quantum Experience)。这一天 IBM 公司在沃森研究中心 (T.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 首次宣布，大众可以通过云技术使用电脑或是移动设备登录这个量子计算平台运行算法和实验。

这个消息使量子计算机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IBM 公司研究量子计算机有些独特的意味，在 1981 年，正是 IBM 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共同召开了第一届量子计算会议。在会议上，著名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 (Richard Feynman) 号召人类开始研究量子计算机：“自然界并不是经典力学的，如果你希望能够更好地模仿自然界，你最好利用量子计算，而且这像是个很棒的问题，因为它看起来可不容易。”费曼从物理学家的角度希望研制出量子计算机从而更好地模拟自然界，但 30 多年之后，在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流行的时代，人们更关注的是量子计算机所展示出的强大计算潜力，这在电子计算机的发展逐渐接近极限的节点尤为重要。

IBM 公司的网页上写道：“我们正在书写计算历史的新篇章。”传统的计算模式已经逐渐接近到它的极限，“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 18 ~ 24 个月便会增加一倍”的摩尔定律支配了人类半导体产业长达半个世纪，但是近年来电子器件的集成化速度已经开始显著减慢，人们预测在 2035 年左右，摩尔定律将彻底失效，传统的集成电路达到极限。人们自然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量子计算上，从自然界的运算方式、量子力学中寻找远超传统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在我们所生活的宏观世界中，人类的行为由经典力学所决定，因此我们处理信息的方法也是“经典力学式”的，即使是到了纳米尺度的电子计算机也是以“经典”的方式处理数据。但是在原子量级，自然界的规律是由量子力学所决定，这与传统计算机利用不同的电压代表“0”和“1”两个数字进行存储和计算有本质的不同。量子计算的基本单元“量子比特”(qubit) 利用量子力学的“叠加态原理”，可以同时代表“0”和“1”两个数值，并且利用概率进行计算，这使它的计算能力与传统计算机之间将出现指数级别的差异。

IBM 并没有像 D-Wave 公司一样声称开发出了量子计算机，而是宣布开发了一个量子处理器，相比量子计算机的规模要小得多。这个量子处理器主要由在硅片上 5 个金属材料制造的超导线圈构成，以格子结构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下工作。虽然 D-Wave 公司在 2015 年制造出了 9 个量子比特构成的计算机，但 IBM 的 5 量子比特处理器的架构和测量方式都与之不同，这不仅代表了 IBM 量子计算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展示了他们研究通用型量子计算机的计划。

目前尚不存在通用型量子计算机 (D-Wave 量子计算机也只能执行一些特定的计算任务)，但是 IBM 公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在未来 10 年中开发出 50 ~ 100 个量子比特的中等量子处理器。目前 5 个量子比特的处理器可能还不能进行真正的工作，这个 IBM 量子体验平台更多还是用于展示目的，但如果能够研制出哪怕只有 50 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其计算能力就堪比目前世界上前 500 名的超级计算机，这正显示了量子计算的潜力。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量子计算研究所的教授大卫·科里 (David Cory) 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在 IBM 量子体验平台上运行一个实验，他对于这个系统的稳定性感到十分惊讶，对于每一次实验，系统几乎都能够给出同样的结果——在传统计算机上这个结果固然无奇，但是对于一个量子系统来说，则是一个了不起的展示，量子计算是对于概率的捕捉，能够进行稳定的运算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克里希纳介绍：“量子计算机与目前的计算机的差别极大，不仅在于外观和材料，更重要的是它们能

够做什么。量子计算正在成为现实，而它把计算能力延伸到了远超传统计算机可以想象的地步。”卓越的计算能力将使人未来在药品研发、材料研究、人工智能、大数据搜索、天气预报、解读 DNA 序列、预测股市、模拟分子运动等各个领域都实现飞跃。

增加量子处理器中的量子比特数目，最终制造出含有大约 10 万个量子比特共同工作的通用量子计算机，是量子计算机研究人员的最终目标。实现这样的理想绝不容易，首先量子比特的状态极为脆弱，如果你试图观测一个量子比特的状态，它就会发生“退相干”（decoherence），只呈现出一个确定的数值，因此量子计算过程只能在人类无法观测的状态下进行。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一旦发生退相干，量子的叠加态就会发生塌缩，量子计算机最多只能退回到传统计算机的水平，而当量子计算结束，人们又需要利用退相干过程进行测量，把量子过程转换为经典状态以取得一个确切的数值，这需要极为精确的控制。传统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器件工作的能量差别在 1 万倍以上，这使得量子计算过程中检测和纠错极为困难。无论是哪种材料制造的量子比特，都非常容易受到外界

环境的干扰，热扰动、电磁波的影响都很容易使量子比特的运算发生错误，目前即使是只有几个量子比特共同工作，也很难检测和纠正它们出现“比特翻转”（bit-flip）错误，研制多个量子比特都能够正常工作的通用型量子计算机，是否具有有效的量子纠错系统是关键。

量子计算已经展现出了远超传统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和应用空间，它接受输入，通过最终的测量给出一个输出值，但是它的运算过程则是完全无法控制的，无法观测的量子态，这是自然界真正的运算方式。正如费曼所预想的，利用量子计算机将可以更准确地模拟大自然。尽管如此，量子计算也只是利用了量子力学中最为神秘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进行计算，它为人类真正理解量子态带来了新的机会。量子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波函数中为什么会有虚数“i”出现？波函数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量子叠加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量子纠缠的本质又是什么？人类又是如何利用最令人迷惑的自然现象，一步步地搭建起计算能力超群的量子计算机？这就需要从量子现象中最令人感到迷惑的量子纠缠谈起。■

《读书》2016 年第五期目录

- | | |
|----------------------------------------------------|-----------------------|
| 江晓原 穆蕴秋 “影响因子”是用来赚大钱的 | 余婉卉 《吴宓日记》中的老温德 |
| 李大兴 抚琴弦断上高楼 | 品书录 |
| 黄纪苏等 庙堂高耸，人间戏场 | 记忆、爱与死亡（刘倩）· 怡情悦性 |
| 李喆 “数”拓新土 道不远人 | 天天谈（王正宇）· 粉红系，治愈系（黄荭） |
| 短长书 | |
| 人的大脑何以研究人的大脑？（王一方）一个人、一辈子、一件事（陈飞）反学校文化与工人的子承父业（彭斌） | 潘家恩 双面的浪漫与多维的乡愁 |
| | 赵稀方 从未到来，却已过去 |
| | 蒋晖 “逆写帝国”还是“帝国逆写” |
| | 励轩 民国的汉藏佛教与现代国家 |
| | 赵志勇 百年风雨《春之祭》 |
| 傅谨 红伶残稿，可留真香 | 钟乔 《我的诗篇》：纪录电影与诗歌的对话 |
| 顾昕 印度版的市场与政府之争 | |
| 张治 “法漫”中的古物写生 | |
| 李建军 丹齐格对抗塞利纳：文学阅读与国家欺詐 | 丁宁 关联性：艺术史思考的一大纽带 |
| 许志强 谈论卡佛时我们在谈论谁 | 刘潞 “清明画谏”千古谜 |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墙上的那个洞

文 / 张斌



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室前负责人罗琴科夫博士

格里格耶·罗琴科夫博士，现身洛杉矶，本身就极像是“冷战”题材大片中的剧情。去年11月，罗琴科夫辞去俄罗斯反兴奋剂实验室负责人的职务，当时他面临的指控是销毁1400份俄罗斯运动员的尿样，以干扰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调查，试图帮助俄罗斯逃脱兴奋剂“举国体制”的恶名。半年后，罗琴科夫沐浴着洛城阳光，告诉美国媒体，之所以奋不顾身逃离祖国，皆因生命安全已经难保。

日后如果真有一部电影来展现新“冷战”之兴奋剂疑云的话，故事的开篇兴许会是俄罗斯反兴奋剂委员会首任主席以及前任主席2月先后离世，罗琴科夫似乎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就在左近。美国媒体小心翼翼地给了罗琴科夫一个称谓——自我放逐者，意在表白美国政府与此无关，而这位俄罗斯人来美后披露的一切，则对新“冷战”中交锋双方太具有实在的震撼感。简而言之，俄罗斯政府体系化地参与到了兴奋剂丑闻之中；索契冬奥会中，包括15位奖牌得主在内的几十名俄罗斯运动员的尿样曾经被神秘地替换掉，其操作手法绝对是《谍影重重》级别的。

罗琴科夫将索契冬奥会中俄罗斯的兴奋剂运作体系比喻为“像瑞士手表一样精密准确”，他们为俄罗

斯运动员研发了最新的兴奋剂供俄罗斯运动员服用以提高运动成绩，赛后还要抹除掉兴奋剂痕迹。“人们在庆祝奥运冠军诞生，而我们则处于快发疯的境地，忙着调换他们的尿样。你能想象奥运会是这么举办的吗？”罗琴科夫说。

在美国电影制片人的镜头前，罗琴科夫足足说了三天的时间，他的表达将成为一部关于兴奋剂题材的纪录片中最有杀伤力的内容。索契冬奥会前，罗琴科夫得到的指令是，一旦哪位运动员获得了奖牌，那就必须调换尿样。冬奥会期间，时近子夜，俄罗斯奥委会的一位官员会与罗琴科夫仔细核对名单并发出指令。

兴奋剂检测中心的124房间用来放置兴奋剂尿样，得到指令后，罗琴科夫和同事们在黑暗中点亮一盏孤灯，找出需要替换的尿样，挪至墙边，低身打开墙上的一个塑料盖子，将尿样送至隔壁125房间，一个不起眼的储藏室。随即，尿样被转移至旁边大楼内，俄罗斯特工部门要施展超高本领，打开尿样瓶的机关锁。锁住尿样瓶的装置由瑞士公司研发，一般人除非破坏瓶体，否则无计可施。特工部门功力不凡，将运动员几个月前的干净尿样瞒天过海替换了问题尿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送回实验室。

这够刺激吧，拍成电影才算过瘾。罗琴科夫透露，之所以如此操作，皆因举国上下都有“获胜的巨大压力”，而这压力来自谁，不言自明，包括越野滑雪和雪橇金牌得主在内的多位俄罗斯选手的尿样被从墙上的那个洞送到了特工的手中。在索契，俄罗斯总共获得33块奖牌，超越美国。

罗琴科夫在美发声后，俄罗斯政府第一时间出面予以否认，称所有事关兴奋剂的指责都是“毫无根据的”，没有实在的证据链，只靠一个人的表述，实难成立。至于说国家行政体制下的兴奋剂服用则被重点否认。罗琴科夫神秘到美，此时猛烈爆料，无疑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委员会不可能坐视不问，反俄势力只想坐实一件事情：这是一个肮脏的兴奋剂国度，里约奥运会必须将其拒之门外。如果罗琴科夫所言真实，那么通向特工世界的墙上的那个洞，让俄罗斯体育帝国大厦将倾。新“冷战”，就是如此你死我活。■

普京会不计后果替别国“挡枪”吗？

文 / 宋晓军

5月12日，当美国高调宣布第一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在罗马尼亚南部空军基地开始正式投入运营后，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军备控制事务的官员乌里扬诺夫（Mikhail Ulyanov）马上做出了回应。他不仅强调了美国此举是“扰乱了战略稳定”，而且还特别强调美国此举的性质——在我们看来，这违反了《中导条约》。俄罗斯官员如此表态，明显与一些国内媒体评论此事时把重点放在“俄罗斯将如何强硬反制”上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差异说明了什么呢？

同一天，《今日俄罗斯》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威胁俄罗斯的五个理由》的文章。文章中的五个理由没有一条是说美国的反导系统可以拦截俄罗斯远程弹道导弹的。五个理由分别是：1. 陆基“宙斯盾”系统的垂直发射装置可装载并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这违反了《中导条约》；2. 反导系统功率强大的雷达可以监视俄罗斯的领空，与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同理；3. 美国为测试反导系统开发的目标火箭若装载了核弹头就违反了《中导条约》，就等同于朝鲜发射运载火箭违反联合国相关决议；4. 美国称反导系统不影响俄方远程弹道导弹的发射，但在小规模冲突中会影响俄方的飞机和导弹的使

用；5. 美方拒绝了俄方所有缓解因美方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引发紧张局势的建议。

很显然，无论是乌里扬诺夫的谈话还是《今日俄罗斯》的文章，都把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之举的违约作为前提和重点。至于其间由俄罗斯媒体透露的俄罗斯将要打造的重达100吨的重型弹道导弹——“萨尔马特”，那只是俄罗斯作为“后手”的一个谈判筹码。5月13日，在美国于波兰的反导系统开始破土动工之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防工业会议上发表了回应性讲话。其讲话的内容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美国在东欧建立反导系统之举打破了战略平衡并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二是俄罗斯为此将调整军事部署消除威胁；三是俄罗斯不准备就此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其实，普京讲话的三层意思中的前两层意思在之前的俄官员和俄媒体中已有所表达。普京讲话中的关键点是第三层意思——俄罗斯不准备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这显然是给美国的下任总统留下谈判的余地，而谈判的筹码就是包括发展“萨尔马特”导弹等在内的军事反制手段。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下任美国总统仍坚持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不仅会突破《中导条约》的制约恢复发展中程导弹，而且还会不顾俄、美2010年达成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的限制发展新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当然，在2018年上述“条约”到期后，普京还可能会以不再与美国进行“新条约”谈判为筹码，迫使希拉里或特朗普限制或放弃东欧反导系统的部署。

最后我想说的是，国内一些媒体在评论美、俄的战略博弈时，过分强调了普京“狠”的一面，而忽视了普京作为一个政治家必备的理性一面。从2008年出兵格鲁吉亚到2014年兵不血刃“收复”克里米亚，再到2015年在叙利亚“出奇兵”，普京的“行动自信”未必是来自他刻意表现出来的性格，恐怕更是来自他对俄罗斯和对手真实实力的准确评估。虽然现在还不能断定美国下任总统是否愿意妥协坐下来与普京就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展开谈判，但我们绝不能以“看戏”的心态天真地认为，普京会不计后果替别国“挡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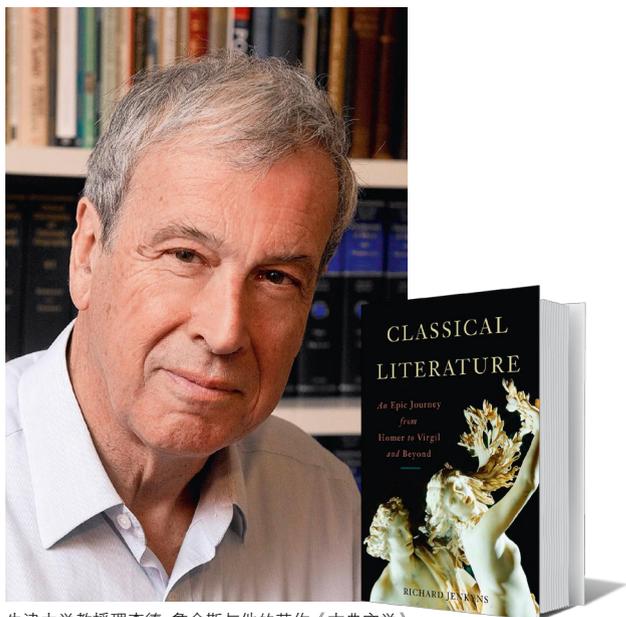


5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与安全理事会成员召开会议

辉煌的古典

主笔 / 薛巍

牛津大学古典传统讲座教授理查德·詹金斯说，西方古典文学包含一些可以跻身于人类心灵最高成就的作品，它们非常辉煌，既有深度，又有原创性、多样性。



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詹金斯与他的著作《古典文学》

《荷马史诗》和哲学

古希腊和罗马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个是希伯来文化）。一部新的哲学史说，如果列举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必定会包括4个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其中前两个。欧洲最伟大的6位诗人肯定会包括荷马、埃斯库罗斯和维吉尔。如果挑选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肯定会落到修昔底德头上。

理查德·詹金斯是牛津大学古典传统讲座教授和赞词宣读员、《罗马的遗产》一书的主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古代史荣休教授鲍尔索克说：“作为牛津大学的赞词宣读员，詹金斯负责用拉丁文撰写对学位接

受者的赞词，他华美的拉丁语以及敏锐的玩笑让听者莞尔。作为古典传统教授，他在专著和论文中探索西方文学以及音乐中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无穷无尽的踪迹。他的近著《罗马想象中的神、空间和城市》记述了古罗马这座城市的历史；他的新书《古典传统》篇幅很小，只有200页，但他在书中介绍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所有重要的作者的著作，并表达了他新颖的、吸引人的、会引发争议的个人见解。”

“古典”一词有多种含义。詹金斯说，他书名中所用的“古典”是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艺作品。“古典”的另一种含义强调形式上的完美、平衡，与之相对的是“浪漫”，强调个人的情感表现、激情和不规则等。这种一词多义现象造成的一个结果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古典文学是第二种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文学，它们并不是“冷冰冰的、有礼有节的”，如《荷马史诗》。现在大部分学者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出自两位诗人之手。他们的第一个理由是，这两首诗的语言不通，第二个理由是这两部作品表达的价值观和信仰差别很大，不像是出自同一个人。詹金斯认为这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语言学证据模棱两可，并没有完全指向一个方向。道德观上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想象力很强大的诗人在尝试创作不同种类的诗歌。”

跟《伊利亚特》不同的是，《奥德赛》的社会范围很广。人物包括奴隶、乞丐，甚至还有一条狗，除了奥德赛之外，大部分有趣的人物都是女性。《奥德赛》除了讲述奥德赛的返乡之旅之外，还有一个次要的情节。“实际上，奥德赛本人直到第5卷才出现。在那之前讲的都是奥德赛的儿子特勒马科斯的故事，他父亲归来时他外出寻找。”当他回到家之后，他母亲的那些求婚者发现他有了他之前缺少信心。当他母亲让他走开时，他回答说：“我了解并明白了我精神中的一切，无论好的还是坏的；在我是个婴孩之前。”之后他命令她回她的房间，她令人惊讶地听从了。他现在是一个男人了。他的故事是成长小说的鼻祖。奥德赛说，他的故乡虽然崎岖不平，却是年轻人的好看护。异国的宫殿再华丽也不如自己的家和父母更甜蜜。在这里，文学开始探索身份认同和归属感。伊萨卡岛也许不是最好的地方，但它是奥德赛感情的

寄托，虽然穷却是自己的。《奥德赛》还赋予了婚姻很高的价值。奥德赛说：“没有比一对男女和谐地一起生活更好的事情了，它令他们的仇人痛苦，令他们的朋友快乐。”

柯勒律治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柏拉图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前者是玄虚的、超验的、理想主义的，后者是实用的、经验主义的。詹金斯提醒读者不要被这种看法误导：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虽然有差异，但他们毕竟是师生关系，对哲学的范围及其开展方式有着同样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伊壁鸠鲁尝试了另一种路径。他从物理学开始，认为除了原子之外再无他物存在，有着无数原子以及无穷的空间。从这些科学真理得出的哲学结论是，不存在超自然的秩序，没有形而上学，一个人能够理性地追求的只有他自己的快感，死亡是一个完全不用去关心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伊壁鸠鲁延续的是前苏格拉底的传统：自然科学与哲学携手。他的影响持续了几百年，但从长远来说，还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展的苏格拉底式的思想更流行。苏格拉底把哲学跟自然科学彻底分开。亚里士多德虽然是一位科学家，但他区分开了他的科学和他的抽象思考。詹金斯还说，亚里士多德现存的著作的风格非常单调，但并不能彻底勾销他的著作的美学价值。它们的简洁有其自身的力量。比如在读《尼各马科伦理学》时就会感受到它的密度：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几乎每句话都会带来新的相关的东西。

西塞罗的修辞术

在古典时代，修辞术也非常发达。修辞术是说服的艺术。有人说修辞术有三种目的：告知、打动和愉悦。它应该既诉诸人的理性，又诉诸人的情感。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建立起两种修辞观。一种认为修辞术是一种高贵的艺术。最好的演说家是能够向他的城邦给出最佳建议的人。昆体良在论演说家的教育一文中说，演说家首先必须是高尚的，完美的演说家的本质是智慧。另一种观点认为，演说家要能够为他接到的所有案件辩护，因此修辞术的艺术就是能使更坏的动机显得更

好。还有第三种修辞观，它强调审美因素：修辞术研究的是如何最有效地使用词语。按照这种看法，文学都可以用修辞术的术语加以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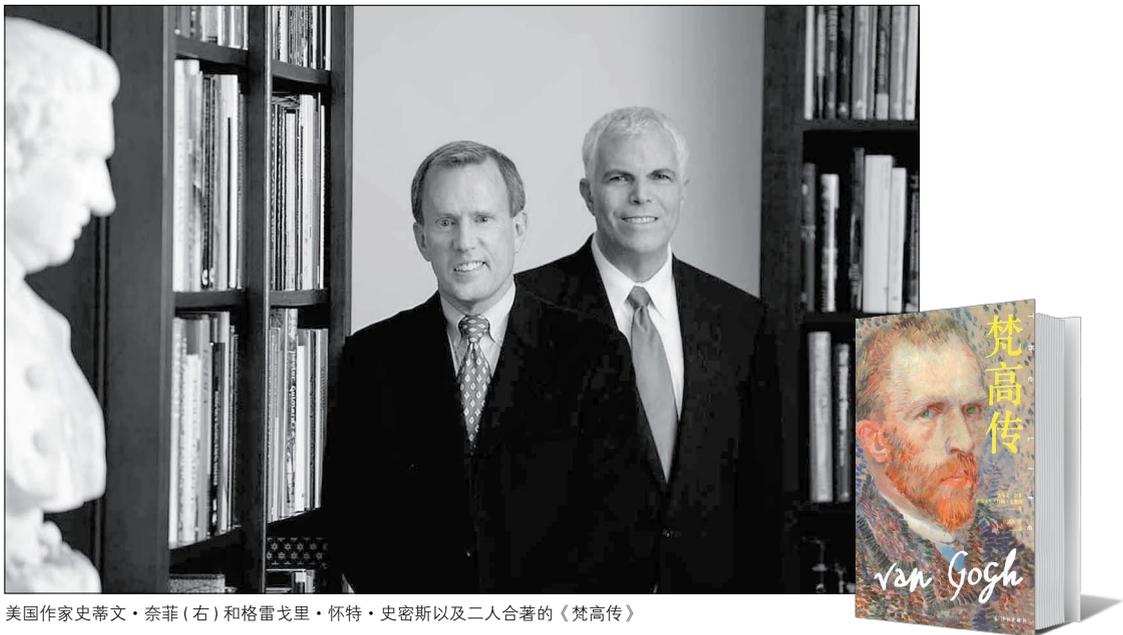
詹金斯说，这三种修辞观在人的头脑中并非泾渭分明。实际上，古代人从未解决作为智慧的演说和作为欺骗的演说之间的冲突。柏拉图在他的《高尔吉亚篇》中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一冲突。西塞罗认为修辞术很崇高，但他也吹嘘说他能够欺骗评审员。高尔吉亚是一位来自西西里的智者，以传授修辞术为生。他留下了两篇作品，其中一个为悖论练习，赞颂海伦的通奸行为。

西塞罗很早就确立了他的罗马第一演说家的地位。但他之所以主导了他的时代，有两个偶然的原因：一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演说家中，只有他的演说稿得以传世，完整和不完整的一共 58 篇；其次，他还留下了 900 多封书信。所以在古代人中，后人对西塞罗的了解最多。但后人对他的评论却不一致。无疑他是一个自命不凡、脾气很坏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勇敢的、有魅力、充满活力的人。他的诗歌经常遭人耻笑，但从留下来的残篇来看还是令人满意的。有人认为他的哲学只是衍生的，是对各种学派的筛选和综合。西塞罗很重视他的哲学。他无法接受任何主流的哲学学派，最后他决定做一名学者，这是他的政治地位很自然的结果，学者所持的是温和的怀疑论，认为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必须将就着可能性来行事。修辞术家首先要通过一场杰出的控诉来扬名，然后通过辩护来建立关系网。按照这种路线，西塞罗唯一的控诉针对的是西西里总督维勒斯，它的结尾非常精彩，是对神灵的求助，在一个长句中使用了 800 多个词。☑

实际上，古代人从未解决作为智慧的演说和作为欺骗的演说之间的冲突。柏拉图在他的《高尔吉亚篇》中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一冲突。

凡·高之死，这很重要吗？

文 / 马凌



美国作家史蒂文·奈菲（右）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以及二人合著的《梵高传》

1889年，新锐评论家艾尔贝·奥里耶在唐吉老伯的画材商店橱窗里看到了两幅《向日葵》，旋即于1890年1月的《法兰西信使》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孤独的灵魂》，将溢美之词两点一样泼向文森特·凡·高：“一个象征主义者”“一个狂热分子”“一个喝醉酒的巨人”“一个亢奋的唯美主义者”“一个强健的、真正的艺术家”……这也是文森特在世时所获得的最高评价。1月20日，布鲁塞尔“二十人展”开幕，凡·高作品中的向日葵、麦田、果园和葡萄园首次被放置在塞尚、雷诺阿、劳特累克、西涅克等画家的旁边。3月19日，“独立艺术家沙龙”在巴黎开展，赞美之词洪水一般涌来，“10幅画，见证一个罕见天才的诞生”。可是，盛誉之下他也只不过卖出了一幅画，还是毕生唯一一幅：《红色葡萄园》，400法郎。这迟来的声望未能缓解他一生所积累的精神焦虑，已经在精神病院出入多次的文森特前往小镇奥威尔。7月27日，他身受枪伤，29日在弟弟提奥·凡·高的怀抱里去世，终年37岁，留下近900幅油画与1100幅纸上素描。

作为文森特一生的经济支持者，也作为这大笔画作的继承人，职业画商提奥计划为哥哥举办一个盛大的展览，并推出哥哥的书信选，不幸的是，他自己也崩溃了——医生诊断是梅毒所致的肢体麻痹和精神失常。1891年1月提奥逝世于荷兰乌特勒支的一家精神病院，凡·高家族对这体面的死亡保持沉默，提奥遗体埋于公共墓地，连葬礼都没有举行。好在，提奥的妻子乔安娜·邦格承担起亡夫的志愿，从事文森特书信的出版和翻译工作。到1914年，书信选付梓，一个天才的内心世界得以为世人所知，“文森特之星”终于冉冉升起。又过20年，26岁的欧文·斯通依据这批书信写出了激情澎湃的传记小说《渴望生活：凡·高传》，“艺术殉道圣徒”的形象自此深入人心。1953年文森特·凡·高诞辰百年之际，隆重的纪念活动使他的声誉又上升到新的高度，1956年由《渴望生活》改编而成的电影获得奥斯卡奖，文森特·凡·高终于成了现代艺术史上永远的传奇。

一位痛苦而不被赏识的艺术家，为了逃避世人的

漠视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太能满足大众泛滥的同情心。斯通这样悲情而又浪漫地描绘文森特之死：“他把脸仰向太阳。把左轮手枪抵住身侧。扳动枪机。他倒下，脸埋在肥沃的、辣蓬蓬的麦田松土里——生生不息的土地——回到他母亲的子宫里。”歌手唐·麦克里恩也在《繁星之夜》里感喟：“你如何承受天才智慧的折磨，你如何试图解脱自己……因为他们不能爱你，但你的爱是真挚的，当内心再也没有希望，在布满星星的夜晚，你像情人们常做的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这是画家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戛然而止的最高音。所以假如有人论证说，文森特不是自杀，而是被十几岁的小流氓所害（尽管可能出于意外），而且发生事故的地点并非金黄色的麦田而是毫无诗意的粪堆，那么，奠基于传奇之上的“凡·高文化工业”——展览、图册、学术研究、咖啡杯、雨伞、明信片、计算机程序——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史蒂文·奈菲（Steven Naifeh）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Gregory White Smith），两位作者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们以特有的“专业敏感”复原了文森特死亡的场景，剥去年深日久、道听途说所形成的历史积垢，这算是新版《凡·高传》的最大噱头。该书诞生于2011年，好评如潮，被誉为迄今为止最翔实的凡·高传记。值得说明的是，二位作者的“法律精神”并不仅仅体现在有关弹道、距离、证据和推理之中，更体现为他们对文森特书信的“拷问”以及对于艺术家心态和精神世界的“查证”。

当年，乔安娜·邦格编辑出版的文森特书信只是选集，以“写给亲爱的提奥”为核心，而存世的几千封书信不仅包含兄弟二人的通信，还包含家人、朋友的相关通信，权威的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耗费15年时间进行编辑整理，最后成果是出版于2009年的6卷本全集。奈菲和史密斯的研究奠基于书信全集之上，他们的睿智之处在于，“并未把凡·高的信件当成其生活事件甚至是想法的可靠记录——至少没有这样来阐释”。他们认为信件与日记不同，“不是只供作者倾诉内心烦恼的媒介”，而是在特定语境下与特定对象针对特定问题的商谈，有目的，亦不乏文字策略。

凡·高兄弟二人的人生际遇大为不同。身为著名的古庇尔画廊的经理，提奥春风得意，他赡养家庭、包括每月为哥哥提供100~150法郎的资助（当时一个教师的月收入不过75法郎），维持着家庭在社会中的体面地位，因此被家人宠爱、祝福、拥抱和喜欢。

而一生“事业失败”、脾气暴躁（曾经在暴怒中拿起餐刀对着父亲）、索取无度、出入精神病院的文森特被视为“家庭的劫难”。身为牧师的父亲在对长子的遗憾中辞世，母亲对他不闻不问，认为他的艺术“荒谬可笑”，除了提奥之外，另外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与他相当疏远，以至于在他的葬礼上，家庭成员只有提奥出席。奈菲和史密斯提醒读者，由于二人的遭际反差过大，文森特与提奥的关系远非“我亲爱的提奥”那般单纯美好。文森特不断向弟弟要钱，以便雇用模特、租赁画室、购买画材、支付旅费、出入妓院、买衣服、买家具，甚至装修整个房子——阿尔的黄房子。不仅如此，他还需要“说服”弟弟与他开创伟大的“商业计划”，以及从弟弟那里获得亲情友情手足之情。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剥削与需要，在书信中有着曲折的表达。两位作者指出：

“文森特在信中向提奥倾诉了多少心里话，他同时就在内心隐藏了多少真实想法，他害怕弟弟疏远他，进而威胁到弟弟对自己的经济资助，或是证实家人对他的言之凿凿的绝望判断。同时他可能利用敏感而棘手的问题作为要挟的利器。比如，威胁会采取一些影响兄弟情义或让家人尴尬的行为，从而迫使提奥拿出更多的钱；或者先主动提出某种不计后果的鲁莽做法，然后再将其弃之一边，这样来诱使提奥赞成他一直以来真正想做的事情。”

总之，文森特书信中叙述的准确性乃至真实性，大可质疑。研究者发现，至少有几次，文森特为他的信草拟了好几稿。而在字里行间，引人注意的沉默、耐人寻味的不合理推论，或是闪烁其词的省略（“等等”是他喜欢的词），都是他用以掩饰痛苦、憎恨、屈辱和挫败感的手段。这种迂回婉转，有时变成了欺骗，对传记作者提出了特别大的挑战。

居住在艺术史中的艺术家是可亲可敬的，但是居住在隔壁的艺术家是有可能让人避之不及的。同时，望远镜或许有助于塑造圣徒，可是显微镜下绝没有英雄。这部《凡·高传》厚达900页、90万字，在日常生活无数鸡毛蒜皮中“还原”的文森特·凡·高形象，不再是80年来千万凡·高迷所熟悉的“殉道者”，而是一个偏执的、自私的、心理与精神皆有着严重问题的艺术家。历史上第一个盛赞文森特的人，也就是那个年轻的艺术评论家艾尔贝·奥里耶说了太多主观的话，但他毕竟还是抓住了重点：“他的大脑处于高潮状态，难以抵抗地将熔岩倒入艺术的深谷中；他是一

个可怕的、发狂的天才，通常很高雅，有时行为怪诞，总是处于病态的边缘。”

当年的医生诊断文森特·凡·高是“躁症，伴有典型的精神失常”，或是“潜伏性癫痫”，显然凡·高家族一直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病史，基因或许是致病的重要原因。《星夜》完成一个世纪以后，科学家发现潜伏性癫痫发作类似于脑电波激起的火花，像是某种神经风暴，又像是大脑中的连环爆炸，而每一次癫痫性轰炸都会动摇大脑的神经运作功能，使人进入高度超现实的状态，很多情况下病人会产生宏大的宇宙观和宗教狂热。在这个意义上，“文森特笔下旋转的、给人以精神错乱之感的、宇宙形成的亢奋画面表明，他的防御机制已被攻破”。提奥曾经说：“很多画家疯了以后才开始创作出真正的艺术，天才沿着神秘的轨迹成长。”的确，文森特艺术的爆发期与他的精神疾病同步，无论是《星夜》《丝柏》《向日葵》还是麦田，都有着一种神经质的抽搐与炸裂之感。提奥向第一位敢于赞赏文森特作品的艾尔贝·奥里耶表达感激之情：“要知道，他的画就是他本人的写照。”

从传记写作的角度衡量，《凡·高传》是“电子

数码时代”的产物，两位作者发明了特别的软件来对多达10万张卡片进行数据处理，“幕后支持团队”包括8位研究者和18位译者，除了这一大部头纸质著作，还创建了一个将参考文献、文本注释、插图和照片融合在一起的网站，据说注释部分打印下来约需5000页。难得的是，虽然有着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充塞着大量的细节与考证，本书却又不失故事性和艺术性，框架清晰，文笔清新，有成为畅销书的资质。

那些为我们的文化做出持久贡献的人，或许是因为被我们审视得太久，因此在我们的眼中无法保持纯洁。但传奇之所以为传奇，就在于尽管有后来无数颠覆传奇的努力，每一次翻案不过是加强了传奇的实力而已，就像水归于水，就像风归于风。所以《凡·高传》并不会对凡·高造成损失，甚至也不会对凡·高文化工业造成损失。比文森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他画了什么。在他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画过一棵蓝色天空下的杏树，粗糙多节、濒临死亡的树枝歪歪扭扭地伸向天空，热烈地绽放出粉色和白色的花朵。艺术的动人之处，就在这里，如此简单。✎



14 新知 WISSEN

春暖
花开
造房子

《新知》2016年第2期上市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刘心武：更自由扇动文学的翅膀（2）

文 / 朱伟



刘心武

（任峰涛摄/新华社供图）

《如意》在1980年发表，是试探了人道主义讨论的禁区的。它通过“我”——原贝勒府变成十三中学内教师刘心武的视角，写出在不断生成的政治漩涡中一个朴实、敦厚、善良的扫地工友石大爷的形象。“如意”是从贝勒府流落到胡同杂院里，变成自食其力劳动者的格格赠石大爷的信物。石大爷与格格，在极“左”思潮的观念里，构成着不可逾越的社会关系——在只有人的社会关系学而不能有人学，只有人的社会属性而不能有人性的社会认知氛围中，不能有混淆阶级关系的亲情。当时有关“人道”与“人性”的意识形态讨论刚揭开序幕，主角都还未登场，刘心武就通过这朴实的石大爷与落魄的格格的关系，来呼吁普世“人道”“人性”的位置了。石大爷与格格之间是爱情吗？石大爷只是觉着，一个贵族成了贫民，住进胡同受苦很不易，记得她当年救他之恩。格格也只是念他多年关照之好，只是说，“我这辈子遇上的好人有数，没指望还能交什么好运”。在当年政治风雨中，这样的质朴特别真实。石大爷给打死的资本家盖上塑料布，只是觉得其尸身不能雨淋，“他也是人”。他所有的挺身而出，都只是“可怜那让别人不当人待的人”。刘心武是以他所叙述的石大爷的作为，来给人性正名，

这个闪烁着质朴光辉的形象丰满了他原来的创作方式。这是刘心武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得最好的小说，它使原对他社会概念化创作有异议的人刮目相看，形成了他第二阶段创作的开端。这篇小说对他人影响很大，比如湖南作家古华后来写《芙蓉镇》，深夜帮助扫地的细节，就令人想起石大爷。

遗憾的是，《如意》之后，第二个中篇是《立体交叉桥》，他又回到了社会学分析师的角色。《立体交叉桥》发表在1981年第二期《十月》上。80年代初，立交桥代表着城市现代化，刘心武的这个中篇显然与1980年建成的上下三层，当时宏伟成北京新颜面的西直门立交桥有关。在他的小说中，新的立交桥将崛起于东单——他忽略了长安街作为迎宾大道不容改变的事实。亏得城市规划者没敢用立交桥来切割主城，事实是，之后所有的立交桥都建在了环路上。

刘心武是通过立体交叉桥崇拜，来表达城市现代化的渴望。在他当时的意识中，唯有城市现代化的脚步——拆迁，才能改善人的生存环境，而生存环境才是人学之本，这当然是进一步呼吁人性——在不尊重人的前提下，才有了人均居住3或5平方米，不人性的混居、合居环境，不人性的环境培育出不健康的人格。刘心武痛心疾首地描写出蜗居胡同大杂院中的三代七口人，在隔成里外间的16平方米空间里的彼此扭曲：哥哥没能力争到房子，自认自己窝囊而自卑；弟弟攀到高枝，找到高干家的媳妇，为自家寒酸而自卑；妹妹找不到对象，为自身没位置自卑。这是70年代末的典型环境：本为解决人口爆炸疏散出去而“上山下乡”的，“文革”结束后全部返城，都要争这16平方米里的居住权，毕竟空间有限，于是本性都被扭曲，正常人都变成不正常人。

刘心武是最早描写这种不人性拥杂居住的。他从生存空间来写人性，来写这样畸形的人性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对社会生态的揭示得以深进。与王蒙的小说以写自己为主体不同，刘心武写的是社会，他在这大杂院外，是个叙述者、揭示者、感叹者，他自己的故事你很难寻觅，他掩藏着他的本体。在小说结尾前，主人公老大侯锐走到北京站广场，见广场上随意坐卧的人们的感叹，是刘心武自己的。他先感叹：“人，

应当随时随地都是高尚的，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做到这一点却如此之难？”然后再反问，难道一个人所需生存空间的缩减，能换来社会纯洁，人与人关系相对美好？他把侯家兄妹的问题，归结于缺乏自己足够的空间，所以，立交桥能带来的城市格局变化，就意味着“有限空间的开拓、拥挤人流的开拓，人际关系的回避”。回归人性要从回归人所需，属于自己的足够私人空间始。

《立体交叉桥》发表后，直到1983年开始写第一个长篇小说《钟鼓楼》，他没再写出有分量的作品。1982他参与了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讨论，高行健与他是挚友。

高行健的这本小册子是1981年9月在花城出版的，高行健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工作，还没去“人艺”。他法语好，读过萨特、加缪之类很多原著。为什么到花城去出版？因为当时花城出版社总编辑是李士非，他拉了冯亦代去编《现代外国文学译丛》，引进很多新小说，花城当时的开放尺度，也吸引了北岛和很多诗人作家。

高行健的这本小书当时一出版就在北京圈内受到热捧，李陀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82年冯骥才致李陀、李陀致刘心武、刘心武致冯骥才讨论此书的三封信发表在《上海文学》第八期上，于是有了“四只风筝”的说法。“风筝”最先来自冯骥才信开头，对高行健此书的比喻：“在目前‘现代小说’这块园地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情况下，好像在空旷寂寞的天空上，忽然放上去一只漂漂亮亮的风筝。”然后，刘心武信中称冯、李与他都是放出“风筝”，也就成了“四只风筝”。其实，在他们三人通信发表前，王蒙先在上海《小说界》发表了一封给高行健的信，刘心武信中称，那也是一只“难说漂亮，只能说可喜”的风筝，那就是“五只风筝”了。

仔细看这三封信，观点其实相差很大。冯骥才认为，现代派实质是“文学上的一场革命”，是“时代产物”，因此要承认它的存在。社会需要现代化，文学也需要现代派，但此“现代派”指“中国的现代派，而不是全盘西化，毫无自己创见的现代派”。李陀的标题是《“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特意将“现

代小说技巧”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分开，认为：“可以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派小说中的技巧因素，创造出和西方现代派完全不同的现代小说。”但他又强调：“怎么能设想这样一个新的文学时期会不探索、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学形式呢？”认为形式一定会决定内容。刘心武呢？他强调了文学发展的“四个坚持”前提，强调中国特色的主流读者对象——工农兵“恐怕很难消化‘现代派’作品”。他显然也不同意李陀对形式重要性的强调，他认为，所谓“形式美”，应该是可“拆卸”的“技巧元素”。

这三封信，冯骥才写于3月31日，李陀写于5月20日，刘心武写于6月8日。这两个月，文坛背景是，4月，老作家徐迟在华中师大主办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现代化与现代派》，提出“社会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文学的现代派”，观点与冯骥才类似。随后，胡乔木在《红旗》杂志发表了《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他》，也就是说，李陀与刘心武的信都写在胡乔木的文章发表后。80年代上半期的不同选择，决定了他们之后的不同道路。☐（未完待续）



1. 1980年《十月》第3期发表了刘心武的《如意》，发表时未等重要位置。这一期的中篇小说头条是宗璞的《三生石》
2. 1981年《十月》第2期发表了《立体交叉桥》，头条位置。这一期上还发表了古华的重要作品《爬满青藤的木屋》
3. 1982年《上海文学》第8期发表了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关于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通信，自此有“四只风筝”说

大家都有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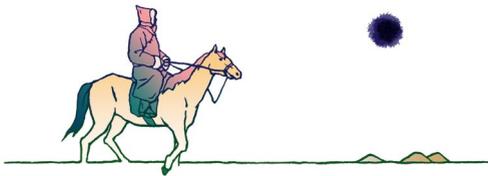


朱德庸



隐藏的情节

文 / 照日格图（内蒙古） 图 / 陈曦



弟弟电话打来的时候我被吓个半死。父亲试图自杀，现在医院里，正在给他缝针。就这么一句话，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从床上一跃而起。女儿出生之后妈妈来呼和浩特帮我照顾孩子，父亲留在牧区，给弟弟帮忙。弟弟说，没有妈妈在身边，父亲就显得特别孤单，手边的收音机一开就是一天，从不换台。或许他根本也不听，找个伴儿而已。

父亲有严重的高血压，这导致那个健步如飞、经常在草原上一个人打草放牧的汉子成了拖着一条腿，一步一步缓慢挪动的笨老汉。起初，父亲常常为此事生气，说自己现在完全是废人一个。他拿妈妈出气，经常把碗筷摔得到处都是。妈妈知道他接受不了现在的自己，尽量让着他。后来，他也适应了现在的生活，拖着他的一条腿早晨起来给牛喂草、收拾牛圈、打扫院落。只是人变得异常敏感，“老”和“无用”两个字我们都很少提及。

那天，父亲患了感冒，弟弟就没让女儿查斯娜去爷爷那屋。父亲想去收拾牛圈，弟弟说他还在感冒发烧，自己去收拾了。父亲把这两件事放到一起，认为弟弟和弟媳妇已不再喜欢他，不仅不让孙女儿来和他玩，连牛圈都不愿意让他碰。可能是感知到了“无用”的可怕和孤独，当天晚上他喝了一瓶白酒，给牛割草的镰刀被他磨得锃亮，等弟弟他们睡下之后便照着自己的脖子来了一刀。弟弟说，在推进医院手术室的时候父亲哭了，不知道哭的是什么。

弟弟跟我说，在医院的那一周里，父亲特别乖，医生说什么他都听，任他们摆布。只是，病房的人问起他怎么会变成这样时父亲就说是让人给揍了。我也放心不下，打算用最快的速度把父亲接到呼和浩特来。尽管父亲一再要求还是坐火车便宜又稳妥，可我坚持让他坐一回飞机。尽管是弟弟陪着，他还是问了好多关于飞机的问题。我一一解答，并提醒他要提前两个小时去机场，还告诉他机场离市区较远。呼伦贝尔和呼和浩特温差太大，父亲穿了一身冬衣上飞机，

也不知道脱下来，下来时满头大汗。见面时我绝口不提自杀之事，故作轻松地问他坐飞机的感觉如何。父亲说飞机就是噪音大，还特别热。见我笑，他也笑了。出了机场，那个曾经在草原上策马驰骋的父亲，竟然不知道步子应该怎么迈，看着电梯试了几下也不敢站上去。我来做示范，他才战战兢兢地站到我身边，还打趣说：“你们城里人可真懒，上楼梯都不用爬了。”等我们登上小区楼道里的电梯，父亲就更自信了，说：“你看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们果然懒。”我本想说，“您腿脚不方便，这样不是正好吗？”可话到嘴边还是没说出口。

白天我和妻子上班，母亲忙着带孩子，父亲变得无所事事，整天坐在家里。在牧区，男人很少带孩子，也基本不接近锅灶，父亲到了城里全然没有了用武之地。想到父亲必须有事可做才可以，我就从小区的饮水处给他办了一张打纯净水的卡，这样他每天需要接三次水，可以下楼活动活动。起初，父亲对刷卡程序一窍不通，我教了两次，他便学会了，甚至还学会了找旁边那位中年女人往打水的卡里充值。给父亲的零花钱，他从不花净，至少留着100元，他说，每次充值至少得用100元，没了这钱，一家人就吃不上水了。父亲的认真和天真让我都不敢相信，他就是一个月前在自己的小屋里试图自杀的那个人。

稍稍有空，我就喜欢问父亲关于爷爷和太爷爷的事，他也喜欢给我讲这些。有时也喜欢给我讲他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我们聊得再多，也没聊过那次他自杀的情节，我打算永远不触碰这个话题，还为此专门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告诉妻子和母亲要将这个情节隐去。她们比我还敏感，自然知道我的意图，点头不语。■